

军事科学理论



战略学概论

● 王宝山 主编 ●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军事 科学 理论

战略学概论

王宝山 主编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战略学概论

王宝山 主编

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3印张 281千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5369-0737-0/E·2

定价: 4.70元

前 言

当前的国际形势，总的看来，仍是由紧张转向缓和，由对抗转向对话。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是必须看到，世界上仍然存在着不安定的因素，存在着可能导致发生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的危险。人类铸剑为犁的时代远没有到来，化干戈为玉帛也还只是善良人们的一个美好愿望。

即将结束的1989年，世界上仍存在着15场战争，这些战争与冲突造成30多万人的死亡，核弹头总数在继续增长，已达5.7万枚，相当于在广岛所投原子弹的12亿倍，有16个国家处于军人控制之下，是十年来最多的数目，63名记者被害，84个国家出现风波，次数是1988年的两倍……1989年将作为充满重大事件的一年被载入史册。这些事实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了“和平与对话”帷幕之后的刀光剑影。事实再一次告诉我们，“天下太平，无敌国外患”的观点是极其错误的。

《战略学概论》从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我国的客观实际出发，着眼未来战争的可能发展，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探讨如何对付敌人的全面入侵和局部入侵，如何加强相对平时战争准备等问题。它既可作为军队院校军事理论教学和部队干部军事训练的基本教材，又可作为地方大专院校、高中学生军训及社会各阶层干部和青年

进行国防教育的参考资料和补充读物。

战略学作为军事学术的独立学科，早在十九世纪中叶就出现了。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非常重视军事战略的研究。我们国家的“战略热”，是在我国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之后掀起的，起步较晚。因此，战略学在我国可以说是一门古老的“新兴学科”。

本书经过编著者的努力，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十三届五中全会的热潮中脱稿了。由于参考资料和我们的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错误和不足在所难免。诚望广大读者和专家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再版时更正。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我们参考了军事科学院《战略学》、《战争与战略问题研究》、原军事学院《战略学教程》、解放军出版社《积极防御战略浅说》等书目，并吸收了近年来军事学术研究的有关成果。在此对原作者表示感谢。

参加本书编写的是多年从事军事理论教学的教员。

王宝山任主编。

各章撰写人：魏连第第一章；王宝山第二章、第九章；梁彦宁第三章、第四章；丁凤仪第五章；周志哲第六章；车正兴第七章、第十一章；郝应禄第八章；李振成第十章。

本书最后由郝应禄、王宝山统稿。

编 者

1989年12月30日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战争.....	(1)
第二节 战争与其它因素的关系.....	(13)
第三节 战争规律与战争指导规律.....	(28)
第二章 战略概述	(39)
第一节 战略.....	(39)
第二节 战略学.....	(63)
第三节 战略的客观基础.....	(66)
第四节 战略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73)
第三章 积极防御战略	(80)
第一节 积极防御与消极防御.....	(81)
第二节 历史上的防御理论和防御作战.....	(86)
第三节 我军积极防御战略.....	(92)
第四章 世界战略形势和苏美军事战略	(132)
第一节 世界的基本战略形势 和我国对外政策.....	(132)
第二节 亚太地区的战略形势及未来爆发 军事冲突的主要动因.....	(148)
第三节 苏美军事战略及新的变化.....	(165)
第五章 现代战争	(195)
第一节 什么是现代战争.....	(195)

第二节	现代战争的特点·····	(203)
第六章	战略方针与战略作战原则·····	(230)
第一节	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的首要问题·····	(230)
第二节	我国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	(235)
第三节	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必须 坚持的战略指导思想·····	(242)
第四节	战略作战原则·····	(253)
第七章	中国的武装力量·····	(264)
第一节	中国人民解放军·····	(264)
第二节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275)
第三节	中国民兵·····	(277)
第四节	我国的兵役制度·····	(280)
第八章	反侵略战争准备·····	(284)
第一节	现代战争准备的特点和要求·····	(285)
第二节	战争准备的基本方针和原则·····	(289)
第三节	提高全民国防观念, 保持应付战争 的精神准备, 防止敌人突然袭击·····	(297)
第四节	积极发展经济, 把战争准备 建立在可靠的物质基础上·····	(306)
第五节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 提高 全民族的政治素质·····	(317)
第六节	加强军事方面准备, 提高 我军战斗力·····	(323)
第七节	由平时转入战时状态·····	(335)
第九章	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	(341)
第一节	战略阶段·····	(341)

第二节	战略防御.....	(345)
第三节	战略进攻.....	(353)
第十章	战略指挥	(361)
第一节	战略指挥员的素质和品格.....	(362)
第二节	战略指挥的基本要求.....	(369)
第十一章	战争中的政治工作	(394)
第一节	未来反侵略战争，政治工作 仍然是我军的生命线.....	(394)
第二节	战时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	(398)
第三节	对战时政治工作的要求.....	(405)

第一章 绪 论

为了指导战争，取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就必须认真学习研究战略问题。

研究战略问题，首先又必须对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关于研究和指导战争的立场、观点、方法，有个基本的认识，以作为学习战略学的理论武器。正是从这点出发，我们在绪论中首先介绍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观、方法论的几个基本问题。

第一节 战 争

自从人类社会有了战争，人们就在不断探索战争的奥秘。对战争的研究可以有多种方法，从纵向可以考察它的来龙去脉，从横向可以研究它同其它诸因素间的关系。这样可以对战争这个事物获得一个完整的概念。从而准确地把握其本质。

那么，什么是战争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阶级、国家、民族以及政治集团之间为推行一定的政治目的而进行的极端残酷激烈的武装斗争。毛泽东同志对战争也有过一段科学的表述，他说：

“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

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毛泽东选集》第155页）这段论述，深刻地揭示了战争的起源和本质，是我们研究战争的理论基础。

一、战争是阶级社会特有的历史现象

战争和客观世界中的一切事物一样，有着它自身的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科学地揭示战争的本质，必须首先从战争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去加以考察。

战争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在生产水平极其低下的原始社会，生产资料是原始公有制，人们集体劳动，平均分配，才能勉强维持生存。那时，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阶级和战争。当时的部落之间虽然有时也会发生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作“战争”的暴力冲突，但与私有财产和阶级产生后的战争有着质的区别。到了原始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产品有了剩余，随之出现了社会分工、产品交换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于是，氏族内的一部分成员（如氏族酋长）开始脱离生产，渐渐地演变为专门依靠剥削他人为生的奴隶主；部落武力冲突中的俘虏或本部落的穷困成员则被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渐渐地沦为奴隶。从而导致原始社会的解体和阶级社会（奴隶社会）的产生。这时，有组织（军队）、有目的（掠夺、奴役和剥削）的战争，就取代了原来部落间的武力冲突。从此，“战争以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已成为民族生活的正常职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0页）。

战争随着阶级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由于私有财产和阶级的出现，“几千年来人类的生活中充满了战争，每一个民族都不知打了几多仗，或在民族集团

之内打，或在民族集团之间打。打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帝国主义时期，仗就打得特别广大和特别残酷”。（《毛泽东选集》第442页）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要争夺世界霸权。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没有暴力和掠夺，没有流血和枪杀，帝国主义就活不下去。这就是帝国主义之所以为帝国主义”（《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78—179页）。两次世界大战的起因都是帝国主义为了重新瓜分世界和争夺世界霸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霸权主义的扩张政策而引起的局部战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我们说，现代战争的根源来自霸权主义者的争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并没有消失。

但是，当今的世界形势毕竟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世界作为矛盾的统一体，既有引起战争的因素，也存在着制止战争的因素。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第三世界以及第二世界的一些国家和人民（甚至包括第一世界的人民），是坚决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苏美军事实力的大体相当；战略部署的没有最后完成；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以及“雅尔塔协定”所规定的势力范围的有效性，使得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苏美两家，都不敢轻易发动世界大战。由于以上因素的制约，所以我们说，当前的和平是武装对峙下的和平，是脆弱的和平。只要全世界人民维护和平，反对战争，世界大战的推迟以至在一定时期内的避免，是完全可能的。但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发动世界大战的危险并未消失，马列主义关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理论仍然有效。对这一点，我们不能有丝毫动摇。

在将来，战争也必然会随着阶级社会的消亡而消灭，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到那时，阶级没有

了，军队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因而为解决阶级矛盾而应用的最高的斗争形式——战争，当然也不会再发生。

通过对战争的历史考察，不难看出，战争既不是与人类同时产生的，也不会“永恒”存在下去。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特殊社会现象，是同私有制和阶级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是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考察了战争发生、发展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原因后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因此，一切与此相佐的观点，如：“人类天性说”、“人口增长说”、“种族差异说”、“上帝意志说”等等，都是我们所不取的。

二、战争与政治的关系

战争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历史唯物主义战争观的一个根本问题，历来受到军事家的重视。中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在其兵法十三篇中，就很重视对“道”（即政治）的研究，并且把政治因素放在考虑备战的首位。尽管他讲的“道”是为维护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与我们所讲的政治的内涵有本质的不同，但身为两千多年前的古人能朴素地看到政治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却是难能可贵的。资产阶级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人类军事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著明论断。他认为“战争是政治的一种工具”（《战争论》删节本，第174页），“战争是由政治产生的。政治是头脑，战争只不过是工具，不可能是相反的。”（《战争论》删节本第178页）虽然克氏对“政治”涵义的理解并不科学，但它关于战争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却仍被列宁肯定为真理，称为“至理名言”，并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考察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

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军事文选》第319页）毛泽东同志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的观点，精辟地指出：“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毛泽东选集》第447页）。这就把战争与政治的辩证关系讲透了。那么，究竟怎样理解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呢？

1.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就是说，在战争与政治这一对矛盾中，政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决定战争，战争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之一。

政治决定战争的产生。斯大林同志指出：“在战争与政治之间，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政治产生战争，战争是强力手段的政治的继续。”（《斯大林文选》第456页）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分不开的，当某个阶级，某个民族，某个国家或某个政治集团的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时，为了扫除政治道路上的前进障碍，就要采用暴力的、流血的、这个最高的斗争方式——战争来加以解决。于是，政治就由非流血的方式转化为流血的方式进行。在这一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毛泽东选集》第446页）。

政治决定战争的发展进程和结局。战争爆发以后，是不是政治就中断了呢？不是的，政治在战争的发展过程中继续发挥着它的决定作用。一九七九年的对越还击战，教训越南地区霸权主义者，为“四化”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的政治目的，决定了战争的目的、规模、时间等，都是有限的。抗日战争中，虽然就军事力量比较，中日双方是敌强我弱，但由于政治上的优势在我方，所以尽管抗日战争的道路

艰苦漫长，但**敌败我胜**的结局则是早就决定了的。这些，都是政治在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上发挥决定作用的极好说明。

政治决定战争的性质。历史上的战争尽管有各种样式，但就其政治性质而言不外乎两大类，即**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所谓正义战争，就是一切符合人民群众和民族根本利益的战争。如解放战争和反侵略战争等即是。反之，一切违背人民群众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的战争就是非正义战争。如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的战争，掠夺和奴役别国人民的侵略战争等。一般地讲，战争双方总有一方是正义的，而另一方则是非正义的。也有战争双方都是非正义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国和协约国就是。

可见，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密不可分，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战争一刻也离不开政治。战争的筹划与指导，必须服从政治的需要；战争的样式、规模、性质，及所使用的战略战术，也要受政治的制约。政治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渗透到战争的各个方面。因此，我们必须确立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的观点，从而把军队的各项工作摆在适当的位置上。

2. 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

就是说，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是实现政治目的的特殊手段。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战争与政治具有同一性，战争与政治密不可分，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但战争毕竟不能完全等同于政治，它除了有与政治共性的一面外，还有自己的特殊性。这个特殊性表现在：第一，它不是一般的政治，而是特殊的政治。是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的形式，是一种需要以流血的方式来实现政治目的的特殊手段；用列宁的话说，就是“战争 = ‘以剑代笔’的政治”；（《列宁军事

文集》第195页)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讲是“流血的政治”。就是说,当政治斗争用一般的手段如:声明、照会、谈判、罢工、游行等实现不了既定的目的时,就需要采用战争这种最高的武装斗争形式,以剑代笔,以枪炮代谈判,这就要流血、死人了。

第二,为了适应战争的这种特殊性,就需要有一套特殊的组织——军队及其附随的一切东西;一套特殊方法——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一种特殊过程——交战双方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这就是说,军事虽然从属于政治,但政治绝不能代替军事,军事本身自有它特殊的领域。

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把握战争即政治的共性一面,犯以政治冲击军事、取代军事的历史错误。而要研究战争规律,努力学习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提高带兵打仗的实际本领。这样,才能真正做好政治工作,完成保卫祖国的历史使命。这对我们军队政治工作干部来讲,尤为重要。

3. 战争对政治不是消极地服从,而是积极的反作用于政治

我们在研究了政治对战争的决定作用之后,还必须反过来看一下战争对政治的反作用。从人类战争史加以考察,战争对政治的巨大反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战争可以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从而加速或延缓政治目的实现。战争对人民的教育作用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对于革命的正义战争来说,因为战争目的从根本上反映了人民大众的利益,群众发动的越充分,觉悟越高,战争就越好进行,战争的政治目的才越容易实现。

“战争的性质决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这是一个历史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355页）比如，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毛泽东选集》第449页）这个目的从根本上反映了四亿五千万中国民众的宿愿，从本质上讲，群众是拥护、支持并能积极参加这场正义战争的。正因如此，所以才出现了“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群众踊跃参军参战的生动场面，使得在我党领导下的艰苦抗日战争得以坚持并取得最后胜利。

二是对反革命的非正义的战争来说，因为战争的政治目的与人民的愿望相背，其战争目的的实现程度，会在人民的反抗下延缓实现，以至不能实现。敌人的烧杀抢掠、侵略扩张的兽行，会从反面激起人民的阶级仇、民族恨，使人们更加勇敢地投身到反对法西斯暴行的正义战争中去。反革命以为杀人越多，他们的胜利越快，事实恰恰相反，他们杀人越多，失败越快。解放后，毛泽东同志会见日本代表团时，曾风趣地对日本朋友说过，没有你们的侵略和占领大半个中国，我们不能胜利。你们的侵略激起了全中国人民都来反对你们。并且，正是在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解决了穿衣问题、吃饭问题、枪炮问题等等。可见，反革命教员的作用有时比正面教员还来的快些。它可以使人们眼睛擦得更亮，使对战争迷惘的变得清醒，旁观的变得积极，怯懦的变得勇猛，动摇的变得坚定起来。可以说，没有什么可以像战争那样使人们精神振奋，斗志昂扬，一往无前的了。战争年代人们的进步之快，是和平时期难以想象的。

其次，战争的胜负，对政治目的的实现与否有决定性的

影响。战争作为解决政治矛盾的一种最高手段，它的胜利或失败，自然要对某阶级、某民族、某国家、某政治集团战前推行的政治目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3页）一般说来，革命的进步的阶级领导的，以人民解放为目的的战争，可以使政治目的加速得到实现。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中讲到这个问题时说过：“抗战越坚持，政治就越能改进。但是基本上依赖于坚持抗战。”接着又讲：“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毛泽东选集》第424页，425页）抗日战争的胜利，为建立新中国创造了条件；解放战争的胜利，使我党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主张得以实现，一个新中国诞生了，并为进一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开辟了道路。如果我们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均告失败的话，那么，我党的政治主张——一个平等自由的新中国，也就无从谈起。

对于以掠夺或镇压为目的的反革命战争或侵略战争来讲，从根本上说，可以延缓、阻碍政治目的的实现，以至于使政治目的向相反的方向发展。中国的抗日战争，从日本一方来讲，它的政治目的是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世界人民对日本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看得越来越清楚，于是，纷纷加入到反战行列中来。如在中国就有日本共产党野坂参三领导的日本反战同盟，和中国人民一起，使日本军国主义的政治目的没有能够

最终得逞。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列宁提出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使得沙皇政府以掠夺为目的的政治主张不仅未能实现，就连自己的“宝座”也在革命战争的炮声中坍塌了。

总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实现政治目的的特殊手段，战争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完全取决于政治，这一点是必须明确的。但战争对政治的这种服从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给政治以巨大的反作用，这一点也是必须肯定的。只有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有个辩证的、全面的认识，才能够避免“政治冲击一切”或“枪指挥党”的历史错误的重现，正确处理军队工作中的各种矛盾，完成好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各项任务。

三、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

列宁说过：“弄清战争的性质是马克思主义者决定自己对战争的态度必要前提，……。”（《列宁军事文集》第155页）那么，又怎样来弄清战争的性质呢？主要应把握以下三条基本原则：

首先，要看进行战争的政治目的。这是因为，政治是战争的本质，它从根本上决定着战争的属性和发展趋向。因此，只要把参战双方的政治目的弄清了，区分性质也就比较容易解决。对这一点，列宁和毛泽东都有过明确的阐述。列宁说：“决定战争的性质的是战争所继续的是什么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列宁选集》第3卷第167页）毛泽东同志则进一步明确地指出，战争的政治目的决定战争的性质。可见，区别战争的性质，根本的是要看战争的政治目的。凡是为了人民，为了革命，为

了人类进步事业的战争，都是正义战争，如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等。反之则是非正义战争。

其次，要看是哪个阶级进行的战争。列宁指出：“决定战争的性质（反动战争或是革命战争），不是看谁先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是看哪一个阶级进行战争”。

（《列宁全集》第28卷第268页）一般地讲，凡属先进阶级进行的战争都是正义战争。奴隶起义战争，农民起义战争，资产阶级处于上升时期的革命战争，以及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等等即是。凡是落后的、反动的阶级进行的战争，一般是非正义的。以掠夺、称霸或镇压人民起义为目的的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形成以后，以至于发展到帝国主义时期所进行的战争就属于这个类型的战争。但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和美国同社会主义苏联，结成同盟国共同抗击德意日轴心国的战争，以及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蒋介石与共产党合作进行的抗日战争，则当属于正义战争之列。

最后，从战争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来看，凡属有利于解放生产力，推动历史前进的战争是正义的，否则是非正义的。固然从战争的直接效果来看，凡战争都会造成人员伤亡，田园荒芜。但从根本上看，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正义战争会造成生产力的大解放。所以毛泽东同志讲，革命战争会解放生产力，促进社会的飞跃。而反动的非正义战争则束缚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社会的进步。在当今世界，凡是为了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战争都是正义的，反之则是非正义的。

由于战争情况的复杂性，在判断每一场具体战争的性质

时，要在详细占有各方面材料的基础上，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才能做出符合实际的结论。既不能教条地、机械地用前边讲过的标准去对号入座，也不能只看“声明”，不看行动，更不能仅从战争双方的实力，攻防态势以及结局等表面现象去观察。那样，往往会引出错误的判断。

对某些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侵略战争，如苏联一九六八年的出兵捷克，一九七九年的入侵阿富汗，越南一九七八年底对柬埔寨的入侵。就不能单从社会性质、阶级的先进性上去套，而应从它的军事理论和战争实践上，从历史和现实的对比上去进行具体分析。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一般地讲，进行的是正义的自卫战争，但是，如果它对外推行霸权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政策，也可能进行侵略别国的非正义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可能进行侵略别国的非正义战争，也可能进行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战争。可见，决定战争性质的主要是战争的政治目的。国家的政治制度，阶级的先进与否只是决定战争性质的重要因素之一。在这里，尤其要注意把握分析问题的全面性。

对待战争，我们既不能盲目地表示反对，也不能无原则地表示拥护，要根据战争的不同性质采取不同的态度。对于正义战争，我们积极赞助并在必要时直接参加，尽一切可能去争取战争的胜利。对于非正义战争，我们坚决反对。在爆发前，应及时揭露战争发动者的阴谋，教育人民做好战争准备，以积极行动竭力推迟或阻止其爆发；爆发后，只要有可能，就用战争去反对战争，用正义战争去反对非正义战争。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对不同战争的不同态度。

中国共产党人当年对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新旧军

阔的混战，采取反对的态度，同时积极参加一九二六年至二十七年的北伐战争；国民党叛变以后，又独立地领导和进行了十年的土地革命战争。建国后，对于外国所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如朝鲜抗美战争、越南抗美战争、阿尔及利亚抗法战争、阿拉伯反对以色列侵略的战争、柬埔寨抗越战争，以及阿富汗抗苏战争等，都给予过积极的支持和力所能及的援助。

第二节 战争与其它因素的关系

前面我们研究了战争同政治之间的关系。战争除了与政治的关系外，还有战争与经济，战争与军事，战争与地理，战争与心理等因素的关系。只有从横的方面将这些内容把握了，才有可能说对战争有了个基本的认识。

一、战争与经济的关系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实现政治目的的特殊手段。那么，政治又是什么呢？我们对战争本质再做进一步地研究，就必然要涉及经济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作为政治继续的战争无疑也是上层建筑领域的一种现象。而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服务于经济基础。所以，战争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原因引起也，是不同阶级的经济利害冲突所导致的；战争又一时一刻也离不开经济力量；战争的作战方式也要受经济的制约；而战争的结果又会反作用于经济，对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作用。这就是战争与经济在宏观上的辩证关系。

1. 经济利害冲突是战争的根本动因

前边我们曾经讲到，在人类历史上，作为严格意义上的战争是伴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而出现的。私有制和阶级的形成则是生产力获得了一定发展的标志，没有生产工具的改进、剩余产品和社会分工的出现，原始的无阶级的社会不可能向有阶级的奴隶社会过渡，因而战争也就不可能问世。所以我们说，战争这一社会现象仅仅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是私有制基础的直接的和必然的发展。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是“私有制引起了战争，并且永远会引起战争。”（《列宁军事文集》第622页）

战争不仅在历史的渊源上与一定的经济关系相联系，而且每次具体战争的爆发，也总是和一定的经济利害冲突相关联。恩格斯正确地指出：“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基础性’得多；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同样基础性得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9页）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很能说明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后起的德、美、日等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为了重新瓜分早已被英、法、俄等老牌帝国主义国家瓜分完毕的殖民地，以便占领有利的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获得高额利润。而这靠和平协商的方法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于是，新老帝国主义的经济利害冲突，终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是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战败的德国，经过近二十年的恢复，经济实力迅速膨胀，为了在世界上求得有利于自己的经济利益，于是不得不用武力来重新瓜分世界。由此可见，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既不是偶然的事件，也不是某些国家领导者政策上出现了什么错误，而是在帝国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作用的结果，“是世界各种经济和政治势力在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的必然产物。”（《斯大林军事文集》第381页）

2. 经济力量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

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毛泽东选集》第925页）任何战争都是在一定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进行的。战争就是敌对双方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竞赛。财力的厚薄自然反映了经济水平的高低；军力的强弱，归根到底还是由经济力量决定的。没有它，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

我国古代战争，虽然规模有限，形式简单，战争对经济的依赖性没有现在这样大，但有些军事家还是朴素地看到了战争与经济之间的相互关系。孙武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孙子兵法·军争篇》）就是说，军队没有辎重、没有粮食、没有物质供应是要被敌人消灭的。由于当时处于农业经济时代，战时只要人有粮吃，有刀枪用，马有草料，就可以作战。所以他们对战争与经济关系的认识，不能不具有相当的局限性。

随着时代的前进，大工业的发展，人们的视野开始打开。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对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揭示得更加深刻。恩格斯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6页）列宁

也说过：“战争是对每个民族全部经济力量和组织力量的考验”。（《列宁军事文集》第586页）当年的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敢于侵略中国，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本的是仗恃它具有较强的军力和经济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轴心国的失败，归根结底是经济物质基础没有反法西斯阵线强大。同盟国与轴心国相比：在人力资源方面，仅中、苏、英、美、法五国就有八亿多人口，是德、意、日三国人口总数的四倍；在钢铁方面，以一亿五千多万吨对五千余万吨，三倍优势；石油是六十倍的优势。强大的经济实力就可以保持大量的军火生产。从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反法西斯阵线方面（主要是苏、美、英）生产了近五十九万架飞机（德国才生产了近十一万架飞机），为五倍多优势；坦克是二十四万辆对五万辆，近五倍的优势；火炮和迫击炮是二百零九万门对四十万门，五倍多优势。没有这样强大的物质基础，要想战胜德意日法西斯是不可能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局部战争也清楚地说明，现代战争对经济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由于武器装备以惊人的速度向高、精、尖发展，使之造价也相应的加倍增长。一架新式飞机价值数百万美元，一艘核潜艇或航空母舰价值数亿美元。武器装备价值的增高，使战争出现了巨额的消耗。第四次中东战争打了十八天，阿、以双方的物质消耗就达五十亿美元，平均日消耗达三亿美元。英阿马岛之战，实际交战时间不到一个月，双方耗资六十四亿至八十五亿美元。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战争是巨大的经济战。战争双方谁经得起消耗，谁才有赢得胜利的希望。

毛泽东同志历来十分重视经济对战争的巨大作用。在各

革命战争时期，他都以极大的注意力去做经济工作，把革命战争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解放战争时期，一方面在解放区实行土地改革，满足农民的土地要求，组织解放区人民努力增加生产，支援前线；另一方面又把夺取敌人武器装备为我所用，列入“十大军事原则”之一，使得伦敦、汉阳和华盛顿的兵工厂生产出来的新式武器，通过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源源不断地送到我们手中，极大地武装了人民解放军。这些，已被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3. 经济生产（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决定着作战方式的发展

作战方式演变的历史告诉我们，军队的组织形式和作战方式的运用和发展，总是同社会的经济条件，即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恩格斯说：

“装备、编成、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1卷第12页）斯大林也说：“作战方式、战争形式，不是永远一样的。它们是随着发展的条件，首先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改变。”（《斯大林军事文集》第108页）

经济条件对作战方式的影响不是直接的，而是间接地通过武器装备这个中间环节起作用的。在古代，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们使用刀矛弓箭等冷兵器打仗，作战样式也只能停留在白刃格斗和车战、步战的水平上；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火药和火器广泛用于军事，线式战术和纵队战术应运而生，军队的编制、指挥也随之发展，开始出现了参谋机关；到了现代，特别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由于经济和科学的高度发展，导弹、核武器和电子技术广泛应用于军

事，使得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形成的集团攻防、大兵团野战、纵深突击的战术等原则遇到了新的挑战。作战方式开始发展为诸军兵种的合同战，使用战略武器的立体战，以及指挥手段的自动化，和“外层空间战”的理论。美国正在研制的“星球大战”计划即是这个理论的代表。新的武器装备依赖于发达的生产力和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同时新的武器装备的出现，又必然推动军队的组织形式和作战方式向高一级的层次迈进。这是一条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毛泽东同志运用这一规律，针对中国革命战争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一贯主张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当我们手里只有大刀、梭标、手榴弹、长枪和少量重武器时，军队组织形式只能是以单一的步兵为主，作战方式只能是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解放战争后期，当我们手中有了一定数量的大炮、坦克后，就不仅能打运动战，而且也能打阵地攻坚战了。抗美援朝战争及其以后，我军又有了飞机、军舰，开始形成一支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因而开始有了解放一江山岛那样的陆海空诸军兵种合成作战的经验了。现在我军又有了战略导弹部队，陆军已编组为合成集团军，未来反侵略战争的作战方式也必将会发生新的变化。

4. 战争对经济的反作用

以上，我们研究了经济对战争的决定作用的一面。那么，在战争和经济这对矛盾运动中，战争对经济是不是只是消极地服从而无所作为呢？不是的，战争对经济有巨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是战争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巨大的破坏作用，这是

不言而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九三九年九月至一九四五年九月，历时六年。全世界共有六十一个国家，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卷入了战争，参战国的人口达十七亿，被征入伍者一亿一千万以上，有五千余人丧生，造成了四万亿美元的物质财富损失，仅在欧洲，战争破坏造成的物质损失就达二千六百亿美元，各交战国的直接军费开支约占其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苏联在四年卫国战争中共伤亡二千二百万人，中国在八年抗战中共伤亡近二千一百八十八万人，占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伤亡总人数的五分之二。战争给全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牺牲了无数的生命，消耗了巨大的经济力量，严重地破坏了经济的发展，使千百年来人类劳动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遭到空前浩劫。

其次是战争通过科学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促进经济的发展。战争一方面给经济发展以巨大破坏，但同时也可以通过科学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促进经济的发展。科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科学技术成果不是适应军事上的需要而问世，就是首先应用于军事，尔后再转向民用，从而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原子弹的研究过程就是一例。美国和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自为了战胜对手，都在秘密地进行原子弹的研究工作。美国为了抢在德国之前研制成功，在英国、加拿大的合作下，调集了十五万科技人员，动员了五十余万人，前后花费了约二十二亿美元，终于获得成功。搞这样一项庞大的“曼哈顿工程”，投入这样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花了四年的时间，如果不是战争的需要，是不可想象的。这是一项综合性的科学研究，涉及到系统论、控制论、人才学、材料学、电子计算机等几十项科学领域，从而

也推动了一批新兴学科的建立和深入发展。以核武器的出现为标志，人类开始跨入“原子时代”。武器装备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同时开始了工业的第三次革命，使得社会生产力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当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战争对科学技术的这种促进作用，比之它对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巨大破坏作用来讲，毕竟是有限的。看不到这一点，就容易在认识上走向极端，以至引出错误的结论。

目前，美国正在进行的“星球大战”计划，是技术发展和武器发展进入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它的背景是新的技术革命和由此而引起的产业革命。它的军事目的是为了打破苏联的核均势，以取得军事、政治上的主动地位；它的经济目的则是通过该计划“作为今后二十年国民经济发展的科学推动力”，以挽救国民经济的衰退形势。其经济价值在于：其一，可以带动一系列新技术的大规模发展。据估计，在空间计划上每花费一美元就能回收十四美元的经济效益，整个空间计划每花费十亿美元，可以使美国生产力提高百分之零点一。其二，它的近期成果，可以产生二十万个新的工作岗位，每年吸引投资一千九百亿美元，并得到一批技术成果。其三，它的中期成果，可使美国在近十年内经济增长率维持在百分之四至六的范围。其四，从长期看，作为能束武器的技术基础——等离子技术，不仅会给经济上带来核聚变能的好处，而且它的广泛应用将使人类进入一个新的等离子时代。“星球大战”计划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军事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革命的正义战争，虽然象一切战争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来灾难和痛苦，但是从根本上说，由于它是合乎客观经济规律

的运动方向和符合历史潮流的，所以它能够扫除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为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开拓道路。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同志给正义战争以极高的评价。说它是拯救中国拯救人类的旗帜，是至高无上的荣誉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历史转到新时代的桥梁。马克思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19页）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一扫沙皇旧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地球上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为新的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中国二十多年的革命战争的胜利，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建国后的三十多年来辉煌的经济建设成就，也有有力地证明了革命导师关于正义战争对经济有巨大推动作用的理论的无比正确。这种作用，当然是非正义战争所不能起到的。

二、战争与军事的关系

从广义上讲，军事是有关武装斗争事项的统称。包括武装力量建设、武装斗争的准备与实施，以及军事科学的研究等。凡是同解决国防和军队发展问题有关的理论和实践活动，都属于军事的范畴。

军队是衡量军事力量强弱的重要因素。没有军队固然谈不上军事，军事力量弱也同样不容易取得战争的胜利。正义战争虽然能得道多助，从历史发展的总规律上讲必然要胜利，但军事力量太弱被敌人击败的也不乏其例。历史上一些进步的弱小国家常有被大而退步的国家灭亡的，一些争取民族或阶级解放的战争常有被强大敌人战败的。印度虽然国大人多，但终因军事力量弱，被小而强的英国所吞并。阿比西尼亚抗击意大利入侵，波兰抗击德国入侵之所以失败，原因

之一也是军事力量薄弱所致。

军事影响着战争的进程、作战方式和规模。军事力量强，可以速战速决，一举成功；军事力量弱，则需要以持久战去拖垮敌人，作战方式应灵活多样，作战规模不宜过大。我们的土地革命战争之所以搞了十年之久，经历了“围剿”反“围剿”的长期反复；抗日战争之所以抗了八年，经历了战略防御、相持、反攻三个战略阶段，无不是与军事力量太弱紧密相联。

军事力量又与军事思想密不可分。正确和错误的军事思想对同样军事力量的指导，其结果可以截然相反。正确军事思想去指导，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弱为强，连战皆捷；错误军事思想去指导，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强为弱，一战败北。中国红军由开始的九千人发展到后来的八百万人民解放军，使得当年的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就是因为有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指导。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就红军力量而言，大于前四次反“围剿”，但却遭到了失败，主要原因就是战略指导的错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波兰、法国所以很快战败，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军事思想落后。

既然军事力量和军事思想对战争胜负有决定性的影响，那么，平时的一切军事建设就必须以战争的需要为转移。一切的方针、政策、原则、措施都要适应战争的需要。要着眼未来战争特点，从军队的实际情况出发，规定武装力量的编制体制，更新武器装备，加强军队和人民的教育训练，加强军事学术研究，努力提高军队的军政素质。开展战略预测，搞好战场建设，健全兵役法规和预备役制度。如此等等。军事建设搞好了，取胜的把握就大了。

军事影响战争，战争推动军事的发展。现代战争不同于古代战争，就是同一战争的初期、中期和后期，以及不同战场的情况也各有特点。战争实践的发展不断给军事提出新的课题，要求军事理论作出回答，从而推动军事科学不断前进。解放战争十大军事原则的提出，就是因为有了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初期经验的缘故，没有近二十年的战争实践，作为完整军事纲领的“十大军事原则”不可能问世。

三、战争与地理的关系

地理的因素对战争胜负有重要的影响。任何战争都是在一定的空间内进行的，离开空间，战争无法存在，也无法发展。国土面积（包括领水），战场范围，地理地形，天候气象等空间条件，都对战争有一定的影响。

国家的地理位置对武装力量建设、战争准备、和国家安全有重大影响。处于不同地理位置的国家，其武装力量的建设各有特点。岛国注重海、空军建设，可以凭借海洋环卫以确保国家安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袭击英国的“海狮”计划所以未能成功，与英国是个岛国的地理环境不无关系。内陆国家一般只有陆军和空军。周边关系复杂的国家，易受战争的威胁。地处战略要冲之地或资源丰富的小国，过去常受殖民统治之苦，而今则受超级大国之害。中近东及海湾地区之所以成为“热点”，一个原因就是地理位置重要。

国土的广狭，人口的多寡，资源的丰缺，关系到战争潜力的大小。一般地讲，国土辽阔，空间大，平时便于合理配置兵力，战时便于机动作战。毛泽东同志在分析中国革命战争特点时，就是把“大国”作为一个重要因素加以考虑的。指

出，“中国是一个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不愁没有回旋的余地。”（《毛泽东选集》第173页）当然，国大也容易遭受来自各方面的袭击，要保卫国土安全，则需要相当数量的军队，由此增加了国力负担。国小回旋余地小，易遭袭击，但较易集结力量，同仇敌忾御外侮。人口多、资源丰富，兵员储备雄厚，能经得起战争的消耗，足以支持长期战争。但如组织力差，资源潜力得不到正确利用的话，则也很容易被小而强的国家所欺侮。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孙子兵法·地形篇》）地形特点对战争有很大的影响。军队机动、阵地选择、兵力部署、火力配系、战术运用、后勤保障、组织指挥等，无一不受地形的限制。机械化部队行动离不开道路，进攻要选择便于接敌的路线，防御要尽量利用险要的地形，火力配系时要注意射界开阔，战术运用要注意利用地形地物，如此等等。当然，地形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可以根据需要改造不利地形使之变得有利于己。同样的改造地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法国的马奇诺防线，以色列的巴列夫防线，开始曾起到过一些作用，但当对方采取了出敌意外的对策后，防线就崩溃了。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利用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理条件，构筑了以坑道为骨干的坚固阵地防御体系，在战争中则起了很大作用。

交通条件在战争中不可忽视。良好的道路状况，便利的交通条件，军队的前运后送就迅速，较易抓住战机，较易增强一梯队力量，进、退、攻、守，较为主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我志愿军的后方铁路、公路遭敌严重破坏，后勤保障跟不上，使作战行动受到很大影响。当采取了果断措施，成

立了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大力开展反“绞杀战”后，改善了交通状况，形成了钢铁运输线，提高了后勤保障能力，保证了战争的需要。

天气气象是空间条件之一。雪、雾、雨、风、云、雾、冷、热、四季的变化，都对作战行动有一定的影响。有利的天候会有助于战斗力的发挥，不利的天候会妨碍战斗力的发挥。孙武就把“阴阳、寒暑、时制”作为影响战争胜负的要素之一。战争史上，由于天候原因导致战争胜利或失败的例子很多。郑成功收复台湾，是利用雾天渡海；拿破仑进犯俄国，损兵折将，狼狈逃回巴黎，士兵不适应俄国的寒冷天气是原因之一。目前，一些发达国家正在研究“气象武器”，以人工的方法，制造风雨等不利于敌人的气候，以造成消灭敌人获取战争胜利的战机。

空间是客观存在的条件，它对战争胜负的影响有利有弊。它既有促进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又可以导致战争的失败。关键是战争指导者要能对其正确的加以利用。历史上，我军就曾正确地利用不良天候对敌实施攻击，从而取得了多次胜利，夜战成为我军优良传统之一。所以，既不可把空间条件看得可有可无甚至不承认它的作用，又不能把其作用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它只能影响而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德国人说，德军没有消灭苏联，是因为寒冷、冰雪和泥泞；一个日本人则说，侵华战争“因兵要地志调查不够，而不战不进行苦战。”（《从兵要地志看中苏战争》第1页）他们都把次要原因当成主要原因，从哲学上讲是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从政治上讲，是为了掩盖侵略战争的实质。

四、战争与心理的关系

战争影响人的心理活动过程，人的心理状态对战争的胜败，又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人的心理是在实践活动中，人脑对客观现实的主观能动的反映。

战争是一种极其残酷、发展运动又极其迅速的“怪物”。参加战争的人都要经受生死、苦乐、以及紧张、激烈、复杂、困难的考验，这就必然会对军人的心理过程产生重大的影响。

首先，战争对军人的心理可以产生积极的影响。正义之战可以使人们产生良好的心理状态，可以激励人们不怕艰难困苦，不惧流血牺牲，即使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敌人，也无所畏惧，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敌人所屈服，能够在生死关头表现出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在物质条件极其困苦的条件下，无怨言，不动摇，有坚持到底的革命意志，在胜利面前不骄傲，在失败面前不气馁，武器优良，供应充足时可以打胜仗，武器低劣，供应匮乏之时，也同样可以士气高昂。这些，都只有在政治上占有巨大优势的正义之军才能做到。

其次，战争对军人的心理也可带来消极的影响。战争是要流血、要死人的。对于意志不坚定，战争目的不明确的人来说，可以使其精神脆弱，斗志减退，产生畏惧战争、贪生怕死的心理状态。这样的人，在战争进行顺利时也可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在战争失败，武器低劣、供应匮乏之时，就可能经不起战争的考验，而有可能成为逃兵。从根本上讲，进行非正义战争的反革命军队固然可以用欺骗宣传、重金收

买等手段来激励士气于一时，但不可能长久地巩固下去。因为战争的目的同参加战争的人的利益是相违背的。革命军队中固然也有个别的意志薄弱者，但从总体上讲，正义战争对军人心理状态，通过战争实践会给人以积极的影响。使之成为一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胜利军队，从而造就出一批杰出的将帅和士兵。

正因为如此，历来军事家对心理战的运用均极重视。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就把“不战而屈人之兵”列为战胜敌人的上策，即不经过交战使敌人投降是最好的办法。诸葛亮则明确指出“攻心为上”。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革命战争中，在心理战的运用上更堪称楷模。早在井冈山时，红军就作出了优待俘虏的四条规定：第一，不打、不骂、不杀、不虐待俘虏。第二，不准搜俘虏腰包。第三，对受伤者给予治疗。第四，释放俘虏，走留自愿，留者欢迎，还可以加入工农革命军，一视同仁，走者一律发给路费。抗日战争时指出：“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毛泽东选集》第350页）把“瓦解敌军”列为我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解放战争中，又创造了北平方式、绥远方式解决敌人的有效方法。由于我军在军事打击敌人的同时总是辅之以强大的心理攻势，认真执行了瓦解敌军这一原则，所以大大加速了胜利的到来。整个解放战争中，我们共歼灭了八百多万国民党军队。其中，起义、投诚、俘虏和接受改编的就达六百三十万，占歼敌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九。这有力地说明了心理攻势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以上讲的战争与其它因素的关系，不是平列的，而是有

主次之分的。它们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对战争的胜败发生不同的影响。我们只有从战争总体上去把握它们各自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才不致于犯片面性的错误。

第三节 战争规律与战争指导规律

当我们了解了战争是什么的问题之后，就必须懂得如何研究战争。这就必然要涉及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这对马克思主义战争认识论中的一对重要范畴。

一、指导战争必须认识战争规律

要指导战争就必须认识战争，认识战争就是认识战争的规律。进而才能依据战争规律制订出符合战争实际的战争指导规律，引导战争走向胜利。

那么，什么是战争规律呢？

所谓规律，就是客观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战争规律就是战争这一事物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具体地说，就是战争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地理诸因素之间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

毛泽东同志把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原理运用于对战争规律的研究，科学地阐明了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规律，而且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规律，尤其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这是因为战争规律和其它事物的规律一样，都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结，共性与个性的统一。特别是认识战争的特殊规律，是我们认识战争，指导战争的基础。

一般战争规律，就是在古今中外的一切战争中都普遍存在和起作用的规律。例如：所有战争的军事目的都是“保存自

已，消灭敌人”；所有战争都是战争双方政治的继续；所有战争的基本表现形态都是攻防手段的交替运用等等，这些，都是对战争的共同本质的抽象。

特殊战争规律，是相对于一般战争规律而说的，它指的是某种或某一具体战争所特有的规律。是对某一具体战争特殊本质的抽象，其规律的内容因具体战争情况的不同而不同。

毛泽东同志研究战争从来不是漫无目的的就战争谈战争，就规律谈规律。而总是紧密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在谈到特殊战争规律时，他总是要求我们不要一般地就特殊规律研究特殊规律，而要在一般战争规律的指导下，着重研究革命战争和中国革命战争规律，以求得战胜国内外的强大敌人。那么，什么是革命战争规律呢？革命战争规律就是一切革命战争所固有的普遍起作用的规律。例如：革命战争在本质上都具备正义性和进步性的特点；在战争行动上一般都是后发制人；在战争过程上一般都经历一个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因此，以弱胜强，以劣胜优，就是革命战争的普遍规律。但对一般战争规律来讲，它又是特殊规律了。

中国革命战争规律，又是区别于一般革命战争而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所特有的规律。因此在一般战争规律和革命战争规律之外，又有它自己的一套特殊规律。中国革命战争长期以弱御强，以劣抗优，这是一切革命战争规律之中所仅见的。

战争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任何一个具体的战争，都既有特殊战争规律又有一般战争规律。一方面，一般战争规律不能

全部包括和代替特殊战争规律，一般存在于特殊之中。所以研究战争应着力研究其特殊规律；另一方面，战争的特殊规律之中孕育着一般规律，但又不能代替一般规律。同时，它也跟着研究范围的不同，战争的发展和条件变化而改变。在一定范围属于特殊规律的东西，在较小范围则属于普遍规律。例如：“持久胜敌”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相对于革命战争的一般规律来讲它是特殊规律。但对于中国革命战争各时期来讲它却具有普遍指导意义。这就告诉我们，当着我们研究一般战争规律时，既要看到它对特殊战争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又不可把它绝对化，用一般战争规律去代替特殊战争规律，否则会犯教条主义错误。当着我们研究特殊战争规律的时候，既要看到它所包含的一般战争规律，又不可把它任意普遍化，把一些只适于特殊战争的规律到处套用，否则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

二、认识战争规律的目的在于找出战争指导规律

我们研究战争规律的目的完全是为了用它来指导战争。指导战争就需要有一套相应的方针办法，即战略战术，这就必然要涉及战争指导规律。这个具有理论与实践内容的新概念，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是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并应用的。战争本身迫使军事家不发现规律则已，一旦发现规律，就会努力与自己的能动性相结合，利用规律来为自己的战争目的服务，这就势必导致战争指导规律的产生和运用。

战争指导规律，就是合乎战争客观规律的用以指导战争的原理和原则。换句话说，就是已被人们正确认识并加以应用的战争规律。这里有两层含意：首先它必须是正确反映战争的客观实际，即以主观形式反映战争的客观内容，是战争

的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的统一。就是说，战争指导规律必须具有客观真理性。其次，它必须能够用来对具体的战争给以正确的指导，而不是停留在书本上的空洞理论。就是说，战争指导规律必须具有可行性。毛泽东同志曾形象的把这比喻为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

战争指导规律也有一般和特殊之分。例如：知彼知己，百战不殆；集中兵力；兵贵神速等，即属于一般战争指导规律。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等，则是革命战争的一般指导规律，相对于一般战争指导规律来说，它就是特殊的战争指导规律。“围剿”与“反围剿”的长期反复；包围与反包围的长期反复；进攻与防御的长期反复；既不是有退无进的保守主义，也不是有进无退的冒险主义，而是退与进辩证统一的积极防御等等，都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一般指导规律。相对于革命战争的一般指导规律来讲它又成为特殊的战争指导规律了。但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各个历史时期来讲，它又是一般战争指导规律。而各个时期，（比如：抗日战争时期的以游击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的指导规律）的战争指导规律，就又成为特殊的战争指导规律了。

由以上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各自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可以看出，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是辩证统一的关系。首先，战争规律是战争指导规律的客观基础，战争指导规律的产生和制定完全依赖于人们对战争规律的正确揭示。就是说，战争规律是客观的第一性的，而战争指导规律是主观制定的、第二性的东西，但却是对客观第一性的战争规律的正确反映。土地革命战争的规律决定了积极防御战争指导规律的产生；抗日战争的规律决定了游击战的战争指导规律的

问世，解放战争的规律则决定了“十大军事原则”的制定，这些战争指导规律已被战争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其次，战争指导规律是对战争规律的具体应用。应用战争规律于战略行动，是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属于战略学的内容。应用战争规律于战役行动和战斗行动，是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属于战役学和战术学的内容。战争指导规律就是对战争规律的认识和应用这些规律于战争行动的原则和法则。

三、研究和把握战争指导规律的方法

总的讲，要有一条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按照战争的客观实际适时地制定出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使主观指导与战争实践好好地符合起来。具体地讲，着重要注意以下几点：

1. 着眼战争的特点和发展

着眼特点和着眼发展去研究和指导战争，是毛泽东同志在总结“十年血战史”的经验时，把辩证法引入认识论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研究和指导战争问题上的运用和发展。

毛泽东同志在谈到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方法时，告诫我们说：“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毛泽东选集》第157页）所谓着眼特点，就是说要从事物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区别和联系中，去把握战争的特殊规律；所谓着眼发展，就是说要从战争的发展变化中去考察具体战争的特殊规律。一句话，就是要从具体战争的特点和发展上去把握其规律性，才能真正认识战争并引导战争到胜利。这个思想，毛泽东同志后来在《矛盾论》中

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和发挥，专门写了一节“矛盾的特殊性”。

战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矛盾运动形式，它有着不同于其它社会矛盾的本质特点——流血的政治，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指导战争；革命战争，是战争中的一个特殊类型，指导革命战争的人，对革命战争的特殊性，如果不了解不掌握，当然也就不可能给革命战争以正确的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又是革命战争中的一个更加特殊的类型，对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历史及发展变化情况如果不甚了了，也同样会导致中国革命战争的失败。所以，毛泽东同志讲：“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不能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就不能引导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胜利的途径。”（《毛泽东选集》第171页）

战争规律是发展的，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战争情况的不同而变化，因而战争指导规律也是发展的。战争规律有时间、地域、性质和对象的差别。

从时间上说，战争总是在一定时间内发生的。由于时间的不同，构成战争的诸因素也就发生了变化，所以不同时间的战争有不同的特点。即使一场战争的不同阶段，其特点也各不相同。因此，不同时间的战争，同一战争的不同阶段的经验，也不能机械的互相移用。

从地域上说，任何战争都是在一定空间内进行的。不同地域（国度）的政治、经济、气候、地理等条件千差万别，各有特点。国有大小之分，经济有穷富之别，气候有寒暖之差，地理条件各不相同，如此等等，不同的地域特点决定着不同的战争规律。

从性质上说，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是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战争，因而在战争的政治目的、战略指导和依靠力量上

也各有特点。革命战争由于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能够以弱胜强，以小制大，进行持久的人民战争；反革命战争由于违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也就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虽然能仗恃其军力和经济力的优势得逞于一时，但终久是要失败的。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战场，

“红军处处光明，白军处处黑暗”，就是因为不同战争性质的特点所决定的。

从对象上说，此一战争和彼一战争，由于作战对象的不同，也就必然形成不同的战争规律。同蒋介石作战和同日本作战，打法不完全一样。打美帝国主义的成功经验，原封不动地搬到未来反侵略战争中，也必然要碰壁。

所以，我们研究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性质、对象的战争，都应该着眼其特点和发展。

2. 要用全面的观点去研究战争

我们讲研究战争要着眼特点和发展，是不是随便抓住战争的几条特点就可以了呢？不是的。因为战争和其它事物一样，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和周围其它事物之间有着各式各样、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构成战争的因素不只是单纯军事力量一项，还有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外交等等各个方面，这些因素之中有直接的和间接的、内部的和外部的、本质的和非本质的、必然的和偶然的、主要的和次要的、有利的和不利的等各种区别和联系，这就使得战争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现象。它们各从不同的侧面，反映着战争的本质，体现着战争发生、发展和结局的必然趋势。所以我们在着眼特点和发展去研究和指导战争时，必须坚持全面的观点，要从战争的整个情形出发，研究战争中的一切现象、一切方面和一

切过程。而不是从战争的个别现象出发，抓住战争特点的一鳞半爪就当做本质，大做文章。要反对主观性和片面性，

“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全面性的要求可以使我们防止错误和防止僵化。”（《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3页）

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同志在对敌我双方各基本要素进行全面分析后，得出了互相反对的四条基本特点。在此基础上，做出了持久战，我必胜的科学结论。相反，亡国论者只孤立地看到敌强我弱这一特点并把它绝对化，忘记了我国大、人多、进步的特点；速胜论者却根本不顾敌强我弱的事实，片面地、过分地强调我国大、人多、进步的特点。由于二者都只是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把个别当整体，因而结论必然是错误的。

我们研究和指导战争，不仅要从战争的客观实际出发，全面把握它的一切特点，而且还必须能够随着战争的发展变化，使主观认识不断前进，继续把握其新的特点，才能不断把战争推向新的阶段。

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引起了武器装备、作战方式的新的革命。有许多新的必然王国需要我们去研究、去认识。我们决不可闭目塞听，对新事物不敏感、不接受，抱着过去成功的经验不放。而应立足于敌我双方的现实情况，着眼现代战争新特点，解放思想，开拓前进，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去探讨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新规律。

3. 在既定的客观物质条件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

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在《论持久战》

中第一次把人的主观能动性称为自觉能动性。从马列主义能动反映论的原理上，对战争中自觉能动性与战争客观物质条件的关系进行了科学的阐述。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战争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按战争客观规律去指导战争。从而建立了自觉能动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主观能动性的学说。

战争中的自觉能动性，简单地说，就是人们在战争实践中，能动地认识战争和实行战争的能力。毛泽东同志指出：

“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毛泽东选集》第445页）这段论述清楚地向我们揭示了战争中自觉能动性的内容特点。它既包括认识战争的能动性，又包括实行战争中的能动性，还包括在认识和实行战争中人的一种精神状态。

自觉能动性在把胜负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它既可以对现存的客观条件进行辩证分析，从而找出其内含其中的内部联系（战争规律），制订出正确的战争指导规律；又可以充分利用已有条件，创造尚不具备的条件，使客观条件变得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并不等于胜利的现实性。胜利的可能性既可能转化为胜利的现实性，也可以转化为失败的现实性。同样，失败的可能性也有两种前途，一是转化为失败，一是

转化为胜利。这里决定性的条件就在于主观的努力。自觉能动性发挥得当，不仅胜利的可能性可以转化为现实性，即使失败的可能性也可能向胜利的方面转化，至少可以减低失败的程度。毛泽东同志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这样讲过：“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毛泽东选集》第454—455页）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证明，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懂得并运用了抗日战争的规律，充分发挥了全国人民的自觉能动性，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样地，在毛泽东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揭示的战争规律指导下，全国人民充分发挥正确的自觉能动性，用小米加步枪，战胜了用飞机加大炮武装起来的蒋介石的几百万军队，解放了全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然而，战争中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发挥一时一刻也离不开战争的客观物质条件。军事实力的强弱，是构成战争力量对比的直接因素；政治上的优劣，从根本上决定人心的向背和战争的胜负；经济力量的雄厚与否，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是构成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地理因素，是进行战争的空间条件。毛泽东同志曾形象地把战争的客观条件，比做发挥自觉能动性的“舞台”，把自觉能动性的正确发挥比做演出“威武雄壮的戏剧”。戏剧的演出离不开“舞台”，战争中自觉能动性的正确发挥，同样不能离开战争的客观物质条件。所以，尊重战争的客观物质条件，及其内部联系所形成的战争规律，是正确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前提。

战争的客观物质条件制约着人的自觉能动性。但在具备

一定客观物质条件的基础上，人的自觉能动性发挥的程度对于战争胜利的影响会有着不同的作用。因此，我们既要重视战争的客观物质条件对人的能动性的制约作用，不可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程度去期求战争的胜利。同时，又要在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内，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按照战争规律办事，去争取战争的胜利。

第二章 战略概述

为了指导战争，取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学习研究战略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明确和探讨战略的概念、分类、要素和层次、内容，以及战略的客观基础等，对于建立适合我国我军情况的战略体系，加强战略指导，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节 战 略

一、什么是战略

战略概念源于战争实践，并长期运用于军事领域。

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即对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它是战争指导者运用物质和精神力量，采用各种手段，达成战争目的的科学和艺术。

要准确地把握战略概念，首先要准确把握“全局”的涵义。关于全局，清末人陈澹言有：“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的论述。很明显，他的万世是指时间而言，全局是对空间而言。全局只包括空间而不包括时间。这反映了过去对全局的理解。而我们今天所说的全局，是空间和时间的统一。它不仅在空间上包括各个方面，而且在时间上包括各个阶段。因此，我们所说的“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包括了当前、今后对战争发展的

各个方面、各阶段的指导。另外，在战略上使用的全局概念，通常具有在空间上最高、最大、独立的、不受上一层直接控制的基本属性。在战略上称为全局的东西，必须具有既是统管较大的和独立的领域，又能统管各方面和各阶段情况的性质。不具备这些性质，就称不上是战略的全局。

有人根据毛泽东同志“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的论述，将全局相对化，认为只要是可以分成几个方面和几个阶段的。不管区域、范围、规模的大小都可以有自己的全局。以此类推，不但一个战区、一个军种可以形成全局，甚至一个兵种、一个建制单位、一个战役或一个大的战斗也可以形成全局。如果这样，不但兵种、部队集团有战略，连战役法、战术也成为战略了。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其实，毛泽东同志对全局的使用范围是有限制的。他说“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略学的任务。研究带局部性的战争指导规律，是战役学和战术学的任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59页）很明显，他只在世界、一国以及大的独立的游击区和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这几个层次使用全局的概念，在这之下就不再称为全局了。

以约米尼为代表的战略理论家把战略称为艺术，而以克劳塞维茨为代表的战略理论家，则认为战略是科学。战争、战略是科学还是艺术的问题是个古老而有争议的问题。战争和战争指导的实践证明，战略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

是科学与艺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说战略是科学，是就战略研究而言的。战略研究，是以客观的战略环境和目标、战略力量的运用和发展，以及战略实施过程为其研究对象的。一切可行的战略都是以对形势正确估量为前提，以明确的目标为基础，以现有的人力物力手段为保证。它要求人们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去探索，把握它的发展变化规律。

说战略是一种艺术，主要是指战略运用而言。战略的成功不仅要以科学的判断为基础，更要以灵活多变的艺术创造为条件。战争的胜负，与指挥员能否根据实际情况机动灵活的指挥紧密相连。我军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就分别对两场战争的整个过程科学地区分了不同的战略阶段，艺术地指挥战略转化，夺取了战争的主动权，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尤其在解放战争中，在战略阶段转化时节，果断地决策刘邓大军挥师南下，挺进大别山，揭开了我军战略进攻的序幕，表现出精湛的战略运用艺术。战略的胜利，不仅要依赖战略思想的先进性，更取决于战略指导的灵活性。只有掌握一定的战略手段，而又足智多谋的战略家，才能驾驭战争。因为战略有许多不同于自然科学的若干特点。

战争中，敌对双方的力量对比和战争环境都是不相同的。要夺取战争的胜利，有一系列问题需要解决：如认识战争的形势和特点，从而把握战争规律问题；在认识战争规律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战略方针，以确定战略目的、战争形势、战争主要方向、战争阶段、武装力量的编组和部署、战场选择和准备；组织指挥自己的军队同敌人作战以实现自己的计划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所遵循的原则和方法，就

是战略。

二、战略溯源

战略，是个形式古老而内容全新的问题，它起源于战争。公元前六世纪末五世纪初，我国伟大的军事家孙武著有兵法十三篇。他在第一篇“计篇”中提出了“庙算”的概念。“庙算”，可以说是我国最早含有战略筹划的概念。因此，无论国内外军事界人士均把孙子推为“战略鼻祖”，并把“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战略的最高境界。孙武还论述了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因素“五事”、“七计”，这与当代战略研究的内容也是相近似的。后来人们把对战争的认识和谋划与进行战争的方法、军队的组织、管理及战斗行动等统称“兵法”。“兵法”，即战争的驾驭术。

在我国战略一词的出现，根据迄今所作的考证，可溯源西晋时期史学家、军事思想家司马彪（公元？～306年）所著的《战略》一书。其所探讨的问题，涉及到现代战略研究的主要内容和问题。但原著早已失传，其部分内容散见于《三国志》、《太平御览》等古籍中。从所遗篇章来看，主要是指作战的谋略。

在西方，“战略”一词起源于古希腊语“诡计”（strategem）或将道（strategos）。公元六世纪东罗马（拜占庭）帝国时代，毛莱斯皇帝于公元580年左右写了一本叫做《strategicon》的军事教科书。依照这本书名字义的源流来解释，可称作“将道”或“为将之道”。由于“战略”与“将道”名异实同，所以就成为我们今天所用“strategy”（英文、德文均如此，而法文的“strategie”也明显源于“strategy”）这个名词的始祖。后来许多西方国家所使用

的“战略”，被理解成一般的“统帅艺术”，以后进一步发展成为区别于“战役法”、“战术”的“战略”。西方军事理论传入我国以后，西方的战略概念也被移用过来。大约在十九世纪末，我国在日本留学生把这个译名带回国内，我国开始用传统的“战略”这个概念来翻译西方的“strategy”，并沿用至今，奠定了我国关于战略定义的基础。

可以看出，战略概念的产生有两个源头。东方源于我国，意指作战的“谋略”；西方源于古希腊，意指“将道”。由于两者含义相近，我们即用“战略”去翻译西方的“将道”。

应该指出的是，素有“兵法之国”美称的我国，在进入近代以后，战略思想没有取得质的飞跃和进步，没有突破带有思辩倾向的谋略的框框。究其原因，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国运衰微，外辱内患不断，迟滞了生产力的发展，思想禁锢，科学落后所致。落后的生产关系不仅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也禁锢先进的战略思想的产生，这是不言而喻的。西方在战略概念出现以前，战略实践和反映这种实践的观念早已存在。如公元前471~400年间古希腊的《伯罗奔尼撒战记》这本史书，即已有了相当完整的战略思想。其后，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36~323年）、汉尼拔（公元前247~183年）、凯撒（公元前100~44年），均有丰富的战略实践。史书记载，汉尼拔被誉为“战略之父”，其得意之作是“坎尼会战”。可惜的是，记载这些名将的史书传世无几，其丰富的战略思想与实践也实难考稽。总之，东西方的战略概念的产生，既有联系又无渊源。它们都是战争实践的产物。

三、战略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

战略一词起源于军事领域，它作为一种知识体系，本来是直接为战争服务的。古代早期的战争，进行的方式是两军对阵，在战场上角力斗勇，胜负主要取决于兵员的数量、勇气和体力。作战方法简单，持续时间短，往往一次交战就决定胜负，无战略战术之分。随着战争的发展和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人们逐渐懂得了在战争中使用谋略，并总结出指导战争的方法，于是便产生了战略。随着战争和人类社会的发展，战略概念被用于政治领域。其后，战略概念继续向其它领域扩展。时至今日，它几乎敲开了人类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大门，成为一个具有全局性、层次性、系统性的概念和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说明，战略在向横的方向发展。

由于战争不仅仅是一种军事行动，而是与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外交诸方面的举措紧密相联，传统的仅仅涉及军事行动的战略概念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代战争和战略的要求。于是，“国家战略”便应运而生。它是高层次的战略。最初，英国人把超出军事范围的战略称为“大战略”，亦称“高级战略”。其定义是“最有效地使用国家一切力量的艺术”。后来，大战略这个名词也为欧洲其它国家所采用，“高级战略”一词逐渐被淘汰。美国曾长期使用大战略一词，但目前又多改称“国家战略”。法国有的主张采用“总体战略”这个概念。苏联只笼统称为“战略”或“军事战略”。另外，在西方某些国家还有“小战略”一说，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军事学术由于没有“战役”这个学科，在涉及到这个概念时只得用“小战略”或“大战术”这样的概念。

以上说明，战略概念在向横的方向扩展的同时，在纵的

方向亦在发展变化。

战略概念的发展还表现为其内涵与外延的扩展变化。其内涵的变化主要表现在战略概念的内容不断丰富、深化。战略概念形成之初，战略与战术的区分含混不清，且专指“为将之道”或“作战的谋略”。现在，军事战略的概念已包括在战争准备与实施过程中对军事、政治、经济、科学技术诸力量的综合运用。战略概念外延的变化表现为，其适用范围早已超出军事领域，进入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诸领域的全局性筹划活动之中。

在战略概念内涵与外延的发展方面，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1）在我国古代和西方十八世纪以前，战略和战术尚未加以区分，战略作为“作战的谋略”、“将道”。主要是指导当时空间范围较小，持续时间较短的军事斗争。是纯属军事领域的问题。

（2）进入十九世纪至第一次世界大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军事行动规模的扩大，人们已把战略理解为“对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但这个全局，实质上是指战争爆发以后的作战问题。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都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反映了人们对战略概念新的认识成果。

（3）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大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战争问题空前复杂化。传统的单纯运用军事手段达到战争目的的观念和作法已经过时。因此，战略开始包括战争准备、经济、军事、外交精神力量等各方面。即最有效地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诸种力量达到战争目的的艺术。同时，战略概念的使用不再局限于军事领域。

(4)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战争和社会实践活动的发展，战略概念的外延进一步扩大，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战略概念。战略概念由一个单独概念演变为普遍概念，由普遍概念进一步演变成范畴概念，并由单一层次演变为多层次。形成了纵横交织的网状结构系统。

四、战略的分类

战略的分类同其它事物的分类一样，因根据不同而不同。随着人们对战争研究的深入和战争的发展，人们对战略的分类越来越细，越来越复杂。

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军事战略，都是依据其国家政策制定的，都是为其政治目的服务的。一个国家，一支军队，依照其阶级属性和物质力量，都有其指导战争的基本观点。它从属并服务于政治，是制定战争政策和作战原则的思想依据。这种指导战争的基本观点就是战略思想。依据战略思想而制定的总的战争指导方针，就是战略方针。从古至今，任何国家的军队都有它自己的战略思想和以此制定的军事战略和战略方针。各国的军事战略，虽然有各种各样的叫法，但是从性质上区分，一个是进攻战略，一个是防御战略。一些自恃力量强大的国家和军队，怀着侵略、扩张和征服、镇压别人的政治目的，一般都采取进攻战略。它的战争准备、武装力量建设和战争计划，都以进攻为根本宗旨。与进攻战略相对立的是防御战略。一般来说，力量较弱的一方，不怀有侵略、扩张、征服、镇压别人的政治目的国家和军队，所采取的战略都是防御战略。防御战略的出发点是自卫，不首先挑起战争。

战略的基本特点是实践性和全局性。只要有战争，就有战争的全局。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

一全局，一个大的独立的战区也可以是战争的全局。因此，按照不同范围战争的全局，可以赋予不同的战略名称。如世界大战有世界战略（即全球战略）；联盟战争有联盟战略；局部战争有局部战争战略或有限战争战略；一国之内，一个大的战区或独立的作战方向，有自己的战区战略等等。

随着战争工具的发展，战争从陆地扩大到海洋和天空，于是有了海战战略或海军战略；空战战略或空军战略；天战战略或宇宙战略。

依据战争的强度划分，有高强度战争战略；中强度战争战略；低强度战争战略。

依据是否使用核武器，有核战争战略；常规战争战略。或依据进行战争的工具和手段，划分为常规战争战略和非常规战争战略（包括核战略、高技术战争战略等）。

除此以外还可根据战略的时效性、实用性、实战性等特征，划分为现行战略，发展战略；实战战略，威慑战略；直接战略，间接战略等。

总之，战略的分类既与战争的分类息息相关，又有自己的特殊性。战略的分类，因分类的根据不同而不同，不可把不同根据的分类混淆起来。随着人们对战争、战略问题的实践和认识的不断深入，以及研究问题的角度需要，对战略的分类千姿百态，越分越细。这也是战略发展、研究的需要。

五、战略的要素、层次和内容

每一战略都由具体的要素构成，这是制定任何战略的人不能不考虑的问题。那么，战略通常有哪几个要素呢？美国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威尔·泰勒上将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战略 = 目的（追求的目标）+ 途径（行动方案）

+ 手段（实现目标的工具），这是就所有领域的战略而言。用上述公式来探讨军事战略内容，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些概念：目的就是军事目标；途径就是使用军事实力的各种方案，这些方案就是军事战略方针；手段就是完成任务所必须的军事实力（即人力、物力、财力、精神力量等）。即军事战略 = 军事目标 + 军事战略方针 + 军事实力。这样，军事战略就是一个由军事目标、军事战略方针、军事手段所构成的完整的控制系统。军事目标是在国家战略目标、利益的制约下，根据该战略系统所处的环境，实力手段所确定的；军事实力即军事手段是军事目标的前提，也是战略形成的基础。一旦目标确定后，它的运动就受目标的大小，强度及方向的制约。控制者必须根据目标对其进行规划、运用。如战斗力的建设、布局、使用等，军事战略方针，就是为完成军事目标，在现有力量条件基础上确定的军事行动方案即控制途径与方式。其中，军事目标的确定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内学术界部分同志赞同这个观点。

我军学术界相当部分同志提出战略由以下三要素组成，即战略环境，战略目标，战略方针和途径。这里讲的战略环境，包括战略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其核心是敌我力量的对比。这种观点与上面所述观点大同小异。

战略要素的确定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战争观，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观点作为根据，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主观与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因此，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战略，构成要素应有所区别。

战略的层次。战略概念是随着社会实践逐步发展、演化的。人们对战略的认识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深化，不断完善

的过程。它的最初形态只是一个单独概念，没有层次不成体系。战略概念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一个跨领域、多层次的概念体系。因而，战略概念也必然具有层次性。各种战略概念之间即有纵向的制约与被制约、输出与反馈的关系，也有横向的互相制约、输出和反馈关系。要对各种战略概念在战略体系中所处的地位、性质、功能作出科学的回答，就必须对战略层次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划分。它反映了人们对战略认识的不断深化和不断完善。

这里需要指出的，不可将战略层次与战略的分类混为一谈。所谓战略的分类是把军事战略内部的不同类型按同一标准进行分类。因为具体的军事战略很多，尽管一个国家一个时期只能采取一种军事战略，但却不影响学术界提出更多的军事战略设想和建议。所有这些战略都是军事战略的范畴，而不是军事战略以外的新战略或战略层次。战略分类具有一定的随意性，每个人都可以根据需要对战略进行不同的分类。而战略的层次系统是由军事战略及军事战略以外的不同内涵的战略所组成。如军事战略之上是国家战略，与军事战略平行的有政治战略、经济战略、科技战略等。军事战略之下有战区战略和军种战略。不管是国家战略或战区战略、军种战略，都已经不是统管战争全局的军事战略了，而是区别于军事战略的另一种战略概念，因而形成了战略的不同层次。战略层次必须反映战争情况的客观变化，具有比较稳定的性质。如果把属于军事战略之内的不同类型（如常规战争战略和核战争战略）作为战略的一个层次，是不科学的。所以，讲战略层次的战略是广义的战略，而不是单纯的军事战略。开列战略的层次，是把战略作为一个体系、一个系统、研究军事战略在战略系统

中的座标以及与母、子战略和平行战略之间的联系和区别。

目前在我国，对战略概念的系统结构层次，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处于学术探讨阶段。我们认为，在军事理论相通的今天，战略概念不能不具有世界性、通用性。我国的战略概念应切合自己的实际情况，不可简单地搬用别国的某些战略概念。我国的战略概念大致可分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国家战略，这是战略的最高层次。所谓国家战略，是根据国际国内环境对国家的发展和安全的根本方略。它的任务是规划、指导和运用国家力量，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是国家各领域各部门制定了战略的基本依据。它不表示国家的全部战略，而侧重于国家安全的军事领域及与军事有关的其它领域，类似国外的“大战略”。在战争年代，我党只使用政治战略和军事战略概念，前者制约和指导后者，当时我们党还没有夺取全国政权，因此谈不上国家战略。只有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现在我们已经建立了统一的国家政权，客观上需要从国家全局来研讨维护国家安全和增强综合国力的方略。作为最高层次的国家战略，在事实上已成为必不可少。

国家战略在西方国家中较为流行，美国将其定为军语，其定义是：在平时和战时使用武装力量的同时，发展和使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心理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

各国的国家战略都强调靠综合国力来保障国家安全，实现国家利益和目标。国家战略依据情况变化各时期强调的重点不同，有时强调军事力量，有时强调外交力量。所以各国一般都不对本国的“国家战略”作具体的表述和概括。有人把美国国家战略说成是“SDI”（战略防御计划），把日本国家

战略说成是“科技立国”，都未必合适。因为它不能确切地反映国家战略的本质属性。强调一点，舍弃其余，这正是国家战略之大忌。

第二个层次是军事战略。与它平行的有政治、经济、外交、科技等战略。其中某一项在特定时期可以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中心而居于主导地位。军事战略是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是直接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军事战略作为国家战略的系统，受国家战略的制约和控制，是从属于国家战略，为国家战略服务的。

第三个层次是战区战略和军种战略。这是两个平行的战略。战区战略泛指国家指导某个战略地区全局的方略；军种战略是指导某一军种的使用和发展的方略。战区战略和军种战略是军事战略的子系统。它的发展是军事战略和国家战略的具体发展。如果离开了具体战略的研究，军事战略和国家战略也不可能是切实可行的战略。当然，战区战略和军种战略离开了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就失去了目标和方向，自身的发展和实现也将落空，而且还将影响国家战略和军事战略的实现。战区战略与军种战略的差别是：战区战略对军种战略来说，是带有超出某一军种和把各军种联结起来的那种综合性。而军种战略对战区战略来说，是带有超出某一战区把多个战区联结起来的综合性。它们各有侧重，但总的来说，战区战略较之军种战略具有更大的综合性。

战区战略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必须是大的独立的战区才存在战区战略。如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欧洲战区和太平洋战区；我国国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各大根据地，都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在政治上受党中央的统一领

导，在军事上中央除作原则指导外，并不对他们实施具体的指挥。因而各大根据地在军事上形成了独立的战局，产生了自己的战略。我国现行的各大军区并不完全具有独立战区的性质。首先他们都是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一般没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指挥的权利。如1979年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这样的边境局部战争，也是由几个军区几个军种的部队共同组成，在中央军委统一组织指挥下进行的。即使在某海湾需要执行抗登陆作战时，也很可能需要若干个大军区和海、空军联合作战。另外，我国的战区与美国的战区不同。美国在海外有诸多驻军，它的战区分布在世界各地，被彼此分割独立，每个战区都存在着战区战略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军队分别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区作战。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军事上并不对他们进行具体指挥。欧洲战区由艾森豪威尔独立指挥，太平洋战区由麦克阿瑟独立指挥。这样美军在欧洲战区和太平洋战区的战略问题就产生了。

我们承认有战区战略。但并不是说我国的每一个军区都有自己的战略。战区、军区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哪些军区（或区域）为一个战区并拥有自己的战略，要根据战争实际情况，并且是发展变化的。

至于军种战略，则要受到更多条件的限制。现代战争从战略到战术都强调各军兵种协同作战，一般情况下很难将各军种分开，形成各自的战略。只有在存有较大军种，其主要兵力能够脱离其它军种直接配合，单独开辟战场和实行独立作战的情况下，才能形成自己的战略。如海军有足够大的规模，其主要兵力能够深入远洋独立作战，那样海军战略就产生了。如其规模很小，主要兵力只能用来配合其它军种作

战，暂时就不会有自己的军种战略。目前我军有许多同志不同意有军种战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近年来，在国内报刊杂志上经常出现的“国防战略”，因分歧较大，我们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层次。从字义上看，“国防”与“军事”的概念迥然不同，军事被包含在国防之中。学术界为国防战略的定义是：运用国家力量为实现国防目的而进行的总体谋划和指导。认为军事战略侧重军队与武装斗争，而国防战略则要顾及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不仅要进行斗争，还要进行国防全局的建设，特别是和平时期的国防建设，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认为国防战略侧重管“养兵千日”，而军事战略则侧重“用兵一时”。认为国防战略比军事战略的内涵多出了“综合协调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以维护国家的安全。所以，它应是国家战略之下、军事战略之上的战略层次。其实，军事战略包括了与战争有关的一切方面。纵向看，它包括了战争准备、战争实施的各个阶段；横向看，在战争准备和战争实施中并不单纯只是武装力量的建设和使用，还包括非军事力量的建设和使用。不仅包括战而胜之，而且包括不战而胜。在这点上，我国的传统战略一直到近代的革命战争战略，无不强调要从政治、经济等方面吸取足够的力量来为自己服务。至于不战而屈人之兵，它本来就属军事战略。不战而屈人之兵必须建立在强大的军事实力和战而胜之的基础上。例如，平津战役，我军先在张家口、天津战而胜之，尔后迫使北平守敌不战而降。总之，国防战略的内涵与军事战略的内涵基本一致。即使少部分内涵不为军事战略所复盖，也为国家战略所复盖。这样一个与军事战略，国家战略复盖、交叉的概念，

在战略体系的狭缝中很难找到一个立足点，把它作为军事战略的上位概念是欠妥当的。另外，我国与美国不同。美国现行军事体制，是国防部负责建军，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作战指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军事领域的战略区分为国防战略和军事战略似乎可行。但实际上，两者交织在一起，无法分开。因此，美国也只有一个统一的军事战略。即使有的西方学者也使用过国防战略等概念，但并未为官方所采纳。

战略的内容。军事战略是以战争为其研究对象。战争环境的改变，战争形态和样式的变化，战争手段和发展等等，都直接决定和影响战略内容的演变。战争时期，军事战略的主要内容是战争的直接准备和实施。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对未来战争的预测和准备则成了它的重要内容。对战争实施的指导虽然仍是其内容的重要部分，但最现实的突出问题是如何防止战争并同时做好一旦发生战争情况的各项准备。我军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后，局部战争上升到了主要地位。尽力避免战争，并从根本上加强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做好长期战争准备，成了它的基本问题。由此可见，作为我国现时期的军事战略，其基本内容概括地说有三个方面：一是旨在避免和防止战争发生的全局问题的筹划和指导，其核心问题是树立我军强大的军事威慑形象；二是应付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争的长远准备和直接为进行局部战争所做的应急准备；三是旨在夺取战争胜利的全局问题的筹划和指导，并突出夺取各方向局部战争胜利的筹划和指导。

避免战争的军事斗争，实质上也就是维护和平的军事斗争。从二战后四十多年的情况看，在维护和平避免战争的军事斗争方面，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军事理论的竞争。战争的历史告诉我们，敌对双方的较量从来都是分两个过程进行的。第一个过程是军事理论和对策的竞争；第二个过程是在战场上进行的直接的军事力量对抗。在一定意义上说，第一个过程的较量并不亚于战场上的直接较量。建国以来，我国周边形势虽几度紧张，但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外敌入侵。这除了其它原因外，大大发展了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理论，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积极防御战略等，都是敌人把入侵我国视为畏途的重要方面。越来越多的历史证明，要赢得未来战争，必须首先在军事理论上高敌一筹。

二是军事科技的竞争。科学技术的发展是战斗力强弱的标志，是促使战略理论发展的杠杆。在相互对峙的战略竞争中，争夺未来军事科技“制高点”的斗争显得更加重要。这一方面将加剧战争的威胁程度，但角逐难见分晓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世界大战特别是核战争的爆发起到了遏制作用。我国发展高科技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垄断，反对战争，保卫和平。我们军事装备目前虽与发达国家有一定差距，但具有相当的威慑能力，随着我国高科技的发展，将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三是发展与控制军备的斗争。有战争危险存在，就必须发展军备。而无控制地发展军备，又必然影响经济的正常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军备发展过度和不足都会增大战争爆发的可能，威胁安全与和平。从目前情况看，保持与国力相适应的军备，有助于制约战争的爆发。当然，从根本上说，只有停止军备竞赛并全面实行裁军，才能有利避免战争。但这只能是一个长期的斗争任务，也是军事战略必须具

有的一个重要内容。

四是军事威慑的运用。战争是通过力量的对抗，迫使对方屈从于自己意志的行为，军事威慑便是达到这种目的手段之一，常被用于对和平局面的维护和制止战争的扩大上面。它的基础是实力，但主要不是实力的实际投入，而是显示。通过巧妙的运筹造“势”，在对方心理上造成相应的压力，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军事威慑”，作为专门术语，我军尚未把它作为军语。作为手段，我们早已使用过了，并且获得了良好的效果。1962年面对美蒋集团的“反攻大陆”野心，我们采取了紧急战备的实际行动，显示了我们坚决不让其企图得逞的实力和决心，慑止了对方；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也狠狠地教训了越南当局，打击了它的嚣张气焰，赢得了中越边境一个时期的相对安宁；1981年的华北大演习，1984年的国庆大阅兵，还有对金门实施炮击、向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等等，都显示了我军保卫祖国安全的意志和能力。它提高了我们的国威和军威，鼓舞了我国和第三世界的人民群众，对敌人也是一种威胁和打击。在保卫和平，制止战争方面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关于战争准备，平时时期与战争时期，我军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以后和以前，军事战略在内容上是有所不同的，人们头脑中的战略概念必须随之改变和发展，不能把战略在特定形态下的具体表现当作固定不变的模式。战略性转变后，战争准备主要是全面加强国防建设，着眼从根本上全面提高整个国家的综合抗衡能力。这是更全面、更扎实、更长久、更实际的准备。其目的仍然是为了防止和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就当前来讲，主要应在大力加强武装力量建

文
二
一
设的同时，有计划地开展全民国防教育，积极发展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研制先进的武器装备；进一步搞好战区、战场、边海防和战略后方的建设，建立适应未来作战需要的后勤保障体系，建立建全国家战时动员制度和动员工作体制；有计划地发展国防经济，开展国防外交，加强国防立法等。另外，如何认识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特别是战争形势和未来战争特点，从而对战争形势作出及时、准确的判断，这既是直接影响战争准备的前提条件，也是战争准备的重要内容。

关于战争爆发后的战略指导，这是军事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对战争情况的判断（这既是战争准备的内容，也是战争爆发后战略指导的内容），战争动员和战略展开的实施、战略部署的调整、战略重点的规定、作战活动的运筹，诸军兵种和其它武装力量的战略运用、战略性战役的组织实施、战争阶段的区分和战略转变的把握等。

以上内容，归纳起来就是：通过对战略环境客观、周密的分析，确定主要作战对象及战略重点。在和平时期充分做好战争准备以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在战时赢得战争的胜利。

六、关于我国的军事战略

我军在以往战争年代所建立和发展的军事战略，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进行科学认识，并对各时期的战争经验进行概括和总结的产物，集中反映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文章中。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和发展了独具特色的军事战略，并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了胜利。建国后，毛泽东同

志对我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和战争指导方面的问题作了许多论述，其后又针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以及应当采取的对策，有过一系列的重要指示，为我军确定军事战略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六十年代以来，我军曾就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与实施问题进行过数次大讨论。尤其在80年代初，全军围绕战略方针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和探讨，进一步统一了战略指导思想，明确了新条件下的战略指导方针。这些都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我军的战略理论。我军以“积极防御”为核心的军事战略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虽然我军“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建国以后一直没有改变其称谓，但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作战对象的不同情况和战略指导上的新要求，都赋予了它不同的内容。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军的军事战略应当继续发展和完善。但应看到，这是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并不意味着要重新建立我军的军事战略。

我军的军事战略是防御性质的，是以国土防卫为基础的。因此，以“积极防御”来概括这种战略的本质特征是比较适宜的，但这不是对具体战略的表述。对于我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确立一个什么样的军事战略，目前多数同志主张提“积极防御，灵活反映”。理由是，我军的军事战略既要服从国家利益，又要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因此，首先应是积极防御。其次，根据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周边关系，我军的军事战略又必须保持较大的灵活性，要对错综复杂的情况作出灵活有效的反映。其中包括应付不同规模，不同样式的战争，以及在必要情况下以积极的进攻粉碎敌人的进攻企

图等。另外，我军以往的军事战略是针对某一主要作战对象或某一主要作战样式确定的，在内容上比较单一，对于遏制战争的问题重视不够。目前，国际战略格局已发生很大变化，我国的周边关系也比较复杂。针对这种情况，我军的军事战略应具有更强的适应性。既要有和多种敌人作战的准备，也要有在各个不同方向上打不同规模，不同样式战争的准备。同时要把采取各种有效措施，遏制战争爆发作为军事战略的重要内容。只有这样，我军在战略指导上才能保持较大的灵活性和主动性，以应付各种复杂困难的局面。基于这种认识，又有“积极防御，多元遏制”的提法。也有同志提出，和平时期的军事战略，既要有应付不同规模和样式的战争准备，又要善于发挥国防力量的威慑作用，有效地制止或推迟战争。这两方面的问题不仅反映了我军事战略的根本职能，而且是确立军事战略目标的重要内容。因此，应提“灵活反击，有效威慑”为好。至于积极防御，那是人所共知的，可以不提。

关于战略目标的确定。战略目标是军事战略的重要要素。我军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后，围绕如何确定战略目标问题，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讨，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甚微，中小规模的局部战争是对我国的现实威胁。就中小规模战争而言，小规模局部战争和边境冲突又是主要的、多发的。但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对大战的准备不能放松，只不过是要从过去那种应急性的准备中，转变到立足较长时间、注重于打好基础的准备上来。同时，由于大战小战可能发生的程度不同，在战争准备和指导上必然会有不同的要

求。因此，我军的战略目标应定为“小打有把握，中打有基础，大打有准备”。也有人将其概括为“中小打有把握，大打有基础”。

关于作战对象的确定。确定作战对象，是我们制定军事战略的主要依据。过去，我们在确定作战对象时，存在着一种倾向，重视主要作战对象而忽视对次要作战对象的分析和研究。一定的历史时期，应该确定一个主要作战对象，但“唯主”决不是“唯一”，对于次要的作战对象的研究和准备也不应忽视。这是因为，主要作战对象和次要作战对象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只有一手准备，在情况发生变化时就会措手不及。有了对付主要敌人的准备，这是有效防范次要敌人的基础；而对次要敌人可能带来的威胁预有准备，这也可以保障在战略上集中力量对付主要敌人。因此，我们必须全面分析国际形势和周边关系的新情况、新特点，在明确主要作战对象的同时，对次要作战对象也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不能搞“单打一”。因而，要全面而有重点地加强敌军研究和外军研究，结合不同的任务赋予相应的训练内容，针对战区的具体特点搞好战场建设，从而使我军在战略上始终保持较大的主动性。

关于军事战略与战略方针的关系。建国以来，我军对于军事战略问题不是讲的很多，而常常是以战略方针来具体反映军事战略指导问题。在如何处理好军事战略与战略方针的关系上，缺乏必要的研究和探讨。在某种情况下，虽然也把“积极防御”作为我军的军事战略，但同样的提法又常常用来表述我军的战略指导思想 and 战略方针，以至使有些同志认为，军事战略就是战略方针。这种理论上的模糊性和通用

性，恰恰反映了我军新条件下军事战略不尽完善的问题。

那么，军事战略和战略方针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二者既不是象有人所说的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也不是直接的从属关系。军事战略本身就包括战略方针，战略方针是军事战略的基本构成要素。军事战略不是抽象的，它是由具体的内容和要素构成的。确定军事战略目标，制定与达成与这一目标相适应的战略方针，明确实现目标的基本途径和方法，这是军事战略本身的内容。因此，战略方针只是包含在军事战略这一概念中的基本要素。研究战略方针，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研究战略问题，起码是研究战略的部分问题。根据这种情况，不应把军事战略与战略方针的关系看成是指导与被指导或直接的从属关系。按照军事战略的内部结构，在确定明确的军事战略目标的前提下，研究和制定相应的战略方针，并规定实现战略目标和贯彻战略方针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实际上，我军历来都是运用这种方式解决军事战略问题的，在对战争情况有一个总的判断的基础上，提出战略上的指导方针，并据以筹划战争准备和研究实施战争的具体方法等。这样不仅便于理顺关系，而且也能更好地体现军事战略的指导作用，从而有效地解决战争的准备与实施问题。

七、战略与战役法、战术的关系

战略、战役法、战术理论都是军事学术的组成部分。对军事学术所包含的内容，各国有关著述的说法不同。苏军认为军事学术包括战略学、战役学和战术学。美军有关著述把军事学术称为“军事学说”，包括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事经济学、军事历史学、军事地理学、军事教育训练学、战争动员学、军事后勤学。我军对其定义是：军事学术

是研究和阐述建军、作战的理论和实践的各门学科的统称。主要包括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等学科（1983年《军语》）。

战略、战役法、战术作为不同层法的指导方法，如同战争、战役、战斗一样，是不可分割的。它们是局部与全局的关系。

战争，是敌对双方相互斗争的最高形式；战略，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战略学是研究带全局性战争规律并用于指导战争的学科。

战役，是敌对双方在一定方向或空间，各自使用一支统一指挥的军队，为达到战争的局部目的或全局性的目的。按各自的作战企图，在一定时间内进行的一系列战斗的总和；战役法，是指导战役的方法；战役学，是研究战役规律，并用于指导战役的学科。

战斗，是敌对双方的兵团、部队和分队，在较短时间、较小范围所进行的有组织的直接武装斗争，是达成战争或战役目的的基本手段；战术，是指导战斗的方法；战术学，是研究战斗规律，并用于指导战斗的学科。

战争、战役、战斗是从两军拼搏的外部形态，即规模、范围上区分的，战略、战役法、战术分别是指导它们的方法，回答是什么的问题；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分别是复盖战争、战役、战斗全部问题的学科。它们分别研究战争、战役、战斗的规律和方法，以及这些方法的形成发展，不仅要回答是什么，还要回答为什么、怎么办的问题。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

第一，它们三者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即战略处于主导地位。战略是统帅战役法、战术的最高部门，它规定着完成

战役、战斗任务的行动目的、方法和手段。战役法、战术从属于战略，用克劳塞维茨的话来说：“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战略是为了战争的目的运用战斗的学问”。因而，三者的范围和具体目的不同，有时甚至是方向相反。例如，战争全局的胜利并不绝对取决于战役、战斗任务的胜利之和。因为有时整体上的保存，需要个别局部的不保存；全局上的防御并不排斥个别局部的攻势行动，全局上的进攻也不排斥个别局部的防御等等。由于战略利益是全局的利益，所以在全局与局部利益发生矛盾时，作为从属全局的局部，要无条件的服从全局，离开了全局无所谓局部。从这个意义上说，战略全局的利益是压倒一切的，战役战斗指挥员必须了解全局并无条件的服从全局，即使牺牲局部利益也要在所不惜。

第二，这三者之间又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因为任何一场战争都是由若干个完整的战役、战斗构成的，全局不是抽象的。离开了局部无所谓全局，离开了全局也无所谓局部。如多数一般性局部的失利，将会导致全局的失败。而那些具有决定意义的局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局部，一旦失利将立即引起全局的变化。因此，作为战略指挥员，既要特别关注具有决定性意义局部的变化，也要注意一般性的多数局部的变化。

第二节 战 略 学

一、什么是战略学

战略学是研究带全局性的战争指导规律，并用于指导战

争的学科。战略学在军事学术中处于主导和统帅地位，是军事学术的最高领域和整个军事科学的骨干学科，它统帅战役学和战术学，决定战役学、战术学的主要任务和发展方向。战役学、战术学依据战略学的要求，确定各自的理论原则。同时，也对战略学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军制学、教育训练学、战争动员学、军事管理学、军事地理学等学科也都要依据战略学的要求来确定各自的研究任务和发展方向。此外，战略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即战略学也要利用以上学科的成果来发展完善战略理论。

战略学以战争全局为研究对象，研究的主要内容有：战争中各种客观条件对战略的影响；战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战争指导的历史经验；未来战争的性质和特点；战略方针和作战指导原则；武装力量各组成部分的任务和战略运用；战争准备、战略防御、战略进攻的组织与实施；战略指挥；战略后方；战争中的政治工作等等。

二、战略学的产生和发展

战略学和各种门类的学科一样，有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从经验到理论的。在古代，战争经历了冷兵器时代的漫长进程。由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落后，战争规模有限，战略战术是交融在一起的。最初，人们仅把各次战争的将帅活动，作战方法、战争经过、胜利或失败等纪录下来，久而久之从中发现了一些反复出现的、带有普遍性的东西，从而形成了一些指导战争的原则和方法。这些原则和方法，经过战争实践的检验，有的被肯定，有的被新的观点所取代。经过多次循环和反复，逐步达到较高的认识，上升为理论。同时，战争的发展是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紧密相联的，前者受

后者制约。古代社会生产力落后，投入战争的人力物力有限，决定了战争的规模较小，样式简单，时间较短，往往一场战斗就是一场战争。这样，在军事理论上，还不能把战争全局和局部分为几个学科加以研究。所以这时的军事理论只能是包括战略、战役法、战术及其它学科在内的混合概念。

我国是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几乎历代都经过频繁的战斗，战争经验极为丰富，因而战争理论的产生也比较早。远在殷商时代的甲骨文、金文中，就有大量的军事活动的记载。大约在公元前11世纪至8世纪，出现了军事文献《令典》、《军志》、《军政》。后来又产生了《孙子兵法》。孙武以后兵家迭出，有了更多的兵书传世。这些兵书所论之方法，类似我们今天所说的“军事学术”，它包含着军事理论各个学科的概念。

从国外来说，涉及战略内容较早的，要算弗龙廷写的《谋略》一书。到了16世纪，在文艺复兴时期以后，相继出现了两位战略巨匠，一位是意大利的尼科罗·马基雅维里，写了《论兵法》一书；另一个是普鲁士的腓德烈大帝的《与诸将书》。后来，瑞士人安东·亨利·约米尼，总结前人的军事实践写出了具有重大价值的《战争艺术》一书。德国的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写了《战争论》这部巨著。至今仍被西方军事理论界认为是经典之作。但是上述的著述虽然分为战争理论、战略、战术几个部分加以研究，而本身仍属于综合性的军事理论著作。

军事学术的各个学科真正独立区分开来，大约是从19世纪中叶至下半叶开始的。这个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实现了向机器工业的过渡，生产力继续提高，新兴生

产部门不断增加。对战略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是：铁路的建设，电报、电话的发明，汽艇代替帆船，机动车辆的出现，以及线膛速射武器的使用等等。这样，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军队人数迅速增加，实施战略集中得以实现和集中的速度加快。战略行动可在数个方向的宽大正面上进行，并提高了战略预备队的作用，从而产生了适应这种发展的战略理论。在这些战略学说建立和发展的同时，相继出现了战术学、军械学、筑城学、军事地理学、军事教育学和军制学等专门性著作。尔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军队的武器装备、组织状况和军事行动实施方法的变化，整个战争不是几次战斗就可完结的，而是要由多种类型的若干个战役来完成。这样，又产生了战役学理论。

第三节 战略的客观基础

战略是领导和指导战争的人们的主观指导活动。战争的主观指导不是统帅个人意志的自由创作，而是为战争的客观物质条件所制约的，是以客观条件为基础见之于主观的产物。战争指导者虽可凭借一定的客观物质基础，去夺取战争的胜利，但却不可能超出客观物质条件去企求战争的胜利。正确的战争指导只能在认识了战争规律的基础上产生出来。脱离对战争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就不会有对战争的正确指导，不会有正确的战略。因此，战略学应该研究影响战争的诸条件，揭示它们同战略的关系。

一、政治条件

政治与战略的关系，概括地说，政治是制定战略的前

提，政治对战略有广泛的影响，政略决定战略，战略亦反作用于政略。由于政治决定战争的产生、发展进程和结局，决定战争的性质，即战争必须服从政治、服务于政治，也就决定了战略必然要服从服务于政治。简单地说，政治对战略的影响是这样产生的：世界上任何战争的双方，都有着各自的利益追求，这些利益和追求即政治目的。当这种政治目的需要通过战争手段去实现的时候，就表现为战争的目的。实现战争的目的，要有与之相适应的战略，这样政治目的必然要渗透、控制着战略。在这个基础上，政略与战略融为一体了。任何战争及其战略，首先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分不开的。过去，帝国主义制度国家奉行殖民主义政策，为了瓜分殖民地而进行殖民战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其战略就必然适应这种战争目的而产生。由于他们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所以其战略必然是依靠船坚炮利的强大武力而设计的，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和掠夺性。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和国家进行的是正义战争，他们必然依靠人民群众采取防御性的战略。当前，超级大国所奉行的战略具有明显的进攻性和冒险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性质，决定了我们决不会发动掠夺别国领土和财富的非正义战争。我们的政策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因此，我们的战略是积极防御战略。

每个国家的政策和策略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战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许多国家（同盟国）在反对德、意、日轴心国的侵略战争中，总的说来有许多共同基础。但他们又有各自不同的利益，从而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战略：英法等西欧

国家不履行援助波兰的诺言，企图将希特勒这股祸水东引，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消极防御战略，进行了八个月之久的“假战争”。苏联在战争迫在眉睫的情况下，仍寄希望与德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采取所谓“不给法西斯德国以任何挑起战争的借口”的策略，从而陷入极端被动的战略地位。在中国战场上，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实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采取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策略。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的全民的抗战”政策，因而制定了持久战的战略。

从另一方面看，战略也会反作用于政治。战争爆发之后，国家要从和平体制转入战时体制。这时，“两军敌对的一切问题依靠战争去解决，中国的存亡系于战争的胜负”（《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19页）。战争有它自己特有的规律，违背它就会使战争遭到失败，甚至国破家亡。因此，在战争期间，政治要服从战争进行活动，要考虑战争的需要并为其创造有利条件。如战时的领导体制、战时的法律与法规、战时的宣传教育等方面，都必须按照战争规律和战略要求来组织实施，以取得最大的战略利益为出发点。

二、经济条件

经济能力(生产水平)是战略观点产生和发展的决定性条件，并为战略提供物质保证。同时，战略对经济发展方向提出要求。任何战争都离不开经济，反映在战略上就是战略也依赖经济。战略依赖经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战略的制定和作战方法的选择，都必须考虑敌我双方的经济情况。任何国家在确定战略企图和计划时都必须以各自的物质力量和技术力量为基础。否则，任何好的企图和计划都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想。例如，铁路、公路、内河航线的密度和分布状

况以及陆运、海运和空运能力，是制定战略机动和战略展开计划的依据。钢铁生产能力、军事工业和技术装备的能力，以及国家的粮食和各种物质储备状况等等，是确定整个战略企图要考虑的基本条件。

其次，新的战略观点的产生，离不开生产力和交通运输能力的发展。随着社会生产能力的发展，经济各部门技术上的进步，创造发明了新的作战工具，为作战提供了更多的手段，从而产生了新的战略观点，导致战略理论的发展。这从战略学发展历史中可以找到许多证据。以坦克和装甲战车组成的快速兵团取代步兵，产生了“闪电式”的战略突袭理论；直升机、电子器材和海空军作战工具的发展，确立了“立体战”的战略思想。新的军兵种的诞生和原有军兵种的分化，给战略指导提出了新内容。导弹核武器的出现，不管是否在实战中使用，都将成为战略上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从战略与经济的相互关系看，战略并不是完全处于被动地位。首先，战略要向经济提出要求，国家在确定经济发展计划时要充分考虑战略的需要，在经济体制和布局主要与战略部署相适应，要使发展国民经济与加强国防能力有机结合起来。其次，战时夺取和保护经济目标，也都要依赖战略部署去实现。

三、科学技术条件

一定的战略依赖于一定的科学技术条件，是与一定的科学技术条件相适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对军事战略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往的两次世界大战，战争各阶段的战略任务基本上是通过各个战役、战局逐次实现的，战略上用于直接影响战争进程的手段不多。由于

高技术兵器的发展以及侦察、通信、导航、气象等军用卫星、自动化指挥系统的发展，为战争指导者和战略指挥机关提供了能直接完成一定战略任务的物质手段，使战争指导者在考察战略的客观物质条件时，不能不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独立的因素加以研究。近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精制导和高效炸药等军事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常规武器的威力。超级大国鉴于核力量处于相对均势，而常规武器大大增强的情况，日益重视研究和发展先进的常规武器。他们的军事战略也出现了由核战略向以核力量为后盾的常规战略发展的趋势。由于目标探测技术的发展，以及定向能等非核拦截武器的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表明对战略导弹进行防御和破坏对方卫星是可能的。这就为美国提出所谓《战略防御计划》奠定了技术基础。不难看出，科学技术的发展已对军事战略的制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对于战略者来说，必须及时掌握科学技术发展的信息，预见其对战略的可能影响，并努力学习新的科学技术，以适应指导现代战争的需要。

四、军事条件

军事力量是进行战争的主要物质基础。它的强弱对战争规模的大小，持续时间长短，战争形势的转变以至战争的胜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军事力量主要指一个国家或政治集团可以直接用于战争的力量。包括武装力量的数质量和可用于直接支援战争的人力、物力。也包括武装力量的建设，武装斗争的准备与实施，军事科学研究等等。军事力量是决定采用何种战略的主要物质因素，制定军事战略必须符合敌我军事力量的实际情况。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的弱小和敌人的强大形成尖锐的对比，每支红军部队从一开始就处

于强大的敌人包围之中。在这种情况下，红军则不能与敌人采用营垒对营垒的正规阵地战。而只有采取集中作战、分散游击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这同当时我军的军力情况密切相关。当前有的霸权主义大国实行积极进攻的全球战略，充当世界宪兵的角色，干预别国内政，除了政治原因外，也与他们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分不开。

五、自然条件

自然条件与战略有着密切的关系，制定战略必须重视地理条件的影响。自然条件主要是指自然地理条件，包括地理位置，地形条件，国家幅员、人口、资源和气候状况等。

国家地理位置和与邻国的接壤情况，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它对战略有直接影响。地理与战略的关系主要表现为一个国家处于不同的地理位置，就会产生不同的战略需要。四面临海的岛国，必然重视海空军的发展和建设，确定以空海军为主体的战略。而既有广阔的海岸线又有较多的陆上邻国的国家，就会产生多方面的战略需要。

地形是战争中千变万化的条件中相对固定不变的条件。所以，克劳塞维茨说，地形对于战略“几乎始终是有影响的”，有的地形对确定战略意图及所产生的结果可能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我军战史上，也历来把选择有利地形条件作为弱军战胜强军的重要条件之一。例如，抗日战争开始时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战略；解放战争选择大别山地区实施战略进攻，都取得了极大的战略成功。

国家幅员、人口、资源等情况对进行战争和战略有重大关系。土地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大国，与小国相比，具有生存能力强，战争潜力雄厚、回旋余地大等有利条

件，有利于抗击敌方的核突击和支持长期战争。另外，边界的形状对战争初期作战有重要影响，特别是突击部：防御时容易遭到对方数个方向的向心攻击；进攻时则可作为有利的进攻出发地。

气象对战略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有的表现为利用气象条件确定战略企图和组织实施战略行动。例如郑成功利用大雾渡海，收复了台湾。相反，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在莫斯科地区遇到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影响了战略计划的执行。越南战争期间，美军在“胡志明小道”上采用气象战武器“呼风唤雨”，给越南北方造成很大困难。

六、国际条件

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战争的发生、发展越来越受到国际关系的影响。不考虑这一点，将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如英阿马岛之战，由于阿根廷错误地估计形势，而导致军事战略的失误。开始阿根廷认为，在英阿冲突中，美国可能中立，北约国家无大作为，南美国家可能持同情或支持态度。基于这种判断，低估了形势的严重性。结果美国不但没有保持中立，反而积极为英国提供后勤和技术支援。欧洲对阿实行经济制裁和禁运。这是阿根廷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总之，战争是一个多因素的复杂的动态系统。因而指导战争的战略必然是一个复杂的知识体系，它是由一系列科学群体组成的大科学，直接需要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中的各个学科的方法和结果。现代战略不仅内部结构越来越复杂，相关领域的联系亦日益密切。战略行动的内容和形成都突破了原有的界限和模式，带有多学科交叉的广泛社会性和精深的专门性。需要广泛利用多学科知识和先进的手段去研

究、探讨，使之在深度上、广度上和精确度上得以进一步发展。

第四节 战略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战略是战争理论的灵魂，是一个形式上古老而内容常新的问题。反映战争规律的战略理论及其实践，也随着战争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深化而不断演变。人类社会有了战争，就形成了谋划战争全局的战略。几千年来，它的内涵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依据战争的物质条件变化而变化。透过它的轨迹，探索战略演进的规律，将有助于我们对未来战争与战略的研究和制定。战略的发展，大体经历了古代、近代、现代三个历史阶段。

一、古代战略理论

我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几乎历代都经过频繁的战争，战争经验极为丰富，因而战争理论的产生也比较早。可以说，中国是古代战争的摇篮。尽管当时人类对战争的探索还处在朦胧的初始阶段，但是我们祖先在开创战争理论方面，作出了举世公认的巨大贡献。十七世纪以前，无论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中国都是走在世界的前列。中国既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又是战争和战争理论最发达之国。

远在殷商时代的甲骨文、金文中，就有大量的军事活动的记载，夏末商初的鸣条之战，汤采取了翦夏羽翼，迂回侧后，追而歼之的方略。周武伐商纣的战争，采取了积聚力量，隐蔽待机，上智为间，分化瓦解，联合诸侯，吊民伐

罪，乘虚蹈隙，奔袭商都等战略。这些均已具有政治、军事谋略的雏形。大约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八世纪，出现了反映殷商后期和西周时期军事思想的军事文献《令典》、《军志》、《军政》，这是我国最早的兵书。其中“有德不可敌”，“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强而避之”等，反映出注意内部的德治，量力进退，先发制人的谋略思想。这一时期是古代战略理论的形成时期。

春秋战国，是古代战争和军事理论的大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战略理论应战争的需要，日趋系统、完善和成熟。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参战人数增多，动辄兴师十万乃至数十万，除车兵外，骑兵和步兵逐渐成为独立兵种，作战方式多样，不仅有单一兵种的车战，还有步、骑、车兵合战。这可以说是最早的诸兵种协同作战。在战略运用上，形成一些原则，至今为人称道。如晋楚城濮之战的退避三舍、后发制人，吴楚柏举之战的诱敌疲劳，毁楚潘筦，齐魏桂陵之战的“围魏救赵”、“批亢捣虚”，马陵之战的“减灶示弱，诱敌入伏”等。这些战争经验的理性概括和阐述，体现在《孙子》、《吴子》、《孙臆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等一批著名兵书中，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基础，深远地影响后世。

《孙子兵法》是举世公认的第一部战略战术著作，是“富于教益和无与伦比的战略论”。它当时提出的“安国全军之道”，“不战而屈人之兵”，“伐谋、伐交、伐兵”，“全为上，破次之”等战略思想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谋略的运用上，比较全面的揭示了战争的指导规律，对

于现代战略也具有较大的启示。

秦汉之时，秦统一六国，采取“远交近攻”、“连横破纵”的方略，注意战略目标先后次序的选择。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采取了强己弱敌的联盟战略，在多集团、多角争斗中，“伐谋”、“伐交”，在南北相持中，以江河为界，依险而守的思想，以及在混战中“坚壁清野”，“筑坞建垒，自守为战”的思想等均有所发展。隋唐时期在用兵上更多地表现为军政兼行，以兵威慑，辅以分化瓦解。这时的《李卫公问对》是运用战例来阐述战略战法的著名兵书，强调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至于人’而已”；辩证地阐明攻守关系，认为“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反对“攻不知守，守不知攻”。宋代，火药、火器用于军队，有专门的“武学”，培养高中级谋略人才。出现了官方颁布的第一部集录性军事教科书《武经七书》和一些汇编性专题性名著，丰富了战略理论。辽金元以骑兵称雄，成吉思汗的骑兵强悍善战，是古代骑战的鼎盛时代。明清前期，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有所发展，但总的说缺乏更多的进取性。

在公元五世纪至十五世纪的欧洲，则因为社会生产力、社会政治条件等的限制，大战罕见，战略理论也就处于停滞状态。按西方理论家的形容，这是个黑暗时代，知识之灯在其它领域还微弱的闪烁着，但在战略理论方面，这盏灯实际上熄灭了，而且一直熄灭了一千多年，是个“毫无收获的时代”。

二、近代战略理论

近代战争理论从欧洲异军突起。十五世纪，战争从冷兵器时代步入热兵器时代。我国发明的火药在西方得到了广泛

的运用，步枪、火炮在战场上首先使用。战争的规模也随之扩大。随着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在军事上的改革，军事战略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拿破仑作为资产阶级杰出的统帅，在领导法国资产阶级向欧洲封建势力进行斗争的作战中，创造了一些新的作战方法。他在战略指导上强调大量歼灭敌人的军队，快速机动，以及在主要方向集中优势兵力，建立预备队，出敌不意的袭击等等。

对西方战略理论发展影响较大的还有瑞士的军事理论家安东·亨利·约米尼和德国的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指出：“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军队的学问，战略则是为了完成战争目的而运用战斗的学问”。约米尼在《战争艺术》中则定义为“战略是在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它所研究的对象是整个战场……”。在理论上进一步严格了战略和战术的范畴。他们的战略理论都揭示了“警戒线战略”的弊端，把歼灭敌人的军队而不是占领领土作为战略的主要目标。正确认识战争与政治的相互关系，强调精神因素，是《战争论》最主要的观点。

十九世纪下半叶至二十世纪上半叶，随着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过渡，西方军队战略的视野扩大到了全世界，各种适应资本主义瓜分世界、争夺世界霸权、服务于帝国主义战争，以使用新式武装为基础的战略理论相继问世。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海权论”；“陆权论”；“速决歼灭战略”；“空权论”；“机械化战争论”；“总体战论”；等等。这些战略理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资本主义各参战国的战略，有的至今仍有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评和继承前人军事理论的基础上，

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提出了人民战争思想；高度重视军队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中的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必须在战场上争得自身解放的权利，指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军队”；认为武装起义是一种推翻反动统治的有效手段，且必须在各方面条件成熟时，才能实行；在总结各次战争的基础上，指出了一些重要的作战指导原则。指出战略的首要任务在于正确选定主要方向，战略运用的奥妙在于集中兵力。恩格斯对于进攻防御两种基本作战类型作过十分精辟的论述。指出，进攻是夺取主动权的行动，一般能获得更大胜利。防御不应当是消极的，而应当从机动中吸取力量，并且只要一有机会，防御者就应当采取攻势行动。这些精辟论述，反映了军队行动的客观规律，为无产阶级军事理论奠定了基础。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成为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在此期间，军队武器过渡到以热兵器为主的时期。在军制上，仿效西方建立新军，陆军设步、骑、炮、工、辎部队，并建立了海军舰队，已经能够进行步炮骑协同作战和独立的海战，以及陆海军协同的抗登陆作战。兵书的著述以翻译西方的为主。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方略，“以守为战”，“以逸待劳”，近海陆地歼敌等战略防御思想，初步改变了“有海无防”的状况。这一时期，是中国由传统的军事思想过渡到近代军事思想的时期。在传统基础上，注意吸取外国经验，具有“中西结合”的特点。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主张采取联络同志，利用会党，结好外国为后劲，先据有一、二省，以为割据之势，而后张势于四方，奠定大局的方略。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战略，从根本上说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战争战略，以人民军队为骨干，实行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相结合是人民战争的基本组织形式；是以弱胜强的战略，持久战是以弱胜强的主要指导方针；把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作为基本指导思想。为消灭敌人实行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作战形式的结合运用；在作战指导上突出的表现为灵活机动的特点，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敌变我变，不拘一格。因而能够战胜国内外强大敌人。

三、现代战略理论

现代战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战略格局。美苏分别成为战后在国际事务中起主导作用的超级大国，其军事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代表性，并对世界局势发生重大影响。

核战略理论。二战后，美苏大力发展核武器。一方面，在“核恐怖均衡”的相互制约下，尽量避免迎头相撞；另一方面，又在世界“敏感地区”之外的广阔领域挑起局部战争。初期的核战略主张以核武器进行遏制，企图利用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造成的恐怖心理和核武器垄断地位，迫使对方屈服。这使一切战略不可避免的打上核烙印。如美国的“遏制战略”，企图以核武器为讹诈手段，来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大规模报复战略”是在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前提下，依靠自己的核优势，打“闪电式”的核大战，“灵活反应战略”，试图以核力量为“盾”，以常规武器为“剑”，使战争逐步升级，侧重打特种战争和局部战争，以补充核大战战略的不足；“现实威慑战略”把用核武器优先打击城市改

为优先打击军事目标，企图迫使苏联不敢贸然对其实施突击。苏联这一时期的战略与美相仿，并有所发展。苏六十年代推行的“火箭核战略”正是这种理论的产物。

核条件下的常规战略理论。这种理论是在美苏核力量进一步处于均势，核“实战战略”走进死胡同情况下产生的。这种理论的基本点是：在核均势情况下，常规战争的可能性增强；在有核国家之间进行的常规战争，必须以核为“盾”，以常规力量为“剑”，作好在常规战争中使用和防御核战争的准备。

七十年代以来，由于世界新技术革命的兴起，不仅加速了常规武器的现代化，推进了新一代核武器向高精度、小型化方向迅速发展，还开发了新一代空间战略兵器，为世界主要国家推行以高技术为主攻方向的新战略提供了条件，各主要军事大国竞相推出了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发展战略，预示着现代战略向空间时代的发展。

美苏的战略理论，围绕着核武器和外层空间武器的发展，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和对抗。美国1983年提出“战略防御计划”，苏联1987年提出“加速发展战略”，标志着他们之间的争夺进入了一个情况颇为复杂、目标更加长远的新阶段。美苏的战略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代战争的发展趋势，对未来战争将产生重大影响。因此，我们预测未来战争，研究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问题，必须重视对美苏战略理论的研究。

第三章 积极防御战略

积极防御战略，是防御战争和作战中一种克敌制胜的聪明的战略，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战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军在历次革命战争中赖以取胜的“传家宝”和战略思想的精髓。

纵观古今中外，在防御性的军事行动中，采取积极防御战略的战例和国家是举不胜举的。由于各场战争的时间、空间以及当时的具体情况不同，在解释和运用上也不尽相同。但是，尽管如此，积极防御在本质上却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都是在防御中采取灵活积极的攻势行动，消耗以至消灭进攻敌人的有生力量，最后赢得战争的胜利。

在漫长的古代冷兵器时期，随着战争实践的丰富，朴素的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萌芽就已经产生，它不仅在理论家们的著述中散发着奇光异彩，并为许多聪明的军事家广为应用。到了19世纪，热兵器的大量使用，使西方资产阶级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首先提出了积极防御这个概念，已经开始敏感地触及到这种先进的军事思想的实质。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命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而且及时赋予了科学的内涵，使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并且从一般性的战争原则上升到防御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

毛泽东同志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从理论和实践

的结合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对积极防御的战略作了科学、深刻、全面和系统的论述，使之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而指导我军由小变大，由弱变强，一次又一次战胜强大的国内外反动势力，取得了革命的成功和中国的统一。

时代在发展，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并没有停止它前进的步伐。因此，不同的历史时期，积极防御战略必然要现出不同的特点。在未来战争中，战争的客观环境已经同过去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表现出许多新情况和新特点。我们在战争指导上也一定要着眼其特点与发展，使积极防御战略不断完善和发展。

第一节 积极防御与消极防御

防御战略，按其本质可以区分为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两种根本对立的战略类型。

一、积极防御战略

积极防御，又称攻势防御，决战防御。是一种为了辅助进攻，或为了转入反攻和进攻创造条件而进行的防御。在作战行动上，处于防御地位的军队或依托阵地，先以顽强的抵抗、消耗、疲惫攻者，继之以积极的反击（反攻）挫败敌人的进攻；或先以运动防御和退却，诱敌深入，陷敌于不利地位，而以进攻将其消灭或击破之。“攻势防御”和“后发制人”是这种防御的本质和核心。积极防御把防御和进攻这两种作战的基本类型与手段有机地统一起来，寓攻于防，寓防

于攻，攻防结合，溶为一体。它的思想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战争观与方法论，即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运用攻势防御、决战防御的积极思想指导战争的全过程。积极防御战略其主要特点是积极性、主动性、进攻性，它是一种聪明而巧妙的，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致胜战略。

二、消极防御战略

消极防御，又称专守防御、单纯防御。是一种不是为了转入反攻和进攻，而是专门防守，单纯以阻挡敌人进攻为目的的防御。“专守防御”和“后发而不制人”是这种防御的本质和核心。把防御作为制止敌人进攻的唯一手段。它割裂了防御与进攻之间的有机联系，它的思想基础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战争观与方法论，即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为指导，把防御看成是孤立的、静止的、绝对的、永恒不变的唯一手段和形式，片面地认识敌我力量优劣对比和战争形式的转换。消极防御战略其主要特点是消极性、被动性、单纯防御性，实质上是一种愚蠢的、被动的战略，其结果只能招致惨重的损失和失败。

三、坚持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

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战略思想。我们要自觉地贯彻积极防御，防止消极防御思想的干扰，就要把两种防御的本质区别搞清楚。

第一，两种防御对战争情况认识的思维方法不同

积极防御，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去认识战争，研究战争，指导战争；消极防御，则是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去认识战争，研究战争，指导战争。两者在指导防御战争的具体实践中，其本质区别是：

(1) 积极防御坚持用客观的观点指导战争。主张一切从敌我双方的客观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尊重防御战争的客观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重视深入细致的侦察和调查研究，透过现象看本质，进一步熟识敌我双方的各种情况，做到知彼知己，因枪因敌因地因时制宜，强调自己的主观指导不能超越战争的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力求使自己的主观与客观相统一，制定出与客观实际相符合的防御战争的战略战术方针。消极防御则坚持主观的观点。主张一切从主观愿望出发，一厢愿望，实行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不能正确地估量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既不知己又不知彼，超越客观现实允许的条件范围去规定战略战术。例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根据地方的第五次反“围剿”时的消极防御，不顾敌强我弱的客观现实，时尔战略上否认防御而频频冒险进攻，时尔在敌人大举进攻面前，又惊慌失措，畏敌如虎，企图以单纯的防御堵住敌人的进攻，在客观条件不允许时，与敌人阵地对垒，以硬碰硬，死打硬拼，给红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2) 积极防御坚持全面的观点。要求从防御战争的整个情况出发，研究战争中的一切现象，一切方面和一切过程，即敌我双方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化、外交、军事、作战特点、武器装备、士气等各个方面，以及直接的和间接的、内部的和外部的、本质的和非本质的、必然的和偶然的、主要的和次要的、有利的和不利的等各种因素。战争初期、中期、末期各个阶段。力求从各种纷繁复杂的战争现象、方面、因素、阶段中，寻找出敌我双方的强点与弱点，尔后制定出以己之长攻敌之短的制胜方略来。例如，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利用这一科学分析方法，从时代特点

出发对战争进行了总的考察之后，深入到矛盾内部，具体考察了敌我双方各个基本要素，得出了相互对立的四个特点：第一，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量是强的，中国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弱的；第二，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抗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第三，日本是一个人力、物力、军力、财力先天不足的小国，中国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多、兵多的大国；第四，日本在国际上是寡助的，中国在国际上是多助的。第一条特点的敌我对比，决定了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其余三条特点决定了最后胜利是我们的。这样就从根本上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规律，从而为制定一套正确的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原则奠定了基础。

消极防御则坚持片面的观点。从战争的个别现象、因素和阶段出发，抓住敌我双方特点中的一鳞半爪当做本质，去做文章，任意地夸大或缩小，是偏概全，导致了作战指导上的片面性。例如，抗日战争中的亡国论者只孤立地看到敌强我弱这一特点并把它绝对化，忘记了我国大、人多、进步的特点；速胜论者却根本不顾敌强我弱的事实，片面地、过分地强调我国大、人多、进步的特点。由于二者都只是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把个别当整体，因而结论必然是错误的。

（3）积极防御坚持发展的观点 认为战争是不断变化的动态的发展系统，并不是永恒不变的。每一场战争都存在不同的特点和特殊规律，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着眼其特点，着眼其发展。同时，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必然要引起武器装备、作战方式方法的新变化，必须立足于敌我双方的

实际情况，根据战争的新特点，解放思想，探讨制定新的战略战术。消极防御则从静止和僵化的观点出发，闭目塞听，对新事物不敏感，不接受，死死抱住过去成功的经验不放，并照搬照抄地移植在新的战争中，使其主观指导远远落后于客观现实，必然要受到惩罚。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的消极防御，把第一次大战的经验固定化，闭眼不看第一次大战后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的进步，墨守陈规，军事思想大大落后于客观实际造成了惨重的失败。

第二，两种防御对进攻和防御两者的关系认识不同

积极防御坚持以辩证法的观点看待进攻和防御这两种基本的战争形式，它们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攻中有防，防中有攻，攻防可以互相结合，攻防可以互相转化。而消极防御则以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攻防问题，只看两者对立的一面，看不到还有统一的一面，认为攻就是攻，防就是防。要讲进攻，就看不到某些部分和某些时间采取防御的必要；要讲防御，就看不到某些部分采取进攻的可能，更看不到在一定时间转入进攻的可能。因而在行动上则采取单纯防御、专守防御。

第三，两种防御对战略方针与战役战术方针的关系理解不同

积极防御能够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认识到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战役战术从属于战略，不能脱离战略而独立，但又有一定的能动性，战役战术的胜利推动战略形势的发展，在战略防御阶段，战略上是防御的，而战役战术上却主要是进攻的，即战略内线持久防御战与战役战术外线速决进攻战的辩证统一。即使在未来战争初期，战役战术上以坚守

防御阵地战为主，但还要进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进攻战，从战略防御的全过程看，战役战术上的进攻仍然应当是主要的。而消极防御则不然，它把战役战术对战略之从属的、被动的一面绝对化，看不到还有相对的区别性、一定的能动性的一面。因而机械地认为战略上是防御的，战役战术上也只能是防御的，在行动上则是平分兵力、处处设防、节节抵抗，把自己的手脚捆得死死的，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第四，两种防御对战争结局的要求不同

积极防御是后发制人，通过战略防御阶段的作战，削弱敌人力量，扭转战局，然后“还手”，举行战略反攻和进攻，战争结局是彻底消灭敌人。而消极防御则只招架不还手，没有转入反攻和进攻的打算，其最高要求是顶住、挫败敌人的进攻，使敌人丧失进攻能力而结束战争，然而由于战法错误，这样的结局也是难以达到的，它是“后发不制人”。所以说，积极防御是胜利之途，消极防御是失败之道。

第二节 历史上的防御理论 和防御作战

积极防御理论，是伴随着人类战争历史的延续而逐步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我们翻开古代的兵书，有关积极防御的精辟论述，可以说是举目可见。我国春秋时期的大军事家孙子说“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孙子兵法新注》第69页）唐太宗李世民同他的属将李靖在研讨兵法时说：“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李卫公问对校注》卷下）明代的著名将领方

云儒也讲到“我以退为守，则守不足；我以攻为守，则守有余”。（《历代名将言行录》卷27）《百战奇略》中说：

“凡战强敌，初来锐气，我之势弱，难以相持，且当避之。伺其疲敝而击之，则胜。”诸如此类说法散见于大量的兵书之中。尽管这些言论尚未形成一种完整系统的理论，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概念，但是却赋予防御以积极内容的早期的朴素性论述。可见，古代军事家已经开始注重防御的积极性和进攻性。整个冷兵器时代，是积极防御理论萌芽产生和形成的阶段，并在防御作战中开始应用。

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工业革命以后，科学技术和军队的武器装备突飞猛进，火药武器的出现给战争插上了翅膀，使作战方式方法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传统的方阵对垒已被抛进历史的陈迹之中，取而代之的散兵线、野战阵地大量地运用于防御作战。从而为防御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客观条件。这一时期，不仅催生了积极防御的理论雏形，而且在新的防御战争实践中，使其逐渐完善和丰富起来。

十九世纪初，瑞士的军事理论家约米尼，率先提出了防御作战可分为“消极守势”和“积极守势”两种概念。他说：“一个守势的战争，假使进行得很技巧，也并非完全没有利益的。守势又可以分为消极的守势和积极的守势。消极的守势是必败无疑的，而积极的守势则往往可以转败为胜。”他在进一步阐述这种观点时，又提出了“攻势防御”的概念。他说：“守方决不可以站在原地不动，静等着敌人来对他加以打击，反而言之，他应有双倍的活跃，随时保持着机警的态度，一发现了敌人的弱点，马上就加以强烈的回击。这

一类的作战计划可以叫作‘攻势防御’。”（《战争艺术》第52页）约米尼从防御这种被动的作战形式中，发现了可以转化为主动的因素，更可贵的是提出了“积极”和“消极”两种概念，对防御作战理论作了卓越的贡献，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但是，这还不能算是积极防御的完整概念和全部理论体系的产生。

与约米尼同一时代的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1810年至1812年间为德国王太子讲授军事课时，提出了“积极防御”的概念。他开始是在论述战术防御的一般原则讲到的，他说：“一条主要的原则是：决不要采取完全消极的防御，而要从正面或侧面攻击敌人，甚至当敌人还在进攻我们的时候也要这样做。在一定的战线上进行防御，目的仅仅在于诱使敌人展开兵力来进攻这段防线，接着我们就要用控制在后面的其它部队转入进攻。”他在这里列举了四个战例后说：“上面列举的会战中并不是每一次会战都明显地体现了所有上述原则，但是这些会战都是积极防御。”（《战争论》第3卷第957、961页）后来，他在《战争论》一书中，又从战略上讲到了有关积极防御的内容，他说：“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应该把转入反攻看作是防御发展的必然趋势，是防御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不论什么场合，如果通过防御形式所取得的胜利在军事上不以某种方式加以利用，而听任它象花朵一样枯萎凋谢了，那就是重大的错误。迅速而猛烈地转入进攻（这是闪闪发光的复仇利剑）是防御的最光彩的部分。”（《战争论》第2卷第476、495）这些就是世界军事理论著作中最早出现的“积极防御”概念及其含义。

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积极防御战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恩格斯曾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历史上防御性的战争进行了科学的分析，充分肯定了积极防御的观点。他说：“在现时的条件下，还不曾有过依靠野战工事的消极抵抗在决战中击溃有才能的统帅所指挥的优势敌军的事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第482页）“最有效的防御仍然是以攻势来进行的积极防御”。并且还指出：“世界上各次大会战的历史都证明，在下列情况下，即被攻击的军队具有坚定沉着的精神，足以进行不断的抵抗，直到攻击者的火力开始减弱、兵力行将耗尽，然后转为进攻，进行攻击，防御的战法才是最可靠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72页）恩格斯在许多军事著作中反复强调了上述观点。他所讲的积极防御主要内容是攻势行动，即在防御中以积极的攻击和反攻来达到防御的目的，然后转入进攻。

人类的战争实践，孕育了防御作战的理论，积极防御的思想又从中脱颖而出，成为防御作战从被动中赢得主动，克敌制胜的法宝，这是人类对战争从无知走向有知的可贵的一步。

翻开人类历史的防御战争史，有许多以弱胜强的战例至今仍闪烁着积极防御思想的光彩。公元前684年我国历史上的齐鲁长勺之战，就是一个著名的典型战例。战争开始，弱小的鲁国军队避开强大的齐国军队初战时的锐气，拒不出战，给敌以疲惫和消磨，等到敌军怠惰沮丧之时，迅速转入攻击，一举击败了强敌齐军。鲁国曹刿在总结这次战争经验时说：“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左传》庄公十年）

公元221年吴蜀彝陵之战，东吴将领陆逊率领5万兵力

抗拒西蜀皇帝刘备亲自统领数十万大军的进攻。陆逊采取避锐乘疲、伺机决战的方针，一开始就从边境的建平（今四川巫山县）沿长江向东实施战略退却，一直撤退到彝陵。刘备蜀军劳神费时半年才走出三峡口，攻占了彝陵，但留在背后的却是一条五六百里长的隘路，兵力施展不开，运输十分困难，态势极为不利。吴军退至猇亭（今湖北宜都县北）、夷道（今湖北宜都县）之后转入防御，阻止蜀军前进。两军经半年多的相持作战，陆逊看到蜀军处处结营，兵力分散，部队疲劳，士气沮丧，主动权已操己手，遂开始反攻。吴军采用火攻破蜀军连营，同时割断蜀军水陆之间的联系，分路出击。蜀军终于不支，大败而逃，沿原进军的狭长隘路遁去，主力丧失殆尽，刘备辗转回归白帝城（今四川奉节县东），不久积怨身亡。陆逊正是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以少胜多，取得了战胜蜀军的胜利。

公元1449年北京保卫战，是明朝兵部尚书于谦指挥的打退蒙古瓦剌军大举进攻的战争。战争开始时，明军主力被歼，明英宗朱祁镇被俘，瓦剌军太师也先率领十万大军已攻破紫荆关，进逼北京，形势岌岌可危。当时，北京城朝野惊恐万状，有的主张迁都南下，有的提出谈判议和。在这种情况下，于谦等主战派积极抗战，多方筹划，初步稳定了局势，并制定了依城为营、以战为守、分调援军、进行夹击的作战方针。当也先驱师进攻德胜门时，于谦派兵在城外设伏于民房内，派少数骑兵佯败诱敌，也先以万骑进击，明军“神机营”火器齐发，伏兵骤起，前后夹击，大败瓦剌军于城下。也先发觉明军主力在德胜门，便转攻彰仪门（今广安门西十余里），于谦派兵迎战于城外，在要路埋伏“神铕”、

短枪伏击，对突入土城之敌实施坚决反击，又打退了瓦剌军的进攻。在瓦剌军围攻北京过程中，各地人民群众也纷纷组织起来到处袭扰与打击敌军。敌军久攻不克而败退，于谦下令分路追击，斩获甚众，迫使瓦剌军退往塞外。

在国外，积极防御战略也早被战争指导者应用于战争了。十九世纪初，俄国名将库图佐夫大败威震一时的法国皇帝拿破仑就是成功的一例。战争开始，法军兵力约为俄军的三倍，而且法军两次打败过俄军，四次打败过奥地利，战胜了普鲁士，控制了大半个欧洲，士气正旺。俄军在强敌而前主动向本国腹地实行战略退却，不与法军主力会战，迫使法军分散兵力，延长补给线，并在沿途以游击队和民兵不断袭扰，使法军力量不断削弱。俄军在秘密集结地经过休整补充，不断壮大，逐渐转变了战争形势和兵力对比。在此情况下，俄军立即转入反攻，彻底击败了法军，用积极防御的战略以弱胜强，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当然，在防御作战的历史上，人们都渴望执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没有人公开承认自己的战略是消极防御，但消极防御在实际上是存在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法国，就是执行消极防御的典型代表。战前，法国为防备德国进攻，耗费巨资，从瑞士到比利时的东部国境上修筑了一道坚固阵地的防御体系，命名为“马奇诺防线”。从1929年始建，到1934年基本建成。1940年5月，当德军从比利时绕过这道防线攻入法境时，抱定消极防御战略的法军统帅部依然将重兵配置于马奇诺防线，不作临机变更处置。致使拥有260余万重兵的法国，仅经44天即战败投降。在现代战争中也有这样的先例。1982年，在英阿马岛战争中，阿军又犯了单纯防御的战

略错误。当英军登陆时阿军不积极出击，当英军向马岛腹地进攻时，阿军又轻易地放弃了许多战略要地，当英军合围了马岛首府斯坦利港时，阿军不主动实施反击，陆、海、空三军各自为战，失去协同，最后在天时、地利、人和等多种有利条件下反招失利，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历史永远是面镜子，它告诉了人们许多战争的哲理，使人们比较地聪明起来，在无数次胜利和失败的防御作战中，寻求以弱胜强以劣胜优的普遍规律，在大量的战争史料和经验教训中探索致胜的奥秘，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的思想正是人们对前人和自己所进行的防御战争中思辩出的两种不同的防御观。坚持积极防御必胜，执行消极防御必败，这是人类领悟到防御作战的真谛的证明。

第三节 我军积极防御战略

我军的积极防御战略，是在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运用攻势防御、决战防御思想指导战争全过程的战略，是指导正义的防御性战争，克敌制胜的有效战略。

一、我军积极防御战略的基本精神

什么是我军积极防御战略的基本精神？这是运用积极防御战略指导正义的防御战争的人们不能不研究解决的重要问题。

1. 自卫战争，后发制人

革命导师列宁说过：“战争无论何时何地总是由剥削者、统治者和压迫阶段挑起的。”（《列宁军事文集》第43页）我们是被压迫者、被侵略者，我们进行战争的目的是

被迫的，是为了自卫，是正义的。我们任何时候都不会首先挑起战争。正义的防御性战争的基本性质，从根本上就决定了筹划和指导战争的原则与出发点，只能是自卫的、后发制人的，而不是进攻的、侵略的和先发制人的。

就国内革命战争的某一阶段而言，军事战略的防御或进攻，取决于敌我之间总的力量对比。革命，要推翻敌人的反动统治，夺取政权，从政治上说当然是进攻的（也有防御和退却），但就军事斗争来说，面对强大的敌人，只有采取防御战略，才能使自己得以生存和发展，逐步削弱敌人，最后战而胜之。

就国家对外军事战略而言，除力量的条件外，还决定于国家性质。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它既消灭了我国屈从外国侵略的社会根源，也消灭了我国对外侵略的社会根源。我们党和国家对外关系的总方针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各国之间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相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但是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中国已经多次公开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永远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永远不占领别国的一寸土地，绝不首先挑起战争。因此，我们的军事战争只能是自卫的、防御的。

然而，这种自卫的防御战略，并不是消极的被动挨打的战略，而是积极的、后发制人的战略。我们虽然不侵略别人，并不意味着别人不侵略我们。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新的殖民主义依然存在，近期或在相当长

一段时间内全面大战的可能性尽管不大，但战争的危險没有消失，而局部战争却愈演愈烈，我国周边环境十分复杂，历史遗留问题较多，至今南沙群岛的大部分岛屿和海域仍然被沿岸周围国家占领着，并不能排除中、小规模战争的可能性。中国没有侵犯别国主权的意图，也决不容忍别国干涉中国的内政。中国决不威胁别国的安全，也决不容忍别国威胁中国的安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后发制人，战略上虽然是“后发”，但终要“制人”，虽不首先动手，但却要进行强有力的还手，制敌于死命。一日敌人打进来，我们也可以打出去，彻底消灭进犯之敌。

实行后发制人，在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一方面可以获得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得到必要的援助，形成战胜敌人的强大力量；另一方面，可以充分利用和发挥防御作战的各种有利条件，如本土抗战，人熟地熟情况熟，民族感情向己等等。而这一切恰恰是侵略进攻的敌人的短处。这样就可以获得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的效果。如中国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一至四次反“围剿”时，仅以几万弱小之师，先后粉碎了蒋介石10万、20万、30万、50万大军的疯狂进攻，创造了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在中国古代著名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都是弱者采取后发制人方针而战胜强敌的。

2. 充分准备，严防突袭

充分做好战争准备，严防敌人突然袭击，是实行积极防御战略的重要内容和战略原则，是从被动中争取主动夺取战争胜利的前提条件。

孙子曰：“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实行防御战略，总的处于被动地位，但要从被动中争取主动。不是坐等敌人来攻，而是要积极准备战斗。积极防御的所谓积极，也表现在积极准备一个方面。毛泽东同志在论述战争准备时指出：“如果我们没有必要的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时仓卒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没有的。”“开始准备的时机问题，一般地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选集》第184页，第518页）

反动派总是过高估计他自己的力量，过低估计人民的力量，冒险发动战争。不宣而战、先发制人，突然袭击是侵略者发动战争的惯用伎俩。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法西斯以“闪电战”的方式，几乎席卷了整个欧洲，使毫无准备或准备不足的被侵略国家和人民遭受了巨大损失。

战争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要使战争的主观指导同客观实际相一致，是很不容易的。德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经说过：战争是充满了不确实性的领域，战争行动中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好象隐藏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诚然，战争同其它事物一样，有端倪可察，也有其自身的规律，可以认识和判断。但是，它毕竟是一场你死我活的生死搏斗，作为防御的一方，要想在对方严格保密、精巧伪装和多方干扰欺骗的条件下，正确地了解掌握发动战争的时间、地点、企图等具体情况，是相当困难的。战争的这种特点，决定了防御战争的指导者必须立足复杂困难的情况，充分做好各方面的准备，使自己具有应付各种情况的能力。为此，战争的指导者必须认真地进行调查研

究，全面了解敌对双方诸方面的对比条件，深刻把握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尽可能解决主观指导同客观实际的矛盾。同时，为了确有把握地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必须从最复杂最困难的情况出发，设想多种情况，预定若干方案。既要考虑到战略防御阶段特别是战争初期的各种可能情况的预案，也要预见到其他阶段的可能情况方案；既要考虑到主要情况和方案，又要考虑到次要情况和方案；既要考虑发展顺利的情况和方案，也要考虑到发展不顺利的情况和方案。总之，要使自己胸有成竹，掌握随机应变的能力。

在现代条件下，科学技术和军队作战的武器装备的飞速发展，使战争的突然性、破坏性大大增加，对战争准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战争情况的复杂性决定了战争准备的复杂性。因此，战争情况的分析，战略方针的确定，武装力量的建设，动员体制的规化，军队干部的培养，教育训练的实施，科学技术的研究，武器装备的更新，战争物资的储备，工业布局的调整，指挥通信的加强，交通网路的修建，国防工程的构筑，战场建设的进行，以及其它问题的处置等等。它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就是局部战争的准备也决非临时突击所能完成的，需要平时通盘考虑，立足于复杂困难的情况，进行实事求是地筹划、指导和落实。通过战争准备，有效地提高现代战争条件下军队的作战能力，不断加强其协同作战能力、快速反应能力、电子对抗能力、野战生存能力和后勤保障能力，为夺取战争的胜利创造物质上、精神上和组织上的有利条件。

否则，持侥幸心理或“临时抱佛脚”，就要遭受不应有的严重损失。从某种意义上讲，备战重于应战。我们准备好

了，敌人就不敢轻易冒然动手，就有可能推迟或避免战争的爆发；如果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乘虚而入。

实践证明，战略上处于防御地位的一方，一定要居安思危，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严防敌人突然突击，决不可因为大战可以避免以及国家的战略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的轨道上来而有和平麻痹思想，忽视战备，等待挨打。这也是实行积极防御战略的一个重要战略原则。只有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时刻注意动荡不安的国际局势，在搞好国家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强国防建设，提高自卫能力，才能从容对敌，立于不败之地。

3. 对待强敌，持久作战

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实行积极防御战略必须坚持持久战。这是弱军对强军作战的又一重要战略原则。

所谓持久战，就是持续时间较长的战争。它和速决战相比，后者是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决定胜负的战争。是坚持持久战，还是坚持速决战，这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战略指导思想。

自恃力强而又举行不义战争的进攻一方，总是要求战略速决，而不利于战略持久。力量较弱而又进行正义战争的防御一方，则应自觉地实行战略持久。毛泽东同志在论述这个问题时指出：“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在这上面性急是要吃亏的，在这上面提倡‘速决’是不正确的”。（《毛泽东选集》第217页）

究竟是实行持久战，还是实行速决战，这不是一个单凭主观愿望可以回答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来，是由敌对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科学技术诸条件的综合对比决定

的。倘若有速决取胜的条件与可能，实行速决战当然是可取的。“兵贵胜，不贵久”。无谓地消耗时间，走不必要的弯路都是力量的浪费，因而是战略所不容许的。”恩格斯也指出，连年的战争会使甚至是最强大的国家精疲力竭。”毛泽东同志说：“在战争问题上，古今中外也都无不要求速决，旷日持久总是认为不利。”

为什么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就决定和要求实行持久战呢？这是因为战争是敌对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地理、外交、科学技术等条件的力量竞赛。力量强的一方具有战争胜利的客观条件。而力量弱的一方要想避免失败而争取胜利，就必须千方百计地转化力量对比，而转化力量对比就需要相当的时间，这就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实行持久战的最平常的道理。中国明代军事著作《草庐经略》就有“持久以待其衰”的论述，清代后叶成书的《历代名将史略》也有“师久则老，老则可击”的记载。这都是以时间疲惫敌人，待机破敌的重要理由，力量弱的，实行防御战略的一方，只有设法把进攻者拖入持久战的长河，才可能逐步扭转不利地位，获得最后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采取“闪击战”方针，一举打败波兰、法国等，却未能打败苏联，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苏联把希特勒军队拖入了持久战的深渊。历史证明，进攻者一旦速决不成而陷入持久，下步就是失败。这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战争潜力不足。德国是一个贫油的国家，战前最高年产量只有满足消耗量的百分之十，到1944年8月，德国飞机执行任务的时间不得不由两小时减为半小时；它1939年在国民经济部门的劳动力与军队的比例为32:1，到1945年降为3.8:1，形成后方劳动力紧张，

前方兵力不足，劳动力与兵员比例严重失调的困难局面；加之其政治、外交等其他方面的困难随时间的延长而加剧，结果垮台是不可避免的。

战争，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和未来的，通常是在进攻者预有准备、事先计划的基础上发起的。战争初期，进攻者握有主动权，力量雄厚，兵力集中，锐气正盛；而防御者则处于被动地位，难以准确判定进攻者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发起进攻，难以在战前做好各种准备，即使有所准备，也很难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要求。因此，战争初期，防御者往往处于不利地位，有利条件也难以立刻发挥有效作用。要在这种条件下实现速胜是不现实的。只有通过持久作战，才能避开敌人的锐气，粉碎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把敌人拖入持久战和全面战争的深渊，逐步转化双方强弱、攻防、主动被动的形势，达到“蓄盈待竭”、“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之目的。

战争史上，开始处于弱者、被动、防御的一方，通过持久作战转化了战争形势，达到最后克敌制胜之目的的战例很多的。诸如，1775—1781年的美国独立战争，1808—1813年的西班牙反法民族解放战争，1881—1885年的苏丹马赫迪抗英斗争，1941—1945年的苏联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卫国战争，1946—1954年的印度支那人民的抗法战争。1950—1953年朝中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1954—1962年阿尔及利亚人民反法解放战争等等。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历次革命战争也同样是依靠持久的人民战争，来达到胜利打败敌人之目的。

这里的关键是怎样才能把战争拖向持久，大家知道，战争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运动形态，正义的防御性战争要粉

碎强敌的速战速决，把战争拖入持久，需要采取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战略措施和成功地运用战略战术原则。总的说加强军队建设、实行人民战争、贯彻人民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战术，都是为了粉碎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达到持久胜敌之目的。具体地说，只有通过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才能达到战略上的持久战。

今后反侵略战争中，我们面对的作战对象可能是在经济上、军事上，尤其是武器装备上高度现代化的强国。战争的爆发是突然的，战争的破坏力量是巨大的，战争情况的变化是异常急剧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战争还要不要持久，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我们说仍然是持久的，是因为：战争的力量对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总的说仍然是敌强我弱；敌掌握发动战争的主动权，在战争初期依赖其优势的武器装备对我发动突然袭击，将使我遭受严重的损失；为转化敌我主动与被动、优势与劣势、进攻与防御，需要经过相当时间的艰苦努力和转化过程，时间太短是不行的。然而，随着双方技术条件的发展和战争消耗的增大，未来战争持续的时间可能相对缩短。至于持久战之所以能打成，是由敌对双方诸条件决定的。就敌人方面说，尽管它有上述强点，但也有很多弱点，诸如：其野心很大，力量不足，战争的非正义性将进一步加深其重要困难；两线作战，兵力分散，腹背受敌，顾此失彼；作战消耗大，补给线长，后勤负担重，难以持久；重装备及车辆多，受地形道路限制大；过分倚重装甲，步兵比重偏小，防御能力较弱，攻坚能力有限；多路多方向进攻，间隙大，翼侧暴露，易被分割；对付游击战经验不多，等等。而我们尽管军事、经济的现代化程度较敌有很大

差距，但具有大量经常起作用的重要条件，诸如：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的正义的革命战争，人心所向，得道多助；地大物博，人多兵多，战争潜力大，足可支持长期战争；具有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丰富的传统经验；本土抗战，以逸待劳，人熟、地熟、情况熟，有着社会的、自然的得天独厚的制胜条件，等等。因此，我们有充分条件和信心把战争拖向持久的长河之中。这是敌人最害怕的，因为战争拉的时间越长，它们的人力物力消耗就越大，人民就越反对，士气就愈低落，军心就愈动摇。而我则相反，在持久战中，人民战争的威力可以得以充分发挥，人民越战越强，士气越战越高，使战争不断向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化。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才能逐步克服我之弱点，挖掘我之战争潜力，发挥我之政治优势和人民战争的威力，使我由小到大，由弱变强，逐渐削弱敌人的优势，扩大其弱点，使其由强变弱，由大变，最后将其拖垮、打败。

需要指出的是，战略上实行持久的原则，并不意味着战役战斗也一律实行持久的原则。相反地，我们在战役战斗上主要是实行速决的原则。在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在战役战斗上，我们实行速决的原则。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我们在战役战斗上仍然要实行速决战，坚持战略上的持久和战役战斗上的速决相反相成的原则，这是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

4. 依靠人民，以劣胜优

积极防御战略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之上的。它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立足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这是积极防御战略区别于进攻战略

和消极防御战略的重要标志。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这种力量包括政治、经济、军事、自然环境、战争性质、国际援助和战争的主观指导能力等因素。概括地讲，就是人与物两个方面。在物的方面，经济力、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上的敌强我弱，敌优我劣，这是中国历次革命战争以及未来战争长期存在的客观现实。那么，我们如何对待这种不可回避的现实呢？唯物主义认为，战争中敌强我弱之间的强弱优劣都是相对的，暂时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向自己的对立面发生转化，即弱的一方可以变强，强的一方可以变弱。敌人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强中有弱，我们也并不是弱不可击，而是弱中有强。要想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关键的问题是以我之强，击敌之弱，充分发挥我之优势来限制敌之优势，去促进战争总体力量上的强弱转化。人民战争就是我们去实现战争力量转化的条件和优势。它是积极防御战略的坚实基础，是我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根本法宝。

为什么这样讲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进行战争的主体，也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力量。

毛泽东同志在论述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时指出：“……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毛泽东选集》第437页）这一论断，科学地阐明了人和武器在战争中的辩证统一关系。这里所说的人，是指人力是人心；所说的物，是指武器装备、经

济力量等物质条件。这是战争力量的两个基本因素。在战争中，人处于暴力对抗之中，只有借助武器，才能实现其暴力意志；武器借助于人的作用，才能发挥其应有的效力。因而，在战争中人和武器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进行战争，当然离不开人和武器这两个基本因素，它们的互相结合，才能构成战争力量的总体。但人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武器是起重要作用的因素。

人是战争的决定因素。我们所以强调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在于任何战争，都离不开人的作用。人的因素在战争中始终处于主导的、决定的地位。首先，从认识战争，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战略战术原则，离不开人的作用。仗是要人去打的，在战争中，要靠广大指战员冲锋陷阵，奋勇杀敌来实现战争的目的，还要发挥战争指导者的能动作用，按照客观情况的变化，灵活运用作战原则，去争取战争的胜利。其次，武器装备是由人制造、由人掌握、由人使用的。武器装备是死的，是被动的；人是活的，是主动的。在战争中，人的作用发挥得怎样，决定着武器装备效能的发挥程度。威力再大的武器，离开了人的作用，将不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战斗力。正如恩格斯所说：“枪自己是不会动的，需要有勇敢的心和强有力的手来使用它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221页）“赢得战斗胜利的是人而不是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5卷第232页）总之，战争的胜负，固然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但从根本上说来，战争的胜负则主要取决于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多助寡助，而不决定于一两件新式武器。

军队的战斗力，是由军队人员的军政素质和武器装备、物资保障等因素构成的。概括地说，是由人和物两个基本因

素构成的，缺少任何一方都不成其为战斗力。武器装备和经济力在战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它仅是一种可能的战斗力，只有与人相结合才能成为现实的战斗力。而人如果没有起码的武器，也就没有战斗力。具备了同等的武器装备，由于人的政治觉悟、军事素质不同，武器装备发挥的效能也就不同。所以说，人是战斗力的主体，是战斗力最活跃的因素，起着支配和决定的作用。

人民战争，是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反抗阶级压迫或民族压迫而组织和武装起来进行的战争。它符合被压迫阶级或被压迫民族的根本利益，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能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它是建立在正义战争基础之上的，具有进步性和群众性这两个显著特征。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马列主义的人民战争理论，把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中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创造了适合中国情况的人民战争思想。他指出要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使人民群众成为战争的主体，使革命战争成为人民群众自己的伟大事业。早在红军时期他就提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在《论持久战》这部名著中，他又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名言。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

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动员了全国的人民群众，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前提。从土地革命战争到解放战争，从抗日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都一再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揭示的这一真理。只有坚持人民战争才能最后赢得战争的胜利。

战争双方历来都是尽最大努力发挥自己的优势，限制、减煞对方的优势，利用、扩大对方的弱点，以便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实行人民战争最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和敌人相比我们的优势很多，如战争的正义性在我们一边，人民在我们一边，这是最大最根本的优势；我国人多兵多，人民勤劳勇敢，有人民战争的光荣传统，有以劣势装备打败优势装备敌人的丰富经验；我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地形复杂，有进行人民战争的良好战场和广大的回旋余地；我国的社会制度优越，中国共产党有很高的威望，巨大号召力和组织力，能领导和保证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必将得到友好国家和人民的同情与支持。实行人民战争，不仅有利于充分发挥这些优势的作用，而且可以弥补我之经济力弱，武器装备落后等等不足，坚持持久作战，最后战胜敌人。

有人认为，我们过去打人民战争，是由于武器装备十分落后，有了先进的武器装备，就可以不打人民战争了。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人民战争是人民革命斗争的最高形式，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使用大刀长矛、小米加步枪要打人民战争，有了飞机、坦克、导弹、核武器同样也要打人民战争。又有人问：过去我们打人民战争是在敌人技术装备较为落后的情

况下打的，人民战争确实显示了强大的威力。今后敌人军队技术装备日新月异地发展，武器装备高度现代化，我们的人民战争还灵不灵？对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充满必胜的信心肯定地回答。过去我们依靠人民战争打败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取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这已经载入中国革命的光辉史册，是大家公认的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今后军事技术装备日新月异地发展，敌人武器装备高度现代化，我们仍然要依靠人民战争战胜侵略者。1977年12月，叶剑英同志就明确指出：对付现代化的强敌最根本的是实行人民战争。邓小平同志更进一步指出：“只要我们坚持人民战争，敌人就是现在来，我们以现有武器也可以打，最后也可以打胜”。（《邓小平文选》第74页）

一些有见识的外国人，如英国列斯特大学讲师西格尔一九八三年在《冲突研究》上发表文章，认为人民战争“过时的看法是一种浅见，是忽略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深远意义。”他说，毛泽东的人民战争理论在中国已发展成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理论。人民战争战略“确实是一种可靠的防御战略”。日本陆军少校高桥雄一郎一九八二年在《新防卫论集》第6期发表文章指出：“在未来战争中，中国军队仍然要以劣势装备对付优势装备之敌，仍然要依靠人民战争战胜敌人。”

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特别是战争初期，在武器装备上，仍将是敌优我劣的形势。我们的作战对象虽然是军力和经济力很强的大国，但它向外扩张的本质是虚弱的，有许多致命的弱点。诸如：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民心不顺，官兵对立，士气低落，失道寡助；在战略上，它不得不准备两面

作战；深入我国土以后，它的战线漫长，地理民情不熟兵力分散，消耗多、技术保障复杂，后方遥远，补给困难等等。我们实行人民战争，就可以广泛利用并扩大敌人的弱点，运用多种武装力量，采取多种手段，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切断敌人油料、弹药等作战物资的供应，袭击敌人的基地、机场和指挥机构、削弱敌人优势武器装备的作用。就可以将敌人化强为弱，化大为小，一口一口吃掉。我则在持久战中，人民战争的长处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人民越战越强，士气越战越高，最终必将赢得的胜利。

未来反侵略战争，是一场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尽管与过去历次革命战争有着很大的不同——作战对象和武器装备变了，作战样式也不同了，战略战术也将有许多发展等。但是，它没有也不能改变人民战争这条根本路线。这是因为：党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党的群众路线没有变，人民群众始终是战争的主体，兵民仍然是胜利之本，我党我军始终为了人民利益而战的宗旨和坚定地依靠人民的力量而胜的原则也没有变；最后，战争的正义性质更没有变。因此，不管武器怎么发展，现代战争情况如何复杂，当外敌侵犯时，我们还是要打人民战争。而且是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

5. 积极作战，适时反攻

战争爆发后，首先在战略防御的形式下，积极地进行战役战斗的攻防作战，不断削弱敌人，逐步改变战争形势，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为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创造条件；当战争形势发生根本变化时，就要适时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与敌进行战略决战，以解决战争胜负，在敌

入全线溃退时，要不失时机地实施战略追击，彻底消灭敌人，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积极防御战略最本质的精神。所谓攻势防御、决战防御，就是通过这样一个战争过程体现出来。

以往战争的战略防御，我们在战役战斗上主要是进攻的，通过战役的歼灭战，逐步改变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战略形势，为我军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创造有利条件。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防御特别是战争初期则应首先打好战役战斗的防御战，保卫战略战役要地和重要地区，消耗、分散、拖住敌人；同时要积极进行中小规模的运动战，广泛开展游击战，并使三者紧密结合，共同完成防御任务。这和过去相比，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挫败敌人的战略进攻，为我军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创造条件。

适时地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这是积极防御战略最精彩的部分。在战略防御阶段中所造成的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条件和形势，只是具备了战争胜负的可能性，但还不是胜负的现实，实现这个胜负的决定关键，在于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只有充分利用战略防御造成的有利条件，抓住战机，毅然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才能彻底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二、我军积极防御战略的主要特点

我军积极防御战略不仅具有积极防御战略的共同本质属性，而且还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特色。

1. 总体性

在世界上，有些国家把自己过去进行防御作战中所采用的战略亦称为积极防御战略，因为它具有积极防御思想的共同性质，这一点毋庸置疑。然而，这与我军所要阐述的积极

防御战略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是有显著区别的。古今中外，一些国家和军队进行的防御作战，主要是在防御阶段采用战役战斗上的反击、反突击等攻势行动，杀伤与消耗敌人，使防御作战的被动形式有了主动积极的内容，但这仍然没有超出防御阶段和防御作战本身的范围。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是把积极防御作为战略指导思想，用于指导战争的全过程，这就不得不使防御作战本身这种被动形中增添了主动的内容，更重要的是使积极防御原则上升到指导战争全局、全过程的地位，纳入了国家的总体战略，使其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整个战争的根本性战略。

2. 革命性

我军的积极防御战略，是指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国人民进行的推翻国内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和反对外国侵略战争所创造的积极防御战略，是共产党领导的保卫国家安全和反对外来力量的干涉主权与保卫领土完整的自卫战争的战略，是具有阶级性、进步性和正义性的战略。

3. 民族性

我军的积极防御战略，凝聚了我们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彭德怀、邓小平等人以及全党、全军的智慧和武装斗争经验的结晶，是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军事科学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继承了我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精华，并批判地吸取了外国军事思想的有益部分是适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克敌制胜的有效战略，具有显著中国特色。

三、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是与毛泽东

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战争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相伴随的。我军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建立以来，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人民解放战争和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四个时期。建国以前，我军同国内外敌人进行了22年之久的战争。建国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我军还进行了中印、中越边界自卫还击作战。在长期复杂的战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毛泽东同志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运用积极防御战略，依据不同时期不同战争具体条件，创造性地提出了各具特色的具体战略方针，使我军积极防御战略理论，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并逐步达到了理论化、系统化的程度。

1.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确立了积极防御战略思想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力量是弱小的，根据地既小又不巩固。在井冈山斗争阶段，红军采用的作战形式主要是游击战。毛泽东同志总结井冈山武装斗争的经验，提出了行之有效的原则。诸如：“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毛泽东选集》第101页）鄂豫皖、湘鄂西、赣东北等根据地的红军，也都总结了一些适应客观情况的原则。这些作战原则，虽然提法不尽相同，但都有共同特点。即高度的运动性、灵活性；广泛的群众性；积极的进攻性，体现了积极防御的基本精神。由于当时每个根据地都是独立的红色区域，红军的作战规模虽然不大，但却是带全局性的军事行动。因此，这些原则既是战役战术原则，也是战略原则，甚至是指导整个根据地革命战争的总政策。在党

的领导下，红军运用这些正确的作战指导原则，经过近三年艰苦曲折的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创建农村根据地，打击了敌人，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多次“进剿”、“会剿”，保存和发展了自己。1930年夏，全国红军已发展到十几个军约十万人，创建了遍及十一个省的十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从1930年冬起，敌人对各根据地的进攻，开始由地方性的“会剿”改为全国性统一组织的大规模的“围剿”，并将重点指向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当时，中央根据地的红军已由几千人的游击队发展到三万多人，建立了由方面军领导的比较正规的红军。红军的作战也适时地实行了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尽管这时的运动战，就其本质来说只是提高了的游击战，但它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标志着红军的作战进入了新阶段。1930年10月开始的第一次反“围剿”，我军采取了“诱敌深入”的方针，并且运用成功了。接着，以此方针为指导，又于1931年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二、第三次“围剿”，于是，红军以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为中心的全部作战原则就形成了。其主要内容是：反“围剿”的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集中兵力，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等。这些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在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中曾遭到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反对，使革命力量受到了重大损失，直到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才又确认了这些原则的正确性。

1936年12月，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标志着我军战略思想体系的形成。这篇文章总结了土

地革命战争时期正反两个方面的战争经验，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关于研究和指导战争的根本观点和方法，系统地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特别是积极防御战略的基本原则，清算了“左”、右倾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大大地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军事理论，成为马列主义军事科学宝库中的一部杰出著作。

2. 抗日战争时期，丰富和发展了积极防御战略理论

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次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取得了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伟大胜利。这个时期，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丰富、发展、达到理论化的重要时期，《论持久战》一书的发表，是其重要标志。主要的发展有：

（1）提出了持久战三阶段的理论。毛泽东同志全面分析了中日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指出中国必胜，但必须持久。揭示了敌我双方战争力量消长的过程由量变到质变、由部分质变到全部质变的客观规律，预见抗日战争的发展必然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持久战三阶段的理论，不但已被战争实践所证实，发展了积极防御战略理论，而且具有巨大的哲学意义。至今仍然可供我们作为分析未来战争进程的借鉴。

（2）提出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问题。在战争形式中，正规战是主要的，游击战只起辅助作用。但毛泽东同志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指出一个大而弱的中国遭到一个小而强的敌国的进攻，这个大而弱的中国却处于进步时代，这场战争的

特殊性就发生了。“于是中国抗日游击战争，就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毛泽东选集》第374页）从这一认识出发，毛泽东同志给处于敌后的我军规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具体战略方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敌后战场开展了空前规模的游击战争。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成为抗击日伪军的主要承担者，成为坚持抗战的中流砥柱。毛泽东游击战争的理论，不但丰富了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内容，指导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具有深远的国际意义，给予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以巨大影响和鼓舞。

（3）提出了战略上内线持久防御战、战役战斗上外线速决进攻战相反相成的理论。敌强我弱，战略上敌居于外线进攻的主动地位，企图战略速决；我处于内线防御的被动地位，应自觉采取战略持久。然而，在战役战斗上，却要倒转过来，我在局部上集中优势兵力，对敌进行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一战获胜，再及其余。我把若干个战役战斗的胜仗集合起来，就能扭转战局。这就叫做被动中的主动，劣势中的优势，内线中的外线，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这些作战原则，在内战时期即已提出并应用成功，而抗战时期毛泽东同志把它理论化、系统化了。战略上内线持久防御战与战役战斗上外线速决进攻战相反相成的辩证统一，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精髓，是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军事的最精彩部分之一。

3.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发展到更高的阶段，特别是创造性地发展了战略进攻的理论

积极防御战略是通管战争全过程的战略，它包含着战略防御、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的全套指导原则。十年内战，我军总的是处于战略防御地位。虽然也有过战略进攻，但那仅是某一红色根据地的战略进攻，还不是全国规模 的战略进攻。战争的结局，红军由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退却（长征），是战略防御的继续。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干了十年的革命战争，对于别的国家也许是值得惊奇的，对于我们却好似八股文章还只作了破题、承题和起讲，许多热闹文章都还在后面。”（《毛泽东选集》第217页）中国国内革命战争的“热闹文章”出现在解放战争时期，其中包括了我军由长期处于战略防御地位转向战略进攻，进行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等伟大场面。实践产生理论。我们的军事理论在这个时期有了极大的丰富和发展，反映在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方面，不但战略防御阶段的战法有了许多新的创造，尤其是完成了战略进攻的理论体系。主要是：

（1）实现了由游击战向大规模运动战的战略转变，进一步完善了运动战、歼灭战的战法。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曾设想在战略反攻阶段，我军要把游击战上升到大规模的运动战，在广大空间实行机动作战，那个著名的运动战定义就是抗日时期提出的。但是，抗日战争的反攻阶段，由于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反攻阶段为时甚短，抗日战争迅即结束。我军由游击战向大规模运动战的转变，严格说来是在解放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完成的。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以歼敌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作战指导思想，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后退。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这个时期的运动战，歼灭战，规模越打

越大，战法越打越巧，运用极为成功，把由十年内战时期形成的这一传统战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我军仅用一年的战略内线作战，就扭转了战局，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2）创造性地解决了战略进攻的战略指导和一系列作战原则问题。当战争进入第二年，出现了战略转机之际，毛泽东同志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与科学的求实精神相结合，高瞻远瞩，洞察全局，准确把握转入战略进攻的时机，巧妙选择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组织各个战场的战略协同，推进了战争的发展进程。1947年12月，他总结了战略防御阶段和战略进攻阶段前期的作战经验，把我军的战略战术原则概括为“十大军事原则”。十大军事原则，以歼灭战思想为核心，规定了有关作战目标的选择、兵力部署、作战准备与补充、战斗作风、作战休整等一整套原则。十大军事原则的发表，进一步统一了全军的战略战术思想，武装了广大指战员的头脑，部队战斗力大为提高，我军愈战愈强。

1948年秋，战争进入第三年的初期，毛泽东同志把握战机，适时组织指挥了战略决战，举行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依照各个战场的具体情况，对东北之敌，封闭退路、就地解决；对华北之敌，隔而不围，围而不打，仰留敌人，不使逃跑，然后逐次解决；对淮海之敌，我军以战役相对劣势于敌之兵力对庞大之敌首歼一部，然后转用兵力各个解决。在战略决战阶段，我军把大规模的运动围歼战和大规模的城市、野战阵地攻击结合起来，把进攻战和阻援防御战结合起来，作战艺术提高到空前的水平。创造了长围久困、分化瓦解以及“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绥远方式”等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解决国民党残余力量的诸多成

功范例。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和战役指挥艺术，达到了得心应手、炉火纯青的高度。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大大加速了解放战争的全国胜利的到来。从而也为我军创造了进行战略决战解决敌军重兵集团的极为生动而丰富的经验。

三大战役之后，战争形势急转直下，我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进行战略追击，消灭残敌。此时，我处绝对优势，敌处绝对劣势，敌尽力避免与我作战。毛泽东同志指出在追击残敌的作战中，必须实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只有首先断敌退路，才能彻底消灭这些敌人。在解放全国的进军中，我军先取中心城市，然后逐次解放小城镇和广大乡村，这与十大军事原则中“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的规定是完全不同的。这说明情况变了，那些具体的规定也必须随之改变，否则便是削足适履了。

（3）毛泽东同志一面指挥我军作战，一面领导我军建设，使我军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积极防御战略的所谓后发制人，要最后战胜敌人，根本上靠的是力量。战争过程，一方面是不不断削弱敌人的过程，一方面是不不断壮大自己的过程。解放战争中，我们除组织解放区发展生产、支援前线、动员人民参军参战外，以缴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使我军迅速发展壮大，以取之于敌的新式武器，逐步建立了炮兵、工兵和少量装甲坦克部队。在战略进攻阶段的城市攻坚战中，普遍使用爆破技术，能够组织相当规模的步炮协同，在一些重要战役中还有少量坦克参战。解放战争在我军建军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同志以

极大的注意抓了部队利用作战间隙的休整训练，起草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等重要文件，我军的军政素质都提高到历史的空前水平。解放战争时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与红军、八路军、新四军相比，不但数量上大大增加了，而且质量上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到战略追击阶段，我军不但在数量上占有对敌之压倒优势，在武器装备方面也占有相对优势。我军的迅速壮大提高，也是使得战争进程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敌我之间力量消长变化的过程，也就是积极防御战略得以全部实现的过程。

4. 抗美援朝战争，使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经受了新情况的检验，我军取得了现代条件下以劣胜优的初步经验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与我国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友好邻邦。我国出兵朝鲜，是为了援助兄弟国家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为了保卫祖国的安全。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场防御性的正义战争，我们的军事战略依然是积极防御。但是，同我们以往的战争相比，这场战争有了许多新情况、新特点。我们是出国作战，朝鲜半岛地幅狭长，不象在国内作战那样大的回旋余地；作战对象是高度现代化的头号帝国主义强国，武器装备方面敌优我劣的对比较以往更加悬殊。这就使得我们的战略战术不得不有许多新的突破，新的发展。

（1）不拘一格，依照实际情况活用原则，创造了先战略反攻，后战略防御的特殊样式。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前曾确定，部队进到平壤、元山之线以北地区进行防御，待装备加强后，再配合朝鲜人民军举行反攻。但是，当志愿军入朝

后，发现敌人已越过清川江，分兵向中朝国境线疯狂冒进，战局异常危急。据此，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毅然改变决心，令志愿军同北犯之敌进行运动战。经五次战役，歼敌23万余人，把敌人赶回到三八线附近，扭转了朝鲜战局。这一阶段，从战略行动上，联系朝鲜人民军第一阶段作战，则为战略反攻的性质。五次战役后，考虑到不可能彻底歼灭敌人重兵集团以结束朝鲜战争的实际情况，适时地进行了战略转变，采取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依托有利地形进行防御战。到后期，采取“零敲牛皮糖”的方法，打了一些小型歼灭战。同时，把军事打击与停战谈判结合起来，以打促谈。经过两年零九个月的斗争，歼敌109万人，终于迫使敌停战言和，胜利地结束了战争。按照积极防御战略的一般规律，是先进行战略防御作战，逐渐转变战争形势，然后举行战略反攻。毛泽东同志依照我军入朝时的战争局势，首先进行战略反攻作战，挫敌锋芒，煞敌锐气，粉碎敌将战火推进到中国领土的狂妄企图，将敌赶回三八线，稳定战局，然后转入防御作战，完全符合朝鲜战争的实际。这对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突破。

（2）以劣势装备对付高度现代化之敌，要实行小包围、小迂回，小口小吃，打小型歼灭战。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争。美帝国主义动用了三分之一的陆军，五分之一的空军和大部分海军，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所有新式武器。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初期，使用的是解放战争后期的装备，既无飞机，也无坦克，火炮也较少，只是到了战争后期，才有少量的空军和新的兵种参战。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继续沿用解放战争后期的战法，打大规

模的围歼战，很难办到。毛泽东同志总结了运动战的经验，及时告诫我军“野心不要太大”。即是说，歼敌目标要小，集中优势兵力的倍数要大，对美英军作战，要求我军一个军一次歼灭其一个营至多两个营即可。敌机动能力大大优于我军，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往往不成功，要实行小包围、小迂回，小口小吃，打小型歼灭战。志愿军的这一作战经验，对未来战争初期的运动战，仍有借鉴作用。

（3）创造了依托坑道工事的防御战法，提高了我军防御作战的能力。我军转入阵地防御后，在1951年秋季防御作战中，开始出现了坑道工事雏型，经改进发展，至1952年夏季，全线已逐渐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阵地防御体系。它的形成，标志着我军阵地战进入一个新阶段，成为我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

坑道防御体系的主要作用为：在防御中，能够有效地保存自己，增强防御的稳定性。在进攻中我可依托坑道作为进攻出发阵地，缩短冲击距离，减少伤亡，增加作战的突然性。这种防御体系的出现，使志愿军可以劣势装备与优势装备的敌人对垒，我阵地逼近敌军数十米而屹立不动。

在两军对峙的防御作战中，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前线作战的经验，提出了“零敲牛皮糖”的战法。即是说，防御作战也不是被动地坐等敌人来攻，而是要主动积极地杀伤消耗敌人。从开展冷枪冷炮狙击活动，到小型进攻战斗，攻歼敌人的班、排、连支撑点，逐渐发展到消灭成营、团建制的敌人，到发起有限目的的进攻，突破敌人师的防御阵地。这种战法，是战役战术上积极防御的一种表现形式，零打碎敲，

积小胜为大胜，对付优势装备之敌最为有效。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这种战法，指出此种作战方法实行下去，“必能制敌于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结束朝鲜战争。”

5.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新发展

建国以来，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以后，我军建设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继续领导全军把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是作战的实践紧密结合，取得了军队现代化建设和抵御外敌入侵的伟大胜利。胜利地进行了中印边境反击战，中苏边境反击战，西沙群岛自卫反击战，援助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及粉碎美帝蒋介石的武装挑衅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等。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邓小平同志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对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方向，以及战争与和平关系的分析等方面，都有许多新的建树。使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得到进一步地坚持和发展。

（1）我军积极防御战略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继续和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任务由主要是夺取政权，变为巩固和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如何把人民解放军迅速建设成一支强大的国防军，是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就历史地摆在了我军的面前。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解决这一任务的过程中，自然要随之发展。

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初期的《中国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四个训词》，（《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

357~362页)《论十大关系》，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关于十大军事原则也要发展的指示，以及其它的一些讲话和文件中对部队建设所做的有关论述，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其主要内容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适应人民解放军由低级向高级阶段发展的需要，及时指出了军队建设的方向。在战争年代里，我们军队的建设总的讲是处于较低水平阶段上的，这是与当时的客观条件相适应的。尽管毛泽东同志在红军时期和抗日时期，对我军的高级阶段曾做过一些设想，但是由于客观条件尚不具备，所以一直未能实现。

建国以来，客观情况起了基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担负着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作战对象主要是敢于入侵的具有高度现代化技术装备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对付这样的敌人，毛泽东同志在1952年就明确指出，必须把我军建设成一支“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59页）而要建设这样一支部队，必须从过去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和游击习气的状态，转变到“五统”、（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四性”（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纪律性）的要求上来。与此相适应，还必须建设一个健全的、具有头脑作用的、富于科学的组织和分工的司令机关。而这样做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政治上，党的统一领导和人民政权的建立，是军队现代化、正规化的前提条件；经济上，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建立，会日益为现代化国防军提供强大的物质保证；二十余年的正反经验，使得我军现代化、正规化的进程可以快

一些，国际上又有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及其经验可供借鉴。所以，实现我军的现代化、正规化是既有必要，又有可能。

毛泽东同志建国初期关于军队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的指示，为我军建设指明了新的方向。尽管以后的实践中有种种干扰，但建设强大的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的思想，还是在全军指战员的心目中扎了根的。

第二，根据国际形势和主要作战对象的变化，适时进行战略转变。建国以来，虽然我军总的战略思想仍是积极防御，但具体的战略方针随着国际形势和主要作战对象的变化，有过几次转变。建国初期是以防御美帝国主义为主，1955年军委制定了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发展到同时对付美苏两家，叫做对付四面八方；到60年代末，主要是以对付苏联为主。不同时期中，这种全局性的战略变化，必然引起国防建设、战争准备、战略方向、军事部署、军队编组训练，以及在作战指挥、作战方法等方面的一系列变化，认真研究战略转变中的新情况、新问题，给予唯物主义的科学指导，是巩固国防、加强战备所必须。

第三，在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上，认真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讲得很透彻。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国防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保障。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不可能有强大的国防。所以要加强国防，必须首先加强经济建设，这是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首要的物质基础。

其次，要有一条正确的战争指导路线。积极贯彻“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从精神和物质上做好应付

敌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准备。

再次，要充分发挥我国地大人多、制度优越，有人民战争和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光荣传统的有利条件。把优良传统和现代条件相结合，一旦敌人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就用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经过持久作战，争取最后胜利。

由于毛泽东同志晚年的失误和林彪大搞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影响，使得我军在军事战略等方面，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搞得不是那么合乎实际。因此，上述一些符合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正确方面，有的虽然贯彻了，但没有贯彻到底。有的贯彻偏了，如多年来我们安然自若于“人民战争必胜”的抽象口号上，而对具体的、扎实的战争准备实际上做得并不充分；满足于我军传统经验，而对现代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研究不足。我们要认真地对待这些情况，全面系统地学习毛泽东军事思想。要彻底肃清军事领域中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倾向，以使我军的建设和作战沿着正确轨道前进。

（2）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坚持和发展了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思想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我们的国防建设，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通过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肃清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中的一些“左”的影响，从新时期的客观实际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使得国防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出现了一派喜人的景色。《邓小平文选》和党的十二大文件中的有关国防建设方面的文章，中央军委

的重要文件，以及中央、军委首长的讲话等，都是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运用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历史记录。

在这段时期中，我们党对毛泽东军事思想和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运用和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拨乱反正，把被林彪、“四人帮”搞乱的一些问题加以澄清，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例如：关于军事和政治的关系，长期以来纠缠不清。林彪鼓吹“四个第一”、“突出政治”等谬论，结果把政治工作推向可以“冲击一切”、“压倒一切”的极端，使之同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任务相脱离，结果是既破坏了政治工作本身，又使整个军队建设受到空前破坏。

按照毛泽东军事思想看来，“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31页）当然军队工作也是如此。在这一点上把政治隶属于军事的观点，无疑是错误的。但另一方面，政治工作的这种“生命线”作用不是空的，而必须结合着军事工作一道去做，在保证军事任务的完成过程中，去加以实现。我们既反对以政治冲击、代替军事的倾向，又反对以军事排斥、脱离政治的倾向。正确的原则只能是二者的有机统一。

再比如，关于如何对待毛泽东军事思想问题。林彪、“四人帮”把毛泽东军事思想说成是适用一切战争、可以不再发展的教条，从而造成一种只能用既定结论去剪裁现实，而不能从客观事实中发展理论的万马齐喑的军事学术沉闷局面，这本身就是违反科学的，同时也是违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辩证的统一，只讲继承不讲发展是教条主

义。毛泽东同志本人就从来也没有把他的理论看成是僵死的教条，而总是强调要结合实际不断地去补充发展，以至于修正。反之，只讲发展不讲继承则是历史虚无主义。只有在继承的前提下发展，才是我们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

第二，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军建设的总目标以及一系列指导原则，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建设的总目标是什么？党的十二大明确指出，

“把我军建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进一步提高我军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党员必读》第175页）我军的各项工作、各项建设，最终目的就是提高现代条件下的自卫能力。这既是十二大赋予我们的战斗任务，也是开创军事工作新局面的总目标。

要实现这样一个宏伟目标，首先对现代化、正规化和革命化，必须有一个辩证地理解。“三化”的核心是现代化。为了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有革命化、正规化做保证。“三化”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有机整体。只有对“三化”有了完整的理解，才能使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而没有贯彻到底的这个思想，结合新的历史条件把它落到实处。

其次，“军队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邓小平文选》第56页）上来。这是实现国防现代化和积极防御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战争年代靠打仗训练部队，和平年代就要靠训练来提高部队战斗力。这是毛泽东同志的一贯思想，但由于多年只搞文，不搞武，使得军队战斗素质大为下降。军队工作转移到现代化轨道上来以后，在邓小平和军委其他领导同志大力倡导下，这个思想才得以贯彻。

再次，在训练的指导思想，在武器装备的引进和制造

上，在军队干部革命化、年青化、知识化、专业化等方面，中央军委和邓小平同志，都紧紧围绕“三化”问题，做过多次重要阐述。

最后，为了使军队充分发挥既能建设祖国又能保卫祖国的两套本领，军地两用人才一体化训练，军民共建精神文明的活动，在全军广泛开展。这是新时期军队建设的一个新形式。它把保持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密切联系了起来，把保卫祖国和建设祖国辩证地统一了起来，对我军“三化”建设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三，从国际、国内和我军的实际出发，毅然作出了实行我军建设指导思想上的战略性转变。所谓指导思想上的战略性转变，就是从过去的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思想，转变到立足于较长时间内世界战争有可能不发生的基点上，来考虑部队的各项建设。这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我军建设上的具体应用和发展。

现在世界上有资格打世界大战的只有苏联和美国。虽然他们之间的军备竞赛还在加剧，战争的阴影并未消除，但包括苏联和美国人民在内的第三世界的广大人民，都反对战争，希望和平。也就是说，当今世界，和平的力量，制止战争的力量，大于战争力量的发展，争取较长时间的和平是可能的。一九八五年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正确分析了战争与和平之间辩证关系的基础上，做出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的战略决策。这本身就是维护和平、制止战争的实际行动。对于争取时间搞好国内经济建设，把部队建设得更富有战斗力，无疑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军队建设的程度、快慢，必须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

应。邓小平同志多次强调，四个现代化中的国防现代化，只有在其它“三化”（工业、农业、科学）基础上才能进行；国家经济建设是大局，军队必须服从这个大局，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军队精简整编，可以减轻国家负担，加快经济建设速度。反过来，国防建设速度也才能加快。这是辩证的统一。否则，只能是“欲速则不达”。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邓小平同志向我们发出了要“研究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军事学术》1978年第4期第5页）的号召，全军对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特点、打法等进行了广泛的探讨，更加坚定了人民战争必胜的信心。在三结合武装力量的体制上，在地方军中增加了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对民兵组织进行了整顿，使之更加精干；野战军经过严格训练，战斗素质全面得到提高；在兵役制度方面，实行了民兵和预备役相结合，义务兵和志愿兵相结合的制度；在领导体制上，国家成立军事委员会，国务院设立国防部，党的中央军委仍做为党中央的军事领导机关直接领导军队。这样既能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又能保证国家运用国家机器，对突然事变迅速作出反应。以上这些，都是对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新发展。

第四，针对未来作战对象的可能行动，重新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坚持和发展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战略思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军委根据国际国内条件的发展变化，重新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明确了一系列战略指导原则。

首先，针对作战对象的作战特点，把抗击敌人战略突袭作为战争开始的首要问题加以提出，进而明确了战争初期的

科概学念，战略任务，及战争初期的作战指导原则等，这在我军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其次，一反传统的诱敌深入的战略步骤，改为战争初期在主要作战方向上要坚决地“顶”的做法，这是新的条件下敌我主客观条件决定的。这样做，既可以有效地制止敌人长驱直入，粉碎其速战速决的企图；又利于保存我有生力量和战争潜力，争取时间和把战争拖向持久。这是在新的条件下，坚持和运用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重大成果。

再次，规定了战争初期的主要作战形式是坚守防御的阵地战。这和历史上较长时期中都是以运动战和游击战为主，而以阵地战为辅的情况相反。这也是军委对战争初期敌我双方情况具体分析得出的科学结论。以坚守防御阵地战为主，并不排斥其它作战形式。而是阵地战与运动战、游击战紧密配合、各得其所。阵地战要立足于独立作战，长期坚守，以保“地”为主要任务；运动战要着眼于配合阵地战完成保地为目的，抓住战机，依托或不远离阵地，打规模不等的歼灭战；游击战要以寻歼敌人后方目标为主，从战略或战役上配合阵地战等。这些都是对毛泽东人民战争战略思想的发展。

总之，可以这样说，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主持军委工作以来，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我军积极防御战略理论得到了多方面的丰富和发展，这是我军军事思想发展史上一个辉煌的时期。可以预料，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军队的深入发展，积极防御思想必将以更加丰富多彩的新鲜内容，展现在人们面前。

通过对我军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形成、发展过程的回顾，使我们认识到，任何战争指导规律，都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

发展，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总结我们的战争经验，说明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我们必须遵循的指南，而具体的战略方针即积极防御战略的具体内容，则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我们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必须根据未来战争客观实际，着眼其特点和发展，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坚持用得着的部分，否定用不着的部分，充实不完善的部分，增加过去没有而未来又必需的部分，把积极防御战略，提高到一个更新的阶段。

四、未来我国积极防御战略面临的新变化及主要发展趋势

我国以往的军事战略方针是以立足于对某个特定的作战对象全面入侵，大打持久战争为背景而制定的，现在世界处于大战打不起来，小战停不下来的总体和平之中，突发事件、军事冲突和局部战争将是未来战争的主要样式，也是我国未来可能遇到的主要战争样式。我国积极防御战略面临的问题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

- ①作战对象多元化；
- ②作战方向多面化；
- ③战略任务复杂化；
- ④作战样式多样化；
- ⑤战争进程快速化。

这些变化，已使原先制定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难以适应战略性转变以后情况的需要，有必要根据情况的变化，制定出一个有明确提法的军事战略，以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

我国新时期积极防御战略的主要特征：

1. 具有一贯的防御性

我国军事战略的性质是防御的。这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平外交政策和我党我军的阶级本质决定的。我国的军事战略是为维护世界和平，抵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国家统一，保障经济建设而进行的防御性正义战争服务的。我们的防御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正战争威胁面前决不示弱，要积极抗争，顽强奋战。为此，要从精神和物质等方面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实行攻势防御，在战略防御的被动形式下争取主动，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2. 具有较强的适应性

我国的积极防御战略适用于多种作战对象。它既适用于对付强敌，也适用于对付弱敌；既适用于对付当前的现实对手，也适用于对付长远的潜在对手。可以在积极防御战略的指导下，根据不同的战略方向、不同的作战对象、不同的地理条件，制定出不同的战略方针或作战方针，用以指导不同的战争。

3. 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我国的积极防御战略是有相对稳定的时效性的。它是用以指导一定历史时期的军事斗争的。这样，就有利于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有计划、有步骤地搞好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对未来可能爆发的战争进行筹划和指导，未来反侵略战争作好准备。

4. 具有很大的灵活性

我国的积极防御战略在运用上是灵活的。战略目标的确定，作战样式的选择，兵力兵器的使用，战略战术的运用都是灵活的，都要根据不同的作战对象和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因敌因时因地制宜，灵活处置，以获得最大的政治、军

事和经济效益。

5. 具有广泛的群众性

我国的积极防御战略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之上的。我们实行的是本土防御，全民防御，群众性是我国军事战略本质的反映，是我国军事战略的显著特征。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变革和国际战略形势的不断变化，战略无论是内含还是外延，将产生相应的变化。未来的战略，将跳出传统的“纯军事”、“纯作战”的小圈子，朝着“大军事科学”方向速跑，成为一门包含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在内的综合性大科学。

第四章 世界战略形势和 苏美军事战略

第一节 世界的基本战略形势 和我国对外政策

研究军事战略问题，应当正确分析世界的基本战略形势。世界的基本战略形势对战争的发生、发展和结局有重大影响。正确分析世界的基本战略形势，考察其演变和发展，是制定军事战略，进行反侵略战争准备的重要依据，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开展外交斗争，团结世界人民，反对共同敌人的前提。所以应对世界形势进行科学分析，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判断。

一、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列宁曾经指出，当代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从二十世纪末到本世纪50、60年代的国际关系史证实了列宁的判断。在此期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巨大洪流，一系列国家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或是民族民主革命，战争与革命构成了这一时期的基本特征。60年代中期，随着殖民主义体系的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的分化，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以及第三世界的

崛起，世界实际上已开始向新的历史时代过渡。美帝国主义的霸权地位日益衰落，苏联走上了与美国争霸世界的道路。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随着其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长已逐步成为国际斗争中的重要力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绝大多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经过长期艰巨的斗争已相继取得独立。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49年建国后，又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胜利，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基于上述情况，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他在1974年2月同第三世界一个国家领导人谈话中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1974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向全世界阐明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观点。他指出：“从国际关系的变化看，现在的世界实际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它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这个划分是根据列宁关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理论，分析了当代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和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得出的合乎客观实际的结论。它明确了当今世界的基本战略形势，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为我们制定对外政策和军事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进入8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苏美争夺态势由70年代中后期的苏攻美守转化为互有攻守的战略相持局面。苏美军备竞赛加剧，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激烈，同时

又寻求一定限度的妥协。苏美双方力不从心的矛盾都很突出，干预国际事务和控制盟国的能力都在下降。第二世界独立自主的倾向进一步发展。第三世界进一步朝多极化方向发展。在当今世界上，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国际问题很多。邓小平同志透彻地分析了国际形势，把纷繁复杂的国际事务，形象地概括为“东、西、南、北”四个字，指出“东西”问题是争取和平的问题，“南北”问题是争取发展的问题。他抓住了当代诸多矛盾中的主要矛盾，明确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精辟论断，科学地概括了当今时代的基本特征。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

二、当前国际形势的主要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既然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两大潮流，我们在观察判断国际形势时，就必须紧紧把握住这个时代的特征。那么，在和平与发展的两大潮流中，当今国际形势呈现出哪些主要特点和趋势呢？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是不可忽视的：

1. 两霸争夺的僵持局面将继续发展

苏美两两个超级大国为了谋求各自利益，在全球展开了激烈争夺。它们仍然不会放弃军备竞赛，争夺军事优势，抢占战略要地，掠夺战略资源，保持和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同时又互挖对方墙脚，它们既激烈争夺，紧张对峙，又谋求暂时的妥协，避免迎头相撞。它们之间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它们在各个领域的争夺，导致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威胁着世界和平和各国安全。

当前苏美争霸的战略重点仍然在欧洲。欧洲在世界战略全局中处于重要地位。在政治上，欧洲是苏美的主要盟国最集中地的区。苏联的发达地区和绝大部分人口在欧洲。东欧和西

欧分别是苏美各自为首的“华约”组织和“北约”组织的势力范围。在经济上，欧洲是世界财政金融的中心，是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是世界上经济实力雄厚和技术先进的地区。在军事上，欧洲历来是帝国主义激烈角逐的场所，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现在“华约”和“北约”都将重兵部署在欧洲，形成直接对峙的局面。对苏美来说，谁能把欧洲拿到手，谁就占了优势，因而它们都把欧洲作为争夺的战略重点。苏联对东欧一些国家在政治上干涉其对内对外政策；在经济上把这些国家变成它的商品销售市场；在军事上驻扎重兵集团，实行“华约”军队的统一指挥，甚至直接出兵占领，使这一地区成为它的前沿阵地。尽管目前苏联正在调整政策，实行收缩，东欧形势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但目前尚不十分明朗，我们将拭目以待。苏联对西欧则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以和平攻势为手段，以经济贸易为诱饵，分化西欧联盟，离间欧美关系，企图排挤削弱美国在西欧的势力。美国为确保其在西欧的巨大经济和战略利益，不断加强驻欧美军的战备，继续在西欧部署潘兴Ⅱ式导弹和巡航导弹，要求西欧盟军增加军费，落实战略分工，共同对付苏联挑战；对东欧则以经济技术合作为诱饵，实行“和平演变”，挖苏联的墙脚。

中东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接合部，北邻苏联，南濒印度洋，西扼地中海，东连南亚，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它能沟通两洋（大西洋、印度洋），连接四海（黑海、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一湾（波斯湾），被西方称为“海上生命线”的战略通道，是欧、亚、非三大洲的战略枢纽。中东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蕴藏地和生产地，是西欧和日本最主要的石油供应基地。苏联利用其临近中东的有利条件，把西方在

这个地区防御力量薄弱的所谓“软腹部”作为战略中的一个突破口。它支持和扶植阿富汗亲苏政权，与一些国家签订军事性质的所谓“友好同盟条约”，采取对一些国家提供“军援”、“经援”等手段，进行扩张推行南下战略。它企图打通从中亚到印度洋的大陆走廊，夺取印度洋的出海口，包围海湾油田，卡住西方的战略通道，进而把它的东西两线的军事力量连接起来，从南翼包抄欧洲，向东包围中国和日本，迫使依赖中东石油生存的西欧和日本“自我芬兰化”，使美国陷于孤立。近几年来，美国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不断加强该地区的军事力量，把中东亲西方的军事力量和军事设施与美国的快速部队连成一体，以堵截苏联南下扩张。

亚太地区已成为苏美争夺的重要地区。这一地区人口众多，资源丰富，有马六甲海峡、对马海峡等重要战略通道。它是苏联向外扩张的重要方向之一，也是美国平时遏制、战时牵制苏联的一个重要方向。70年代以来，苏联趁美国在亚太地区退缩的机会，大大加强了在该地区的军事力量和扩张活动。在远东战区建立了统一的指挥机构，增加了战区核力量，扩建军事基地网，提高太平洋舰队的作战能力，唆使越南控制老挝，侵略柬埔寨，拼凑“印支联邦”，瓦解东盟；对日本加强军事压力和经济引诱，离间日美联盟，破坏中日关系等。所有这些活动既是为了对付中国和日本，同时也是对其西线的策应。近几年来，美国为维护其在亚太地区的利益，加强了美日、美韩同盟以及和东盟的关系，增强了太平洋海军包括第3、第7舰队的实力，在日本、南朝鲜加强围堵苏联的军事部署，以改善它和苏联争霸的战略态势。

非洲是苏美争夺的重要目标。非洲位于大西洋和印度洋

之间，东临中东，北濒地中海，是欧洲的南翼，西欧的战略“后方”。其东西两岸的港口、基地，是欧洲到亚太地区的必经之途。非洲有丰富的稀有金属等战略资源，是美国和西欧的原料产地，也是苏联觊觎的地区。苏联打着“天然盟友”的旗号，通过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支持古巴出兵与派遣军事顾问等进行渗透扩张，企图控制某些国家和地区，掠夺战略资源，切断西方国家的原料供应和大西洋和印度洋的战略通道，从南翼包围欧洲。美国则增强其在非洲的军事力量，增加军事和经济援助，推动与之关系密切的国家加强合作，并联合西欧共同抗衡苏联的扩张，以维护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

拉丁美洲也是苏美争夺的重要战略目标。它位于北美以南，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有许多良港和基地，还有沟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巴拿马运河，战略地位重要。过去它是美国的势力范围，素有美国“后院”之称。自50年代末期以来，苏联加紧向这一地区渗透扩张，扶植亲苏势力，在古巴部署军事力量，威胁美国本土的安全，扩大自己的影响。美国以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手段排斥苏联的势力和影响，甚至直接出兵格林纳达，扶植亲美势力，以维护自己的势力。

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军事优势，增强争霸的实力地位，都维持着高额军费，军备竞赛不断升级，日益在更高的水平上展开。美国自1982年以来，军费增长率均保持在7%以上，1986财政年度的军费为2857亿美元。苏联进入80年代以来虽然面临经济困难，经济增长率一直在3%左右徘徊，但军费增长率一直保持在4—5%的水平上下。据西方统计，1985年军费开支赛比上年度增加了12%，其增长幅度

是相当大的。

苏美对其核武器和常规武器，都在加紧更新换代。美国新一代的战略武器，如MX导弹、“侏儒”导弹、“三叉戟”Ⅱ型潜射导弹、B—1B战略轰炸机、隐形战略轰炸机等，开始装备部队。苏联的第五代战略导弹SS—24、SS—25以及“海盗旗”式战略轰炸机、潜射战略导弹、远程巡航导弹等，也陆续装备部队。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它们把军备竞赛从陆地、海洋和空中扩展到外层空间，竞相发展自己的“星球大战”系统。双方都力图通过军事技术的突破来夺取军事优势，剥夺对方的战略进攻和还击能力，使自己处于能攻能守的地位。这标志着两个超级大国军备竞赛的质的升级。美国计划在本世纪末至下世纪初建立以太空为基地，采用定向能、动能和微电子等尖端武器技术的全面防御体系，拦截来袭的苏联战略导弹。苏联正采取紧急对策，一面发动“和平攻势”企图牵制、推迟或打掉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一面加紧发展自己的太空武器系统。苏美太空武器之争已成为双方军备竞赛的一个更为重要的领域，是两国国力的一次全面较量，对军事、经济、科学技术以至整个战略格局都将发生重大影响，而且直接关系到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双方军事力量发展前景，因而都不肯作出让步，这必然导致双方的军备竞赛在更高的水平上展开。

两个超级大国军备竞赛不断升级，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和各国的安全，战争的危險依然存在。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它们在战略上都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和弱点。诸如苏美的军事力量大体均衡，相互威慑，苏美战争将意味着两败俱伤，谁也不敢贸然发动世界大战；双方的全球战略部署都没

有完成，经济上都有许多困难，各自盟国掣肘甚多。因此，虽然进行争夺，但双方僵持局面仍然会继续发展。

2. 国际战略格局向多极化发展

当今世界，国际战略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以中国为首的第三世界已成为国际战略格局中的重要力量，成为制约战争的重要因素。

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新兴国家经过数十年的斗争和发展，终于联系到一起，组成了第三世界，作为一支独立而又强大的政治力量活跃在国际战略舞台上，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第三世界人口众多，地区广大，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目前，第三世界已经包括130个国家和地区，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70%以上，面积占世界陆地面积的60%以上。它们有丰富的资源，仅以石油为例，据1981年统计，第三世界拥有世界储量的63.8%，产量的42.3%和出口的87%。它们握有许多战略要冲，如重要的海峡、运河、岛屿等，它们掌握着联合国的80%的席位，在国际战略格局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广大的第三世界在历史上有共同的和相似的苦难经历，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压迫剥削最重，反抗也最强烈，具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曾经是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经过英勇斗争，相继获得独立，旧的殖民体系被瓦解，一个新的朝气蓬勃的第三世界诞生了。第三世界诞生后，它们团结起来，利用本身有利的因素，充分发挥自己的政治优势，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特别是霸权主义进行斗争，捍卫自己国家的主权，维护民族独立，保护战略资源，牵制和吸引了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打乱了两霸的全球战略部署。

拥有11亿人口，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国家，是国际战略格局中重要的一极。中国在处理复杂的国际事务时，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谁主张和平，我们就与谁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这种和平的大协同，使我们在中、美、苏大三角中和整个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日益主动自如，作用更加举足轻重。

第三世界的经济和国防力量不断发展，更加提高了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力量。经过多年努力，第三世界民族经济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发展，有些国家开始跨入经济发达的新阶段。许多国家国防力量有了明显的提高，更有利于制约霸权主义的行动。目前，已经改变了一两个超级大国操纵联合国的局面，使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经常受到谴责。拉丁美洲国家发起的反对超级大国海洋霸权的斗争，石油输出国和其它原料生产国争取对自己的自然资源享有行使永久主权的斗争，不结盟国家反对强权政治和集团的斗争，所有发展中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形成了当代的正义潮流，取得了一次次斗争的重大胜利。柬埔寨人民反抗苏越侵略者的斗争，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以色列扩张主义的斗争，非洲各族人民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的斗争等，沉重地打击了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改变了霸权主义任意摆布世界命运的局面。

欧洲、大洋洲、日本等经济发达的国家和集团，也是国际战略格局中重要的一极。战后40多年来，这些国家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以日本为例，其发展速度高于美国和西欧，预计本世纪末，日本的年国民生产总值将达二万四千亿美元，在美、日、西欧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将从1980年的18%

上升到22%，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日本在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在亚太地区的政治舞台上拥有更多的发言权。西欧国家为应付国际上经济和技术竞争的挑战，其联合趋势日益发展。欧洲共同体在经济上加强合作的同时，在政治上也不断加强合作。目前它们建立的共同政治机构有部长理事会、共同市场委员会、欧洲议会和欧洲法院等，不断协调各国的外交政策，使欧洲能用一个声音在世界上说话。近年来，它们在军备控制、防务政策、对苏关系等问题上与美国的分歧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在国际重大问题上采取了不同于美国的立场。欧洲一些中立不结盟国家，也在加强合作，力求在维护欧洲和平问题上，在两大军事集团之间起缓冲作用。东欧国家独立自主倾向还在迅速发展，东欧国家和集团的经济改革有可能在广度和深度上超过苏联，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将可能影响苏联同他们的关系。

当今世界，国际战略格局正由两极向多极化发展，不少发达国家已经建立了数以千计的和平组织，一再掀起规模巨大的和平运动。第二世界的广大人民群众反对核竞赛、核威胁的和平运动正同第三世界广大人民群众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侵略扩张的斗争遥相呼应，蓬勃发展。现在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从本国的民族利益出发考虑问题，听命于超级大国和地区霸权主义国家指挥棒的越来越少，独立自主性越来越强。因此，在战争问题上，过去那种由一两个大国一呼百应的局面已经很难出现。1950年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很快就汇集了十四个国家参战，而1986年美国袭击利比亚时，很多国家，包括北约成员国意大利连空中走廊也不愿给美国空军提供。由于地理阻隔及复杂的双边多边关系，已很难形成众多

国家利益一致的军事同盟。正因为国际战略格局向多极化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把战争或冲突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难以扩大和升级为世界大战。

总之80年代以来，经济上，由于欧洲共同体的国民生产总值超过了苏联、接近美国，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也接近了苏联，经济多极体制已经形成；政治上，除中、美、苏大三角外，西欧联盟、日本以及地区性国家集团的作用日益增大，正向多极化过渡；军事上，随着中、英法核力量的发展，地区性防务合作的增强，军事两级体制的作用也正在削弱。总的看来，世界格局正向多极体制转变，两个超级大国干预国际事务的能力逐步下降，由它们为所欲为地主宰世界的时代已经过去。

3. 东西方关系出现了既对抗又对话的局面

核武器的巨大破坏力，美苏两国的核均势和在核战争中不可能有胜利者的认识，以及两国综合国力的大致均衡，使有资格打世界战争的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谁也不敢先动手；美苏两国由于长期以来激烈的军备竞赛和到处伸手干预别国事务，各自都遇到了困难。苏联经济长期停滞，内外包袱沉重，迫使它不得不调整内外政策，进行改革。美国的日子也不好过，财政、贸易两个赤字的增长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实力大不如前。这就使得两个超级大国发动世界战争的能力下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美苏两国既对抗又对话，对抗而有控制，对话而又不放松争夺的局面。

4. 国际间竞争的焦点由军事领域转向科技、经济领域

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浪潮，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大发展，各国经济利益的联系日益紧密，国际化的程度日益加强，资本、生

产、市场相互渗透，衰荣相关，休戚与共。如果爆发世界战争，各国经济包括发动战争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巨大损失。世界主要国家为保持它们在下个世纪的战略地位，更加关注国内事务，致力于本国综合国力的发展。以发展高技术为核心的争夺21世纪战略主动权的斗争，将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目标。世界各国特别是大国间的经济战、科技战将更加激烈。

5. 全世界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力量日益增长

世界人民，尤其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人民反对战争，要求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发展国家的经济和科学技术。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发展，成为维护和平的基本力量。美苏两国的人民和它们的盟国人民也不希望战争，要求和平，尤其是东欧、西欧，都不愿意把自己绑在苏联、美国的战车上，独立自主的倾向在增强，它们是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全世界反对战争、要求和平，反对军备竞赛、要求全面裁军，反对紧张、要求缓和的力量不断增长。因此，尽管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但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发展，世界战争是可以制止的。

6. 地区性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但对世界战略格局影响不大

由于两个超级大国更多地采用间接对抗形式，把挑动或直接、间接参与局部战争，作为它们争夺势力范围，调节其全球战略部署的重要手段；还由于地区霸权主义推行侵略扩张政策以及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土、宗教、民族等矛盾激化，地区性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难以避免。但是，两个超级大国为了各自的利益都有所节制，尽量避免直接对抗，因此这些地区性局部战争都不致于影响世界战略格局的变

化。可以预测，受和平与发展两大潮流及缓和趋势的影响，世界现有的“热点”地区，有些将降温，有些局部战争可能在近年内结束。虽然由于地区性的矛盾冲突，新的热点还会产生，新的局部战争还可能爆发，但是从总的趋势看，热点地区可能会减少，局部战争发生的频率可能会降低。

综上所述，当今时代和平与发展的两大潮流和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决定了国际形势发展的总趋势是走向缓和。这是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为反对战争、维护和平、谋求发展进行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克服自身困难的需要。以美苏签署中导条约为标志，东西方进入了一个新的缓和时期。但是，这种新的缓和是有限的，其发展也决不会是平稳的，缓和的进程仍将是曲折的和充满斗争的。

根据以上对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形势的分析，可以推断，尽管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但经过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世界和平是可以争取和维护的。

三、我国对外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加强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团结，支持被压迫民族和发展中国家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正义斗争，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了这些政策，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和国家集团，不屈从于外来的压力，也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

对国际事务，我们根据它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坚持正义，主持公道，不迁就于一时的事变，不拿原则作交易。邓小平同志在党的12大开幕词中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这充分表达了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坚强意志。

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是时代的要求，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的政权性质决定的。新中国的诞生，不但消灭了屈从于外国的压力，仰人鼻息，推行依附外交的社会根源，而且消灭了对外侵略的社会根源。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是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它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既珍惜本国独立自主的权利，也尊重别国独立自主的权利，既维护本国的安全和利益，也尊重别国的安全和利益。

世界各国人民都渴望和平，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民经济，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国是世界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的前途与世界的前途是息息相关的，中国需要和平，最不希望发生战争。因为中国人民正在致力于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加强经济建设，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和平国际环境，需要各国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我们绝不愿意让自己经过千辛万苦取得的建设成果遭到战争的破坏，绝不愿意让自己的同胞在战争中蒙受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也不希望人类再次遭受世界大战的浩劫。但是两个超级大国为了谋求世界霸权，在各个领域展开争夺，导致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它们之间的军备竞赛不断升

级，军火库越来越大，严重威胁着世界和平和各国安全。因此，要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历史经验证明，和平不能用祈求来维持，战争不能靠让步去防止。只有坚决反对一切霸权主义，揭露它们的战争阴谋，破坏它们的战略部署，制约它们的军备竞赛，同时从精神和物质上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才能有可能维护世界和平。

中国人民一贯站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最前列，为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停止军备竞赛、促进裁军、防止战争而努力奋斗。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最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深得人心，也令人放心。中国把一切和平力量都作为自己的朋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我们处理对苏对美关系历来是坚持原则、独立自主的。我们决不联合一方反对另一方，因为中国这个力量不论加在哪一方，都会引起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不利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我们主张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在国际斗争中，我们要高举和平、裁军、缓和的旗帜，反对霸权主义，争取持久和平，发展友好合作，促进共同繁荣。

中国主张裁军，反对军备竞赛，这是我国的一贯立场。我们历来主张全面禁止、彻底销毁核武器，大量裁减常规军备。我国真诚地希望根据联合国决议对实现核裁军负有首要责任的苏美两国能够倾听世界人民的正义呼声，停止军备竞赛，通过谈判达成不损害其他国家利益的协议，大幅度裁减核军备，从而为实现所有核国家的普遍裁军创造必要的条件。近几年来，中国大幅度减少军队员额，深得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赞赏。

中国主张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和平解决国际

争端，反对诉诸武力或武力威胁。目前世界上存在着一系列争端，无论是历史遗留的，还是现实产生的，都面临着用什么办法去解决的抉择。兵戎相见，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会留下后遗症，对国际局势的稳定极为不利。只有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才符合有关国家的利益，也不能促进世界和平。中英两国政府通过平等协商，互谅互让，圆满地解决了香港问题，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实践证明，只要有关各方都具有解决问题的诚意，都采取互相尊重、互谅互让的态度，就不难通过和平谈判，合理解决国际争端。

我们要团结一切和平力量，共同反对霸权主义，争取持久和平。一切和平力量都是我们的朋友，都要加强团结。和平事业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事业，只有一切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奋斗，才能制约霸权主义的侵略和扩张，束缚它们的手脚，赢得世界持久和平。

我们要团结和依靠第三世界。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合作，是我国外交工作的一个基本立足点。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的斗争，只要是反对侵略和干涉、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不管它的斗争锋芒指向谁，我们都坚决支持。我们坚决支持不结盟运动，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等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组织与实现世界的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进行的各种努力。我们坚决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进行的斗争，积极参加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我们坚持“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的原则，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进行力所能及的援助，促进它们自力更生，发展民族经济，加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物质力量。

我们要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许多发达国家虽然同这个或那个超级大国结盟，其中的一些国家同第三世界还有矛盾，但是它们都受到超级大国的干涉和欺负，都不想打仗，是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我们要发展同它们的联合。我们谋求在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关系，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只要遵循五项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同样可以和睦相处，友好合作。这样，最有利于促进和平力量的联合和国际局势的稳定。我们积极支持东欧、西欧国家改善关系，谋求中美关系在共同遵守双方达成的协议的基础上稳定发展，希望中苏关系在消除现存障碍的情况下实现正常化。

我们坚信，人类的前途是光明的，和平前景也是光明的。只要各国人民团结起来，一切和平力量团结起来，共同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和战争政策，反对军备竞赛，反对强权政治，同时做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世界和平是可以维护的。

第二节 亚太地区的战略形势及未来

爆发军事冲突的主要动因

一、亚太地区的战略形势

亚太地区地理位置重要，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市场很大，具有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战后四十多年来，亚太地区的战略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的成立与振兴，日本的再度崛起，许多国家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一些

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的迅速发展，使亚太地区在世界战略全局中的地位显得更加突出。

80年代以来，亚太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以高于世界平均增长速度的势头蓬勃发展，成为当今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最富有活力的地区，展现出广阔的前景。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的联系日益密切，各种对话和谈判日见增多，要求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世界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已不可逆转。随着世界和本地区经济、政治情况的发展和中、美、苏、日等国相互关系不同程度的改善，亚太地区总的形势有所缓和。但另一方面，超级大国争夺仍然是影响这一地区和平与稳定的突出问题，牵动着全局。亚太国家（地区）由于政治结构不同，社会制度各异，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以及其他种种历史的原因，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阶级、民族、教派矛盾以及国家之间的领土、边界、海洋权益等方面的矛盾十分尖锐，错综复杂。有的国家长期分裂，有的国家（地区）政局动荡，有的推行霸权主义，有的长期遭受外敌入侵。超级大国争夺与地区矛盾交织在一起，以致局部战争连绵不断，热点此伏彼起，一些地区的形势持续紧张。

目前，亚太地区包括了当今世界上一些最突出、最有影响的国家，形成了各种战略力量汇集的局面，是全球东西关系和南北关系的重要交汇点之一，对国际战略形势具有特殊的意义。历史和现实证明，亚太地区是世界战略全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政治风云的变化，必然波及亚太地区；而亚太地区局势稳定与否，对世界战略全局也同样有着重大影响。

总的看来，当前亚太地区仍存在着一些热点和不安全的因素。超级大国的争夺与对抗，地区霸权主义的侵略与扩张，还有一些国家（地区）内部或互相间的矛盾与冲突，都是影响这一地区稳定的重要因素。展望90年代，亚太地区各种固有的矛盾和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新的动乱和冲突还可能发生，但有利于和平和发展的因素也在增长，亚太大多数国家为了争取21世纪的战略主动权，将可能把稳定内部、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作为主要战略目标。因此，亚太地区总体局势可望保持相对稳定和继续趋于缓和。

应该指出，在维护亚太地区和和平与稳定方面，各有关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很明显，只要超级大国不发生剧烈对抗，亚太地区发生全局性战乱的危险就会大大降低，而没有超级大国的积极参与，任何局部冲突都难以扩大和升级。战后的国际关系史给人们留下了一个越来越深刻的印象：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必须反对霸权主义。既要反对世界霸权主义，也要反对地区霸权主义；既要反对政治霸权主义，也要反对经济霸权。如果亚太地区所有国家都反对霸权主义，都不搞霸权主义，那么，维护亚太地区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是大有希望的。

二、未来亚太地区爆发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的主要动因

1. 领土（海）、岛屿、边界的主权和归属问题的激烈争端，是未来亚太地区爆发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的主要因素

亚太地区的国家，绝大多数都是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了宗主国与帝国主义统治而发展起来的新兴国家。一方面，这些国家背负着种种殖民主义统治所遗留下的“悬案，尤其是领土（海）、岛屿、边界的划分，各种权益的归属问题，为

今天和未来的战争埋下了祸根，这种现象随着各国的发展而日益尖锐突出起来。如英国殖民主义在结束对印度的统治时导演的“印巴分政”，先后引起过两次印巴战争，时至今日两国仍然互有敌意，经常发生冲突，给未来爆发战争留下了火种。非法的“麦克马洪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1962年的中印边境之战，印度也正是利用这一借口，非法侵占该地区以及我国领土，并提出不合理的主权要求，这些都是诱发未来该地区爆发战争的因素。

另一方面随着一些国家经济的发展，人口急剧膨胀，为争夺生存空间，从狭隘和自私的民族利益出发，或以原宗主国的侵略行径为依据，或以相近和实际占领为借口，对邻近领土、海区和岛屿提出了非法的主权要求，这是未来诱发军事冲突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岛屿主权之争，太平洋是世界上岛屿最多的海洋，共有岛屿10000余个，多分布于西部和西南部海域，面积达440万平方公里，占世界岛屿总面积的45%。特别严重与令人担忧的是我国南海地区。

南海，是我国三大边缘海之一，它北靠我国华南大陆，东邻菲律宾，西濒越南和新加坡，南接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度尼西亚等国。总面积为350万平方公里。按历史传统海疆线计算，其中属我主权的海区面积为210平方公里。相当于我华南地区陆地国土面积的3倍多。在宽阔的海区里，目北至南散布着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统称南海诸岛。南海海区以及诸岛是我国华南陆战场的天然屏障和海防前哨，扼太平洋与印度洋海上交通之要冲，资源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前与未来这一地区的激烈争夺对象是岛屿和海区主权与归属问题。

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早在公元前二世纪的汉武帝时代，我国人民就发现了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到唐朝贞元5年(公元789年)，就列入了我国的版图直至今日，这是世界所公认的。然而，沿岸部分国家出于经济目的，竟相对比提出非法的主权要求，进而派兵抢占，激烈争夺，特别是西沙、南沙诸岛，争端更为激烈，已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瓜分，争夺局面。自1970年7月菲律宾率先侵占我马欢、弗信两岛以来，现在除国民党军占领太平岛外，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已先后非法侵占了31个岛礁，并在其中21个岛礁上驻扎了军队，其中越南就占据了13个。它们均宣称对所占岛屿“拥有主权”设置军事设施，进行海上巡逻，以显示管辖权，企图造成既成事实。目前，南海诸岛除中沙群岛未露出水面，西历群岛和南沙永暑等6个岛礁为我控制外，其余几乎全部落入他人之手，连许多难以落脚的适淹滩，也成为各国争夺的对象，而且这种形势仍在继续恶化。

海区划界之争形势也很严峻。按照我国传统海疆线的划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我国大约可以得到170到200万平方公里的海域管辖权，约占整个南海海域的面积一半以上。然而，近十年来，南海周边国家，不仅侵占了南海诸岛，而且纷纷单方面公布所谓的海洋法，修改出版物，划分其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范围。公然侵占我传统海疆。越南统一后，不仅宣称南沙群岛及附近约40万平方公里海域为其所有，而且还得寸进尺地提出了对西沙群岛及附近海域拥有主权的荒谬要求。在北部湾海域划分上，竟以1887年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的不平等的中法条约为依据划界，把三分之二的海域划为已有。1978年6月，菲律宾以总统法令的

形式，把我南沙群岛的大部分岛礁划入其版图，并称之为“卡拉延群岛”，其海域范围达40万平方公里，另外，又以专属经济区的名义，将黄岩岛及附近海域包括进去，连同台湾以东海区与我计有42万平方公里之争议区。1968年马来西亚与印度划分大陆架分界线时，也把我南沙、曾母暗沙附近海域划为己有，侵占我海区达8万平方公里，1979年其出版的大陆架地图，又任意扩大范围，将我海区27万平方公里划归其有。印尼所规定的海疆面积也侵入我海区5万平方公里。文莱也要求将其大陆架延伸到南海海槽，侵入我传统海域3000平方公里。据统计，南海毗邻国家共侵占我海区面积达80至90多万平方公里，并就其一部分提出主权要求，形成多相重叠的局面，我国曾多次与各国交涉，但毫无效果。而且有的国家变本加厉，胃口越来越大，贪得无厌的一再向我提出主权要求。

这些国家在海区、岛屿主权归属问题上与我争执，关键是因为南海地理位置利于其而不利于我，趁我国力、军力、经济力还尚较弱，海、空军远战能力较差，军事上还处于鞭长莫及之际，从中牟利。长此以往，矛盾必然激化。随着我海、空军远战能力的提高，当政治外交手段无法解决时，我为捍卫海疆领海的主权，必然会以军事行动维护之，双方冲突，从而导致爆发局战争和军事冲突。这是军事冲突的一大热点地区。作为多岛濒海的亚太地区，以争夺岛屿和海域主权归属而引起的战争，以谋取霸权主义的领土扩能观和以维护国家安全与民族利益的权益观而产生的冲突，将是未来亚太地区爆发局部战争的主要因素。

2. 经济和自然资源的激烈争夺，是未来亚太地区爆发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的导火线

经济利益往往是战争爆发的根本起因与目的，亚太地区多属于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急剧增加，资源则日益减少，面临的经济问题的各种矛盾也逐渐尖锐起来，最为突出的是对资源的争夺，尤其是对海洋资源的争夺。太平洋总面积约为17868.4万平方公里，约占世界海洋面积的一半和地球表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是一个巨大的天然宝库，有极丰富的海洋资源。这里蕴藏着无法估量的海洋动物、植物、矿物，以及石油、天然气和可以再生的潮汐能、波浪能、温差等巨量能源。其中鱼的产量在各大洋中占居首位，浅海大陆架的油气，煤的储量相当可观，深海区的锰结核资源十分丰富，达16000多亿吨。仅太平洋海底每年新生长出来的锰结核便达1000万吨，若从中提炼钢可供全世界用3年，钴可用4年，镍可用1年。亚太地区多数属于濒海的发展中国家，在陆上资源不断消耗的情况下，迫使各国纷纷将目光投向浩瀚的太平洋。这样势必会引起对海洋资源的争夺，从而诱发战争。

以我国南海地区为例。这里蕴藏着极为丰富的油气资源，据有关资料刊载，南沙群岛周围海域拥有相当于甚至超过中东波斯湾的石油贮藏量。南海毗邻国家出于各自经济利益的目的，对这一海区石油资源争夺的异常激烈，各国都试图通过石油开发大捞经济实惠，有的借助一些发达国家的技术与设备联合开采，有的则利用南海资源秘密交易。其中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分别与苏、美、英、日、荷兰等国石油公司合作。这些公司已在南沙投资达120

亿美元。迄今，他们在我的海疆线内已打油气井121口。据报道，越南头顿南部附近海上油田，到1990年年产原油预计可达200万吨，这对一个严重贫油的国家来说，将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马来西亚和文莱在南沙的曾母暗沙盆地1980年的年开采量竟达2500万吨，至1985年已达9000万吨，按目前最低价格计算，约合120亿美元，从而成为其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此外，南海的矿藏资源也十分丰富，特别是锡、煤，锆石、钛铁矿，锰矿的储量都是居世界前列。水产资源则更为丰富，是我国最大的热带渔场，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价值。

战略资源之争，历来是各国发生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均资源并不丰富的濒海国家来讲，更具有重大的意义，特别是正处于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的阶段，尤为如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军事实力的提高，我们决不能坐视他国对我资源的掠夺，这样非法与合法，侵占与反侵占，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将日趋激烈，从而上升为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在本世纪末，随着世界性开发利用海洋高潮的兴起，亚太地区的各个海域争夺将愈演愈烈。这样，以争夺自然资源为目的而导致的战争将成为未来亚太地区爆发战争的重要因素。

3. 亚太地区的特殊战略地位及苏美两大势力日益对该地区的窥视、重视、争夺，是亚太地区未来爆发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的催化剂

亚太地区人口众多，拥有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自然地理条件好，经济发展很快，近年来，日本、中国、南朝鲜、台湾、香港、新加坡以及东盟成员国，已经形成了经济增长

率最高的世界新的经济区，尤其日本已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一些西方专家预计，亚太地区将成为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中心，21世纪将是“太平洋世纪”。同时亚太地区海、空交通线多，拥有许多不冻良港和海、空中继站，战略地位日趋重要，是苏美两大势力争夺和控制的主要地区。美国对此早已十分关注，不断扩大在这一地区的军事与经济影响，并明确表示要保持其“军事存在”。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与经济影响力较小，但鉴于这一地区的战略地位逐日渐增，它必然要积极参与亚太地区事务。两个超级大国在亚太地区势必早晚将有一番较量。

处于经济利益和军事目的，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战略是：保证亚太地区国家不受苏联威胁和恐吓，以及影响与控制，保证自由贸易正常进行，海上通航。美国把太平洋上的航路视为美国工业和经济的“主动脉”，把阿留申群岛到马里亚纳群岛构成的弧形岛屿锁链看成是保卫其本土安全的“巨大护城河”和“堡垒”，将整个亚太地区作为遏制苏联的缓冲地带与前沿阵地。并在亚太地区建立起拥有与苏联抗衡的军事力量，把围堵苏联的防线推进到苏联近海地区。苏联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战略是：争取立足点（如给越南经援获取金兰湾的使用权，给北朝鲜提供援助，获取过境权，加强对中国的侦察等），拉拢与恐吓日本、中国，企图在苏美发生战争时，使之不介入，保持中立。阻止美国实现“多线灵活作战”战略，排挤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势力，以避免两线作战，确保东出太平洋和南下印度洋的通道，与中东战略相衔接，完成对亚洲、中东和非洲之角的弧形包围圈，切断西方的海上运输线。所有，苏、美在亚太地区争夺的主要军事目

标是：海上交通线，出海口和海峡。

目前，世界上有7条重要的海上交通线，在亚太地区或与亚太地区紧密相关的就有亚欧航路（一头连接西欧，一头连接亚太地区）是世界第二条重要航线，北太平洋航路（是美国同亚洲国家的国际贸易航线，也是美国在军事上“重返亚洲”的海上通道），南太平洋航路（是南北美洲西海岸国家与亚太地区贸易往来通道）。非洲航路（苏伊士运河通航前，是从欧洲到东南亚，东亚的唯一海上通道，这条航路对苏、印越等国利益攸关）达四条之多，其中亚欧航路是西方出口工业品与进口战略物资的“海上生命线”，也是苏联连结其欧亚的唯一不冻航线和最可靠的通道。如美在战时控制，既可保障美、日石油航线的安全，又可切断苏各舰队间的联系，便于各个击破。如苏控制则可直接取得入印度洋的海上通道控制权，打破西方围堵，使美、日处于被动地位。因此，苏、美双方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十分激烈，一些邻近国家如越、日、马来西亚等处于自身利益，也竞相角逐。

出海口是海军作战活动的“生命关口”。苏联由于自然地理条件限制，其舰队没有直接面向大洋的良好出海口，所以一直以寻找最佳出海口为首要目标。位于西北太平洋边缘的日本海，是苏东出、南下太平洋的必经之地，但海区的3个出口——宗谷海峡、津轻海峡和对马海峡被美、日封锁，因此，苏太平洋舰队能否控制这3个出口，是其进入太平洋，实施远洋作战能否成功的关键。所以，美苏双方对此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将十分尖锐。

海峡是海上交通和军事行动的“瓶颈地区”战略意义十分重要。世界海上16个咽喉要点，亚太地区就占有5个。阿

拉斯加湾（对保障美国西部安全意义重大）；朝鲜海峡（是苏太平洋舰队南下必经之地，当前美苏争夺海上霸权的重要环节）；望加锡海峡（是联结太平洋西部与印度洋北部的战略通道）；巽他海峡（是太平洋经爪哇海通往印度洋的战略通道之一）；马六甲海峡（是紧扼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咽喉，是沟通欧、亚、非三大洲海运的交通要道，素有“两洋走廊”之称，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对此，苏美争夺与反争夺的斗争也将日趋加剧。

随着亚太地区战略地位的上升，苏美互为对手争夺战略要冲加剧了严峻的形势。对苏联来讲，亚太地区既是南下的主要门户，又是迂回包抄中东和西欧的重要方向。对美国来说，亚太地区既是围堵苏联的前沿地带，又是未来策应欧洲战场的重要战线。整个亚太地区已成为苏、美全球争夺战略的次重点。近十年来，苏联为适应争夺的需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扩充军备，在亚太地区建立了统辖远东、后贝加尔，西伯利亚等三个军区和太平洋舰队的远东战区总司令部，加强了军事实力和部署。尤其引人注目的是苏军太平洋舰队实力已居全苏四大舰队之首，总吨位比70年代中期翻一番，并在金兰湾建立了前进基地，进驻了海、空军兵力，向印度洋派遣了常驻分舰队。显而易见，苏联的主要企图是要在亚太地区取得对美国的军事优势，把军事力量前推到南中国海、西太平洋和印度洋，以改善与美国进行全球争夺的态势。美国则进一步加强以夏威夷为中心的太平洋总部的实力，重点提高以大型航空母舰为主的太平洋舰队综合作战能力，不断加强和改进驻日本、南朝鲜、菲律宾、关岛等地的美军实力和武器装备，并向印度洋派遣了临时舰队编队。不

难看出美国力图保持在亚太地区的海空优势，把围堵苏联的防线推进至苏联附近地区，以维护美国的既得利益，增加与苏联争夺的实力地位。

同时，苏、美还想通过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在更广阔，更深远范围展开竞争。苏联以推进“亚太安全体系”为策略，美国以推行“联盟战略”和策划“太平洋共同体”为目标，双方都力图把亚太国家和地区的区域合作纳入各自的全球战略轨道。他们在亚太地区的争夺已遍及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严重的影响了亚太地区稳定与安全。战后世界所发生的几百起局部战争，在海上或濒海地区，或有海军参与的就占86%以上，足以见得，海上争霸已成为国际军事争端的一大“热点”。历史证明，发达国家之所以大多数是濒海国家，主要得益于海上交通。在未来，海上通行自由的政治、经济，军事意义对各国更关重要。如果没有海上“舟楫之便”，日本就可能沦为最贫穷的国家，如果没有海上补给之盈，英阿马岛之战的结果就可能改写。对此，苏、美两国以及亚太地区的濒海国家都心明如镜。因此，超级大国的干预与争夺海上自由权将成为亚太地区爆发未来局部战争的催发素。

4. 地区霸权主义政策，是导致未来亚太地区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的祸根

亚太地区的少数新崛起的国家，出于某种政治上、军事上的需要，在大国霸权主义的影响或支持下，为转移国内视线：蓄意制造与邻国的争端，甚至不计后果地推行与殖民主义相似的地区霸权主义，表现出极其强烈的占有侵略欲望，奉行侵略扩张政策，穷兵黩武，动辄征战，这必然引起受害

国的强烈抵抗与不满。譬如，越南地区霸权主义就是典型的一例，越南入侵柬埔寨，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对东南亚的和平和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是当前亚太地区军事冲突的一个主要热点。象越南这样的地区霸权主义在亚太地区的其它地方也有隐患，例如：印度近几年的对外政策和军事实力的发展十分令人担忧，不能不成为一个爆发战争的潜在策源地。

日本的再度崛起，更是亚太地区战略形势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进入80年代，日本在经济上的腾飞，一跃成为世界头号贸易盈余国和债权国。随着经济实力的全面增长，日本争当世界政治和军事大国的欲望日益强烈。几年来，日本调整了军事政策，把保卫1000海里航线作为90年代的扩军目标，并在“本土防卫”的基础上将“海上歼敌”和“远洋防卫”列为日军作战指导思想。1987年1月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取消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1%的限额，向军事大国方向迈出重要的一步，为今后扩军备战扫清了道路。1989年8月19日，日本防卫厅宣布，1990年度日本的防卫预算为4.1688万亿日元。这是战后日本军费首次突破4万亿日元大关。这一突破是日本大力扩军的必然结果，再次说明日本不愿放慢其扩军步伐。近些年来，日本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多次声称要成为“政治大国”、“国际国家”。就是要提高日本在国际上的政治地位。不过，它又感到自己的军事力量不那么相称，故一再表示“要建立与国力相称的防卫力量”。事实上，日本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加强军事力量，建立一支强大军队，始终是它追求的目标，尽管日本首相易人，内阁更迭，但这一基本目标从未改变，只是部分提法、

做法略有不同而已。人们注意到，日本军队的人数规模尚未有大的变化。从已透露的情况看，下一个五年扩军计划期间，日本兵力规模也不会有大的变化。但是，日本政府、防卫当局着眼于21世纪，瞄准世界先进科技学术，在提高“质”上下功夫。为此，日本花大力气，正耗费巨资研制新型先进武器装备，加快武器装备现代化的步伐。几年前，日本防卫厅已经着手陆海空三军自卫队的全面改革，陆续调整三军的组织机构，调整和加强防卫厅技术研究开发本部和陆海空三军的武器装备研制机构。通过改革、调整，三军的组织机构更趋于合理，各项业务效率更高。与此同时，日本还大大加强与美国在军事方面的合作与联系，日美联合军事演习越来越频繁，层次也愈来愈高。日美军事技术合作取得突破性进展。日本自卫队自身的训练也有明显加强，武器装备与后勤保障日趋合理。综上所述，日本的目标是将自卫队建设成一支拥有世界先进武器装备、训练有素的精良部队，使其成为一个不可轻视的军事存在。观察家预言，在不久的将来，日本将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军事强国。

值得指出的是，在日本扩军问题上，美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出于全球战略的需要，多少年来一直给日本施加压力，迫使它分担防卫负担，希望它在对付苏军威胁上助一臂之力。为此，美国甚至还怂恿、默许日本破除一些战后美国强加给日本的“限制”。美国这样做的结果，使日本更加大胆扩军。当前，美苏关系趋于缓和。但在远东，尽管今年5月以来，苏一再表示要削减其远东军队，美国反应却似乎冷淡。今后随着美国在菲律宾基地使用期限即将届满，以及南朝鲜反美情绪的高涨、美国驻南朝鲜军队撤离问题的提

出，日本在该地区的作用，对美国来说将变得更加重要。在美国的对苏战略中，日本将继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承担对苏遏制的任务。多少年来，日本一直是把苏军威胁作为它扩军的一大理由。8月20日，日报透露，防卫厅预定于9月发表的1989年版《防卫白皮书》，将继续写入“苏远东军事威胁依然存在”的基本看法。前些天，日本新任防卫厅长官松本也表示，“苏多年积蓄的军事力量依然如故，尤其在远东更为明显”，“日本须高度警惕，密切注视其今后动向”。松本的意图很明白，苏远东军队对日威胁依然存在，日本没有理由放松增加军事实力的努力。1990年，是日本正在实施的五年扩军计划的最后一个年度。日本防卫厅、陆海空三军自卫队已就下一个五年扩军计划提出初步构想和扩军重点，并开出主要武器装备的采购清单。据报刊已经透露的情况看，其重点是：陆上自卫队方面，为提高前沿击破、反登陆能力，计划引进美制多连装火箭系统，以加强火力；为能迅速集结兵力，加强机动力量，计划增加200架直升机（现五年计划目标是400架），建立600架体制的直升机部队，其中反坦克部队8个（现五年计划目标是4个），将地对舰导弹部队扩充为8个（现五年计划是3.5个），新建MLRS特种部队6个。海上自卫队方面，以加强海上通道防卫力量为重点，计划建造2艘“宙斯盾”舰、2艘DDV大型护卫舰。该型护卫舰排水量为10000—15000吨，将搭载英国“猎兔狗”改良型战斗攻击机和反潜直升机，能对付战斗机、轰炸机的导弹攻击。专家说，该型舰就是实质上的防御型轻航母。

航空自卫队方面，将以提高本土和海上防空能力为主，

计划配备数十架空中加油机（美制KC10、KC135）和数架预警机。

日本大力扩充军备的事实，不能不引起人们的严重关注和思考。尽管日本受各种因素的限制，短期内不会成为军事大国。但是，日本具有迅速扩充军备的巨大潜力，国内又存在着复活军国主义的土壤，日本一些人至今对二战的战略行径毫无反省之意。所以，随着日本经济力量的进一步膨胀，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与其它国家经济矛盾的不断激化，资源匮乏和人口的急剧增加，日本会不会成为未来谋求亚太地区主导地位和世界军事大国，推行霸权主义，不得不令人警惕，是一个更危险的潜在因素。因此，霸权主义政策是未来亚太地区爆发局部战争的一大祸根。

5. 国家政局动乱，是未来亚太地区爆发局部战争与军事冲突的内患

“内忧必然招致外患”，这是无数战争史实早已证明的规律。近期的阿富汗战争和柬埔寨战争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一个国家特别是在整个世界格局中居于一定战略地位的国家，一旦国内出现政局动荡，引起内乱或内战，世界霸权主义或地区霸权主义等外部势力就有可能乘虚而入，支持一方，反对一方，扶植亲信政权，直至军事占领和完全控制。目前，亚太地区的东南亚地区，以越南、印度为轴心辐射的相邻国家，如泰国、缅甸、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菲律宾就存在着这种潜在危险的威胁。如果两股敌对的外部势力同时介入，就会引起战争升级，诱发更大规模的局部战争，例如朝鲜半岛就存在着这种隐患。朝鲜半岛停战30多年来，虽然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但南北长期分裂，重兵对峙，特别是

军事分界线两侧，是世界上军队最集中，气氛最紧张的地区之一。美国至今仍在南朝鲜保留了4万多装备精良的作战部队，谋求美、日、朝“安全保障体制”，并与南朝鲜军队每年举行针对朝鲜北方的“协作精神”的联合军事演习，从而增加了南北军事对峙的紧张气氛。近年来，苏美双方在朝鲜半岛及其附近地区的争夺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一旦朝鲜动乱，外部力量介入，冲突即可升级。因此，随着政治、军事、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国家动乱不稳，也是亚太地区未来爆发军事冲突的一个因素。

基于以上简要分析，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战略地位的提高以及苏美的重视、争夺和影响、扩张，领土、岛屿、领海特别是资源的争夺和斗争将日益加剧，亚太地区未来爆发中小规模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是客观存在的，完全有可能的。对此，我们切不可料以轻心。我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国家，拥有广阔的领土和海域。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近百年间，由于当时反动政府的腐败和无能，惨遭过十几个帝国主义国家从海上与陆上近约500余次的侵略而割地赔款，至今这些血的教训我们还记忆犹新，铭刻在每个炎黄子孙的心上。今天霸权主义、地区霸权主义以及一些狭隘自私的国家仍然还在覬覦或非法侵占着我国的一些领土和岛礁、海域。爆发局部战争与军事冲突的危险依然存在。因此，我们必须从国家兴衰、民族存亡的高度来严肃地认识这个问题。军委邓小平主席和国家领导人反复强调：“保卫祖国领土的安全”，在维护我国合法的领土海洋权益的斗争面前，我们共和国的每个公民、每个军人，都应从这一震聋发聩的教诲中，进一步领悟到自己神圣的历史责任，严切注视

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发展动态，做好精神和物质方面的必要准备，认真研究各种对策，制定灵活的作战方针和外交政策，加强海空军建设，从坚决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立场出发，随时准备应付一切突发事件，发挥我国在亚太地区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方面的应有作用，

第三节 苏美军事战略及新的变化

一、苏联的军事战略

苏联认为，军事战略是军事学术的组成部分和最高领域，它包括国家和武装力量准备与进行战争和战略性战役的理论与实践。军事战略是以国家的军事、经济实力为基础，以国家政策为依据而制定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苏联的军事战略的发展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5—1953年）。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苏军装备核武器之前，苏联在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共中央领导下，认真总结卫国战争的经验，继续执行积极防御战略。它把加强积极防御，防止敌人侵略作为指导方针。在军事、政治、组织等方面采取了相应措施，特别重视加强军队训练，扩大兵员储备，加快兵力动员速度，大力改进常规武器和技术装备，提高军队战斗力。同时，积极研制核武器，防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集团的突然袭击。苏军认为，军队是国家积极防御体系中常备不懈的一支突击力量，而陆军仍然是整个武装力量的基础，应以陆军为主，协调发展诸军兵种，全面加强武装力量。同时认为未来战争具有持久性，战略进攻

是战略行动的主要类型和实施战争的主要方法。应以陆战为主，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认为决定战争命运的是正确的政策和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同情与支持，是“后方的巩固性，军队的士气，师的数量和质量，军队的装备，军队指挥人员的组织能力”等经常起作用的因素。

第二阶段（1954—1964年）。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内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1954年苏军开始装备核武器，1957年先于美国研制成功洲际导弹，并于1960年初建立战略火箭军。在此情况下，苏联领导人逐步修改了原来的军事战略，制定并推行“火箭核战略”。他们认为，战争的命运将由战略核突击来决定，未来战争即使由常规战争开始，也必然会变成毁灭性的火箭核战争，任何局部战争都会迅速蔓延为世界大战；主张优先发展火箭核武器，争夺火箭核优势，贬低常规兵力、兵器的作用；强调战略进攻，否定战略防御，鼓吹先发制人，突然袭击，力求在战争初期达到主要的战略目标，逐步改变了以陆军为主的诸军兵种协同作战原则，确立了以火箭核突击为核心的作战思想，强调各军兵种要围绕火箭核突击协同行动。这一阶段，随着军事实力的膨胀，苏联开始从事全球扩张活动，同美国既争夺，又勾结，谋求与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世界。

第三阶段（60年代中期——80年代初）。苏联领导人对“火箭核战略”进行了修补，奉行“积极进攻战略”。他们宣称：“苏联的军事学说具有进攻性”。“苏联军事战略将是坚决的，积极的，进攻的”。（《70年代苏联军事战略论文选集》军事学院编印，第59页）。这一军事战略是苏联全球性进攻战略在军事上的体现。它的基本点是以美国为主要

对手，以欧洲为战略重点，以“缓和”、裁军为幌子，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全面加强战争准备，积极进行侵略扩张，以实现称霸世界的政治目的。

在这十多年中，苏联以空前的规模和速度同美国展开激烈的军备竞赛。到70年代初期，它已取得对美国的大体均势。随后，又进入以质量竞争为主的新阶段。它不顾经济上的困难，一直保持着稳步增加军费开支和积极增强军事力量的势头。继续改进和发展各种战略袭击兵器，不断提高其命中精度、生存能力和战备水平；大力加强常规军备，大量更新武器装备；协调发展各军兵种，改革军队组织结构，完善指挥体制，进一步提高军队的合成水平和实战能力，以增强同美国争霸的实力地位。

苏联为适应争霸世界的需要，在继续以欧洲为重点的前提下，逐步加强东线、南线及其他地区的军事部署，日益重视在两条或两条以上战线作战的准备。在西线，它优先加强欧洲地区的军事力量，集中部署了总兵力的四分之三，基本成战略展开态势，“强化华约”军事集团，同“北约”军事集团驻欧洲军队保持重兵对峙，大力加强战区核力量，同美国争夺战区核优势，并不断提高苏军和“华约”集团军队的战区作战能力。在东线近20年来它一直在中苏、中蒙边境派驻重兵，形成对中国的军事威胁。1969年苏军武装入侵中国的黑龙江省珍宝岛和新疆铁列克提地区，制造了严重的边境流血事件。70年代后期以来，除了建立远东战区指挥机构，不断更新武器装备外，还加速部署SS—20中程导弹和“逆火式”战略轰炸机，使亚洲国家面临着严重的核威胁。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的实力有明显的增长，它的活动范围已扩大

到南海及其附近海域。它还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对中国边境不断进行武装挑衅。在南线，即北非、中东和西亚地区，推行南下扩张战略。它通过提供军事、经济“援助”，派遣顾问，培植亲苏势力，攫取海空军基地的使用权，利用和制造混乱，进行渗透、颠覆，策动代理人战争，直接进行武装入侵等手段，加紧扩张活动。1978年苏联武装侵占了阿富汗，不断强化侵阿战争，并扶植亲苏政权实行统治。在第三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拉丁美洲地区，苏联的军事部署也有所加强，同美国的争夺也日愈激烈。

第四阶段（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戈尔巴乔夫执政以来，虽然目前其军事战略仍处于“积极进攻”的阶段，但是，正在进行许多重大的调整和变革，使苏联军事战略朝着更加现实和更加灵活的方向发展。

进入80年代以来，国际政治军事形势有了新的发展，科技革命进入新的阶段，苏美之间的军事战略均势一时难以打破，多种新的高技术常规武器系统已经问世或将要问世。同时，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新领导提出“新的政治思维”，实行包括军事在内的全面社会改革。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对未来战争一些“根本的军事政治问题、战略和战役问题”重新进行了思考。估计今后几年内，苏将首先着眼于解决国内问题，加快经济改革步伐，振兴经济，增强军事实力。在对外政策方面，为了改善国际处境，将采取更趋现实和灵活的策略，放长争霸的过程，重点巩固既得阵地，减少在与美争夺的热点地区动用武力的意向，适当进行战略收缩，力避与美直接对抗，坚持同美对话，企图通过裁军谈判限制美国扩军势头。为了集中力量对付美国，将推行多元化“缓和”外交，

发展对西欧和日本的“经济合作”，较前容忍东欧国家的经济改革。在上述总的背景下，戈尔巴乔夫所奉行的战略，表现出有一定的灵活性和现实性。归纳起来基本上有五个方面：未来战争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战争，这场战争需要一支什么样的武装力量；需要什么样的武器装备；未来战争的作战方法；为适应这种战争如何训练军队。经过一番“阵痛”以后，苏联新的军事战略终于诞生了。从苏联已经透露的一些零星材料来看，以及根据长期以来苏联战略思想发展的趋势来分析，这个新战略的一些基本思想大致如下：

1. 以打高技术常规战争为主，同时不放松核战争准备

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大将在1987年10月出版的《保卫社会主义与和平》的小册子中表示，“侵略者准备打什么仗，苏联也就不得不准备打什么仗”，也就是说，要作两手准备，既准备打核战争，也准备打常规战争。但是，苏联海军少将科斯捷夫教授在苏军总政治部机关刊物《武装力量共产党人》杂志上却透露，苏联原先关于未来战争必然是火箭核战争的“论点今天已不符合现实情况”。其理由一是“美国和北约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核战争的异常危险性”，二是出现了性能与小威力核武器几乎不相上下的常规武器。其实，奥加尔科夫元帅早在1985年就说过，世界上核武器储存的数量之多从军事观点看已达到“荒谬的”程度，引起了军事的质变，使人们“从根本上重新看待这种武器的作用，打破了…使用核武器进行战争的可能性的观点”。亚佐夫在上述小册子中也明确说，“核战争一旦被侵略者挑起，将具有全球的规模，不仅给交战双方而且还给整个人类造成毁灭性的后果”。可见，苏联军事战略的基本立足点已放在高技术常规

战争上。但是，亚佐夫同时指出，“常规战争可能随时变成核战争”，这就是对方因陷入“危急状况”而越过“核门槛”之时。因此，苏联也不放松核战争准备。

2. 否定核战争能取胜的观点

原来的军事战略认为，苏联能在世界核大战中获得胜利。1962年出版的《军事战略》一书明确写道，“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战争（如果被侵略者发动起来的话），将是解决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的极端手段”，“社会主义阵营…能取得胜利”。此后，这个结论始终未变。苏联军事理论界还就此进行了论证。奥加尔科夫元帅在《苏联军事百科全书》“军事战略”条目中就曾指出，在世界核大战中，“苏联…具有一定的优势，这种优势是由正义的战争目的和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所决定的。这就为它们取得胜利创造了客观条件。现在，苏联军事战略根据核时代“新的政治思维”的精神，改变了上述观点，认为核战争的结果“既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但却能使世界文明毁灭”。因此，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不可能成为理智的、负责任的政治的继续”。

3. 强调新的常规世界大战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

新的战略认为，两大联盟之间如果爆发战争，也将是世界大战。这种“以常规武器进行的世界大战，与过去相比会有根本不同的性质。”除随时可能演变为核战争外，将波及各大洲的大部分地区，包括海洋和近地空中一宇宙空间。由于使用“许多种战斗性能十分接近小威力核武器的现代常规武器，特别是精确制导武器系统”，作战情况将更加复杂，战争损失和破坏性更大，将超过二次大战的许多倍。此外，

由于核电站、化工企业、核弹药库和化学武器库会遭到破坏，这就会造成大面积的污染区、染毒区和灾区。

4. 立足持久战

苏联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体系之间的战争将是全球性的、决定性的冲突，其规模、激烈程度和破坏性都是空前的，交战双方势必将动用其所有经济、军事和精神力量，因此，战争将是持久的。但是，已制定了火箭核战争战略后，苏联的立足点则转移到速决战上了。对核大战持续时间的估计从“几天”甚至“几小时”到“短暂的”再到“比较短暂的”，或者虽然也提到战争有持久进行的可能性，但并未根本动摇其速决战的基本立足点。同时，应当看到，20余年来，其立足点渐渐向持久战方面转移的趋势也是显而易见的。苏军副总参谋长加列耶夫将军在1985年出版的《伏龙芝的军事思想与苏联现代军事理论》一书中明确指出，“在拥有雄厚潜力的两大联盟之间的战争，很难指望它具有速决性。因此，必须准备进行长期的、顽强的和激烈的武装斗争”。现在，随着基本立足点转移到常规战争，这一结论无疑更加重了自己的分量，原来立足于速决战的思想显然会转为立足于持久战。

5. 首次肯定战略防御是军事行动的基本类型

长期以来，苏联军事思想对于战争中的攻防这一对基本矛盾的认识失之偏颇，对战略防御的地位和作用的估价尤其欠妥，以致苏德战争初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苏联军事思想界长期来并未能从中吸取足够的教训。战后，苏联仍然只承认战略进攻是基本的军事行动类型，而不承认战略防御也是基本类型，认为它是“暂时的战略行动类型”。到了

60年代，这种偏颇发展到了荒唐的地步，不仅完全否定了战略防御，而且连战略进攻也给一古脑儿否定了。《军事战略》写道，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作为战略行动类型，在某些使用常规武器的局部战争中仍将有用，但“在火箭核战争条件下已经失去了原来的意义”。该书作者提出了一种“崭新的战略行动类型”，即火箭核突击，而这种突击却“很难分出是进攻性的行动还是防御性的行动”。直到70年代，这个案才翻了过来，重新肯定战略进攻是军事行动的基本类型，而战略防御被定为“军事行动类型”。这次，新的军事战略首次把防御提高到“军事行动基本类型”的地位，与进攻并列，堪称苏联军事思想的一大突破，当然，在攻防二者之中，进攻是消灭敌人的主要手段，这是不言而喻的。

新的军事战略规定，战略防御必须是“可靠的、稳定的、顽强的和积极的”要能阻止敌人进攻，使其丧失元气，“不得丧失领土”，粉碎突入的敌人集团，而在击退敌人进攻后能够实施坚决的进攻。“转入进攻则采取反攻的样式。反攻将不得不在同装备精良的敌人进行复杂而紧张的对抗情况下实施。”

6. 强调只有各军种联合作战才能获得战争胜利

苏联历来反对一两种武器制胜，如杜黑的空军制胜论、富勒的坦克制胜论和马汉的“海权论”等，主张诸军兵种整体的力量克敌制胜。然而，进入核时代后，苏联军事理论在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影响下一度走向极端，陷入形而上学的泥潭，把核武器绝对化，实质上与美国当时时髦的核武器制胜论合流。因而，当时的军事战略过分夸大战略火箭军的地位和作用，贬低其他军种的作用，甚至企图取消某些军

兵种。

60年代后期，苏联开始扭转这种偏向，重新肯定各军种联合努力才能取得战争胜利。但是，同时强调战略火箭军的主导地位和决定性作用这个大前提。70年代后期，苏联修订军事战略，首次明确未来战争可能从常规战争开始，并在一定时间内只使用常规武器。此后，上述前提开始消失。这无疑也与战略核力量的实战功能趋于萎缩而威慑功能相对上升有关，又与常规力量有了质的变化有关，同时还与苏联后来注意批判地继承过去的战争经验有关。

在苏联军事战略把立足点转移到以打高技术常规战争的情况下，苏军显然将更加强调诸军种联合努力、密切协同、克敌制胜的思想，陆海空军特别是陆军的地位和作用，将进一步上升。80年代以来，苏军继续强调战争是由同时和逐次实施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大规模战略性战役组成的复杂系统，并进一步完备战区战略性战役理论，明确大陆（大洋）战区战略性战役是战略行动的基本样式，都与强调诸军种联合努力获取战争胜利的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此外，过去长期行之有效的一系列传统的基本战略原则和概念，如在决定性方向上集中兵力兵器、节约兵力、积小胜为大胜、战略展开和战略机动等，在实行火箭核战争战略时期都被一一否定，前几年在酝酿新战略的过程中又都全部重新加以肯定，今后无疑将结合新的条件和特点进一步发展。

7. 继续否定有限核战争

60年代，在美国提出有限核战争的理论后，苏联也曾一度考虑只使用战术核武器的局部战争，即有限核战争。但

是，鉴于这种战争难以控制在不升级为全面核战争的范围内，特别是如果这种战争仅限于欧洲地区，身受其害的是包括苏联东欧国家在内的欧洲国家，而美国本土却可以置身于核灾难之外，这当然遭到了苏联的彻底否定。此外，有限核战争论还是破坏战略均势稳定的因素。1981年，勃列日涅夫答西德《明镜》周刊编辑部问时就说过：“任何‘有限的’核战争都是不可能的”。苏联《消息报》著名政治评论家鲍文不无挖苦地说道：“任何形式的‘有限’战争，只有在另一方也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的情况下，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意义。然而，恰恰是这一点无法得到证明。既然将触及苏联安全的根本利益，那么它就将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打算行事，而且未必可以使这种能力和打算服从‘核决斗’的规则”。亚佐夫在上述小册子中又一次重申，“美国把核战争限制在譬如欧洲一个战区内的打算，从军事观点看是站不住脚的”。

8. 研究防止战争问题是军事战略极其重要的任务

1986年版《苏联军事百科词典》透露，苏联把研究防止战争的问题也作为“军事战略极其重要的任务”，这在苏联尚属首次，也是苏联军事战略的新发展。

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4月苏共中央全会上说，达到同美国和北约的“军事战略平衡，是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极其重大的成果…这种均势必须全力加以保持。它可靠地遏制帝国主义的侵略胃口”。亚佐夫大将不久前重申：“现在，苏美、华约和北约之间的军事战略均势仍然是防止战争的决定性因素”。这一论点已经载入新的党纲作为今后长期的行动纲领。显然，一旦均势被打破，爆发战争的危险将大大增长。

因此，苏联今后将不遗余力地保持这种均势。苏联经济实力与美国相比虽然差距较大，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需要集中力量振兴经济，加速发展，但是，军事战略均势事关国家命运，民族生存，可以预料，苏联绝不会容忍美国对自己占有军事优势。当前，苏美之间宇宙空间军事技术的竞争是战略均势能否保持的关键所在。看来，苏联在这个领域主要采取“不对称的”对策，即我国通常所说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办法，所需代价较小，而效能却不低。据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透露，苏联只要用不到美国战略防御计划1/10的资金建立反导系统，就足以使美国战略防御系统失效。此外，苏联还可利用计划经济的有利条件集中资金用于决定性的太空技术领域。再说苏联毕竟是世界第二超级大国，且地大物博，科技潜力雄厚，美国企图通过战略防御计划“拖垮”苏联绝非易事。

戈尔巴乔夫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以来，在军事方面大力贯彻新思维，大刀阔斧地实行改革。在其新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制定了新的“国防与安全政策”（过去称“军事政策”），使苏联的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开始发生重大变化，戈在军事改革方面措施如下：

（1）制定了新的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方针

苏国防建设贯彻“适度国防”和以质量为主的方针。其基本精神就是下数量，上质量，上高技术，并且争取在同西方对等的基础上逐渐做到“只有防御而无进攻的能力”。最后这一点无疑是一个长远的目标，非短期所能实现，并且还要取决于北约的态度和行动。

新方针改变过去在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上“不惜一切代

价”、“多多益善”、重数量轻质量，忽视实际社会经济效益，损害国家经济发展的做法，摒弃外延式发展道路，走内含式发展道路，以较小的代价取得最好的效益。目前正在制定第13个五年军队建设计划和长期发展纲要。新的方针也已开始见诸于削减军费、裁军、撤军、改变军队结构、全面整顿军队、“从军备经济向裁军经济过渡”，以及加强高技术常规武器的研制生产等方面的行动。

（2）削减军费，裁减军队，改变军队结构

苏军费从1986年以来已经减少，戈尔巴乔夫今年1月18日又宣布，军费将再减少14.2%。随着中苏关系完全正常化，核和常规裁军谈判取得进展及东西方关系进一步缓和，预料苏军费还将进一步削减。

戈已宣布在1990年底以前单方面裁军50万（其中军官约10万），约占其军队总员额的12%，即从现有总兵力425.8万人减至376万人。其中欧洲地区减少24万（包括从民主德国、捷、匈三国撤出并解散的6个坦克师），亚洲地区减少20万，南部地区减少6万。减少坦克1万辆（其中5000辆将彻底销毁，5000辆改为民用）、火炮8500门、作战飞机800架和部分战术核武器（苏军从东欧撤军的时间见附表）。此外，在1987年从蒙古撤出1个摩步师及部分独立部队的基础上，将再减少驻蒙苏军75%，撤销驻蒙空军集团。此项决定已从5月15日开始执行。按照日内瓦协议苏从阿富汗撤军的承诺已如期于今年2月15日兑现。苏已表示2000年前从国外撤回一切驻军的意向，提出了解散两大军事集团的建议。

苏宣布从1987年4月起停止生产化学武器，并声明不向其他国家转让化学武器，不在其他国家储存化学武器，今年

将开始销毁库存化学武器。还声明不更新战术核武器，并决定今年停止生产制造核武器用的高浓缩铀，除1987年关闭1座生产钚的反应堆外，令明年再关闭2座这种反应堆。

随着裁军的落实，苏军的结构将逐渐向防御型过渡，戈宣布，到1991年1月1日，驻东欧苏军将是纯防御性的。主要适于进攻的军兵种和武器装备已经或即将开始削减，而防御性的军兵种及武器装备将逐步加强。随着中导条约的生效，至1988年底，苏已销毁572枚中程和中近程导弹及80枚陆基巡航导弹，占全部应销毁的导弹数的1/3，撤除导弹作战基地24处。削减50%战略核武器的协议达成后，苏军的结构将进一步发生变化。坦克兵减少6个师和1万辆坦克（约占其坦克总数的1/5）也将有不小的影响。苏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宣称，今明两年将对苏军进行“根本改编”，集团军的数量将减少，诸兵种合成师数将减少一半，摩步师、坦克师的坦克、火炮和登陆渡河器材将减少30—35%，而反坦克、防空武器将增加50%至1倍。坦克师的编制将由3个坦克团和1个摩步团改为各2个团，坦克减少20%。摩步师编制也将变化，坦克减少40%。有些摩步师将改编为机枪炮兵师，担任筑垒地域的守备任务。空降突击部队也将减少。海军的造舰计划已放慢或改变，预料海军的规模将缩小，近海作战和反潜作战能力等将加强。空军的进攻性机种，如歼击轰炸机将压缩，防御性机种，如歼击机将增加。防空军显然将侧重从质量上加强。

（3）开始“从军备经济向裁军经济”过渡，同时加强高技术常规武器的研制生产

近年来，苏国防工业已开始转产民品的工作。戈在1月

18日宣布，军工生产将减少19.5%。今年将有2/3的军工企业进行军转民的试验。苏中型机器制造部（生产核武器）已有部分企业开始生产民品，今年将向市场提供2亿多卢布消费品，1990年民品产值将增加至3亿卢布。国防工业部（生产常规武器和战役战术导弹）的产值中民品已占一半左右，今后几年还将有较大增长。从1988年起至1995年，该部为食品工业生产的机械设备将增加2.9倍。

同时，为了保持军事战略均势，苏一方面继续提高战略核武器和现有常规武器的质量，另一方面则侧重研制精确制导、激光、隐形等高新技术常规武器，加强太空武器研究，以及使某些战略武器弹头常规化。此外，还把“完善军队指挥和武器控制用的技术器材”（即相当于西方的C³I系统）作为“军事技术政策的主要任务”“使整个指挥系统转到新的自动化的技术基础上”，其中又以完善战略核力量的指挥系统（包括预警、通信和制导）及监督美方执行军控协议情况用的器材作为重点。

在武器装备研制方面，改变过去“进化”式的途径，即通过逐步提高战斗性能的方法达到武器更新换代的目的，采取“质的飞跃”式的途径，即在基础研究、探索性研究和应用研究基础上研制具有崭新战斗性能的武器。

（4）更新军队领导班子，精简领导机构

戈尔巴乔夫自任总书记以来，把对改革的态度作为选拔干部的主要标准，同时，贯彻各级领导班子的年轻化，更新军队领导班子。四年来，苏军高级领导人几乎都已更换：国防部长、3名第一副部长和总政治部主任均已易人，11名国防部副部长已更换8名；4名战区总司令、16名军区司令和

4名军队集群司令（总司令）及1大舰队司令也几乎都更替了。新任命的军区和海军舰队以上的领导人都比较年轻，新任总参谋长莫伊谢耶夫年仅50岁。在更新高级领导人的同时，国防部、各总部、军种、军区和海军舰队等领导机关也进行了较大的精简。据海军总司令称，海军领导机关已精简人员20%。军区将进行裁并，数量将减少。预料1969年6月建立的中亚军区将重新与土库斯坦军区合并，乌拉尔军区将与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合并，有些较小的军区可能撤消。

（5）全面整顿军队，实行“军队生活民主化”

勃列日涅夫“停滞时期”，苏军纪律松弛，作风涣散，事故层出不穷，违法犯罪行为日增；官僚主义，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腐败风气日盛；军队训练简单化，走过场，要花架子，违背实战要求。戈上台后，着力整顿军队，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党组织的作用，实行“公开性”和“军队生活民主化”，强调调动人的积极性，加强军队管理和法纪，对军队内部各项工作实行全面改革。其中干部工作是中心的一环。为杜绝任人唯亲等不正之风，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党团员群众监督作用，“严格贯彻社会公正原则”，除建立常设的“干部考察委员会”外，还明文规定，凡军官（含非党团员）晋升，其政治鉴定必须由党（团）支部大会讨论通过，改变过去只由支部委员会少数人审查通过的做法。建立“军官会议”组织和“军人大会”制度，发挥广大官兵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作用，以及维护官兵自身的合法权益，以扩大民主和减少一长制的某些弊端。在官兵、上下级关系方面，强调除命令不得批评外，可以批评军官、上级的工作、作风和个人品质。禁止侮辱人格。

根据对军队实行“根本改革”和民主化的精神，苏军正在修订共同条令和其他条例规章制度。据称，共同条令即移交最高苏维埃审批。兵役法已经修订，凡具有高等教育程度的役龄青年服役期一律改为1年，在学的大专生可以缓征服役。军官服役条例也在修订中，可能取消某些军衔，如苏联大元帅、苏联元帅等军衔；大将的服役年龄可能要强以限制。

改革也触及党政工作本身。政治机关的工作现在要在各级党的代表会议上进行评论，这在苏军历史上是首创。所有主官和政治副职都必须向基础党组织负责。

在军队训练方面，强调按实战需要进行训练，要求各级司令部的军官深入基层，检查帮助训练。全军各军兵种和勤务部门都有针对性地制定了改革措施，并已不同程度地付诸行动。

（6）加强国防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戈上台以后，一反过去苏共领导在国防决策方面忽视思想库的倾向，适应世界各国领导人的思想由思想库形成这一大趋势，开始打破国防“保密”禁区，在依靠军事思想库的同时面向科学界（包括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界），使国防决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和优化，特别是在裁军（包括核和常规力量）、太空武器、保持军事战略均势和战略稳定，以及国际冲突和危机局势处理等问题方面更是如此。同时，注意进一步调动专家学者的积极性，为国家献计献策。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及其所长阿尔巴夫院士（苏共中央委员，苏共中央国际政策委员会成员）、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及其所长普里马科夫院士（候补中委、国际政

策委员会成员)、欧洲研究所及其所长茹尔金通讯院士和宇宙研究所及其前所长萨格杰耶夫院士等,都是戈尔巴乔夫的智囊。每次苏美首脑会晤,上述几位学者以及其他学者都是工作班子的重要成员。戈的许多裁军和国际安全倡议,都是听取了科学界的建议或直接由他们策划而出台的,如这次单方面裁军50万,这些学者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戈提出的2000年前分阶段销毁核武器的倡议和苏对付美星球大战计划的对策,就是“苏联学者保卫和平反对核威胁委员会”的各专门工作组(内有军队专家)研究的成果。

(7) 实行军事公开性,加强国内人民监督和国际信任

苏首次打破数十年的“军事禁区”,实行军事公开性,开始公布苏军一些内部情况。现已公布苏军总员额、陆、海军兵力及驻欧洲地区的常规兵力,5月将公布亚洲地区的兵力。今年将公布真实国防预算。国防部邀请外国官员和记者参观绝密的军事基地、设施和最新式武器装备,如洲际导弹发射井、图——160(“海盜旗”)战略轰炸机、化学武器基地等。去年实现了多年未有的美国防部长卡卢奇访苏和苏军总参谋长访美的计划;同美国首次签订了包括两国军队和军种领导人,海军舰队和军事史学家互访等内容的两年军事交流协议。苏决心进一步扩大军事公开性和民主化,把国防一些问题交议会审议决定,扩大议会在国防问题方面的权力,建立防止和减少决策失误的机制。苏共中央已经决定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内成立国防问题专门委员会,负责审议军事预算等问题。新修订的宪法已规定,今后对外采取军事行动事先须经议会审议批准。准备制订国防法,完善法制。这一切一方面加强了国内人民参与国防的意识和监督作用,另一

方面也促进了国际间的互相了解，减少猜疑，加强军事上的信任，推动国际缓和。

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尽管苏联为军事战略进行了重大的调整，其军事改革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其“积极进攻”战略和霸权主义已渗透到国家的各个领域，并建立了一支称雄世界的庞大的武装力量，巨大的历史惯性，使其战略仍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质变。然尔，这些可喜的变化毕竟是令人欣慰的，将来的发展如何我们还将拭目以待。

二、美国的军事战略

美国认为，军事战略是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的方式，运用一国的武装力量，确保国家政策目标实现的科学和艺术，是“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国家战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心理战的运用和发展。军事战略旨在使用军事手段达成国家战略的目标。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美国军事战略的发展变化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遏制战略（1945——1952年）

“遏制战略”是杜鲁门政府实行的，旨在对苏联、中国进行包围，阻止其扩大革命影响的战略。其主要内容是：反苏反共、准备对苏战争，扑灭日益兴的各国人民革命，加紧控制资本主义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了资本主义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它的野心很大，杜鲁门公然宣称美国“担负着领导世界的经常责任”。与此同时，苏联的革命影响空前增大，东欧相继出现了若干人民民主国家。美国为称霸世界，1947年3月在给希腊、土耳其军事援助的声明中，首

次公布了以遏制苏联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战略。遏制战略的主要拟制者美国国务院政策委员会主席凯南说，对苏联要“采取坚决的包围政策，在苏联可能危害西方国家利益的任何地方，坚决与之对抗。”为了推行这一战略，美国于1948年以经济援助为名，在西欧十七个国家推行“马歇尔计划”，1949年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军事组织，同年秘密制定了在未来战争中对苏联实施原子轰炸的作战计划。在亚洲，它公开支持中国国民党政府打内战。当中国人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之后，又把中国当成其“遏制战略”的对象之一。朝鲜战争爆发之后，它又将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宣称将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这时美国对未来战争的设想基本上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样式的常规战争，而把“原子垄断”和“原子优势”只作为推行“遏制战略”的后盾。

第二阶段：大规模报复战略（1953—1960年）

“大规模报复战略”是艾森豪威尔政府实行的，旨在依仗核优势，准备对苏联、中国进行核战争的战略。1953年，美国侵朝战争失败以后，认为使用常规武器打不赢与中苏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战争，必须依赖于优势的核武器。1954年1月，美国政府正式提出美国的军事战略是：用美国选择的武器，在美国选择的地方，打一场美国选择的战争。主要做法是：将过去三军均衡发展的方针改为突出发展空军，特别是战略空军和核武器；对三军部队按打核战争的要求进行改编，扩充核力量、削减常规部队，加紧拼凑军事集团。它玩弄所谓“战争边缘政策”，企图阻止社会主义国家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援。

第三阶段：灵活反应战略（1961—1968年）

“灵活反应战略”是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实行的，旨在做好打各种类型战争的准备，视不同的作战对象，灵活使用军事力量的战略。50年代末期，美苏核僵局逐渐形成，美国企图独霸世界的局面让位于美苏争霸的局面。亚、非、拉人民革命武装斗争方兴未艾。美国认识到：“大规模报复战略”在未来的战争中，既不能毁灭对方，也不能保存自己，对蓬勃兴起的人民革命运动，也无能为力，于是提出了“灵活反应战略”。这一战略的要点是：建立一支能够进行核大战、有限战争和特种战争的“多样化军事力量”，使美国拥有选择战争类型的余地；提出打“两个半战争”的备战指标，既在欧洲准备同苏联、在亚洲准备同中国各打一场大规模的常规战争，同时在其它地区打一场局部战争；采取“相互确保摧毁”的核战略，即允许美苏双方各保有一支可靠的核反击力量，以此作为互换条件，使双方均不打对方城市，其本意在于确保美国本土免遭攻击。肯尼迪上台不久，在“灵活反应战略”指导下发动了侵越战争，约翰逊上台后，又将“逐步升级战略”作为它的补充，把侵越战争升级为一场相当规模的常规战争。

第四阶段：现实威慑战略（1969—1980年）

“现实威慑战略”是尼克松、福特和卡特三届政府实行的，旨在美苏争霸态势不利于己的情况下，通过力量的调整以期逐步扭转颓势的一种军事战略。侵越战争的旷日持久，加剧了美国的全国危机，苏联乘机加速发展军事实力，使美苏军事力量的对比，由美占优势变为大体均势。这时，美苏全球争夺愈演愈烈，美国与盟国之间控制与反控制斗争也在

不断加剧。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尼克松政府深感继续推行“灵活反应战略”力不从心，于是提出了“现实威慑战略”。其要点是：强调建立“充足”的战略核力量，以摧毁对方的核反击力量。1980年卡特政府宣布实行新的核战略——“抵消战略”，将优先打击的目标由城市改为军事目标，进一步明确以苏联为主要作战对象，将过去打“两个半战争”，的备战指标降低为“一个半战争”，既在欧洲同苏联打一场大规模常规战争的同时，在其它地区（主要指中东）打一场小战；调整全球部署，收缩在亚洲的兵力，确保战略重点（欧洲），更加强调与盟国的“共同防御”。此外，“现实威慑战略”将未来战争区分为战略核战争、战区核战争、战区常规战争和小于战区规模的局部战争四种类型。

第五阶段：新“灵活反应”军事战略（1981—1988年）

由于70年代末以来美国对苏缓和政策和“现实威慑”战略破产，里根政府上台后对美国军事战略进行了战后第五次大调整。1981年，里根是在美苏争霸世界的态势处于更加不利于已的情况下上台的。他分析了形势，审查了美国的战略，认为美国过去对苏软弱导致了美国的困难处境。为扭转这种局面，里根政府便以“重振军备，抗衡苏联”为口号，提出了以重建美国军事优势为目标的军事战略，并逐步形成了带有自己印记的一整套新的军事战略方针。里根再度当选总统后，正式将新的战略方针定名为“发展了的灵活反应战略”，即新“灵活反应”军事战略。新“灵活反应”军事战略的主要特点是：以攻防兼备的战略力量作为争夺世界霸权的“盾”，把常规力量作为实践的“剑”，作好打赢一切战争的实战准备，提高威慑的可靠性。

1. 全面增强军事实力，着手建设攻防兼备的战略力量体系，重获对苏军优势

里根政府在第二任期内决心继续执行前四年重整军备的方针，利用苏联当前的内外困难，发挥美国雄厚的经济技术优势，力争在九十年代初重建对苏相对的军事优势。

为实现上述目标，里根政府将采取的重大措施是：第一，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1985年度军费开支高达2538亿美元，1986年度进一步增至2857亿美元，年实际增长率为8.4%，打破了和平时期军费开支增长的最高纪录。预计1986年——1990年的军费总额将达17,862亿美元，平均年增长率在6%以上。估计到1990年，年度军费将突破4,000亿美元。第二，全面更新和发展战略进攻武器系统。在九十年代中期前，战略进攻武器仍将是美核力量建设的重点。今后五年将拨款2,200亿美元采购MX洲际导弹、“三叉戟”导弹潜艇和B-1B战略轰炸机等三种战略武器，加快“三叉戟”Ⅱ型导弹、“侏儒”小型洲际导弹、隐形轰炸机等战略武器的研制，估计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将陆续装备部队。第三，大力落实“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该计划是美国新空间战略的基础，与苏争夺未来军事优势的一张王牌。随着它的逐步落实，美国军事战略将发生极深刻的变化。美国今后五年将拨款260亿美元用于战略防御武器系统的研究和发展。1985年9月23日已正式成立“联合航天司令部”，统一管理和指挥三军空间军事活动。“战略防御计划”预计到本世纪末或下世纪初才有可能进行实战部署。届时，将初步建成一个攻防兼备的战略力量体系。第四，继续大力建设一支“既能灵活反击又能持久作战”的常

规力量。计划到1989年将现役总兵力增至228万人，实增14万余人。1986财年为常规部队拨款1,321亿美元，比本年度增加9%，增长率超过战略部队。同时，以比现役部队更快的速度加强后备役部队的建设。第五，突出新技术和新装备的研究发展，加强新兴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据美军方宣称，在20项关键性军事技术中，有14项美国领先，有5项美苏相等，有1项苏联领先。为了保持和扩大对苏技术优势，里根政府决心逐年增加新武器研制费，1986财年即增加20%，达340亿美元，其增长率居首位。美国目前已投产和正在研制的新式核武器运载工具有11种，核弹头有22种，每年平均有10种新式常规武器投产或装备部队。

2. 加强实战准备，增强灵活反映能力和威慑效果，避免战争升级为常规大战和核大战

里根政府认为，美国不可单纯依赖威慑，而应通过积极的实战准备，着重提高灵活反应能力，以便一旦威慑失灵时能对常规战争和核战争及时作出反应，使对方看到美国既有决心又有能力打赢一切战争，从而增强威慑效果。

里根政府认为，在美苏核均势和战略僵持的条件下，80年代甚至本世纪内美苏间爆发核战争的可能性很小，但面对苏联一直在扎实进行核战争准备这个现实，美国的核战略必须着眼于实战，着眼于打赢各种核战争。为此，里根政府在三个方面修正了核战略思想，一是破除了核战争“根本不可想象”，必然是全面核大战和速决战的旧观点，确立了核战争可以并能打赢，可以控制在有限范围内和不可速胜的思想，二是否定了侧重“打击城市”、依赖核威慑的做法，采取了“打击军事目标”的方针，以减少人员伤亡，控制战争升

级，削弱苏联持久作战能力，提高美国核力量的威慑效果和打赢核战争的能力；一是克服了对民防重视不够的倾向，制定了为期7年耗资42亿美元的民防计划，要求到80年代末能在接到警报以后3—5天内从400个城市中疏散三分之二的人口，争取美国在遭到核袭击后能有80%的人口生存下来。

在常规战略思想方面，里根政府也作了较大调整。尽管八十年代末甚至本世纪内爆发常规大战的可能性也不大，但是由于对美国最为现实的威胁来自苏联的强大的常规力量，因此必须重点加强打常规战争的实战准备，以常规力量战胜对方的常规挑战。里根政府常规战略思想的主要变化表现在：一是摒弃准备打“两个半战争”或“一个半战争”的机械的消极的作战方针，采取在几个战区和多条战线上对苏联的挑战作出灵活反应，陷苏于多线作战困境的作战方针；二是改变苏在那里攻、美就在那里顶的消极防御思想，采取在顶住苏联进攻的同时对苏薄弱环节和要害地区实施积极进攻的方针；三是修正了常规战争“要么30—60天内就见分晓，要么迅速升级为核大战”的估计，主张着眼于准备与苏打一场长期常规战争。

3. 积极作好打中大规模战争，特别是大规模战争的准备，以应付第三世界的突发事件

里根政府认为，在美苏双方都力求避免直接军事对抗的情况下，第三世界的恐怖“活动”、“颠覆叛乱”、地区冲突等“低强度战争”构成对美国利益最现实的威胁，因此，美国在准备核大战和常规大战的同时，尤要认真作好打中大规模战争，特别是小规模战争的准备。主要措施表现在：一是对低强度战争采取强硬方针，不论是否有苏联直接插手，

“只要美国及其盟国的利益受到威胁，非动武不能解决时，就应毫不迟疑地动用军事力量”，“不打则已，打则必胜”。二是加强轻型部队和特种部队的建设。今后五年内陆军拟组建5个超轻型步兵师，成立“联合特种作战局”，重建特种作战大队，陆、海军还将各增加一支特种部队，以提高对第三世界突发事件和低强度战争的快速反应和紧急干预能力。三是继续加强战略机动能力，计划到80年代末使战略空运能力比1981年提高75%，战略海运能力提高110%。

1988年11月8日在美国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共和党候选人乔治·布什当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41位总统。根据1988年8月公布的共和党施政纲领和总统候选人多次演讲来看，布什在防务上将继续推行里根政府的基本政策，但面临国际形势转向缓和及美国经济、政治地位相对下降的状况，布什政府正在酝酿对现有军事政策的调整。根据掌握的材料，大致可以看出布什走马上任后美国军事政策的基本趋向。

（1）推行以实力求缓和对苏的政策

布什的新政府将继续坚持在实力基础上的对苏绥和 policy，继续上届政府所进行的军备控制谈判。美国有可能与苏联对战略武器、核禁试乃至欧洲常规武器进行范围更为广泛的谈判并取得一定进展。但美苏之间的对话增加，不会使美国改变苏联是美国的主要对手的出发点。当前美国担心苏联改革的成功将导致苏联尽快获得新的强大实力的机会。因此新一届政府将继续强调现实主义的强硬立场，坚持以实力求缓和的方针。中导条约签订后，布什明确表示反对新孤立主义，提出要防止美苏关系趋向缓和可能导致西方在思想上解除武装，防止美国撤回“美洲堡垒”的思潮再次抬头。他主

张通过增强综合国力，在长期竞争中战胜苏联。因此布什政府将奉行以对苏实施政治、经济、军事等全方位“遏制”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战略。在国防系统，将进一步贯彻“竞争战略”，以美国之长，击苏联之短，使美国国防各领域的各层次都有比苏联更强的竞争力。具体地说，在战略进攻力量方面，将加紧完善和更新战略核武器，继续部署MX导弹、B-1B战略轰炸机，准备部署“侏儒”式洲际导弹、“三叉戟”Ⅱ型潜射导弹和先进的巡航导弹，保持战略核武器在质量上的优势，强化核威慑力量。在战略防御力量方面，将继续推行里根政府的“战略防御计划”。布什曾明确表示赞同研究和在太空试验战略防御系统，并争取在90年代后期实施第一期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在常规力量方面，将进一步实行“常规防御计划”，侧重以高技术兵器保持质量优势，从而强化常规威慑力量。总之，加强军事实力，提高威慑效果，从实力地位出发，迫使苏联在军控谈判中作出更大让步，将是布什政府对苏政策的核心。

（2）主张军事力量对比向下均衡，在高技术领域竞争

美苏核武库的超饱和以及高技术的崛起，使核武器数量上的增加失去战略意义，这就为大量削减核武器创造了条件。布什曾利用中导协议签订之机声称，他将致力于军备控制，象里根那样力求削减50%的战略武器，并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实现常规力量的低水平均衡。强调实行美苏军力对比向下均衡，可以减少美苏冲突的危险，利于战略局势的稳定，也有利于减轻美国因巨额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带来的经济困难。为了实现财政预算平衡，布什就得削减政府开支，首先是军费开支。在军费削减的情况下，将适当压缩军队规模和

武器装备采购数量，把军费主要用于国防科研和保持部队战备水平。

鉴于保持高科技领域的优势是夺取未来对苏战略优势的关键环节，布什比里根更加重视对军事科技的研究和开发。他多次宣称，哪怕军费被减，也要增加高科技研制经费。重点发展航天、精确制导、弹道导弹防御、超导和微电子技术，既用于军事，也带动民用工业，保持竞争优势。

（3）战备重点将进一步移向常规战争，特别是加强对付低强度战争的准备

本世纪内美苏双方还难以打破业已形成的核僵持局面，双方不仅爆发晴天霹雳式的核突袭可能性不大，而且常规战争升级为核战争的可能性也很小，常规力量将成为对付常规冲突的主要手段。有鉴于此，布什政府将把常规战争的准备和常规军事力量的建设置于突出地位。布什明确指出：“我们保持和不断加强我们制止侵略的常规威慑力量是绝对必要的”。

今后若干年内，欧洲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不会发生大的变化，欧洲形势将相对稳定。美苏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主要将在第三世界亚非拉地区进行。本世纪内这些地区的军事形势将动荡不稳，民族独立战争、军事冲突、恐怖活动和政治动乱将不可避免。面对这种情况，布什政府将把第三世界地区作为今后与苏联争夺的“主要战场”，将侧重加强对付低强度战争的准备，提高对第三世界地区的紧急干预能力，通过提供军援，出售武器，派遣军事顾问，必要时直接出兵等手段，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

（4）在全球军事部署上，继续巩固欧亚两线抗苏前沿阵地，加强对海上重要通道的控制

鉴于欧洲的经济和战略地位，90年代欧洲仍然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尽管近些年来，亚太地区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经济、政治地位上升，但今后一个短时期内，亚太地区不可能成为世界经济中心。90年代，美苏争夺重点还不会移到亚太地区。布什明确表示，“对西欧防务所承担的义务是美国防御战略的核心。”布什政府将进一步巩固欧洲地区的防线，美国驻欧兵力仍将占其海外驻军总兵力的首位，并将着重提高驻欧美军部队武器装备的质量。90年代美国研制的先进武器装备将主要装备驻欧部队。

亚太地区是美国牵制苏联，策应欧洲的重要方向。中东、东南亚、东南亚地区存在不稳定因素，局势动荡不安。因此布什政府将维持亚太地区的军事实力和部署，充分利用美国在该地区盟友多、基地网健全、海空军装备精良的有利条件，把围堵苏联的防线推进到苏近海地区。

在未来美苏争夺斗争中，海上通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只有控制海洋，夺取制海权，才能维护海上通道，“投送军事力量”，对海外地区突发事件作出迅速反应。因此，布什政府将进一步加强海上重要航道咽喉点的控制，加紧与苏联争夺制海权。

(5) 进一步强调加强盟国之间的团结，发挥盟国的作用，适当调整对盟国承担的防务义务

中导协议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欧洲发生冲突的危险，但使盟国之间的团结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冲击，即以法国为首的欧洲独立防务趋势的加强和以西德为主的对美欧防务脱钩的担惊。这都会助长西欧对美国的不信任情绪和中立化倾向。面对这种情况，布什政府将继续强调维护北约联盟的团结，

继续保持前沿部署，为盟国提供军事力量与经费，并保持与盟国经常进行协商的同时继续发挥美国对联盟的领导作用和对西欧、日本的影响力。但保持盟国团结和防务上的协作并不排除布什政府今后可能会适当调整其对联盟承担的防务义务，比如适当减少在盟国的驻军等。对布什决策有影响的前国务卿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智囊人物组成的“长期总体战略委员会”在《有区别地进行威慑》报告中指出，“不能只看到欧洲的对抗而忽视其他地区的斗争。为对付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不同威胁，美国有必要重新考虑是否应在欧洲保持如此庞大的部队”。布什政府可能会考虑这一主张，强调欧洲盟国和日本在防务领域承担更多的义务，尤其在地区冲突和危机中期望得到盟国更多的支持。布什政府可能通过适当调整或削减美国海外驻军的途径，促使其盟国承担更多的防务义务。

从上述情况来看，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军事战略因受国内外形势、世界力量对比、国内财团势力的争斗、总统的更迭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等影响，作过多次调整，但是其战略的基本实质仍是进攻战略，美国争霸世界的战略目标和基本内容一直没有改变。在作战对象上，以苏联为对手；在争夺地区上，以欧洲为战略重点；在战略部署上，坚持前沿防御与驻本土战略预备队相结合；在核战略上，坚持以洲际导弹、导弹核潜艇和战略轰炸机“三位一体”的核威慑战略；在武装力量体制上“坚持常规部队、战区核部队和战略核部队三结合，现役部队与后备役部队相结合”的方针；在武器发展上，注重以质取胜，保持技术优势；在战争样式上，由于“核僵局”的情况下，越来越重视打各种规模的常规战争。

在各军种战略运用上，强调海、空制胜，地面作战主要靠盟国的“总体力量”作战。

美国的军事战略是积极进攻战略，是为其谋求世界霸权的全球战略服务的，虽然美国的经济力量雄厚，科学技术发达，武器装备先进，军事力量强大。但是它在战略上存在着出师不义，人民反对，野心很大，战线太长，力不从心，远隔重洋作战，支援困难等一系列弱点。

第五章 现代战争

第一节 什么是现代战争

现代战争是指现代时期中，应用当代先进军事技术与先进军事学术进行的战争。它既可能是核战争，也可能是常规战争，既可能是包括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或北约与华约两个军事集团的大规模战争，也可能是大国侵略中、小国家的战争，甚至只是涉及一些中小国家的局部战争。

列宁讲：“现代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4页）。列宁的论述指明了现代战争确切的时代观念，说明了战争的性质主要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掠夺战争，也指明了这个时代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时期，生产力已有相当提高，所运用的武器装备和历史上运用的武器装备相比，已发生了质的变化。我们现在虽仍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但与二十世纪初期列宁所指出的概念有了较大的变化和发展，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爆发的现代战争，将具有更多的新的内涵。

现代战争有着确切的政治特征。它主要是指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特别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苏美两霸争夺的僵持局面继续发展，制约战争的因素向多极化发展的政治时期所进行的战争。这一时期中，国际政治战略格局和经济关系出现了新的情况，科学技术发生了飞跃巨变，各种新学术以前所

运行的速度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二是现代条件的变化，使现代战争出现了一系列不同于以往时代的崭新特征。

现代时期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开始了，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进入5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各种政治力量经历了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美帝国主义霸权地位日益衰落，苏联走上了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与此同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绝大多数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经过长期艰巨的斗争已相继独立，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日益强大，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进入80年代以来，世界形势又有了新的变化，苏美争夺态势由七十年代中后期的苏攻美守转化为互有攻守的战略僵持局面。两个超级大国为了谋求世界霸权，在全球展开了激烈争夺。它们大搞军备竞赛，争夺军事优势，抢占战略要地，掠夺战略资源，保持和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同时又互挖对方的墙脚。它们既激烈争夺，紧张对峙，同时又谋求暂时的、一定限度的妥协，避免迎头相撞。由于他们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它们在世界各个领域展开激烈的争夺，导致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威胁着世界和平和各国安全，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是，由于制约战争的因素发展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发展，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正在日益减少。

研究战争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时期，孤立地进行研究。实施战争必然是两个方面，从掠夺战争来讲，主要是掠夺者和被掠夺者。随着时代的发展，受压者的独立、民主和反抗意识不断提高，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受到世界人民的谴责，殖民主义、霸权主义横行世界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5世纪时，西班牙贵族，冒险家费尔南多·科尔蒂斯率领一支小军队，就很容易地登上了美洲大陆。土著人对他们所用的枪械认为是神物而惊慌失措。在以后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西班牙统治了除巴西外的整个南美大陆。在统治期间，平均每年将黄金5500公斤，白银246000公斤掠入西班牙国中。葡萄牙主要对非洲进行掠夺，从15世纪末到十六世纪的百余年间，掠走黄金276000公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靠一支不太大的舰队，在海外掠得三千多万平方公里殖民地。二次世界大战时，德、意、日法西斯推行领土扩张，公开宣称凡是认为需要的生存空间他们都要占领，整个大战波及61个国家，除德意日外，50多个国家受到侵犯。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反侵略、反控制的斗争迅速发展，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侵朝战争集结了16个国家的军队，但不得不被迫签字停战。后来美国入侵越南、苏联入侵阿富汗、越南入侵柬埔寨都一一败北。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爆发的现代战争，具有鲜明的侵略与反侵略、进步与反动、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性质。

现代战争有着确切的时代特征。

现代战争不但表现于政治方面，而且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和武器装备对科技成果的应用方面，也就是说，现代战争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进行的战争。战争的发展总是同社会生产力，包括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紧密联系在一起。尽管战争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最终还是受社会经济、政治以至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先进的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军事，极大地促进了人与武器结合方式的改变，催促着战争形式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二次

世界大战以来，这期间社会化的大生产和大经济使现代活动越来越复杂多变，随着现代交通工具和通讯联络手段的迅速发展，地球空间概念空前地缩小了。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精神因素与军事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核武器的大量制造和储存，给战争与和平提出了新的挑战，随着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浪潮蓬勃兴起，以微电子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群正在日益广泛地进入军事领域和应用于战场。以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老三论和耗散结构论、突变论、协同论等新三论以及未来学、行为学、现代经济学等一批横向科学和综合科学出现，和随之产生的现代决策科学，再加上电子计算机这个现代化的逻辑手段，使现代战争诸因素发生着历史性的变化。外军争相将社会科学最新成果引入军事领域，如对老三论的应用方面，苏军强调要运用系统方法对军事科学进行总体研究。把军事看作一个大系统，把相关的、由同一目的联结在一起的各种复杂的军事问题作为一个整体去研究。苏军还认为军事科学是个动态系统，要应用控制论和信息论的科学，高度重视影响军事科学发展的各种因素的量变，及时判断量变引起质变的前景。日军军事科学界在学术研究中除广泛应用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外还将管理学、数学模型法、统计分析法，电子计算机模拟法等引入军事领域，军事科学的发展具有鲜明的社会特征。

现代战争是应用当代先进军事技术进行的战争。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航天、电子、新材料、生物工程技术等标志的高技术群广泛运用于军事，不仅使现有的武器系统得到巨大改进，使其射程远好几倍，威力大几十倍，精度高上百倍，而且还可能有更新的，超常规的航天战略武器、定向能

武器、动能武器、基因武器、智能武器、隐形武器等系统的出现和进入实战使用。现代战争表现为是多种高技术武器系统在战场上综合运用的“超常规战争”。这些高技术武器系统所创造的战场效益将不亚于核武器的效应。这种大量和普遍使用高技术武器系统所进行的高技术战争，它以技术交战为主要内容，以打技术差为主要手段，能在较短的时间和有限的范围达到预期的战略目的。近期几场局部战争中，特别是1982年发生的英阿马岛战争，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时袭击贝卡谷地叙利亚导弹基地的军事行动，都显示了这种以技术交战为主要内容，以打技术差为主要手段的战争形式。1986年美国空袭利比亚中更为广泛地运用当代先进军事技术，更使人们加深了对这种作战形式的印象。

现代战争是应用当代先进军事学术进行的战争。战后40余年来，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动，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外交等一系列因素的作用，世界军事学术发生了巨大变化。进入80年代以来，世界各主要国家军事科学的研究进入一个大转折、大繁荣、大发展的时期。目前军事科学的研究水平，已经发展到强调预测和整体化、精确化、动态化的系统阶段。研究的内容越来越广泛，已经超出纯军事的范畴，其触角已同时伸向国家政治、经济、外交、科技、自然、地理等各个领域，正向着宏观的、高层次的、多学科综合的研究方向发展。

在战略研究方面，世界上各主要国家，特别是苏联和美国，一直重视从宏观上揭示现代战争的客观规律及其对国防建设的影响。在作战理论方面改变了以往单纯围绕武器装备开展学术研究的方法，采取了首先制定出新的作战理论，然

后拟制出武器装备计划和改革部队体制、编制和训练。美军近几年提出“空地一体作战”、“低强度战争”、“高技术战争”以及“战役学”等一系列新的理论和原则，同时又根据这些理论提出的要求开始实行“86重型师”、“轻型步兵师”、“高度技术化轻型师”等新编制。其1982年动用舰船15艘、飞机100余架，地面部队7000余人跨海入侵格林纳达的立体突破，1986年3月24日、25日和4月15日动用航空母舰3艘，其它舰船30余艘、飞机240余架对利比亚的空袭，反映出美军对其新作战理论思想的尝试和应用。苏联“大纵深立体战役”、“战区战略性战役”、“战役机动集群”等作战理论的研究也有很大发展，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时采取空降部队与地面部队协同攻击，高速推进的作战行动，已初步体现出苏军“大纵深立体战役”的思想。

现代战争是核威慑条件下进行的战争。在现时代，作战条件不断发生着变化。进入80年代以来，由于苏美两国战略核武器威慑能力的提高和核均势格局的形成，一方面核大国消灭对方的能力似乎在不断提高，另一方面主要对手对其实施毁灭性报复打击的能力也在大幅度增强，致使这两个目前世界上唯独有实力进行核战争的超级军事强国谁也不敢轻易发动核大战。而现代科学技术又使一部分崭新的，毁伤力空前的超常规武器系统出现和运用，进一步遏制了核武器的使用，从而增大了打常规战争的可能性。苏美军都认为，目前双方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数量和质量几乎已达到极限，在这种“核均势”下，大量使用核武器可能给双方以至全世界造成毁灭性后果，但任何一方又都不可能一举摧毁对方所有的核武库。对方使用“残存的、数量有限的”核弹，亦可进行

致命的回击，尤其是现代常规武器已在射程、精度和威力接近甚至超过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效果的情况下，使用超常规武器不仅是对付常规战争的手段，而且是提高“核门槛”的有效办法。它的“保险系数”更大，既能取得核武器的效果又不担核战争的风险。因此，近年来苏美军都相继调整了军事战略的基点，由原先立足于核大战转变为打核威慑条件下的常规战争。他们一手拿着核武器威胁对方，使其望而生畏，另一手却以每十年更新3—4代的速度发展常规武器，立足在实战中打一场常规战争。不难预料，随着世界拥有核武器国家的增多，尤其是苏美双方战略防御手段的不断完善和发展，对战略核武器的依赖性会愈来愈小，而对常规武器的依赖性将愈来愈大，所以，我们面临的现代战争主要的是即非核大战，亦非以往那样的常规战争，而是核威慑条件下的超常规战争。这种常规战争与核武器出现以前的常规战争相比，有着显著的不同。第一，它是核威慑条件下进行的，随时处于敌人使用核武器的威胁之下，必要时也将使用核武器。第二，是在战争中广泛地使用各种崭新的武器系统采取最新方式方法解决军队的指挥、火力杀伤、协同动作和各种保障问题。

第二节 现代战争的特点

一、战场范围扩大，外层空间也将成为一个独立的战场

以往的战争，主要的战役大多数情况下是在地面上进行的，空海军的首要任务是在战术上直接、间接地支援地面作战。而且战争总是从交战双方的边境地区首先打起，尔后逐

步向国土纵深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战略后方处于相对安全的地位，可以从事军工生产，组建战略预备队以支援前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轰炸机是唯一能威胁后方安全的兵器。但由于航程短，普通炸弹威力小，对后方造成的破坏有限，所以前方和后方有明显的区界。在现代战争中，尤其是大国之间或两大军事集团间的战争，使用的武器射（航）程远、速度快、威力大，军队实施地面、空中、海上机动的能力空前提高，交战将同时在地面、空中和海上全面展开，作战范围将不仅包括交战双方的整个领土，而且可能遍及全球和太空。战争将不一定从直接接触的边境地区首先打起，而是以战略空袭的方式从前、后方同时开始。交战双方都将使用所掌握的军事手段和武器，力求破坏对方整个纵深的的所有重要目标，包括最深远地区的战略目标。直接和间接参战的人员大大增加，参战国的全体人民都可能被卷入战争，很难置身于战争之外。空、海军的活动将明显增多，除了支援地面作战外，围绕空海交通运输线破坏和反破坏，封锁和反封锁的斗争势将比以往战争加强。独立空中战役和海上战役将越来越多地成为达成战略目的的重要手段。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严格区分那是前方，那是后方，这就使过去关于后方的概念发生了变化。特别是那些国土小，纵深浅的国家，更难利用后方进行安全生产和人力、物力动员。因此，现在许多国家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战略都要求战前在各方面完成战争准备，包括储备大量的战争物资和组建强有力的战略预备队，并在平时保持高度的战备水平。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对外层空间的开发和空间武器的发展，外层空间将继传统的陆、海、空战场之后，成为一个新

的交战场所——“第四战场”，军事斗争不但将在那里展开，而且对决定整个战争的胜负起重大作用。美苏两霸都发射了大量卫星和其它航天器，其目的正是试图把宇宙空间作为发动核袭击和防御对方导弹袭击的基地，一方面力求把对方的战略进攻武器的很大一部分摧毁在太空，另一方面以对方的外层空间防御系统及其在外层空间配置的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为攻击目标。目前，美苏两霸都在加紧研制拦截卫星、反拦截卫星、太空雷、太空射束武器与动能武器，以及各种轨道飞行器等“星球大战”武器系统。在各自的星球大战计划研制中，有很多方面已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如将大批物资送入外层空间；人员较长时间在太空生活的实践；在空中建立各种武器平台；利用各种波段的电磁波和其它介质进行远距离通信；探测和精确制导；建立大型智能化的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指挥控制系统；采用以聚能武器为代表的新的杀伤手段等等，已进入早期发展阶段。

外层空间的激烈争夺，对地面作战将产生重大影响，谁掌握了制天权，谁就能在军事上取得优势。目前，虽然外层空间武器系统还未进入实战部署，但已有各种航天器大量涌向太空，执行着侦察、监视、报警等军事任务，最近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中，空间武器对地面作战进程的影响已发生作用。为适应未来外层空间作战的需要，争夺制天权的理论和进行外层空间作战的战略战术，以及新的军种——天军，正在被世界各主要国家所重视。同时，外层空间武器系统还有可能用于支援地面、海洋和空中作战，而且其技术也可能转用于发展陆、海、空战武器，这对常规战争也将发生重大影响。

这些情况说明，现代战争的战场范围比以往战争战场范围空前扩大，前方后方界限不清，大规模交战将波及战争双方的整个领土和外层空间。

二、军队机动能力提高，战争突然性增大，作战行动节奏加快

1. 军队机动能力提高

在现代条件下，由于飞机、舰艇、坦克、火炮、步兵战斗机动车辆等各种战斗运输工具快速机动的能力显著提高，以及军队中所装备的克服障碍的器材和通信、指挥工具、电子技术的发展，加上比较发达的交通网路，给军队机动提供了有利条件。现代战争中军队实施地面、空中和海上的机动能力大大提高。

现在，苏美陆军的机动能力日益增强，两霸的陆军已全部机械化，其中炮兵已自行化、履带化，步兵装备了履带式战斗车和装甲输送车。坦克的单位功率提高，苏联的单位功率，即坦克动力与重量的比率由T—62坦克的每吨15马力提高到T—72坦克的22马力。美国的XM—1坦克已达到每吨30马力，因而大大提高了陆军的机动能力和越野能力。苏美两国的陆军师都装备了先进的克服江河、沟渠等自然和人工障碍，修筑急造军路的器材。苏陆军师属工兵营可以用其建制的器材在30分钟内架设20吨浮桥190米或60吨浮桥110米。2—3分钟就可在地雷场中开辟一条通路。它们还装备了先进的侦察、观察和夜视器材，其夜间机动的能力也得到提高，1970年苏军在“德涅伯”演习中的一些部队，三昼夜行程800公里，基本上达到了其条令规定的常行军每天200—250公里，强行军每天250—300公里的数据。

苏美两国实施空中机动的能力也显著地提高。二次世界大战时，一架远程运输机只能搭载一个步兵排，而现在一架远程运输机则能搭载一个轻装步兵营。目前，在战区内进行空运的飞机的载重量和容量，分别为二次世界大战时同类飞机的6—13倍。直升飞机的发展也很快，而且用途广泛，可遂行运输、救护、侦察、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等项任务，苏联现有8个空降师，1400余架运输机，3800架直升飞机，一次空运能力可达10万人。1977年11月，它利用向埃塞俄比亚输送军火的机会，集中了225架飞机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演练，从这次演练的情况看，苏联可在8—10小时内，空运三个轻装师到利比亚。美国现有一个空降师和一个空中突击师，8500架直升飞机。后备役飞机几乎比苏联多一倍。C—5型飞机的效能，已达到二次世界大战时C—47型飞机的100倍。目前，美军已具有在3天内把10万人的部队及战略物资运送到15000公里以外的作战能力。

美苏还重视增强海上机动 苏海军现有舰船330万吨，其中两栖舰船14.5万吨，海军陆战部队2万人，现在还在继续增强海上机动能力，建立大型补给舰、支援舰、研究高速汽垫船，目前有的汽垫船可搭载400多名登陆兵和数辆坦克。另外，苏联还大力发展商船队。目前它的商船队已跃居世界第五位。美国现有舰船346万吨，其中两栖舰只53万吨，一次可输送4万人，目前正大力发展水翼船、汽垫船等两栖舰船。

这样一来，现代战争中，作战双方机动，反机动的斗争将是十分激烈。

2. 战争的突然性增大

战术是由军事技术水平决定的，由于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并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使现代军事工业的生产能力大大提高，军队的武器装备日益增强。诸如热核武器、航天技术和电子计算机的出现，常规武器的更新，战斗运输工具的改进，电子技术、侦察器材的发展，指挥自动化等等，给敌人实施突然袭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时、空禁区的限制大为缩小，作战行动更富于突然性。目前，美苏两国所拥有的射程远、威力大、精度高、速度快的各型导弹，特别是洲际导弹，百分之80至90处于临战状态，接到命令后，美国一分钟就能发射，苏联也能在数分钟发射。苏美两霸都在试验轨道轰炸武器和部分轨道轰炸武器。前者是把核弹头装在卫星上，绕地球运行，当需要使用时就指令它再入大气层，袭击指定目标。后者是在临战前把装有核弹头的卫星发射出去，根据指令突击目标。被袭击一方在这种武器重返大气层进行反推的发动机点火之前，无法测定其打击目标，待能测定时，离弹着时间只剩下三分钟，防御十分困难。苏美还研究所谓“超级武器”，即在一定自然条件下，用人工改变气象。如1974年10月美国把“菲菲”号飓风引向洪都拉斯，使中美洲蒙受很大损失。美国在侵越战争中也曾人工制造特大暴雨，给越南方面造成了很大困难。美苏空中作战能力提高，轰炸机航程远，载弹量大，美B—52重型轰炸机载弹量达27.2吨，装备有远程空对地导弹，能执行洲际任务。苏联中型轰炸机载弹量10吨左右，作战半径可达6000公里。支援地面作战的飞机，火力强，载弹量大，低空性能好，续航时间长，争夺制空权的飞机，速度快，机动性能好，电子设备比较完

善，攻击力强。美军飞机装备的新式响尾蛇导弹，可同时对付8个目标，能从任何侧面进行发射，能利用敌机外壳与空气摩擦产生的热进行追踪击中目标。苏美海军的船艇都有很大发展，特别是苏联正在大力提高远洋作战能力。由于舰对舰导弹、舰对空导弹的出现，电子技术、核动力和其它技术装备的迅速发展，使舰艇作战能力极大提高。大型水面舰只逐步具备了多用途的作战性能，可担负多种作战任务。目前一艘新式大型巡洋舰的火力（含核火力）已超过过去一个舰队的火力。几十吨的导弹艇可以击沉千吨以上的驱逐舰。舰对舰导弹的射程可达几十公里甚至几百公里。美国还要在水面、水下舰只上普遍安装巡航导弹和装备以雷达制导发射铀弹的机枪，打击来袭的导弹。苏联海军舰艇的作战反应能力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1975年举行的“海洋大演习”中，位于巴伦支海的旗舰发出命令后，分布在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和日本海的舰队，仅91秒钟，就一齐进行射击，使西方的军事专家感到吃惊。苏美两霸的陆军已全部机械化，火力、机动力、突击力都比较强。苏联一个坦克师有中型坦克325辆（相当于二次世界大战时一个坦克集团军的坦克数量），有120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108门，摩托化步兵师有中型坦克266辆，120毫米以上口径的火炮180门，装甲车500辆，使作战能力提高，苏联一次方面军进攻战役持续时间为10昼夜，纵深达1000公里。美军一个装甲师有中型坦克324型，各型装甲车902辆，81毫米以上口径火炮164门，它的作战能力也比较强。

在现代战争中，现代化军队受自然条件的限制日趋减小，选择作战方向和作战目标的灵活性增大，进攻与防御，

集中与分散转换频繁，战场情况变化急剧，使军队行动具有更大的“盖然性”。过去那种只要在战前准确判断情况，确定作战方向和相应部署，战时基本不动或略加变更就能夺取胜利的做法，在现代战场上将不适应。

由于现代化的进攻武器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和利于突然使用的性能，使发动战争的一方有可能在短时间内给对方造成巨大损失，从而夺取战略主动权，一些军事家，特别是超级大国的军事家认为先发制人可以获得更大的战略利益，因此十分强调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发动战争，一开始就投入主要兵力展开激烈交战，力图短期决胜。1970年以来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英阿马岛战争、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以及美国袭击利比亚战争等都是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方针。这些情况都表明，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给敌人发动战略突袭提供了有利条件，从而大大增加了现代战争的突然性。

3. 作战行动节奏加快

随着各种战斗运输工具快速机动性的提高，极大地提高了军队在地面、海上、空中的机动能力，交战双方兵力对比瞬时可变，使情况变化急剧，各种导弹和其它精确制导武器的综合使用，突破了以往战场上时、空禁区的限制、目标距离的远近和复杂地形、气象条件已不是打击的重要障碍，可以在不同距离、不同高度构成多层次、高密度火力，能有效地压制对方全纵深，摧毁其重要的战役、战略目标。这样就能在短时间内使对方蒙受重大损失而丧失抵抗力，从而使交战时间大为缩短。加之，现代战争是诸军兵种的合同作战，与别是新的军、兵种产生，使现代战争具有更大的整体威力，

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迅速形成一个立体、高压的战场。将通信、情报、指挥、控制系统融为一体的现代化指挥控制系统，又极大地提高了军队指挥、控制和快速反应能力，直接推动了战争的高速运转，使作战双方的攻、防、进、退，主动、被动态势变化很快，作战行动的机动性和速决性大大提高，整个战争将是快节奏的。

三、更加强调立体、合同、总体作战

以苏军“大纵深立体战役”和美军“空地一体作战”为代表的新的作战理论产生，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发展，将导致现代战争的战场空间几何级无限扩大，作战行动将主要沿高度和纵深两个方向发展，使其具有明显的全方位、大纵深、多层次的立体化性质。

（1）现代战争将是立体战

远程武器、航空兵器和航天兵器，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展，部队远程作战能力的提高，使战场前方后方战线模糊，攻势行动将改变以往战争中从双方直接接触的边境打起，尔后逐步向国土纵深发展，只要正面不突破，战略后方基本处于相对安全地位的状况，而是前沿、纵深同时开始，空中、海上、陆地同时或相继展开，甚至从意想不到的方向或纵深首先进行。交战双方的前、后方同时遭到对方打击，战火将迅速遍及整个战场空间和各个领域。就一个战区战场而论，很可能有几十万正规部队，数千架作战飞机，数万辆坦克和数百艘舰船在数千公里的正面与纵深、前方与后方、空中与地面、地面与海上以及在翼与右翼同时或相继展开，并投入交战。进攻是全方位的，防御也将是全方位的。

战场纵深将随着常规武器的改进和部队作战能力的提高

而空前增大。苏美大口径火炮的射程已达40—50公里，战术导弹的射程达1000公里以上，超常规武器的射程，精度、威力已不亚于核武器，能对对方战役全纵深以至浅近战略纵深目标实施攻击。苏美进攻作战行动中，苏方面军和美集团军群的进攻纵深都已达到1000公里以上，尤其是苏联新编组的“战役机动集群”其机动力和突击力更强，善于大纵深奔袭作战，几乎能在任何地点、时间和方向将作战行动转向敌战役纵深。航空兵和空降兵的广泛运用，将使得战场纵深打击和纵深部署能力进一步提高，高效能的C³I系统，将使战场的空间纵深增大，为军队提供了较多的反应时间，使其能够使用兵力兵器的机动来消灭、迟滞对方。

外层空间的开发利用，加大了军事斗争的空间层次。现代战争的作战行动将不限于地面、海上和空中，而向外层空间和深海延伸，从而具有“多维”性质，成为名符其实的多层次立体化战场。地面交战空中化，空中交战太空化，海上交战深海化等，将是多层次、立体化战场的主要特征。空中力量加强，所谓“空中坦克”、“空中火炮”以及垂直起降、短距起降战斗机等新型攻击武器广泛使用，又为地面交战空中化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速度快、精度高、效率大、副作用小的天基定向能武器系统将使空间的军事运用由辅助性战斗保障转向全面军事化。由于军事斗争范围的发展趋势和空间军事力量的发展，对地面作战行动发生巨大影响，现代战争将逐渐变为进攻则是垂直进攻，防御则是垂直防御，突破将是立体突破。

（2）现代战争将是合同战

现代战争作战规模大，局部战争和“低强度战争”技术

高，对抗性强，使得作战任务异常艰苦、复杂，对各军兵种的分工要求也更加严格，象过去那样靠单一军兵种已难以实现和完成既定作战任务。部队的行动越来越依赖于合成，战役战斗的成败也越来越取决于合成程度的高低。在现代战争中，战略、战役军团将在现行的基础上增加导弹、火箭、精确制导武器、智能武器、隐形飞机、机器人等新部队，以及电子战、空地一体战、特遣战部队和空降突击、直升机强击部队。战术兵团也将注入新的成分，并逐步向高度机械化、电子化方向发展。军队的编成将根据任务采取混合编组法、任务编组法和特殊编组法。可以把摩托化步兵、坦克兵、火箭兵、炮兵、防空兵、航空兵混合编成，统一指挥，也可以把特种部队编在一起遂行特遣任务。但不管那种编组方法，将主要围绕先进技术这个核心，综合运用各种新式武器，发挥高技术群的合力，以高度合同战的凝聚力去取胜。

（3）现代战争将是总体战

战争不仅是军事力的较量，也是政治、经济、科技、外交等与战争有关的各种因素的总较量，也就是说，一旦有了战争，国家要把全国武装力量迅速从平时状态转入战时状态，并统一调度、指挥、管理一切可用的人力、物力，使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文化等活动服从于战争需要，高度发挥全国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作用。

四、高技术武器系统在战场上综合运用

现代战争是使用高技术武器系统所进行的高技术战争。它以“技术交战”为主要内容，以打“技术差”为主要手段，能在较短的时间和有限的范围内达成预期的战略目的。这种悄悄出现的新的战争形式，在近期发生的局部战争中已见影

迹。第四次中东战争初期，埃及、叙利亚的苏制萨姆对以色列空军造成极大威胁，使埃叙联军夺得制空权，保障了战场的初期胜利。但是一周后，形势急转直下，随着美国大鸟侦察卫星向以色列提供了埃及第二军和第三军接合部没有设防的情报，以军乘隙渡过运河，突入埃军后方，摧毁了埃及许多防空导弹发射场和炮兵阵地，同时用先进的“迦伯列”导弹在海上击沉了埃叙两国13艘导弹艇，使以色列在即将山穷水尽之时又挽回了败局。英阿马岛再现高技术战争的风彩，双方都综合运用了性能较好的飞机和有先进制导系统、射程远、精度高的各型导弹等先进的技术武器系统。加之美国、苏联的侦察卫星及各种现代化侦察器材不时掠过战区上空，不断为英阿提供一部分军事情报，战场发生了极大变化。现代战争的进程表明，现代太空侦察器材的配合指导加精确制导武器的广泛使用，改变了海战的传统形式，双方已用不着面对面地使用舰炮射击，在几十公里乃至几百公里外就可用导弹发动攻击。美国空袭利比亚更是突出了它的样式。在两次空袭中动用了3艘航空母舰、34艘驱逐舰、240多架飞机。空袭中A—6、A—7型舰载机，使用“哈姆”型反雷达导弹，“鱼叉”—Ⅱ型反舰导弹、石眼集束炸弹和激光制导的重型炸弹，摧毁了利比亚锡尔特市附近的萨姆—5防空导弹基地，击沉了三艘导弹巡逻艇，轰炸了卡扎菲的统帅部，击毁10余架飞机和部分军事设施。而利比亚因为军事技术装备和美国差距很大，处于几乎无法还手的地步。

目前，世界上不少国家都注重高技术战争的研究和准备，力求为部队装备更多的具有射程更远、精度更高、威力更大的超常规能力的系列武器，而且不断调整改革部队的编

战，使作战部队向火力更强、机动性更好、突击力更大的高强化趋向发展，美国已经组建了高技术作战师和4个轻装师，还计划下世纪组建三个机器人师，苏联正计划编组两个机器人兵团。连以色列这样小的国家也准备组建二个机器人师。这些高强化的作战部队的显著特征是广泛使用制导武器和无人驾驶装甲车辆，其火力、突击力、机动力比一般部队将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如无人驾驶坦克和机器人驾驶坦克的部队能全天候作战，无需对人员进行防护，一个个是机动性极高的火力发射平台，可以不停顿地作战。目前，苏联的“战役机动集群”和美国的“快速部署部队”，已经具备了高强化的作战能力。

在现代战争中，在以技术交战为主要内容的未来战场上，其技术功能与战场效益是同步增长的。战场上交战双方都力求获得最大的作战效益，力求减少自己的作战损耗，部队的发展将更加向高技术、高强化方向发展。

五、电子战成为战争的重要形式

现代战争中，现代电子技术日益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在两军交战和各种武器的对抗过程中，越来越多地进行着以电子侦察、电子压制、电子防护等为内容的电子斗争。电子装备和电子部件在军队的武器系统和情报、控制、指挥系统中的比重将持续上升。军队对电子装备和电子技术的依赖性急剧增大，电子战成为战争的重要形式。近年来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证明，电子斗争已不仅涉及到军队的情报、通信和指挥，而且将涉及到每一种具体的武器系统和每一次具体的作战行动。所以说，现代战争也就是电子战争。美国一些将领已将电子战比作陆上、海上和空中作战同等重要的第四维

战场。苏军认为电子器材“已成为直接打击敌人的强大手段”，电子斗争已“发展成为战斗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苏军在两级战役军团中均增编了相当数量的电子斗争部（分）队，包括无线电技术侦察团（营）、电子干扰营、空情预警营、雷达侦察营等。

目前，电子战已渗透到地面、空中和海上作战的各个领域，并正在向外层空间扩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电子斗争仅在通信对抗和雷达对抗中得到运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导弹的出现，电子战又增加了制导与反制导的新内容。当前，由于无线电通信设备、电子侦察设备、夜视夜瞄设备和精确制导武器越来越多地装备部队，电子设备对地面、空中和海上作战的影响将逐渐增大。战争中，保证各种电子设备正常工作，就可以使武器充分发挥效能；暴露电子设备的工作，就会暴露兵力兵器的部署和作战意图；电子设备的工作遭到干扰，就会导致敌情不明、指挥中断和火力削弱的严重后果。电子战已渗透到陆战、空战和海战中的指挥、通信、协同、侦察、伪装、防空、空袭、反舰、反潜等作战领域。

在地面作战中，攻方可通过电子侦察，查明守方的兵力部署、阵地编成、火力配系和指挥所的位置。守方可通过电子侦察，查明攻方的兵力部署与调动，判明其作战企图与主攻方向。双方都可通过电子伪装隐蔽己方的部署，通过实施干扰破坏敌军的指挥、通信与协同。电子战已成为火力战的一个组成部分，干扰敌射击指挥通信网、武器控制（制导）系统和夜视夜瞄设备的工作，可以大大削弱敌方的火力。因此，地面防空武器与飞机的斗争，坦克与反坦克导弹的斗

争，火炮之间的对抗，甚至对付装备夜瞄器材的步兵轻武器，都包含有电子战的内容。

在空中作战中，为了保障突击机群、空中机动部队和空降部队突破敌对空防御，要利用敌雷达盲区来隐蔽飞机的飞行，通过实施干扰和发射假目标来破坏敌警戒雷达、炮瞄雷达的工作并使敌地对空和空对空导弹偏离目标，还可使用反辐射导弹摧毁敌军的雷达。在空战与突击地面目标时，要克服敌方的电子对抗，有效地使用空对空、空对地导弹和制导炸弹，此外，电子侦察是空中侦察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海上作战中，电子战用于指挥、通信、导航、侦察、伪装、防空、反舰与反潜。水面舰艇采取电子干扰与欺骗措施，可以躲避敌雷达的搜索和反舰导弹的攻击。舰艇和海军飞机只有适应海上作战的电磁环境，才能引导自己的武器攻击目标。

电子战正在向外层空间扩展。目前在空间轨道上运行的电子侦察卫星，能侦察敌方雷达的参数和部署，截收敌方的通信，这是目前可以深入敌方纵深地区的唯一“合法”手段，其效率要比侦察飞机、间谍船、地面站高得多。苏美等国目前还正在研究电子干扰卫星、拦截卫星和反卫星卫星，并同时研究卫星的反干扰措施以及研究对付拦截卫星的假卫星。

电子战已成为收集军事情报、数据，进行战争准备的重要手段。为使战争顺利进行，已广泛地使用电子侦察卫星、电子侦察飞机、电子侦察船、地面电子侦察台和投掷式电子侦察器材，对敌地面、舰艇、机载电子设备进行不间断的侦察，察明其战术技术性能、数量、频率、工作参数和配置地

点，掌握其工作特点和变化规律，以便研究对付措施，受到侦察的一方将密切注意对方的侦察活动，驱赶或消灭其侦察工具，或采取隐蔽、欺骗等措施，使对方侦察不到真实的电子技术情报，或在敌侦察之后改变己方电子器材的部署和工作参数。电子侦察的作用越来越大，第三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就是通过派遣间谍，进行无线电技术侦察和利用美国的电子侦察情报，掌握了埃及的指挥通信、雷达警戒和防空导弹系统的情况，发起攻击时，采取了针对性很强的干扰措施，使埃军的指挥和通信失灵。加之美国还派出了电子干扰船协助以色列，使埃军20个防空导弹连的100部雷达无法使用，战争中遭受重大损失，仅飞机就损失430架，占飞机总数的90%。

运用电子技术进行电子作战已成为军队领导指挥艺术的一部分。电子战已不仅仅是一种技术措施，在电子战中还要求指挥员在战术上胜敌一筹。电子战本身也有进攻与防御之分。电子干扰和摧毁对方电子设备是进攻，电子反干扰和保护己方电子设备是防御。电子进攻、电子防御、电子侦察、电子伪装、电子欺骗、电子佯动必须与一般的战斗行动密切配合，贯穿于战斗和战役的始终。今天的指挥员必须象运用火炮、坦克等传统武器那样广泛地运用各种电子战手段，善于在电子战中同敌人斗智，达成突然性。他们的作战艺术应该包括对电子战的巧妙运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联军在诺曼第登陆前实施的电子伪装，起到了隐蔽战役方向，扰乱敌军的作用，显示了很高的作战艺术。第四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事先没有掌握埃及和叙利亚使用的苏制“萨姆-5”地空导弹的制导技术，损失了很多飞机。战后，以色列

和美国对萨姆—6”导弹进行了长期研究，研究出对付它的一套相应的战术。相反，“萨姆—6”导弹在这几年中几乎没有什么改进。因此，在1982年6月的贝卡谷地战斗中，以军得以在6分钟内摧毁叙军的19个“萨姆—6”导弹连。

现在的电子战战场比以往战争更为错综复杂，电子斗争的手段也更为先进和多样，聪明的指挥员在这种斗争中将会有更大的用武之地。

六、战场整体化，作战形式多样化，系列化

由于新的大纵深作战理论的推行和广泛实施空降作战，战场内将敌中有我，我中有敌。战场犬牙交错，敌我相互渗透，战线不再像过去那样完整和界限分明。进攻的军队将集中全力实施大纵深立体进攻，防御的军队将运用各种作战力量采取多种作战形式与其抗衡，双方的交战将在多层次同时展开。既在陆战场，又在海战场和空战场同时展开。陆战场将在阵地战战场，运动战战场、游击战战场同时展开。在各个战场的中心战场和次要战场也将同时展开。战场结构呈纷繁潦乱、复杂多变的形态。战场与战场之间既相互影响，又相互牵制。大战场与中小战场相互混杂，彼此作用。大战场夹带着若干中、小战场。电子战、火力战、心理战、环境战、生物战、化学战、激光战、空间战交织出现。传统的作战样式，进攻战、防御战、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等表现形态、规模、内容、任务等诸方面注入新的内涵，如游击战将不再是历史上的方法，而是摩托化游击战、坦克游击战、导弹游击战、空降游击战、电子游击战、化学游击战，民兵等地方武装进行的游击战，以及正规部队进行的游击战。作战形式在同一战场上交织运用，形成有形的抗争与无形的争

夺，“硬”打击与“软”杀伤相互结合，以及攻中有防、防中有攻、攻防一体的错综复杂的交战形式和犬牙交错的局面。

军队行动的“盖然性”增大，限定性变小，部队可能在任何方向，任何地区实施多种样式的作战行动，战场的相对平衡将多次，连续被打破，定下的决心和制定的作战计划将随战场的变化而不断进行局部调整；“主要战场和次要战场”正规战场与游击战场将可能相互转换；主次方向将常有变换，主次兵力亦将随之变更或转化，进攻与防御、集中与分散、突破与反突破、合围与反合围、空降与反空降、分割与反分割、封锁与反封锁、机动与反机动等多领域、多层次的斗争，都具有激变性。

多种武器系统和多种军、兵种在战场上交织运用，军事行动将在战场的正面、纵深、后方、翼侧、海上、水下、空中以至太空等多维空间展开。敌对双方的军队既要进行内线作战，又要进行外线作战，既要进行空战、海战，又要进行太空战和深海战，既要实施“前场”、“中场”和“后场”的争夺，又要进行空中格斗和空地绞杀。从某一具体的防御战役来看，也要既实施阵地防御战，又要实施机动防御战，还有防御战役中的运动进攻作战，既要在前沿作战，又要在后方进行防卫战。既要进行反空降强击和反直升机突击为主要内容的防空作战，又要进行争夺制空权的空战，战场作战样式越来越多样化。

但现代战争中，多样化的作战样式，不是孤立地出现在战场上，各种样式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战场结构的多样化和复杂化决定着战场各种力量对整体化的追求，尽

管战场纷繁复杂，但从整体上看，它们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缺一不可的科学体系。所有参战部队，将由最高司令部统一计划，集中指挥，按照统一的协同计划行动。战场与战场之间、军种与军种之间、兵器与兵器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战场的指挥控制更加集中，行动的整体化和作战样式多样化、系列化将更加明显。

七、作战指挥将决策智能化、指挥自动化、控制信息化

现代战争由于航天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和激光技术在军事领域里的广泛运用，使军队的作战指挥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由过去单凭指挥员和参谋人员的经验和智力，仅靠手工作业达到了运用现代化智能器材实施战场指挥的阶段。作战过程中一般内容，如对敌军进行定位和识别，定下如何对付这些目标的决心，选择适当的武器和兵力，采取适当的方式，并向敌目标实施射击和突击，估计目标的破坏程度和突击效果，以及是否需要再行射击等，将由把军队指挥体系中基本要素——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系统紧密地联在一起的C³I系统来完成。战场指挥将出现决策智能化、指挥自动化、控制信息化的特征。

1. 现代战争决策日益智能化

现代战争的战场是信息化战场。信息流量大、种类多、形势瞬息万变。战场决策机关要在瞬间获取和处理大量信息，并在纷繁杂乱的信息流中辩明真伪，为首长和机关定下决心提供准确情报，仅靠现有手段和力量是万万办不到的。进行决策必须借助于现代化、智能化的技术系统来完成。目前，苏联、美国、以色列等国的军队，已使用遥控飞行器、地面传感器、侦察卫星等，对敌目标实施定位和识别，并将

侦测收集到的信息通过快速通信系统输入中央电子计算机系统。计算机在分秒间即可作出对敌军的最优决策，提供给指挥员。计算机还可选择相应的武器向目标实施攻击，整个过程将能作到完全不需要人的干预。现在美军研制的野战炮兵数据处理系统，可贮存30个目标数据，能为炮兵指挥官适时提供火力袭击的决策。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利用庞大的和高效能的电子计算机系统，每天可处理26,500份情报。现代战争胜负的最终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信息获取和处理系统的工作效率，以及维持持久的程度。

2. 现代战争的战场指挥日益自动化

现代战争战场空间扩大和信息量的增加，使战场指挥的负担加重，尤其是电子战系统的激烈对抗，对实施高效、不间断的指挥增加了困难。根据苏军现装备的电子战器材，估计在作战时，苏军至少可以破坏或压制对方百分之五十的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美军实施电子战的能力还要强些。而现代战争的战场越来越依赖自动化通信系统，如激光通信、光纤通信、传真通信、数据通信等现代科学通信手段，以及借助于卫星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使其具有快速、灵敏、抗干扰能力强，准确无误地决策、指挥能力。苏联从60年代起就把C³I系统的开发工作视为继核武器、远程导弹之后在军事领域中发生的“第三次革命”，并相继建成了许多规模庞大、多层配套的C³I系统。美国对C³I系统的建设更为重视，将其列为部队现代化的优先项目之一。近年来用于该系统的费用达315亿美元，占军费总额的百分之十一。同时，美军全面采用微电子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航天技术、海洋技术和系统工程技术等方面的最新成就，对全球性的指挥系统进行了五十年代

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的更新。

当前外军建立的C³I系统，能迅速处理极为庞杂的各种情报，能“记住”大量的数据和材料，还能按照需要迅速显示；能完成选择或修订作战方案并及时下达命令；能对各种现代化武器进行有效的控制指挥，美国国防部的指挥自动化中心，从提出问题到显示情报只要10几秒钟，并能在几分钟把最高统帅的命令，下达到分布在全球的美军各部队。目前在一些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的国家，空军、防空军、海军和战略火箭军的自动化程度已经相当高，陆军各级部队的指挥自动化也在发展，已将指挥自动化器材装备到了营、连一级。

3. 现代战争战场控制日益信息化

战场上多方向多渠道的信息反馈量的增多，使战场控制具有明显的多维性和全方位性，控制的时间具有瞬时性和持续性。谁能在有效的时间内更多地获取和处理信息，谁就能控制战场，把握全局，掌握主动。否则，就会造成指挥失灵，指导失误，控制失调，陷入被动挨打的局面。二次大战以来，特别是近期几场局部战争以来，战场控制问题越来越引起各国的关注。苏美军和一些发达国家的军队，无不把它作为战场指导的重要问题，加以重视和研究。当今世界上现代战争的战场控制越来越向信息化、灵敏化的方向发展，敌对双方将最大限度地运用现代化的C³I系统，如卫星侦察、预警系统，并建立地面机动指挥所、空中指挥，所以对战场这个动态的系统实施大范围、多领域、多层次、不间断的控制。将来的发展，最高指挥中心可对大至重兵集团，小至单兵、单机、单车或单舰实施全球范围乃至外层空间的高度集中的指挥和控限。

八、战争具有更大的破坏性和消耗性，增大了对经济和后勤的依赖程度

1. 现代战争增大了对经济的依赖性

经济力量是战争赖以进行的物质基础，是军事思想，军队编制装备和作战方法变化发展的前提，战争不仅具有军事冲突的性质，而且具有经济竞赛的性质，这种竞赛通过武装斗争表现出来，并对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发生巨大影响，战争和经济的这种关系虽然为过去中外战争的历史所证明，但在现代条件下，表现得越来越发突出，对现代战争的影响就更加深刻。

(1) 现代战争中，经济力量不仅是战争胜负的物质基础，而且是制约现代战争发生发展的重要因素。十八世纪世界上公认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所著的《国富论》中，批判了西方相当一个阶段主张的“金钱决定战争胜负”的论点，指出国家军事威力的源泉应当是生产。强调“维持舰队和陆军的不是金银，而是可消费的资料，进行战争的资金蕴藏在年度的国民生产品中”。提出应加强本国的经济能力，尤其是对战争胜负有决定作用的工业制造能力。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虽然有一些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因素，但其中合理的经济思想以及所揭示的问题，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在现代条件下，没有一定的经济潜力，就无法进行现代战争。

战争历来要消耗巨大的物资，现代战争的消耗量更是急剧增加，如第四次中东战争，历时仅18天，据外国资料估计，双方投入的兵力约170万，坦克6000辆，飞机1900架，舰艇177艘。阿方损失坦克约2000辆，飞机450架，舰艇18

艘。以方损失坦克900辆，飞机120架，舰艇19艘。双方损失坦克、飞机、导弹、舰艇等重装备的数量，超过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损耗量。埃叙在开战头三天发射的地对空导弹约在1000枚以上，大致相当于“北约”组织在欧洲的全部储存量，以军在战前储备的10万吨弹药，十余天即消耗殆尽。阿以双方物资的消耗和损失总数达100亿美元，每日平均高达6亿美元。由于消耗巨大，使参战国军费急剧上升，在战争中以色列的军费竟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0%，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约旦等国的军费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左右。在短时期的局部战争中，投入如此巨大数量的武器装备，付出如此惊人的损失是史无前例的，也是各参战国难以承受和持续进行的。局部战争尚且如此，大规模的现代战争更将受经济力量的制约。

由于各种高精尖技术直接广泛地运用于军事领域，使得现代武器装备系统的更新周期越来越短，造价越来越昂贵，生产成本数倍、数十倍以至上百倍地提高。本世纪初，研制和装备一代新武器系统的周期为20—30年，现在10年左右乃至更短的时间就更新一代，武器的成本与50年代相比较，一支步枪从50美元增至160美元，一辆坦克从10万美元增至240多万美元，一架战斗机从20万美元增至三千至四千万美元，至于导弹核武器、精确制导武器、中远程轰炸机、航空母舰、核潜艇等提高的更多。这就使得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与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众多国家迫于经济原因，不得不放慢武器装备的更新速度，或者继续使用早已超期服役的武器装备，或者对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装备进行修复和改装，再次进行服役。

现代军备和战争的巨大物资消耗，必然要通过庞大的军费支出来维持，这使国家的财政面临严峻的考验。在近十几年时间里，美苏军费翻了一番还多，苏联1985年军费开支达1100亿美元，占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美国在同年高达3020亿美元，是1980年的两倍多。发展中国家的军费开支平均增长150%。穷兵黩武的以色列，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军费竟占国民生产总值的70%。两伊战争每月消耗10多亿美元，战争进行了九年，双方的战争消耗和经济损失都已超过数千亿美元的损失。可见现代战争将是大规模的经济战，谁的经济力量雄厚，谁就可能赢得战争。

(2) 现代战争对军工生产部门及基础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战争破坏力空前增大，只有建立起雄厚的经济基础，才能经受住敌人的打击。第一次世界大战，波及400万平方公里，有33个国家参加，经济损失278亿美元。二次世界大战时，大战波及到欧洲、亚洲、非洲和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约2,200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使61个国家卷入大战的旋涡，经济损失达2163亿美元，现代战争中，从1980年9月开始的两伊战争，实际经济损失已超过了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损失。在现代战争中，如果使用核武器，将使整个国民经济体系遭到破坏，军事经济基础遭受巨大的损伤。如果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作后盾，在现代战争中取胜是困难的。

现代战争军队技术专业已超过2000多种，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只有20种军事专业提高了一百倍。这些专业兵种的增多，从生产角度讲需要大量的有色金属、黑色金属以及能源、机械、化工产品，据联合国有关专家统计，全世界军事工业部门铜的消耗量占总产量的15—16%，锡、镍、铅、锌

的消耗量分别占总产量的10%。从武器的使用角度讲，必须根据科学技术进步的情况，预测和制定军事专业人员的训练计划，以便迅速掌握和熟练使用现代技术兵器。这些都对提高整个国民经济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在现代战争中，如果军人不具备高度的文化水平和足够的军事技术，缺乏专业素养，面对当今武器系统频频更新换代、日新月异的现实状况，是适应不了现代战争的要求的。在两伊战争中，双方虽然都花费巨资购入大量的现代化兵器，但是由于整个国家经济水平低下，社会教育水平落后，由缺乏军事素质的文盲军队去作战，只好把现代化武器搁置一边，用近代火器进行作战，是无法在现代战争中取胜的。

（3）雄厚的经济潜力是现代战争中持久作战的重要条件。现代战争中妄图称霸世界，积极推行进攻战略的一方，总是力求速决，但是，由于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往往不得不长期拖下去，在经济消耗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企图称霸中东的以色列，虽然猖獗一时，但终因国小，资源贫乏，不仅无力征服埃及、叙利亚等邻国，即使对于饱经战乱的黎巴嫩，也无力作长期占领，入侵30多个月，耗资近百亿美元，不得不自行撤出。越南入侵柬埔寨，也耗资近百亿美元，不仅至今未能征服高棉人民，而且使自己陷于贫困落后的境地。苏联作为超级大国出动十几万兵力，在阿富汗苦战八年，花费一百几十亿美元，不但没把阿富汗游击队镇压下去，反而使自己处于进退维谷的地步，最后不得不被迫撤回自己的军队。这些事实说明即使一个大国对付一个弱小的国家，经济上也有很多困难问题。由此可见，现代战争不仅是大规模经济战，而且是持久的经济消耗战，保

持经济潜力已成为支持现代战争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在现代战争中，保持雄厚的经济潜力是进行战争的必要条件，因而交战双方越来越把袭击对方经济目标作为重要的战略手段。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早在五十年代就把摧毁对方经济设施列为重点袭击目标。两伊战争中，双方都针锋相对地攻击对方的重要石油设施，给这两个主要靠石油维持经济生活的国家带来“经济自杀”的危险。目前，双方经济损失都在千亿美元以上，超过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损失，上述情况也说明，为保持持续的战争潜力，必须高度重视战略后方的建设，采取积极的防卫措施，保持工业的生存能力。

2. 战争破坏力增大，对后方的依赖性增强

现代战争中战场火力空前增强，破坏杀伤作用增大，战斗消耗十分严重。目前，苏美两国军队都大量装备了现代化的大规模杀伤破坏武器。这些武器不但具有多种杀伤性能，破坏威力大，而且日益提高了射程、精度和速度，它们还采取各种大规模杀伤武器和常规武器、超常规武器综合使用，战场上将不存在任何难以摧毁的“硬目标”。以核武器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除美国投在广岛的原子弹造成15万人的伤亡，投在长崎的原子弹造成7万人伤亡外，单件常规弹药威力从未超过5吨梯恩梯当量，而现在的原子弹、氢弹的威力已可达几百万吨甚至几千万吨梯恩梯当量，苏美军还装备了各种类型的毒剂，如V类毒剂为例，只要有8.4微克/升的浓度，暴露一分钟就可使人中毒死亡。苏美的常规武器的杀伤力、破坏力也增大了。如美国一个155毫米自行榴弹炮连，编制火炮六门，一次齐射杀伤面积可达2.5公顷，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提高三倍多，新装备的227毫米火箭炮，一门

炮60秒可发射12发炮弹，可分离出7,728枚子弹，共可压制相当六个足球场面积大的目标，苏军一个摩步师火炮齐射的弹药总量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提高了20倍，苏军的一个122毫米40管重火箭炮连一次齐射，杀伤面积可达28公顷。常规武器的命中精度有了极大提高，苏联新型火箭炮采用激光测距、红外线和微光测距，命中率极高。美国的155毫米榴弹炮可发射“能动炮弹”即激光半自动导向炮弹，能跟踪目标，提高了射击效能，另外他们在射击自动化上有了极大改进，如苏联在火炮上广泛运用自动装弹技术，122毫米火箭炮在射击完毕后，再次装弹完毕，仅需一分钟，提高了作战能力。

在目前，以电子技术为基础的高精度制导武器大量涌现，使精确度比过去普通武器提高了数十到数百倍。过去击落一架飞机通常需高射炮弹800多发，而现在用精确制导的防空导弹最多只需两枚，已经出现的将杀伤手段与侦察手段合为一体的定位攻击武器系统，能迅速捕捉目标和准确地攻击目标。即将大量装备的集束武器，对集群目标构成强大威胁，如美军在T-22导弹上使用集束弹头，对40—200公里内的集群目标实施突击，一次就可消灭一个坦克连。这些现代化武器的大量使用，不仅对军队和军事目标以重大杀伤破坏，而且工业基地和经济中心也成为主要突击目标，在强大火力杀伤破坏下，使地区地形变样，河流改道，树木焦枯，道路毁坏，城镇化为瓦砾，战场环境发生极大变化，战争潜力受到极大削弱。

由于战争破坏力增大，从而使敌对双方物资消耗量大，武器装备损坏率高，人员伤亡数量增加，伤情严重，增大了

对后勤的依赖性。在作战过程中，苏美军作战消耗无疑是全靠后方补充，这是不言而喻的。就我军来说，过去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抗美援朝战争以来，情况发生了变化，利用缴获物资来补充自己的可能性相对缩小，大量的物资器材和技术装备主要靠后方供应。对于日益现代化的我军来说，在现代战争作战中，组织好后勤供应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叶剑英指出：“现代战争更重要的是靠后方，今天打一仗，可供内战时打一两年，消耗大，服务量大，后方工作搞不好是要影响前线的。”可见军队越现代化，战争越现代化，对后方的依赖性越大。

九、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受国际国内政治因素制约增大

由于世界和平力量不断增加，各国人民反对战争，争取和平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加之信息传播的快速性，挑起战争的国家不能不顾及世界舆论和政治外交的影响，因此，常常是政治外交需要决定军事行动，军事行动不能超出政治、外交限制的范围。当代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在这一点上体现的十分明显，如英国和阿根廷争夺马岛战争中，英国政府战前就明确提出“不轰炸阿根廷本土”和“登陆时机视政治需要而定”。

现代战争还表现在战争虽在交战国之间进行，但往往牵涉到一些非参战国的利益。因此战争常常受到交战国以外国家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超级大国的制约。例如很多局部战争都与超级大国有直接和间接关系，有的是超级大国直接挑起，有些表面看来大国未直接参加，但事实上幕后都有超级大国的支持和操纵，大国力图通过政治声援、经济援助、提供武器装备等手段来操纵控制小国的行动，小国成为大国的牺牲

品，如越南地区小霸对我国的挑衅和进攻，就要看苏联大霸的脸色行事。

现代战争由于国际交往频繁，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制度之间的政治联系既密切相关联，又极端微妙复杂，即便是局部战争也往往牵动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严重地影响到有关国家的利益。战争发动的时机、规模、方式无不考虑政治、外交斗争的形势，无不重视国际环境对战争的影响，使政治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性越来越大。

第六章 战略方针与战略作战原则

第一节 战略方针是战略指导 的首要问题

一、什么是战略方针

战略方针，是准备和实行战争的总原则，它统管战争全局，指导战争全过程，是一切作战行动的基本依据。是战略要素之一。

战略方针是为战略目标服务的，其任务是如何指导、运用军事力量去实现既定的战略目标，解决实现战略目标的途径和方法问题。因此，军事战略目标是制定战略方针的主要依据，对其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

从战争历史上看，战略方针通常包括以下主要内容：①确定战争的目的（目标）；②确定作战的主要类型（进攻还是防御）；③规定主要作战形式（阵地战还是运动战、游击战等）；④确定战争的持续时间（持久还是速决）；⑤规定作战行动的性质与要求（积极或消极、决战还是避战、歼灭战还是消耗战）。除上述外，有时还规定主要战略方向及其他重要事项。

战略方针因适应范围和时间不同，可区分为通管战争全局和全过程的战略总方针与指导不同战争阶段和不同战区

的具体战略方针。例如，抗日战争时期的“持久战”，是战略总方针，它统管战争全局，指导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具体到各个不同的战争阶段或不同的战区，则相应的有各自具体的战略方针。同样，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也分别有不同的战略方针。一般地说，战略总方针稳定性较大，阶段性或战局性战略方针则往往随阶段或战局的变化而改变。

二、制定战略方针的客观依据

战略方针的制定，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取决于战争的客观实际。战争的历史经验表明，正确的战略方针是战争客观规律的反映，是在全面分析敌我友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地理诸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的。战争的客观实际情况不同，决定每一战争的规律不同，指导战争的关键问题不同，因此，指导每次战争的战略方针的内容也不相同。只有认识了每次战争的特殊规律，才能提出符合战争实际的战略方针，给战争以正确的指导。

一般地说，就国内战争而言，军事战略方针的防御或进攻、持久或速决，主要地取决于敌我之间总的力量的对比。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有采取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才能使自己得以生存和发展，逐步削弱敌人，最后战而胜之。这种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已为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证实是正确的。就国家对外军事战略方针而言，除力量这个基本的条件外，还决定于国家性质（政治因素）、经济基础、科学技术水平、国际条件、自然条件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作为制定战略方针的客观依据，都是不可缺少的。对此，我们在第一章中战略的客观依据一节里，已分别作了充分的论述。实际上，战略的客观依据也就是制定战略方针的客观依据，所

不同的是讨论问题的范围和角度不同罢了。需要指出的是，在制定战略方针的诸种客观依据中，其中国家性质（政治因素）对于国家对外军事战略方针的制定，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略决定于政略，任何一个国家的军事战略方针，无不受其国家性质及基本国策的制约。

据上所述，我们认为，我军制定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其主要依据有两条：

一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和平外交政策。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它既消灭了我国屈从于外国侵略的社会根源，也消灭了我国对外侵略扩张的社会根源。我们党和国家对外关系的总方针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坚持各国之间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们坚信共产主义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但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没有在任何外国留驻一兵一卒，没有侵占任何外国一寸领土，没有侵犯过任何外国的国家主权。在任何情况下，我们永远不争霸、不称霸，也绝不首先挑起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军事战略方针只能是自卫的，防御的。但是，我们也决不容忍中国人民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因此，我们的战略方针又必须是积极的，后发制人的，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按照这一战略方针的要求，在战争爆发前，我们要用一切办法来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争取较长的和平时间，

加速我国的四化建设，并做好充分的反侵略战争准备；当敌人胆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时，我们就坚决地以正义的反侵略战争消灭非正义的侵略战争，不仅要把侵略者驱逐出我国领土，而且要视情况在国际条件的配合下，超越国境线，彻底消灭战争的策源地。

二是力量对比上敌优我劣的客观形势

战争历史表明，力量对比上的强与弱是决定采取何种军事战略方针的重要的物质条件，它直接关系到军事战略方针是进攻还是防御、是持久还是速决。就我国实际情况来看，毋庸讳言，与某些大国相比，武器装备上敌优我劣、经济力量上敌强我弱、科学技术上敌先进我落后的情况，乃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的现实。这种情况，在客观上决定了我军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必须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必须把持久战和以劣势装备对付优势装备敌人，作为自己战略指导和作战的基本的出发点。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那样，我们的战略就是以劣势装备为出发点的，是以劣势装备对付敌现代化的装备这一点着眼的。因为在力量对比敌强我弱这一总的形势下，我们只有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才能发挥人的勇敢精神，发挥我战争的正义性和持久的人民战争等这些特有的优势，才能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化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造成彻底消灭敌人的种种有利条件，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三、正确的战略方针是赢得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战略问题是战争指导上首屈一指的重要问题。在一定的客观条件下，战略方针的正确与否，对整个战争进程，乃至战争的胜负，有着决定性的意义。美国战略学家马汉曾经说

过：“如果战略错了，那么，将军在战场上的指挥才能，士兵的勇敢，辉煌的胜利，都将失去其作用。尽管在战略正确的情况下，他们能起决定的作用。”事实的确如此。纵观战争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历史上的战争，胜者无一不是因为对战争的客观情况认识正确，采取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全局运筹得当，在战争指导上高敌一筹的结果。相反，败者所以失败，从根本上说大都是由于采取了不符合战争实际情况的错误的战略方针，全局运筹失当，在战争指导上受制于人而招致的。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例，波兰、法国等国家的失败，无一不是由于战略方针的错误所致。苏联在战争初期的失利，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战略方针上的错误，无疑是最主要的原因。以我国抗日战争为例，由于共产党和国民党执行两种不同的战略方针，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共产党执行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领导人民军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一个广大的敌后战场，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而国民党由于实行消极防御的方针，不仅不能有效的打击敌人，反而使自己处处被动，招致正面战场一再受到严重挫败。

上述分析表明，战略方针的正确与否，会对战争产生总体的根本性的影响。因此，基于战争的客观实际，认识战争规律，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是战争指导者头等重要的事情，必须加以认真对待。

第二节 我国未来反侵略战争 的战略方针

一、我国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样式和主要特点

讨论我国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首先应了解我国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样式和主要特点。

1. 我国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样式

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国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共同经济繁荣，作为对外政策的根本目标。但是，由于超级大国的对抗和争夺，依然存在着战争的危险，我们不能不保持必要的警惕和戒备。

从总体上看，我国未来反侵略战争，可能有以下三种样式：一是波及我国的世界大战；二是霸权主义对我发动的全面战争；三是不友好国家挑起的边境冲突以至局部战争。从当前现实的国际环境分析，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不会爆发波及我国的世界大战和入侵我国的全面战争，边境冲突乃至局部战争是我国面临的最主要、最现实的军事威胁。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人类社会未进入永久和平历史阶段之前，大战的威胁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排除的，因此，我们必须有所准备。

2. 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特点

未来全面反侵略战争一旦发生，必将是一场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它除具有未来战争的一般特点外，还将透过我国与侵略者相互矛盾着的基本因素而表现出特殊性。其主

要特点有：

(1) 正义的卫国战争性质。我国未来反侵略战争，具有鲜明的卫国战争性质。战争的胜负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华民族的存亡，也关系着世界和平的维护，因而，它必然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和全力支持，也将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同情和援助。与此相反，敌人对我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其目的是为了扩张领土，奴役中国人民和攫取经济利益，因而是非正义之战。它不符合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愿望，随着战争的发展，其反动性和非正义性将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必然受到来自国内和国际的强烈反对，而陷入空前的孤立。因而，在这场战争中，在政治上我将居于优势，敌则处于劣势。

(2) 以劣势装备抗击优势装备之敌。未来反侵略战争，可能向我发动全面入侵的敌人将是霸权主义大国。敌我力量对比各有所长。从经济实力和武器装备上看，敌优于我。霸权主义大国工业发达，科学技术先进，经济实力雄厚，具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军火生产能力，军队高度现代化，军兵种齐全，装备有最先进的技术兵器。我国虽已有相当规模和水平的现代化工业，但因底子薄、起步晚，在经济实力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有很大差距。进入80年代，我国经济已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随着时间的推移，差距将会有所缩小。我军未来的武器装备也会有很大改善，但仍将处于劣势，特别是在核武器、航天兵器、导弹、飞机、舰艇、坦克，以及电子对抗、通信、侦察、指挥器材和运输工具等方面的数量和质量上，差距较大，这就使我军在火力、机动力、突击力和生存力上不如敌人。从人力和作战环境上看，我将优于敌

人。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多兵多，我国武装力量的数量，特别是后备兵员的储备量，大大超过敌人。而在作战环境上，反侵略战争将主要在我国国土上进行，战场可以预先准备。而侵略者由于人口少于我国，平时已感劳力紧张，战时大量扩军和补充兵员，必然更感困难。加之异国作战，地理、民族等方面也都对其有种种不利。

上述情况说明，在未来全面反侵略战争中，我将以劣势装备抗击优势装备之敌，敌军将以少量兵力面临我军多数兵力，战场环境于我有利，于敌不利。至于边境冲突和局部战争，则因入侵对象的不同会具有不同的特点。总的来说，战争威胁主要来自个别不友好的国家和地区，战场将限制在边境地区，战争中军事斗争与政治、外交斗争交融为一体，局部作战行动受到严格限制。我在有理、有利、有节原则下实行陆、海、空的自卫反击，捍卫祖国领土、领空、领海的完整统一，保障国家在和平环境下进行建设。

（3）规模空前的人民战争。我国作为一个有长期革命战争经验的社会主义大国，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统一的巩固的全国政权和坚强的政治组织力，有广大的具有高度爱国主义觉悟的人民群众，这些条件是我国历史上任何反侵略战争所不能比拟的，是实行人民战争的可靠的政治基础。在未来全面反侵略战争中，我们不仅有强大的正规军，而且有为数众多的民兵、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敌人的大举入侵，必然激起全国人民的同仇敌忾，一致奋起抗战，通过各种组织和各种形式参加和支援战争，打击敌人。这场军民结合的现代化人民战争，其规模会远远超过我国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反侵略战争，在世界史上也将是空前的。相反，敌人发动

侵华战争，军队装备尽管现代化，毕竟数量有限，在我国辽阔的战场上，即便投入几百个师，由于占地、守点、维护交通线等处处需要兵力，也难敷应用，战线拉得愈长，其兵力就愈感不足，这样就更有利于我广泛开展人民战争。

（4）作战形式和作战手段多样化。未来反侵略战争，敌一旦大举入侵我国，必将依仗其现代化武器装备的优势，以大规模的战略突袭开始，以地面进攻为主，以海、空进攻为辅，在空、海军的配合下，以坦克机械化军队对我实行大规模、多方向的快速进攻，同时袭击我战略纵深的目标。其作战形式和作战手段，可能是多样化的。针对敌进攻的特点，我将利用有利的地理条件进行阵地战和运动战，同时广泛开展游击战。我们既将使用现代化的作战手段和正规战的作战方法，又将使用非现代化的作战手段和非正规战的作战方法。在战场形态上，可能出现内线和外线、包围与反包围、敌占区和我占区犬牙交错的复杂情况，这种形态有利于我多种战法的广泛运用，而不利於敌之正规战。

（5）军事斗争与非军事斗争紧密结合。未来全面反侵略战争，不仅是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而且是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种力量的全面的较量，军事斗争与非军事斗争紧密结合的特点十分突出。战争的胜利不仅在于我们在军事上要少犯错误，多打胜仗，而且在于在各条非军事战线上都能够打败敌人。诸如政治上的攻心与反攻心、经济上的封锁与反封锁、外交上的孤立与反孤立、文化上的渗透与反渗透等等。应当看到，这种非军事斗争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它不仅直接关系到军事斗争的胜败，而且影响到能否取得反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在这方面，我们

要善于利用我们在政治方面独有的优势，善于利用敌人的弱点和不足，与之进行积极的斗争，粉碎敌人的心理战、经济战，配合军事斗争，争取反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

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

建国以来，我国的战略方针一直是积极防御。尽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根据当时世界和我国周边政治、军事斗争形势的发展需要，先后沿用了“积极防御”、“积极防御、北顶南放”、“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等几种提法，但基本精神都是一致的。八十年代初期，基于对当时世界战略形势和我国面临的军事威胁的分析，我国的军事战略方针重新使用了“积极防御”的提法，并依据新的历史条件赋予它新的内涵。到目前，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有关我国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又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不少研究认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要潮流，世界大战可以避免，边境冲突乃至局部战争成为我国面临的主要军事威胁的今天，应重新研究确定我国的军事战略。有关战略方针的表述，也有多种提法，如“稳定北方，加强南方，强边固防，灵活反应”；“有效遏制”；“增强实力，强边固防，靠前部署，灵活反击”等等。我们认为，未来反侵略战争，我国的战略方针仍以表述为“积极防御”为宜。其主要理由，一是“积极防御”最能体现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最能体现我国军事战略的自卫性质；二是从确定战略方针的基点上看，不仅要考虑到对付局部战争威胁的现实需要，而且要照顾到对付大战的需要。“积极防御”内涵丰富，复盖面大，以它表述我国战略方针，比其它提法更简明，更深刻。当然，积极防御战略

方针也要发展，要根据新的形势增加新的内容，赋予新的任务。特别是在局部性反侵略战争中，要求其有不同的表现。

从全面反侵略战争考虑，未来反侵略战争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主要内容是：

战争爆发以前，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主要内容是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运用一切手段和方法遏制和推迟大战的爆发。战争爆发以后，在战略防御阶段，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首要要求是处理好战争初期问题，千方百计地顿挫敌人的进攻，争取时间，使后方有所准备。为此，战争初期，在重要战略方向上，我将以坚守防御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积极进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广泛开展游击战，抗住敌人战略突袭，制止敌人长驱直入，把战局初步稳定下来。在完成初期战略任务之后，将继续把战略上的内线持久的防御战与战役战斗上的攻防作战结合起来，在顽强坚守战略战役要地和重要地区的同时，积极捕捉和创造战机，有计划的在预设战场上集中优势兵力打规模不等的运动战，不断歼灭敌人，制止敌人的战略进攻，使整个战争形势向着战略相持的方向发展。在战略相持阶段，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主要任务是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大量歼灭敌人，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争取主动，并应加强外交活动，争取国际援助，为转入战略反攻创造条件。在战略反攻阶段，我将主要依靠自己在前阶段准备的和本阶段成长的力量适时转入战略反攻，进行有利的战略决战，歼灭敌人重兵集团，收复失地，并视情况实施战略追击，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

总括上述主要内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战略方针，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新形势下的

继承和发展。它既坚持了我军历来实行积极防御战略的基本精神，又根据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新情况、新特点，赋予它新的内容。其基本精神，就是运用攻势防御、决战防御的思想指导战争全过程，认真处理好战争初期问题，并通过持久战为自己创造一定的优胜条件，最后战胜敌人。

三、局部性反侵略战争实行积极防御应不同于全面抗战

不论武器装备怎样发展，战争情况如何变化，我国的社会性质决定了未来边境局部战争将主要在我国国土上进行，立足本土进行防御作战仍是我们应付边境局部战争的主要作战样式。因此，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对我进行局部性反侵略战争仍有指导意义。

但也必须看到，局部性反侵略战争不同于全面抗战。由于战争情况不同，投入的力量、作战规模、作战环境、作战时间、作战阶段的区分以及攻防作战形式的变换等等，都有不同于全面反侵略战争的一些特点。因此，局部性反侵略战争实行积极防御，必须从实际出发，解决好具体的作战指导问题。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制定适合当时当地具体情况的具体作战指导方针。如在有的情况下，可隐忍不发，待敌挑衅和进犯到一定程度，再予以有理有利有节的还击；在有的情况下，则应坚守边境，寸步不让，捍卫神圣领土的不可侵犯性，敌人只要来犯，就立即还击等。这些做法，都是积极防御的表现。

总之，局部性反侵略战争实行积极防御，必须依据实际情况，采取不同的灵活的具体方针，不宜拘守固定的模式。在当前，加强对局部战争的研究，探讨在局部性反侵略战争中如何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是我国军事战略的重要课题。

第三节 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必须 坚持的战略指导思想

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是指导战争全局和全过程的总方针。为了贯彻这个总方针，还需要提出一系列带全局性的战略指导思想。它既是制定战略方针的依据，又是贯彻战略方针的保证。

一、坚持打人民战争

人民战争，是广大人民群众为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组织和武装起来进行的战争。人民战争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是我军进行革命战争的根本指导路线，也是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得以实行的坚实基础。未来反侵略战争，无论是作战对象还是武器装备，乃至我军自身的情况，都与过去历次革命战争有很大不同，但坚持打人民战争，仍将是我军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必须坚持的基本战略指导思想。

首先，我们实行的人民战争，是在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指导下进行的，它符合革命的新生力量必然战胜反动的腐朽力量这一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符合反侵略战争的规律，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尽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它没有也不可能改变战争性质给予战争胜负的重大影响，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决定作用。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只要我们坚持打人民战争，敌人就是现在来，我们以现有武器打，最后也可以打胜”（《邓小平文选》）。当然，我们强调人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强调人民战争所具有的不可战胜的

力量，并不否定武器的重要性。相反，我们历来认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并一贯重视武器装备的改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和武器装备具有重要作用的统一论者，既反对形形色色的唯武器论，也反对战争问题上的唯意志论。我们已经有了—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今后还要在我国经济力允许的条件下，继续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不断改善我们的武器装备，增强人民战争的威力。

其次，人民战争能充分发挥我正义之战、地大人多、制度优越的优势。未来反侵略战争，是保卫祖国独立，反对霸权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战争的胜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因而最能调动全国人民参加战争的积极性；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有进行人民战争的广阔战场；中国人多兵多，有敌人无法比拟的雄厚的人力资源；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优越。中国共产党有巨大的号召力和组织力，能够动员和组织足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支援战争，能保证全国军民团结一致、英勇抗战。

第三，人民战争能充分发挥各种斗争形式的整体威力。战争不仅是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和主观指导能力的竞赛，而且是双方全部国力和各种斗争的较量。我们实行全国总动员，大打人民战争，就可以把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力量动员和组织起来，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以及心理等多种形式的斗争，使之与军事斗争密切配合，充分发挥整体威力，夺取战争的胜利。

第四，人民战争能广泛利用并扩大敌人的弱点、削弱其优势武器装备的作用。敌人虽是一个军力极强的大国，但它本质虚弱，有很多难以克服的弱点。如战争的非正义性及由

此决定的民心士气不振，异国作战造成的民情地理不熟、战线漫长、兵力分散、后方遥远、补给困难、战略上有后顾之忧等等。我们实行人民战争，就可以利用并扩大敌人的弱点，运用各种力量，采取多种手段，到处打击敌人，削弱其优势武器装备的作用，造成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条件，各个歼灭敌人。

总之，人民战争作为我军在历次革命战争中克敌制胜的法宝，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仍然是大有可为的。而且，在我军技术装备上仍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非此不足以战胜敌人。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历史在前进，战争在发展，今后我们所要进行的人民战争，是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较之以往的人民战争，条件将更为复杂、更为艰苦，将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因此，我们不仅要继承人民战争的光荣传统，更要在理论和实践的結合上给人民战争以新的发展和创造，使之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发挥更大的威力。在当前，尤其是要加强对人民战争威慑功能的研究，充分发挥其和平时期遏制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积极作用。

二、坚持持久作战

持久胜敌，是弱军对强军作战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一个基本观点。我军在历次革命战争中，都是以战略持久取胜的。所以如此，并非是我们主观上喜欢持久，而是客观情况要求我们必须这样做。因为实行战略上持久或速决，从根本上说，是由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地理诸因素相互对比的特点决定的，“是从全部敌我因素的相互关系产生的结论”（《毛泽东选集》第428页）。

未来反侵略战争，与可能对我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的霸权主义大国相比，敌我双方相互矛盾着的基本情况是：从政治上看，敌不义我正义。霸权主义所进行的侵略战争，必然是失道寡助，我们所进行的反侵略战争，必然是得道多助。从经济上看，敌强我弱。敌方是一个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经济力较强的工业大国，这对其发动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我国则是一个经济上处于发展中的国家，和敌相比差距颇大。但我人力物力资源雄厚，可为持久作战提供足够的物质基础。从军事技术装备上看，敌优我劣。敌军现代化程度高，技术装备先进，有发动突然袭击的手段和能力。但先进的技术装备又增大了对道路、后方补给的依赖性，造成其战线漫长、耗费巨大、补给困难等等难以克服的弱点；我军武器装备与敌相比虽处于劣势，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使我们能够利用并扩大敌人的弱点，扬我之长，击敌之短，使敌之优势大大减煞。

总括上述分析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政治上的敌反动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是敌必败我必胜的根本因素，经济上敌强我弱，武器装备上的敌优我劣又决定了敌人不可能很快失败，我们也不可能速胜，战争将是持久的。可以想见，如果敌人一旦对我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必将凭借其优势的武器装备，首先向我发动战略突袭，妄图初期制胜。它在进行战略进攻时，因其优势得到发挥，弱点尚未充分暴露而气焰嚣张，并能取得某些暂时胜利，我们的不利因素则难以迅速克服，战争潜力大、国际援助多等有利条件也难以立即发挥作用，因而将增加一些困难并蒙受一些损失。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敌必将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由进攻到保守到退

却，我们则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这就是未来反侵略战争可能的发展趋势。所以，我们在战略指导上必须树立持久作战的思想。要千方百计地粉碎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拖住敌人，逼它同我进行持久较量，只有这样，才能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最后打败侵略者。

三、立足于以劣势装备战胜敌人

立足于以劣势装备战胜敌人，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突出特点。尽管现在我军的武器装备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进，并将继续得到发展，但同霸权主义大国相比，差距仍然很大。武器装备上敌优我劣的现实状况，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将继续存在，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因此，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立足于以劣势装备战胜敌人，仍将是我军在战略上必须遵循的指导思想。它既体现了我们在战争问题上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反映了我们对正义之战敢打必胜的坚定信念。

首先，从根本上看，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马克思主义战争观认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战争的胜负归根到底取决于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未来反侵略战争，与霸权主义侵略者相比，我正义在手，人心所向，有人口众多、民族团结、幅员辽阔、资源雄厚等优势；有进行人民战争、持久作战、以劣胜优的优良传统等等，这些都是制胜敌人的根本因素，足以弥补武器装备等条件之不足。因此，从战争的总体上看，真正的优势不在敌方而在我们手里，这是我们最终战胜敌人的信心所在。

其次，从武器装备的作用上看，任何武器装备上的优势和劣势，从来都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而是相对的和有条件的，而且，在一定客观条件的作用下，二者可以互相发

生转化。落后的武器装备，固然有其弱点和不足，但在特定的条件下，有时会起到先进的武器装备所起不到的作用。同样，先进的武器装备自然有其长处和优势，但条件一旦发生变化，长处不但难以发挥，有时反而会成为累赘。如坦克、飞机等现代化武器，一旦断了油料，就很难发挥其优势作用。很显然，武器装备上的优决不是优的无懈可击，劣也绝不是劣的不能打仗。如果只是单纯的强调优势武器装备的作用，认为劣势装备不可能战胜优势装备，那是一种片面的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再说，与我军历史上的情况相比，现在武器装备上的敌优势我劣，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数量多少、质量高低的问题。我们已经具备了战胜敌人的一定的物质基础。

再次，从作战指挥上看，高敌一筹的作战艺术对战争胜负有重要影响，有时甚至起决定性作用。我们知道，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力量的强弱是决定战争胜负的物质基础，这是为历代战争实践所证实了的基本的军事斗争常识。但是，我们也应看到，物质力量上的强弱固然重要，但战争并不仅仅是物质力量的竞赛，而且是智力的竞赛。所谓智，即是指人们认识战争和进行战争的能力，它包括一切有关作战的技术、战术、战略、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以及把他们运用于战争行动的能力。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54—455页）。可见，在两军相杀的战争中，要想赢得胜利，既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更要有高敌一筹的战争指导。有了高敌一筹的作战指导，就能够使敌之优

势大大减煞，使我之劣势转化为优势，被动转化为主动，最后战胜敌人。战争史上，武器装备处于优势但因作战指导错误而失败，或武器装备虽处于劣势，但却由于作战指导正确而获胜的事例是非常多的，尤其是中国革命战争以劣胜优的伟大实践，更是对此作了最充分、最雄辩的说明。未来反侵略战争，同霸权主义大国相比，我军在武器装备上处于相对劣势地位，这是不容否认的。但就作战指导来说，却未必比敌落后。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还要胜敌一筹，因为我们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正义之战基础之上的。只要我们在一定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地讲究作战艺术，充分发挥我指挥灵活、善用谋略的长处，发扬我本土作战、人民战争、地形有利、预有准备的优势，发扬我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连续作战和近战夜战的长处，就能够最大限度的限制敌武器装备优势的发挥，抑敌之长、补我之短，扬我之长、击敌之短，最后实现以弱胜强的战争目的。

必须指出的是，把以劣胜优作为我们的战略指导思想，强调以劣势装备战胜敌人，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安于落后、不求进取，也绝不意味着以劣势装备就可以天然的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而是说我们必须从敌我双方的客观实际情况出发，在武器装备敌优我劣这个现实的基点上，确立我们的作战原则和作战方法。事实上，任何一场战争，最后的胜负总是以力量上的强弱来见分晓的。我军强调以劣胜优，实质上也在通过一系列巧妙的作战来转化敌我力量对比，只有当我力量超过敌人时，才能最后战胜敌人。因此，我们在强调立足于以劣势装备战胜敌人的同时，还必须十分重视发展

我们的武器装备，不断提高我军在现代化条件下的作战能力，任何轻视或忽视武器装备的主要作用，片面的夸大人的作用的观点和作法，都是十分有害的。

四、坚持歼灭战的作战方针

歼灭战，通常是指作战效果说的。就作战效果来说，一般的有歼灭战、击溃战和消耗战三种。所谓歼灭战，就是歼灭敌人全部或大部的作战。所谓击溃战，是指把敌人打跑打散而很少俘获的作战。消耗战则有两种含义：一是指消耗敌人力量的作战，目的是逐渐改变敌我双方力量强弱的对比，最后战胜敌人。这种消耗战，主要是从战略意义上说的。二是指战役战斗上的消耗战，即虽给敌人以杀伤消耗，而自己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得不偿失或得失相当的作战。

歼灭战是进攻战的基本原则，也是我军一贯的基本的作战方针。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我军作战“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20页）击溃战虽然一般地也算胜仗，但效果远不及歼灭战，故为我军历来所反对。而战役战斗上的消耗战有时可能是必要的，但从战争的全过程来讲，它则是辅助的。就三者的相互关系来看，一般地讲，战略上的消耗战只有通过战役战斗上的歼灭战才易达成，而战役战斗上的歼灭战有时则需要消耗战或击溃战进行配合。同样，战役战斗上的击溃战、消耗战只有在对我军对敌实行歼灭作战有配合作用时才有意义。实现歼灭战需要有一定的条件，一般地讲主要有：①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各个歼灭敌人；②先打弱敌，后打强敌；③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④发扬优良的战斗作风和近战夜战的特长。

歼灭战是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和一贯的作战指导思想。未来反侵略战争，我军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仍将坚持打歼灭战的作战方针，其主要理由：

一是坚持打开灭战，是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基本要求。我们知道，所谓积极防御，就其本质而言，就是运用攻势防御、决战防御的思想指导战争全过程，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通过持久作战，为自己创造一定的优胜条件。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说战略上的内线持久防御要与战役战斗上的外速速决进攻相结合，二是说战略上的防御最后必须导向反攻和进攻。因为只有战役战斗上坚持外线速决的进攻战，战略上内线持久防御的目的才能得以实现；同样，只有把战略防御最终导向反攻和进攻，同敌实行战略决战，才能真正实现后发制人的战略目的。

由此可见，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是同进攻紧密联系着的，是以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其基本着眼的（在未来战争初期情况可能稍有不同）。积极防之所谓积极，其实质就在于寓攻于防、攻防结合，防是为了攻，防最后必须导向进攻。相反，如果没有进攻，没有歼灭战，积极防御也就只是一句空话。所以我们说，在战略防御的形势下，在战役战斗上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是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基本要求。对此，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有过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战役战斗的外线速决的进攻战，“这对于我之战略方针、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说来，是相反的，然而，又是实现这样的战略方针之必要的方针”。“我们坚决地采取了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就不但在战场上改变敌我二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形势。在

战场上，因为我是进攻，敌是防御，我是多兵处外线，敌是少兵处内线，我是速决，敌虽企图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于是在敌人方面，强就变成了弱者，优势就变成了劣势；我军反之，弱者变成了强者，劣势变成了优势。在打了许多这样的胜仗之后，总的敌我形势将引起变化。这就是说，集合了许多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胜利之后，就逐渐地增强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于是总的强弱优劣形势，就不能不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到那时，配合着我们自己的其他条件，再配合着敌人内部的变动和国际上的有利形势，就能使敌我总的形势走到平衡，再由平衡走到我优敌劣，那时，就是我们实行反攻驱敌出国的时机了。”（《毛泽东选集》第453—454页）。

二是歼灭战能最有效地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争目的。众所周知，作为人类流血的政治——战争，两军相争的根本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就两者的关系而言，一般地说，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而保存自己的目的，又在于大量的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目的，也是战争的本质和一切军事行动的基本原则。不论是技术、战术，还是战役、战略，都以这个根本目的为出发点。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穿于战争的始终。

实现这个战争目的的手段，亦即基本作战类型，是进攻和防御。虽然在某一战争阶段，防御可能是主要的，但从战争的全部过程来说，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的防御，则是第二位的。

实现这个战争目的的效果，以歼灭战最为有效。击溃战

和消耗战虽有一定作用，但与歼灭战相比，则有极大不同。因为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被击溃之敌虽受挫折，但经过整顿补充仍可再战。而“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毛泽东选集》第220页）当然我们也要看到，由于战争情况十分复杂，在战争之某一阶段，击溃、消耗可能会多于歼灭，但从战争的整个进程来说，我们要力争多打歼灭战，尽量减少击溃战和消耗战。

三是歼灭战是改变敌我优劣形势，夺取战争最后胜利的关键。众所周知，战争是力量的竞赛，力量的强弱不仅是战争中被动和主动的重要条件，而且是最后决定战争胜负的客观物质基础。因而，设法转化敌我之间力量强弱的对比，为自己创造最后战胜敌人的优胜条件，是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基本要求。而要实现此目的，根本的就是要在战役战斗上实行歼灭战的作战方针，不战则已，战则全歼。只有这样，才能使敌之有生力量逐渐丧失，使敌越战越少。越战越弱。

总之，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必须坚持打歼灭战的作战方针，没有歼灭战，也就无所谓积极防御。需要指出的是，未来反侵略战争，将是一场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由于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我们将面临许多与以往不同的新情况。就歼灭战的运用来说，也会跟过去大不相同。特别是在未来战争初期，由于我军将以坚守防御阵地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战役战斗上的消耗战意义将要增大，而歼灭战将要受到一定的局限。从地位上讲，战争初期的歼灭战从属于坚守防御阵地战，为坚守防御目的服务。从规模上讲，只能打中

小规模歼灭战，一般每次歼敌以个把团到两个团，或个把营到两个营为宜。从场合上讲，一般的是在我防御地幅内的预设战场上进行，在条件有利时也可主动出击。从集中兵力的要求上讲，不仅要求集中优势兵力，而且要求集中优势火力，尤其要形成反坦克火力优势；要快速适时；要掌握强大的有机动力的预备队；要采取有效措施，提高部队的生存能力等等。总之，未来战争初期的歼灭战，将会出现许多新特点，我们不仅要继承我军打歼灭战的光荣传统和丰富经验，而且要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使我们的作战方法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客观实际，这是战争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四节 战略作战原则

战略作战对战争全局有重大影响。因而，确定战略作战原则，是战争指导的重要内容。根据战争的历史经验和我国未来反侵略战争可能面临的实际情况，我军的战略作战原则主要有：

一、知彼知己，力求主观指导符合战争的客观实际

知彼知己，熟悉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认识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使主观指导符合战争的客观实际，是战争指导的唯一正确的思想方法，也是战略作战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战争的历史经验表明，大凡能把战争的大船驶向胜利的彼岸的指挥员，都是既熟悉敌军、又熟悉己军，也熟悉一切与战争相关的政治、经济、地理、气象等条件，使战争的主观指导符合了客观实际的结果，而那些明于知己、暗于知彼，或明于知彼而暗于知己的指挥员，是没有不吃败仗的。

我们承认战争现象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但是，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战争也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不管战争情况怎样复杂，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总是可能的。

我国是处于战略防御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知彼知己对战略指导更加重要。在和平时期，就要密切注视世界局势的发展变化，正确估计世界上战争力量与和平力量的对比及其发展趋势，对左右世界局势特别是威胁世界和平、对我执有敌意的国家，应有全面、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详细了解它们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科学技术状况，掌握其内外政策的变化，从而判断战争的威胁程度，及时采取对策。同时，对我国国内各方面情况的发展变化，也应有定期的全面系统的调查研究，并与威胁我国安全的外国势力作出系统分析比较，作为战略决策的依据。

在出现战争危机形势时，应采取各种侦察手段，及时察明敌对国家扩军备战的战略动向，判明其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及战争可能爆发的时间、方式、战略企图、可能使用的力量和主要战略突击方向。战争一旦发生，就要强化战略侦察，迅速及时地搜集和处理情报，随时判明整个战略形势的变化，掌握战略态势的发展，指出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据此确定或修正我之战略计划，指挥战略作战的进行。这样，才能使战争的主观指导始终建立在符合客观实际的基础上，保证战略指挥的正确。

二、依据战争情势，选定有利的作战形式

作战形式，是实现战争目的作战方法。作战形式的选择是否恰当，对战争胜负有着重大影响。因此，在战略指导

上，必须把选定作战形式作为重大战略决策问题来对待。

一般地讲，战争中的攻防活动，依据军队的集中程度和流动性大小，可区分为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三种作战形式，它们是从攻防这两种基本作战类型中衍生出来的，随战争的产生而产生，随战争的发展而发展。所谓运动战，就是正规兵团在长的战线和大的战区内从事于战役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作战形式。所谓阵地战，是指军队在相对固定的战线上，进行阵地攻防的作战形式。包括坚固阵地攻防作战，野战阵地攻防作战，城市和海岸、海岛的攻防作战等。所谓游击战，则是分散流动的作战形式。在这三种作战形式当中，前两种属于正规战，后一种属于非正规战。对我军来说，运动战和游击战适合于发挥人民战争威力，因而是我军的传统作战形式。

有利的作战形式的选定，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从战争的客观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这里要着重注意以下三点：一是根据战争实际，选定主要作战形式；二是依据敌我力量对比和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适时转换主要作战形式；三是要把主要作战形式和非主要作战形式有机结合起来，发挥整体威力。正如朱德同志所指出的：“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三种的配合，是战胜敌人所必须采取的战法，是每个优秀的军事家所应当郑重考虑的原则”（《朱德选集》第37页）。在未来战争中，由于敌我双方都有许多新的变化，我军在作战形式的选定上也会出现一些新的特点，基本的情况是：运动战将有新的表现形式和作用，阵地战的作用将提高，游击战仍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并将增加一些新的手段和战法。在具体运用当中，将在注意发挥三者整体威力的

同时，视战略阶段、方向和情势的不同，适当调节三者的份量。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随着现代兵器的发展，战略作战形式也将有新的的发展。空袭反空袭、空降反空降，更会成为常见的作战形式。同时，由于诸军种技术装备的性质不同。作战行动的空间条件不同，也会有不同的作战形式。不仅海洋作战、空中作战会有新的作战形式产生，核战和天战也将有独特的作战形式。因此，战争中不仅应依据不同的客观情势，选用已有的作战形式，而且要创造和发展新的作战形式，并将各种作战形式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达战胜敌人的目的。

三、正确选定主要战略方向，集中使用并正确部署兵力

正确选择战略主要打击方向，集中使用并正确区分兵力，善于建立有利的战略部署，创造有利的战略态势，保证在主要方向（战场）的决定性作战中，形成压倒敌人的优势力量，是达成战略作战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

战略主要方向的正确选定，来源于对战略情势的正确判断。战略防御的主要方向，应针对敌人的战略主攻目标而又对我威胁最大的方向。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最好是指向敌人的战略要害而又兵力较弱的方向。

战略部署，是区分和配置武装力量，构成便于战略作战的阵势。它要集中陆军、空军和海军主力于主要方向，以必要兵力用于次要方向，建立并保持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布成全面而有重点的，内外线配合的、大纵深的、立体的战略作战体系。保证在决定性的时机和方向能以压倒优势的武装力量，给敌以歼灭打击。

在敌技术装备优势的条件下，我之兵力机动和火力打击范围均受到一定限制，故在战略全局上和各军种、各战区的兵力机动和火力运用上，应有多种方法，作多手准备，并应加强战略伪装和掩护措施，以保证集中兵力火力的顺利实施。

四、坚定灵活，力争和保持战略主动权

主动权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而“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去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55页）因而，力争和保持战略的主动权，是战略作战的重要原则，必须贯彻于战争的始终。

主动权的客观基础是战争力量的优势，但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却可以取得或丧失主动。就战争实践经验来看，战略指挥的坚定性和灵活性，是争取和保持战略主动权的最重要的主观因素。所谓坚定，是指战争指导对战争抱有必胜信念，能够在任何危险复杂困难情况下，坚定沉着，冷静判断情况，当机立断地做出决策，并以坚持到底的决心和毅力顽强贯彻下去的一种精神素质和心理素质。坚定性在争取和保持战略主动权的战争行动中，在实现作战计划夺取作战胜利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情势不利或陷于被动时，它往往成为战争指挥者从不利中走向有利，从被动中争取主动的关键。战争史上不乏这类例子。当然，正确的坚定性与盲目的固执决不是一回事。所谓灵活，是指聪明的战争指挥者，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灵活性主要表现为灵活地使用兵力和运用战法，这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和保持战略主动

权的灵魂。我军在过去战争中创造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锻炼了大批善于灵活用兵的指挥员，积累了丰富的灵活作战的经验，这在今后的战争中，仍然是非常有用的宝贵传统，必须继承和发扬。

未来反侵略战争，敌以先发制人的方式向我发动战略进攻，占有战略主动地位；而我处于战略防御地位，具有一定的被动性，因而争取和保持战略主动权将更加困难。为此，在战争指导上，必须更加强调和发挥坚定性和灵活性。在战争未爆发前，就要密切注视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掌握敌人的战略动向，及时揭露敌人发动和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作好积极的应战准备，力争和保持我在政治上、战争准备上的主动地位。在战争爆发后，在作战中更要善于利用各种有利条件，以主观指导上高度的坚定性和灵活性，争取和保持战略上的主动权。如善于扬我之长，击敌之短；善于利用我人民战争的优势，发现和扩大敌人的弱点，造成敌人的错觉和不意，使其陷于被动不利的地位；善于创造新的作战方法，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善于根据情况变化，及时作出快速反应，抓住有利战机，当机立断，采取有利措施，迫敌处于被动地位等。

五、坚持有计划有准备有把握的作战

战争是“死亡之地，存亡之道”。尤其是战略作战，更是直接关系到全局的胜败。因而坚持有计划有准备有把握的作战，对战略指导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曾把“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作为十大军事原则之一。今后战争条件虽已改变，但这一条普遍规律，仍应坚持贯彻。

从整个战争来说，所谓有计划有准备有把握，内容是十分复杂的。从战略作战的角度讲，主要强调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在战争没有发生之前，应有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的战争观念。要根据战争威胁的程度，保持相应的战争准备，把战备建设建立在长期打算的基础上。同时，又应保持必要的应急准备。事实说明，反侵略战争准备具有遏制战争和保证打赢战争的双重意义。战备工作做得越好，敌人就越不敢轻举妄动，保持和平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敌冒险发动战争时，我们争取主动，战胜敌人的把握也会增大。二是在战争爆发后，整个战争以及每一战争阶段、每一战局和战役，都应有周全的计划和准备。尤其是战争初期作战，对战争全局及整个战争的发展影响极大，因而更应坚持慎重初战和初战必胜的原则。总之，一切带有决战性的战役、战略作战，都必须切实建立在有力、有利、有把握的基础上，并认真做好组织计划和准备工作，不可轻敌鲁莽。

六、组织保障战略协同，协调一致地打击敌人

未来反侵略战争，将是诸军兵种协同进行的现代人民战争。在统一的战略意图和计划下，协调一致的行动，是取得作战胜利的重要条件。

应当看到，现代战争战场空间扩大，地面、空中、海上以至外层空间，都将同时进行交战，情况变化急剧，诸军兵种协同动作复杂，不仅对战役协同，而且对战略协同提出了比过去战争更高的要求。诸军兵种之间，野战军与地方军及民兵、游击队之间，前方与后方之间，各战区、各战略集团、各个战场之间，必须有周密计划，统一指挥，才能协调一致地打击敌人。

战略协同，应根据最高统帅部的战略计划，以承担主要作战任务者为主组织。在组织协同时，要根据战略作战任务和各种武装力量的作战能力，明确规定其各自的作战任务和协同的方法，并以各种指挥方式和通信联络手段保障。当协同失调或遭到破坏时，应迅速予以调整和恢复。各种武装力量必须树立全局观念，充分发挥作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坚决执行协同计划，独立自主地完成任务，并主动配合和支援友邻作战。

七、巧妙运用战略核武器的威慑和破坏作用，遏制敌人的核威慑和袭击

当今时代，随着军事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战略核武器及其他战略兵器，已经成为一种具有毁灭性打击和威慑作用的战略力量，是现代战略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核武器实际使用的可能性不大，但它的威慑作用不能低估。因而，战争指导者必须把对付核威慑和运用战略打击兵器，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

我国是掌握了战略核武器的国家之一。但我国政府再三声明，我们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而且一贯主张世界上有核武器的国家，首先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应彻底销毁全部核武器。然而必须看到，在两个超级大国不放弃自己的核武器政策的情况下，为保卫国家安全，对付核威慑和核讹诈，我国仍要把核武器作为一种战略力量加以运用，以增强自己保卫国防的能力。在今后的反侵略战争中，我必须巧妙地运用自己的战略打击兵器，配合其他手段，遏制敌人的核威慑，反击敌人的核或非核战略兵器的袭击。

遏制敌人的核威慑，首先是通过巧妙地显示自己的核力

量对敌进行反威慑，使敌既能感受到我战略核武器的威慑作用，又摸不清我之核力量的真实情况。其次是及时揭露敌使用核武器的阴谋及其以各种手段施行的核讹诈和核威慑，鼓动世界和敌国人民起来反对其使用核武器，再次是以核反击回答敌人的核袭击。

核反击是在敌人首先使用核武器后的一种后发制人的行动。采取核反击战略，首先必须使自己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和灵敏的反应能力，提高自己战略打击兵器的生存能力，以确保在遭敌核袭击后，保持有效的还击能力。其次对核反击目标必须预先作选择，做好反击的精密准备。三是准确把握反击时机，既要有预定方案，更要有临战决断。四是建立可靠的情报、通信、指挥系统，确保最高统帅部核反击决心的制定和下达。

核武器的使用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必须在坚持反对使用核武器的前提下，善于巧妙地运用各种遏制手段，制止其使用。当被迫施行核反击时，也应严格节制，极力防止和限制战争升级，同时必须做好本国的防护。

八、严密组织防空防天斗争，保障作战和生产的顺利进行

现代战争，随着现代战略、战役空袭兵器的发展，战时全体军民的防护越来越具有不可忽视的战略地位。没有严密的防护，任何国家，特别是处于防御地位、装备劣势的国家，将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因此，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必须严密组织对敌人常规空袭兵器及核、化学、生物武器的防护，以有效地保存军力、民力和国家的组织系统和生产力。组织防护，应普遍而又重点地利用和加强各种防护措施。

施，采取疏散隐蔽和伪装措施，并要大力组织消除空袭后果的工作，力争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严密防护必须与积极抗击和坚决的反击结合起来，形成防反结合的防空防天斗争体系。要建立和健全战略预警和指挥控制通信系统，采取各种可能采取的手段，打击和干扰、诱骗敌人从外层空间、空中、地面和海上来袭的兵器，压制和摧毁敌人来袭兵器的基地，力争将敌空袭兵器消灭在对重要保卫目标危害最小的空间。

九、动员组织战略后方的人力物力，大力支援战争

未来大规模的反侵略战争，将是立体的，全方位的，同时在全纵深进行。战场很难保持有整齐的战线，前方、后方无明显界限。战略指导上必须统筹前后方作战，建立和保持巩固的后方，动员和组织后方的人力、物力，大力支援战争，同时应加强后方防卫作战的指挥，保障后方对敌斗争的胜利。

现代战争物力消耗迅速、巨大，所需的武器装备、燃料、给养和其他物资，将主要依靠后方供应。为保障作战需要，必须在战略后方建设的基础上，充分动员和组织后方的战时生产，合理分配和节约使用后方的人力、物力，并组织好后方的交通运输，保障交通运输的畅通。军队本身要加强后勤建设，建立统一的后勤保障体系，提高综合保障能力。各战略区要充分利用战区的人力、物力条件，力争做到就地动员，就地组织生产，就地供给。

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常备军的多寡和强弱，而且取决于后备力量的数量和质量，为使战时有充足的后备力量及时补充军队，保障军队的持续作战能力，必须在平时建立起完

善的动员体制，按照战争动员法和兵役法，加强对后备兵员的训练，有计划地储备后备兵员和物资，保证战时能以数量多、质量好的兵员源源不断地输运给作战部队。

十、军事斗争与非军事斗争密切配合

战争不仅是敌对双方军事力量的较量，而且是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种力量的全面较量。军事斗争是战争的基本形式，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非军事的斗争，则直接或间接地配合着军事斗争。在战争中，没有军事斗争的胜利，其他各条战线的斗争便失去了支柱和发展的条件；而没有其他各条战线的有力配合和支援，单纯的军事斗争也难以取得最后胜利。因而，战略作战要非常重视并善于把军事斗争与非军事斗争结合起来，去争取战争的全面胜利。

未来反侵略战争，非军事斗争将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而且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其条件和内容将更加复杂。因此，更应把军事斗争同非军事斗争紧密结合起来，配合军事斗争，组织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条战线的斗争，形成全面的人民战争，以达战争全胜的目的。政治外交上，对敌人的欺骗宣传和政治、文化渗透活动要进行坚决的斗争，本着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原则，对敌人区别对待，利用和扩大敌人营垒内部的矛盾，分化瓦解之。要积极开展国际统一战线工作，联合世界上所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反对侵略者的战争政策。经济上要采取积极措施，粉碎敌人对我经济的破坏和封锁。同时，要积极利用战争中缴获敌人的技术装备和获取敌人的科技情报，发展我之科学技术和生产。

第七章 中国的武装力量

武装力量是国家各种武装组织的统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组成。其主要任务是：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的和平劳动，参加国家建设事业，努力为人民服务。武装力量建设是反侵略战争准备的最直接、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建设的基本方向是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

第一节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成和任务

中国人民解放军由陆军、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组成。它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的，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坚强柱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骨干。它在完成党和国家赋予整个武装力量的任务中起着主要作用。

1. 陆 军

陆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军种。它由步兵（包括机械化步兵、摩托化步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等兵种和其他专业部队组成。陆军既能单独作战，又能与海、空军合同作战，既能打常规战争，又能打核

战争，具有在各种情况下实施作战的能力，是战胜入侵之敌的主力。

我国陆地面积广阔，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之一。陆战场是历次反侵略战争的主要战场。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陆战场军事行动的规模是很大的，陆上作战仍将占居主要地位，战争的结局仍须依靠陆军的地面作战。

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陆军在其他军种的协同下，主要担负抗击敌人陆上入侵和在陆战场执行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作战任务，坚守和夺取战略要地，围歼敌军战略集团，消灭、驱逐入侵之敌。在边境地区发生的军事冲突和局部战争中，担负自己还击和击退入侵之敌，保卫国家边防的安全。

根据陆军的战略任务，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陆军的武器装备要进一步得到改善，重点加强以导弹为主的防空武器、反坦克武器和直升机，并相应增建新的兵种进一步加强快速反应能力、电子对抗能力和机动能力，建立和健全自动化指挥系统，以提高陆军的合同作战能力。

2. 海 军

海军是以舰艇部队为主体的军种。它由潜艇部队、水面舰艇部队、海军航空兵部队、海军岸防兵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等兵种及各种专业勤务部队组成。是国家维护领海主权的主要武装力量。它具有在水面、水下、空中和濒海地区作战能力。能单独在海上作战，又能协同陆、空军作战。

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海军将在陆、空军和海上民兵的支援配合下，防御敌人从海上来侵略，坚持海上斗争，配合陆战场作战；协同陆、空军收复敌占岛屿，统一全部国土；保卫我国领海，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主要任务是：

独立地或协同陆军、空军作战，抵御敌人来自海洋方向的进攻；保护我海上交通运输线，打破敌人的海上封锁；破坏敌人的海上交通线；对敌实施海上封锁；参加战略核反击作战；在海上实施战略反攻和进攻。

根据海军的作战任务，运用海军应掌握以下原则：实行海上人民战争；坚持海上持久战；坚持以近海为主要战场；努力控制海上战场的战略战役要地；积极开展海上破袭战；积极配合陆上战场作战；充分做好海上作战准备。

3. 空 军

空军是以航空兵为主体的军种。它由航空兵、高射炮兵、地空导弹兵、雷达兵等兵种和各专业部队组成。空降兵隶属空军建制。空军具有远程作战、高速机动和猛烈突击能力，是空中作战和从空中对敌地面目标实施突击的主要力量，也是对空作战的重要力量。

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空军在国土防空和支援陆、海军作战中将担负的主要任务是：

组织和实施防空作战，保卫国家主要战略目标，掩护军队战略展开，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协同、支援陆军海军作战，争夺并保持主要战略方向上重要时节的制空权，为陆军海军作战创造有利条件；突击敌军队集团、重要军事设施、后方基地、交通运输系统等重要目标；支援转入敌后作战的游击武装；独立地或协同其他军种的战略兵力，对敌人实施战略突击，削弱敌人的战争潜力；参加战略核反击作战；组织实施战略性的航空侦察、军事运输和空降作战等。

根据空军的作战任务，运用空军应掌握以下基本原则：严密防护，积极打击；分散配置，集中使用；统筹兼顾，分

清主次，灵活机动，出奇制胜；主动配合，密切协同。

4. 第二炮兵

第二炮兵是使用地对地战略导弹核武器的一个军种，是实施核反击的主要力量。它由中程、远程、洲际地对地导弹部队以及工程建设、侦察、气象、测地、计算、通信、防化、维修、运输等保障和专业技术勤务部（分）队组成。

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第二炮兵将在敌人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前提下，单独或协同其他军种实施核反击。其担负的主要任务是：

发挥核威慑作用，遏制敌人可能对我国发动的核战争，并为我国的和平外交政策服务；遏制敌常规战争升级为核战争，在我国遇到敌核袭击时实施核反击，打击敌人的战略目标，削弱其战争潜力和战略突击力量；打击敌政治、经济中心，主要工业基地，特别是敌心脏地区城市目标，瘫痪其国家管理和军事指挥系统，在条件具备时，也可根据战场形势的需要打击敌重兵集团，特别是敌战略预备队，削弱其地面部队的作战能力。

根据第二炮兵的作战任务，运用第二炮兵应掌握以下基本原则：指挥高度集中统一，严格控制使用；严密防护，抗敌突然袭击；选择重要战略目标，进行重点打击；灵活使用阵地，适时机动兵力；充分准备，全面保障；主动配合，密切协同。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设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武装力量的主体，是共和国的捍卫者。未来反侵略战争将是一场大规模的现代化立体战争。要想经得住这场战争的严峻考验并夺得胜利，非有一个强大

的人民军队不可。因此，党和国家十分注重解放军的建设，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讲话中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社会主义的捍卫者、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是共和国的钢铁长城。全党和全国人民在集中力量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要十分重视和加强国防建设，重视和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全民族的国防意识，努力推进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军建设的正确方向。杨尚昆同志在《建设一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军队》一文中阐明了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关系，指出：“这三化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缺一不可的，是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

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是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是我军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由之路。它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符合我军发展的需要，符合党的十二大精神，符合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体规划，因而是完全正确的，必须坚决贯彻。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并不是不要革命化和正规化，而是要围绕这个中心全面加强我军建设，做好各项工作。毛泽东说过，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从一定的意义上说，正规化就是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内容，离开了正规化的现代化，不是真正的现代化。至于革命化建设，更是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我们要保证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保证我军的无产阶级军队性质，保证广大指战员建设军队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保证克服现代化建设中所谓遇到的困难，加速建设的步伐，就非有强有力的革命政治工作不可。

1. 革命化建设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军队。这是它的最大特色。这一特色必须永远发扬光大。为了卓有成效地加强我军革命化建设，必须结合我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情况，新任务，新问题，认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实事求是地继承和发展我军政治建设的各项基本原则。要坚持党和国家对军队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使军队永远保持一切听指挥的优良传统作风；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部队，使我军成为政治觉悟很高，战斗力很强的精锐之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三大原则，发扬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使军政，军民，官兵关系更加密切，形成坚如磐石的整体力量；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扎扎实实地建设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的干部队伍，坚决把那些思想解放，勇于创新，立志改革，能够开创新局面的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把各级领导班子配备好，使之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符合现代化战争的需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使我军广大指战员都具有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爱国主义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的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和必定要胜利的精神。革命化建设搞好了，就可以保证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健康地发展。

2. 现代化建设

毛泽东同志关于军队建设的基本思想是，建设一支由无

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具有新式技术装备，现代化军事素养和革命政治工作的人民军队，以这支军队为核心，实行正规军，地方军和游击队，民兵三结合，战时实行全民皆兵的人民战争的武装力量体制。这也是毛泽东同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表述的人民武装力量建设的基本思想。

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是中央军委的英明决策，是我军向高级阶段发展的必由之路。它适应现代战争的要求，符合我军发展的需要，符合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总体规划，也是军队建设的客观规律，因而必须坚决贯彻。

军队的现代化建设，应该在发展国民经济的基础上量力而行。它受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军事战略，科学技术水平，军队在未来战争中的任务和战场条件，以及国际形势等因素的制约。我们的国情军情跟别的国家不同，我军的现代化建设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应当坚持“中国式”，适合中国国情，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军队，必须依靠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依靠千百万群众的集体智慧，通过实践去摸索，去创造。在现代化建设中，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以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为依据，与国家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水平相适应，符合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特点和要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军队现代化建设着重研究如下几点：

（1）改进和发展武器装备

武器装备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军队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要实现我军的现代化，就必须大力改进和发展武器装备。列宁说过：“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武器，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谁都会认为这种

行为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我军现有武器装备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相比，还有不少差距。我们仍然要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同时，必须在国民经济力所能及的条件下，认真改进武器装备尽量缩短这方面的差距。

我军发展武器装备要从抵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家的安全出发，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逐步提高我军在现代条件下的自卫能力。首先要集中力量发展我们急需的防御性武器；其次要循序进行，梯次换装，允许老式装备与新式装备同有，一般技术与先进技术并存。要以发展常规武器为主，适当发展一些核武器和其他尖端武器。在常规武器中，应以反坦克，防空武器为重点。要加强与改进现有武器装备，提高其战斗性能，同时要努力研制和生产新式武器装备，使我军武器装备得到更新，逐步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2）加强教育训练

毛泽东指出：“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锻炼部队，一是靠打仗，一是靠平时训练。”训练有素是部队战斗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克敌制胜的重要条件，所以，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他说：在不打仗的条件下，考验干部，提高部队素质和战斗力，都要从教育训练着手。

加强教育训练的内容很多，我们在这里着重研究军事训练问题。军事训练的指导思想 and 基本任务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为依据，从现代战争的需要和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出发，研究解决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立足现有装备，照顾发展，准备打常规战争，也准备打核战争，研练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

备敌人的战法；树立合同作战思想，加强诸军兵种协同作战训练；针对敌情，结合作战任务和战区特点，从实战出发严格训练，严格要求。

（3）改革体制编制

实现军队现代化，还要有合理的体制编制，使武器装备和训练有素的人密切结合起来。这是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保障未来反侵略战争胜利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在上一世纪中叶曾经指出：“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须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现代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使作战方式发生重大变化，它要求军队的编组与之相适应。要使我军成为一支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很强的精锐之师。

改革体制编制要根据我军的实际情况，主要是：压缩军队定额，精简机关，裁并重叠机构，减少普通兵员，淘汰陈旧装备，有些部队平时实行简编编制，保留技术骨干和技术装备，保持一定数量的齐装满员部队，有重点地加强特种兵部队和院校，科研机构；要坚持合成的原则，在编制体制上要把诸兵种合理调整在一个整体上来；要坚持平战结合，改革体制编制，既要考虑平时，又要考虑战时，既有利于平时建设，又有利于打仗；要着眼于提高效能，有利于发扬我军优良传统，提高部队快速反应能力，适应现代化战争需要。

（4）大力开展军事学术研究

先进的军事思想是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我军在历次革命战争中，之所以能以劣势装

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我们有先进的毛东东军事思想作指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法等国在对德作战中，之所以遭到失败，重要原因之一是军事思想落后。现代战争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战争，我们的军事思想要不落后于形势的发展，就必须十分重视军事学术研究。

军事学术研究，必须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自觉解放思想，广泛发扬学术民主，把毛泽东军事思想同现代战争的实际结合起来，把学术研究同武器装备的试验和部队演习结合起来，注重研究新情况，切实解决新问题，真正有所创新，有所发展。要认真研究敌我双方的全面情况，力求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探讨克敌制胜的有效办法。对敌人的研究，不仅仅是军事方面，还有政治，经济诸方面。在军事上，不仅要研究其过去的作战经验 and 战史，战例，更要突出研究其现实的编制装备，战略战术、指挥特点，以便从中看它的军事思想，军队管理，教育训练和作战特点等。对我们自己，也不能满足以往的成功经验，而要下力气研究我们的国情和现状，研究我们训练演习中的问题，研究现代条件下如何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问题。同时，对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战争历史和经验，以及古今中外著名军事家的军事思想和实践，也应进行必要的研究，做到“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通过多方面的学习研究，把我军的军事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军事学术研究的当务之急是快出研究成果。这是现代条件下建军、备战和作战的迫切要求。为此，应破除陈旧观念，把革命的首创精神与科学态度结合起来，进行学术攻关。通过学术攻关，提出新观点新战法，创立新学科，发展

我们的军事思想。

3. 正规化建设

正规化是现代化革命军队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军队越是现代化，就越要强调正规化。毛泽东早在一九五二年给军事学院的训词中就指出：“与现代化装备相适应的，就是要求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就是要求实行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统一的训练，就是要求实现诸兵种密切的协同动作。为此，就需要克服在过去时期曾经是正确的，而现在则是不正确的那种不集中、不统一，纪律不严，简单现象和游击习气等等，而必须加强整个工作上、指挥上，而首先又应该是从教育训练上来培养的那种组织性，计划性、准确性和纪律性。这是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所不可缺少的重要的条件之一。”彭德怀在一九五四年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总结讲话中说，正规化就是要把全军的各方面用正式的规格，即条令的规定统一起来，作为每个军人遵守的法典。这些精辟论述对当前我军进行的正规化建设仍有现实指导意义。

为了加强我军正规化建设，使我军具有严整的军容，紧张的工作作风，严密的组织，科学的管理，密切的配合，准确的行动，以及正规化的生活秩序等，应采取一系列正确措施，诸如：颁布并坚决执行各种条令，条例和规章制度，把我军全体将士、各个方面，都引导到正规化的轨道上来；加强领导，注重日常养成教育；加强正规化的教育训练；按照正规化的要求，改革军队体制编制等。

第二节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一、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组成和任务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担负国家安全保卫任务的一支武装力量，是公安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由内卫武警部队、边防武警部队、消防武警部队、特种武警部队等组成。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成立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成立人民武装警察总队；地、市、州、盟公安处、局成立人民武装警察支队；县、市、旗公安局成立人民武装警察大队或中队。总队、支队政委、大队政教分别由省、地、县公安部门的负责同志兼任。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担负着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维护社会治安，保卫党政领导机关、重要目标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任务。战时，它还要协助人民解放军作战，抵抗侵略，保卫祖国。各种武警部队的具体任务分别是：

内卫武警部队：镇压反革命；追捕逃犯，逮捕、押解、看守犯人，看押劳改犯、护卫劳教场；警卫党政机关、外国使领馆、重要首长、重要外宾、重要会议、临时现场、路线，守卫机场、电台、重要厂矿、仓库和尖端科研单位，守护重要桥梁、隧道等目标，执行城市治安巡逻，以及应付各种紧急、意外情况等。

边防武警部队：对边境地区的治安管理，防范与打击入潜外逃的敌特分子、小股武装敌特的袭击破坏活动，打击走私贩毒分子的违法犯罪活动；在开放口岸，对出入境人员和交通工具实施边防检查和监护；保护边境地带和领海内的国

家和人民财产，保卫边境居民不受侵害。

消防武警部队：同火灾作斗争，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特种武警部队：对付劫持飞机的罪犯和各种恐怖活动。

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所担负的任务是十分光荣复杂的，既有公开斗争，又有隐蔽斗争；既有政治斗争，又有军事斗争；既要完成平时执勤任务，又要完成战时作战任务。如何使用好这支武装力量，关系重大。

一般说来，运用这支力量应掌握如下原则：各武警部队的业务工作，由各级公安机关领导实施；部队的管理教育、军政训练、政治工作、后勤保障等，由人民武警部队统一规划实施；勤务的组织指挥通常按隶属关系实施，特殊情况可越级指挥，执行临时任务时，应建立指挥所或领导干部到现场进行统一集中指挥；在勤务部署和兵力使用上，要统筹兼顾，重点部署，掌握必要的机动兵力，加强协同，充分发挥整体威力；要以严密防范为主，稳准狠地打击敌人，在重要时节异常情况下，要采取加强措施。

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的建设

组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党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从国家武装力量建设的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一支担负特殊任务的部队，其人数多，任务重，高度分散，专业性很强。一方面要按照解放军的条令、条例和兵役制度去建设它，另一方面要建立适合其性质、任务和特点的管理体制和后勤保障系统，配备特殊的装备，进行特殊的训练。其建设的基本方向是，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训练部队，使之成为忠于

党、忠于人民，热爱社会主义国家，坚强勇敢，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精通业务，敌人惧怕，人民喜爱，党和国家可以依赖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武装力量。具体说来，在政治上，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使之政治可靠，组织纯洁，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成为执行和维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模范。在业务上，要加强教育训练，使之熟悉党的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令，熟练地掌握业务知识和专业技术，努力提高工作效率。在作风上，要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艰苦奋斗，雷厉风行。在装备上，要逐步求得改善，使之优良、先进、现代化。

第三节 中国民兵

一、中国民兵的组成和任务

民兵是不脱离生产的群众武装组织，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助手和后备力量。中国民兵数量之多、威力之大，为世界所仅有。随着国防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发展，它正由单一的步兵向多兵种的方向发展。在重要战略方向和大中城市，已建立了地炮、高炮、工兵、通信、侦察、防化和反坦克等分队。《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规定：乡、民族乡、镇和企业事业单位建立民兵组织。凡18—35岁符合服兵役条件的男性公民，除应征服现役的以外，一律编入民兵组织预备役。民兵干部的年龄可以适当放宽。不建立民兵组织的单位，按规定对符合服兵役条件的男性公民，进行预备役登记。民兵分为基干民兵和普遍民兵。28岁以下的退出现役的士兵和经过军

事训练的人员，以及选定参加军事训练的人员，编为基干民兵；其余18—35岁符合服兵役条件的男性公民，编为普通民兵。根据需要，也可吸收女性公民参加基干民兵。陆海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城市有特情况的单位，基干民兵的年龄可以适当放宽。

我国民兵的任务是：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头完成生产和各项任务，担负战备勤务，保卫边疆，维护社会治安；随时准备参军参战，抵抗侵略，保卫祖国。

民兵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既可配合军队作战，也可单独作战。其将担负的主要任务是：

（1）补充和扩大人民解放军。现代战争，人力消耗巨大，所需的兵员不是几百万，而是几千万、几千万。这样大量的兵员主要来自民兵。

（2）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未来反侵略战争将是多种武装力量相结合、多种作战形式相配合、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呼应的全面人民战争，民兵将发挥重要的战略作用。民兵既将在正面战场直接或间接地配合我军作战，也将在敌后战场坚持长期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

（3）广泛开展游击战。民兵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民兵具有人数多，分布广，人熟地熟情况熟，便于分散和集中，灵活机动等特点，可以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运用游击战、袭击战、伏击战、破击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传统战法，消耗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破坏敌人交通运输，摧毁敌人的军事设施，截断敌人的后方供应，分散敌人的兵力，迟滞敌人的行动；可以人自为战，民自为战，联防作战，到处袭扰、疲惫和牵制敌人，使敌人日夜不得安宁。

(4) 执行战斗勤务。民兵可配合我军担任侦察、巡逻、警戒、构筑工事、维护交通、传递情报、运送物资、救护伤员、押送和看管俘虏等各种勤务。海上民兵，可配合海军进行布雷、扫雷、反潜、海下救生等战斗勤务。这对于我军作战任务的完成，将发挥重要作用。

(5) 积极参加生产，巩固后方，支援前线。未来反侵略战争需要一个强大而巩固的后方。在后方的民兵，既要同敌人的空袭、空降作斗争，与广大群众一起，防奸反特，保卫政权，保卫交通设施、后方基地、军事基地等；又要积极参加生产，为支援前线贡献力量。

二、民兵的建设

我国民兵，不仅是生产战线上的一支骨干力量，也是未来反侵略战争中陷敌于天顶之灾的一支巨大力量。因此，应当把民兵建设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认真抓好。各级党委、政府和军区都应切实加强对民兵工作的领导，把民兵工作列入经常的议事日程。要充分发挥人民武装部、军分区、省军区、大军区的作用，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及时研究解决民兵建设中出现的新问题。

民兵建设，要做的工作很多，概括起来主要就是毛泽东提出的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三项。

组织落实方面，首先要对民兵组织进行调整。调整的基本原则是，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保持民兵组织的普遍性。调整的内容是：缩小组建民兵的范围；缩减参加民兵的年龄；简化民兵组织的层次；严格民兵的政治条件和身体条件；把民兵制度同预备役制度结合起来。通过调整，使它成为一支更加坚实可靠的力量，更有利于在战时发挥重要

作用。

政治落实方面，主要是切实保证民兵组织的纯洁和巩固，使武器装备真正掌握在政治上可靠的人手里。特别要选配好民兵干部，这是加强民兵建设的重要环节。要按照有关规定，从思想好、身体好、热爱民兵工作、具有一定军政素质和文化水平的复员军人，优秀青年民兵中选配好民兵干部。

军事落实方面，主要是结合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特点和民兵担负的任务，实事求是地搞好军事训练，配备和管理好民兵的武器装备，落实民兵的战备措施。要着重把基于民兵教育训练好。对基于民兵的训练，要进行实事求是的调整，主要是减少训练人数，精简训练内容，改进训练方法，妥善安排训练时间，提高训练质量。要尽可能利用农闲、生产间隙进行训练，切实解决民兵参加训练的误工报酬和其他实际问题。

通过民兵工作“三落实”，使民兵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第四节 我国的兵役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依照法律服兵役和参加民兵组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光荣义务”。兵役制度是国家关于公民服兵役的具体法规，是武装力量建设的一项根本性制度。健全的兵役制度可以为武装力量及时提供数量众多、素质优良、战斗力强的兵员。《中华人民共和国

兵役法》规定：我国实行义务兵役制为主体的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这是总结我们多年来的经验提出来的，是我国兵役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

一、以义务兵役制为主体的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的制度

这一制度，是正确处理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中服现役的人员的制度。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诞生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初期，一直是实行志愿兵役制。聂荣臻同志在评价这种制度时指出：“在中国人民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在频繁的战斗环境中，处在被敌人分割包围的情况下，没有全国范围的人民政权，如果不采取人民的志愿兵制来建立、巩固和发展人民革命的军队，那末，要坚持革命战争一直到取得全国的胜利，就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就证明在过去采用人民的志愿兵制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1955年，适应我国新情况的第一部兵役法公布之后，便实行公民在一定年龄内都有义务服一定期限兵役的义务兵役制。从多年的实践看，实行义务兵役制的优点很多。它不仅可以使部队兵员保持年轻力壮，朝气蓬勃，增强部队的战斗力，而且可以积蓄强大的训练有素的后备兵员。随着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程度的不断提高，需要有一部分技术骨干长期在部队服役，以便熟练地掌握各种技术装备。于是，1978年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根据部队需要和本人自愿，将部分义务兵改为志愿兵，实行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的兵役制度。1984年第6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肯定了这种制度。实行这一制度，既保持了义务兵役制的优点，又弥补

了它的不足，是在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基础上，保留部队技术骨干，保持战斗力的好办法。

二、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

预备役制度是当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普遍采用的较理想的兵员储备制度。我国1955年颁布兵役法后，也曾实行过军官和士兵的预备役制度。1958年大办民兵师，实际上废止了预备役制度，没有把两者结合起来。1981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确定，把民兵和预备役结合起来，以适应国防现代化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据此，所有应服兵役的公民，除一部分服现役外，其余的经过登记，编入民兵组织服预备役。退出现役的官兵，只要符合条件，一律编入民兵组织预备役。基于民兵为二类预备役，普通民兵为三类预备役。198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肯定了民兵和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实行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加强我国的后备力量建设，满足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

我国有传统的民兵制度。广大民兵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它是我军的得力助手，是我国兵员动员的雄厚基础。通过民兵组织可以把大部分预备役人员管理起来，但它不能代替预备役制度，尤其是军官预备役制度。因此，有必要把民兵制度和预备役制度结合起来。实行这一制度，既坚持了我国传统的民兵制度，也恢复和健全了预备役制度，既有利于平时加强后备力量的建设，保持雄厚的预备兵员，更有利于战时快速动员，是实现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做到寓兵于民的一项重大战略措施。一旦发生战争，我们就可以以人民解放军为骨干，以民兵和预备役为基础，以最快的速度组

扩建新的部队，动员全国人民，开展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把来犯之敌淹没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为了完善我国的兵役制度，兵役法还对现役官兵和预备役官兵的若干具体问题，诸如现役军人的优待和退出现役的安置问题，预备役人员的平时训练和战时动员问题，军事院校从青年学生中招收学员和大中学校学生的军事训练问题，兵役领导问题，以及其他有关问题，都作出了具体规定。只要认真抓好落实，就一定能显示出强大威力。

第八章 反侵略战争准备

战争准备是实行战争的基础。为了抵抗侵略，保卫祖国，我们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准备好了，敌人就不敢轻举妄动，即使它铤而走险，向我发动侵略战争，我们也恰当地应付各种复杂局面，“有备无患”就是这个道理。

古今中外聪明的军事家，都十分重视战争准备。我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就曾指出：“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也；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孙子兵法新注》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0页。）就是说，实行战争，不要把立足点放在敌人不来上，而要立足于自己有所准备上，不要立足于敌人不进攻上，而要依赖于自己不可攻破上。克劳塞维茨强调：“被迫进行防御的弱小国家，应该经常做好战争的准备，以免遭到突然的进攻。”（《战争论》第二卷496页。）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革命战争的准备，列宁指出，“为了进行革命战争，必须进行长期的、认真的准备，首先必须振兴经济。”没有极其认真的经济上的准备就要进行现代战争，反抗先进的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事情。”（《列宁全集》第27卷第45页。）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一贯重视战争准备，曾作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要有充分准备。”，“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劣势而有准备之

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等一系列重要指示，以及各个时期的正确的政治策略，经济政策，都为有效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成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在世界还并不安宁、我国的安全还受到一定威胁的形势下进行的。因此我们决不可放松警惕“一定要扎扎实实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为保卫世界和平、为保卫祖国领土的安全，为争取台湾早日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作出新的贡献。”（《邓小平文选》，第350页。）

战争准备工作的范围很广泛，内容很丰富，我们着重研究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节 现代战争准备的特点和要求

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战争的规模、范围、强度、样式等在不断发展变化。纷繁复杂的现代战争，使战争准备呈现出了许多新的转变，提出了新要求。

一、现代战争准备是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中进行的，必须考虑到平时的国防安全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40多年没有发生世界战争了，我国自从1953年的抗美援朝战争后，多年来未进行大的战

争。虽然大战的危险依然存在，局部战争也时有发生，其中直接与我国有关的局部战争和军事冲突也进行了几次，但从总体上讲，我国还是处在和平环境之中。分析世界战略形势，和平趋势仍在发展，我们所处的和平环境还将继续下去。在这种总体和平环境，局部动荡不安的情况下进行战争准备，一方面要为赢得未来战争胜利打好基础，另一方面又要使战备本身成为保障国防安全的重要因素。

平时时期的战备，对国防的安全和国家的建设有着密切的关系。战备工作的好坏是国家国防能力的重要体现，在平时时期这种能力，很大程度上体现为一种遏制战争的威慑作用。在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警惕性很高的军队面前，侵略者是不能不有所顾忌的。平时时期的战备工作搞好了，就可以巩固国防，人民有安全感，从而有效地保障国家的建设和人民和平、安宁的劳动和生活。

为了保证平时时期的国防安全，国家要建立完备的国防战略部署，陆上、海疆、空中构成完善的战略防御体系，具有灵活的战略反击能力，作到既能随时应付局部战争，又有打全面战争的基础，使敌人望而生畏。

二、现代战争耗量巨增，战争准备对国家经济提出了更高要求

战争的实践表明，战争的耗费呈现出越来越大的发展趋势。19世纪的历次战争，消耗了各交战国的8—14%的国民生产总值，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则分别消耗了各主要参战国50%或50%以上的国民生产总值。现代战争的消耗更加惊人，两伊战争的前五年（1981——1985年），伊朗平均战争费用达其同期年国民生产总值的60%，伊拉克则高

达164%。

现代战争的巨大耗费，首先是作战物资的消耗量大。据外军资料介绍，按额定标准，美陆军师一个战斗日消耗物资约2240吨，苏摩步师一个战斗日消耗物资约1826吨，都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几十倍。即使是小国，打一场局部短暂的战争，其消耗也很大。如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方面一个师一个战斗日的物资消耗量达2000吨。其次是战争的间接费用增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战争的间接费用占直接费用的三分之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间接费用则为直接费用的1.8倍。随着战争规模和武器威力的增大，战争的间接费用更会大大超过直接费用。这种情况使得现代战争准备对国家经济提出了更高要求，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相当雄厚的经济基础，就很难实现自己的战略计划，因此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增强国家的经济潜力是战争准备的前提条件。

三、现代战争准备的内容越来越广，国家必须加强统一筹划和指导。

现代战争不仅涉及到军事、政治、经济，而且涉及到技术、文化、心理等诸方面，战争的实施必须依靠国家的总体力量，因此战争的准备也必须从国家的全局来安排筹划。战争的准备不仅要为军队打仗做准备，也要为战时人民的生存和生产做准备。类似人民防空等内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尚不被人们充分重视，现在则成了战争准备的重点之一。武器装备、特别是大型尖端武器，如舰艇、飞机、导弹等通常都由成千上万个零部件组成，这些武器的研究、制造、配套已远非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部门所能单独完成，必须依靠国家整个工业和技术力量的协作。就是一般的军用物资也远非军

队自身所能独自保障的。目前我国各种军需物资已达200多万种，涉及到国民经济的各个生产部门，要靠整个社会供给。上述情况说明，现代战争的准备具有国家统一筹划，并由党政军民学各个方面通力合作才能完成。

四、现代战争临战准备时间短，平时准备的作用日益突出

现代战争爆发的突然性增大，战争的行动节奏加快，大量的战备工作，若主要依靠临时准备，难免“临渴掘井”失之过晚。所以平时准备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不仅要建设强大的经济基础，而且要建立使这种经济基础迅速转化为军事实力的能力。并能直接投入战争的动员体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苏联等许多国家主要是靠战争爆发后展开大规模的经济动员来满足战争需要的，这在当时就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普遍认为现代战争不会象以往战争那样有战争爆发后从容进行动员的时间和条件，战争动员必须在战前开始，并在临战时达到高潮。这不仅是因为战争爆发后国家的整个经济结构被打乱，生产条件将大大恶化，而且还因为战争初期的斗争至关重要，如果不在战前的有利条件下把大量的战争潜力转化为军事实力，就可能在战争初期遭到无法弥补的损失，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被动局面就足以引以为训的。

五、现代条件下，武器装备更新换代加快，国防科研必须放在重要地位。

为了不断地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就必须经常完善并及时更换军队的武器装备，这是战争准备的基本任务之一。由于微电子技术、新兴材料、核能技术、生物工程、激光技术、

宇航技术、海洋开发等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所造成的科学进步日新月异，新技术运用到军事领域的速度越来越快，因此武器装备更新换代的周期越来越短。过去，从生产热兵器到发明线膛枪，经过了400年，从发明机关枪到生产飞机、坦克，经历了大约20年，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40多年间，坦克和飞机都已发展到第三代，正向第四代发展，有些导弹和电子计算机大约五年就更换一代。至于武器装备的部分改进，则周期更短，这种武器装备加速更新换代的趋势，导致武器装备易于过时陈旧。因此世界各国在平时战争准备中都适当压缩了武器装备的生产规模，而把重点放在对新的军事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先进武器的研制上。70年代，美军每年的军事科研费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提高了19倍，80年代进一步急剧上升，每年的国防科研费占其全国科研费的50%以上。苏联也一贯把军事科研放在整个国家科研工作的首位，其军事科研费约占全部科研费的80%，占军费总额的17—19%，并一直在科技人才和原材料供应方面优先满足军事需要。

第二节 战争准备的基本方针和原则

战争准备是国家战略的组成部分，必须根据现代战争特点，从我国的政治、军事、经济、科学技术和地理等实际情况出发，针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国防军事力量对比等相关因素联系起来考虑。中央军委明确指出：“战备工作要着眼长远，总体规划，调整改革，完善制度，做好应付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的准备，并为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打下基

础。”因此战争准备应遵循以下方针和原则。

一、战争准备的重点应立足于应付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

战争史证明有备则制人，无备则制于人。在短时期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的形势下，确有把握地应付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是和平时战争准备工作的一个基本要求。这是中央军委在对国际战略格局和我国周边形势科学分析的基础上作出的正确决策。

当今世界能够发动世界大战的只有苏、美两家。但由于东西方现存的全球性战略均势和僵持局面将继续维持下去，世界和平力量又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我国在国际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从发展趋势看，针对我国的全面内战在短期内不会发生。但从周边形势看，以侵占我国领土、领海主权为目标的局部战争，已构成对我国安全利益的主要威胁。因此我们的战争准备工作应该坚持立足于应付局部战争和突发事件的原则。

二、战争准备要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协调

加强战争准备，要以国家经济为基础。把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走富国强兵之路，这是目前世界各主要国家普遍选择的途径，也是我国进行战争准备的基本方针。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战争准备不能超越经济发展的速度，特别是要讲究国防效益和经济效益。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受“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思想的影响，战争准备建设摊子铺的过大，搞了一大批超越国家当时经济支持力的国防工程，有些项目是重复投资，反复施工，经济效益、国防效益都很差。其原因，主要是战争准备的指导思想发生了

偏差。为此应该：

1. 战争准备应该积极主动适应战略性转变 服从国家大局

中央军委关于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的决策，是根据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分析，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和新时期军队建设的需要出发，经过长期深思熟虑作出的。

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的实质就是要从准备随时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利用相对和平环境，从根本上加强国防现代化为中心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建设上来。它标志着我国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进入了一个新时期，是我国军队成长和国防事业发展道路上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一转变的提出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路线，在国防建设领域的具体贯彻和体现。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一定的政治路线总要求有某种与之相适应的军事政策为它服务。一旦政治路线发生了变化，军事政策也必然会随之改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就要求国防建设指导思想也来一个相应的调整，而这次“转变”正是适应了这种要求。

这一转变不是局部的，某几项工作的转变，而是全局上的根本性变革。这种变革对战争准备来说，国防建设不是放慢速度，降低标准，而是要前进、提高、加速发展。因此军事工作就必须积极主动适应“转变”，加强国防建设。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的总战略是集中财力、物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这是一切工作的中心，是国家的大局。国防建设也必须从国家的大局出发，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

首先，要在服从上想问题。由于我军经历了长期的战争年代，建国后又一直处于紧张的临战状态，使得不少同志习惯从纯军事斗争角度去观察、考虑问题，而对军事服从于经济建设则想的少。因此当国防建设指导思想进行转变的时候，往往过多地看重经济对军事暂时制约的一面，而对只有富国才能强兵的深远意义认识不足。军事力量与经济实力同是国家的重要支柱，和平的后盾。两者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相互促进。战争时期，军事斗争是国家的主要任务，一切经济力量都要全力保障战争的胜利；平时时期，经济建设是国家建设的中心，军队建设则处于服从的地位。党中央要求我们“忍一忍、顾一头”，首先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这既是振兴中华的需要，也是富国强兵的正确决策。我们考虑问题，进行部队建设，一定要以此为基本出发点。

其次，要多在服务上作贡献。军事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是要把军队本身的事情办好，增强军力，以有效地抑制和推迟战争，创造一个和平安全的环境，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同时要尽量从其它方面多作贡献。比如，战准建设要坚持平战结合，军民兼容的原则；在确保军事机密的前提下，尽量多开放一些机场、码头等军事设施，适当缩小军事禁区，以利于促进对外开放和搞活经济；积极搞好军地两用一体化的教育训练，培养更多的适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用人才；尽量抽出人力、物力和装备器材，积极支援国家的经济建设等。

2. 把握前进方向，理顺各种关系

军队工作适应转变，就要从应急状态下解脱出来，把着眼点从眼前转向未来，保证小打、中打有把握，大打有基

础。党的十三大为我军建设规定了前进的总目标、军委又进一步要求“把我军逐步建设成为一支机构精干、指挥灵便、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效率很高，战斗力很强的精兵，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军队建设必须紧紧围绕这个总目标，把握好前进的方向。

把握前进的方向，重要的是解决好认识问题。由于战略性转变，确实给军队建设带来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要适应和发展“转变”的新形势，不但要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而且要大胆改革，走开拓创新之路。尤其是要清醒的看到这种转变并不是由“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到“晚打、小打、打常规战争，甚至不再打仗了”军队建设应该“降一降、放一放、让一让”了，军队的根本任务没有变，军事工作的根本规律没有变，我军几十年来总结、积累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丢。

在保持前进方向的同时，还应当注意理顺军队建设中的一系列关系。

一是军队既要服从新时期经济建设的大目标，又要突出保卫祖国的根本职能。新时期我军的主要任务一是保卫祖国，二是建设祖国。军队不仅要成为抵御外来侵略，保卫和平和社会主义祖国的钢铁长城，还要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力量，这就要求军队要积极主动的参加国家的经济建设。但这决不意味着我军根本职能的变化。无论是战时还是平时，军队的首要任务是保卫祖国，根本职能是准备打仗。我们既不能把战争的危险强调到不客观的地步，把战备的弦绷的过紧，但也决不是说战备工作不重要了，可以放松了。邓小平同志只是说“世界大战可以推迟，”“如果工

作做的好，大战可以避免”，而没有说今后就没有战争了。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相对和平时期，把战争的准备工作的更扎实、更有成效。

二是部队既要军、政、文、民教育训练同时抓，又要坚持以军事训练为主。把教育训练摆在战略位置。部队实行军地两用一体化教育训练，丰富了我军准备训练内容，体现了和平时期军队建设的客观规律和实际需要，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我军建设的一个创举。但军政文民四个方面，在时间、内容上不能并重，要坚持以军为主。

三是既要增强管理教育的活力，又要坚持从严治军。军队所处的时代不同，其组织结构、兵员成份、外来影响就有不同，管理教育的特点、内容、方法也就不同。随着我军建设指导思想的转变，部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比如：武器装备的逐步现代化，技术兵器增多，精简整编干部比例减少，兵员文化程度提高，思想活跃，兴趣也比较广泛；社会变革快，对部队影响大等。这就必然带来管理教育的新问题。然而要严格是不容改变的，从严治军，历来就是造就雄师劲旅，树立雄壮军威的法宝，也是战争准备中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三、战争准备水平要着眼于同现代战争特点相适应

在新的历史时期，努力提高我军在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是应付中小规模局部战争和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武器装备的不断更新换代，传统的作战理论和方法受到冲击。目前，各国都很重视对新的作战理论和作战方法的研究。新时期的战争准备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但必须着眼于同现代战争出现的许多新

情况、新特点相适应，特别是要重视从根本上打好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基础，努力提高部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协同作战能力，电子对抗能力，组织指挥能力，野战生存能力，后勤保障能力。就军队来说这是战备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战争是残酷无情的，战备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只要平时致力于提高战争准备的水平，战时就不会受到战争的惩罚。

四、加强战争准备的针对性

战争准备只有抓住主要矛盾，针对外来威胁的不同情况作出反应，才能真正适时有效地对付外来威胁的挑战。

（1）针对不同威胁程度采取不同方针。外来的威胁程度不同，直接关系到对战争准备的程度和时限等要求的不同。当威胁加剧、战争可能在近期发生时，应当加快战备，力争在战争爆发前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当战争威胁不大，在近期或相当长时期内打不起来时，战争的准备就不能要求过快、过急，而应着眼于未来的准备。从区域来说，也应针对外来威胁的不同程度区别对待，特别是对一个大国，各地区，各个战略方向，战争准备的水平也不宜要求一样。当一个地区、一个方向的外来威胁较大时，对该地区、该方向的战备要求就高些，而其它地区和其它方向则不一定进行同样规模和程度的战争准备。

（2）针对威胁的不同实力，进行不同的准备。主要是根据外来威胁者的不同军事实力，进行相应的战争准备。当威胁者拥有核力量，并已构成对我的威胁时，我们就应该除了发展常规力量外，还必须发展自己的核力量，才能有相应的抵御能力。我国在60年代，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仍然集中力量，研制了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和运载火箭，从而打破了

美苏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当威胁者的战略突袭手段越来越占优势，并可能在战争初期实施战略空袭时，就必须研究各种新型防空武器装备，提高军队防空和要地防空能力，并积极做好人民防空准备。总之根据不同的威胁实力，采取不同的对策。

(3) 针对不同的战争样式，进行相应的准备。现代战争的目的、手段、规模的多样化，给一个国家造成的威胁也是多种多样的，有核战争，也有常规战争，有全面战争，也有局部战争，由于威胁者可能采取的战争样式不同，被威胁者战争准备的要求也就不同，应当根据最大的可能有所侧重地进行准备。

五、战争准备必须平战结合、军民结合

和平时期的战争准备，必须采取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方针。这是一项既有利于战争准备，又有利于经济建设的军民两利、互相促进的方针。

从全局讲，实行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方针，有利于战争准备和经济建设的统一规划、全面安排，可以避免各自为政，各搞一套；有利于改善生产力的布局和资源开发，有利于军用和民用技术的互相提高、互相交流；有利于促进军政、军民关系；有利于增强全民的国防意识。从而使战备和经济建设具有较强的适应性，掌握平时需要和战时需要，军用和民用两套本领，达到寓军于民的目的。平时，以发展国民经济为主，组织生产建设。一旦战争爆发，则能迅速转入战时体制，全力保证战时需要。

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方针，要在战备和建设的许多方面贯彻执行，必须根据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以

至各种不同项目的实际情况，作出具体规划，作到有机结合，各有侧重。有的必须以平时需要和民用为主，有的则必须以战时需要和军用为主，防止不适当地过分强调某一方面的需要，而忽视另一方面的需要。

军需和民用，平时需要和战时需要，有其矛盾性，也有-致性，战争准备的许多内容，本身就具有军民通用的特点，象许多工业生产设备，科技项目，能源、交通运输，邮电以及大量的生活消费品等都有军民通用性质，只要加以认真的指导和合理安排，就可以在平战结合中取得良好的效果。

第三节 提高全民国防观念，保持 应付战争的精神准备， 防止敌人突然袭击

和平时期，是发展国民经济，提高综合国力的黄金季节，也便于从长远利益出发，进行国防基本建设。但在长期的和平状态下也会出现对战备不利的因素。面对宁静的和平环境，人们慢慢地对战争失去应有的警觉，忘战思安，不想打仗，甚至害怕战争。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恰恰在人们思想麻痹的时候，战争就来了，这几乎成了一种规律。

要使国家在长期的和平环境下始终保持应有的战备水平，就必须设法保持广大人民群众和军队，特别是高级领导层，对战争应有的精神准备，有了这种精神准备，物质准备就有了思想基础，整个战争准备工作就容易落实。

一、进行国防教育，提高全民的国防意识

我们的国防是全民国防，要提高全民热爱国防、关心国

防、献身国防的观念，就必须持久地、扎扎实实地进行全民国防教育。

1. 必须加强国防教育

“和平建设时期，增强国防观念，不仅是保卫祖国安全的思想基础，而且是增强中华民族向心力凝聚力的精神力量。”这就是说搞好国防教育，不仅要从眼前的练兵、战备等具体战争准备工作抓起，更重要的还要从长远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抓起。实践证明一个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社会风尚的形成，一个国家向心力、凝聚力的确立，决不是一时一事的问题，而是几代人甚至几世纪的事情，因此我们今天的国际教育，一定要站得高，看得远，处处从几代人的生死存亡，安危祸福着想，只有这样，才能将一个巩固的国防一代一代传下去。

近年来，在我们党和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以后，党内、军内和人民群众中，有些人对国防建设产生了一些错觉和模糊认识。有的认为，现在是“无敌国外患”，国防的作用降低了；有的甚至认为可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了。有的说国防建设是一种“纯消耗”，加强国防建设就会影响经济建设。这些错觉和模糊认识在淡化着军队官兵和人民群众的国防观念，导致发生了许多不该发生的事情。例如，有的部队管理松懈，制度松弛，作风松散，战备秩序混乱；有的单位在经济开发中，不顾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致使一些国防设施失去作用；有的地方破坏国防设施的现象屡禁不止；有的部门从局部需要出发，向军队摊派，伸手要钱要物，甚至强占部队的营房、地产；有些青年缺乏从军习武热情；有的地方把一些不符合

参军条件的人送来当兵，影响了军队的声誉和形象；个别地方还发生了侮辱伤害军人的事情。这些，虽属少数的甚至个别现象，但确实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古人有一句名言，叫做“畏危者安，畏亡者存”。对于国家来说，国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任何时候不会发生变化。当前，由于世界和平力量的发展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和军事力量出现了相对平衡的局面，使世界形势出现了缓和。为充分利用这个和平机遇，世界各主要国家都在竞相调整战略，大力发展经济和科学技术，努力增强综合国力，以争夺未来的战略优势。美苏两国在积极对话、进行裁军谈判的同时，仍在加紧研制新一代的战略武器和常规武器，军备竞赛已发展到质的争夺，并进入外层空间。这样，虽然一方面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是另一方面各主要国家特别是美苏竞相争夺战略优势，又会给和平与发展带来威胁。此外，我国周边地区存在着不安全因素，目前也并不太平。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我们的国防机制无时无刻不在行使它的职能，发挥它的作用。不然，全国人民怎能象现在这样和平安宁地进行四化建设？对于战争，有人说“防则无，不防则有”。就是说，你做好了战争准备，敌人可能不敢打来，倘若没有准备，敌人就要乘虚而入了。这是合乎逻辑的。因此，务必使广大军民牢记“居安思危”的铭训。象我们这样主权完全独立而又幅员辽阔的国家，置身于风云多变的现代世界，任何时候都不能“高枕无忧”，而要“居安思危”。

国防建设同经济建设是互为条件的，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促进。一方面，没有经济实力作基础，国防

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另一方面，没有坚强的国防来保卫，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生活就无法正常进行。

过去，由于我们把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随时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国防建设突出了“应急”需要。特别是由于“左”的思想干扰，坚持以阶段斗争为纲，因而阻滞了经济的发展，也使国防建设的基础不牢，后劲不大，长期处于低水平循环徘徊的局面。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工作重点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压缩了军费，指出国防建设要“忍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扭转以往国防建设同经济建设的不平衡状况，使国防建设同国家经济建设相适应，达到协调发展，同时也是为了从根本上为国防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可以肯定地说，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我们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防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国防建设并不是纯消耗。国防建设作为一种社会劳动，是具有自己的“产品”和“效益”的。它的最终产品和效益就是国家安全。不过，这种产品和效益，不象其它社会劳动产品那样可以用数字来统计、计算，或成为商品进入社会流通。这种产品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同享用，它的效益只能以国家与社会的存亡与安危来衡量。人们虽然每时每刻都在享用它，却常被视而不见、知而不觉，我们加强国防教育，就是要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懂得什么是国防，什么是国防建设的产品及价值和效益。使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起关心国防、热爱国防、保卫国防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义务感。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国防还可以起到社会学校的作用。国防科研、国防生产及部队操作现代化装备的各种技能，都是

可以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各种形式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近年来的实践证明，军队的战斗力是可以转变为强大的现实的社会生产力的。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国家对国防社会学校的作用，将会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

此外，国防观念，作为一种积极的精神因素，在军事上可以转化为战斗力，在经济上可以转化为生产力，在政治上可以转化为国家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我们所倡导的国防观念，是以爱国主义、民族精神、自觉奉献和革命英雄主义思想为基本内容的。进行国防教育，提高国防观念，可以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奋斗精神、负责态度，鼓舞人们团结协作，奉公守法，勤奋工作。从而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振兴中华和改革、开放，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现代国防是国家综合实力的体现。现代条件下，为了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利益安全，防止外来的侵略和颠覆，必须从军事、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外交等多方面采取措施，进行建设。因此，现代国防已经是一个涉及范围相当广泛、包括内容相当丰富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它渗透于国家的各个领域、各行各业，贯穿于平时、战时工作的全过程。搞好国防建设，军队责无旁贷。但仅仅靠军队是远远不够的。各个领域、各行各业必须齐心协力，共同奋斗，才能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防。所以，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应来关心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把自己从事的工作同国家安全联系起来，并为之倾心努力。这是现代条件下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体现。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国宪法规定，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主权，是全体公民的神圣权利和义务，看一个

人国防观念强不强，关键看他对国防采取什么态度，持什么观点。不仅要看他说的怎样，还要看他做的如何。我们说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直接从事国防建设，是国防观念强的表现；关心体谅军队的困难，支持军队建设，爱护国防设施，保护军队的荣誉，支持亲属在部队安心服役，参加军训，学习军事知识，热情宣传鼓励国防建设等，也是国防观念强的表现；关心、维护国家的尊严、荣誉和利益，把自己本职工作同国家富强紧密联系起来，克尽心志，努力奉献，同样也是国防观念强的表现。所以，每一个公民，都可以通过自己的言论和行动，通过自己的本职工作，来履行自己的国防权利和义务。这里关键是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宋代杰出诗人陆游说过：“位卑未敢忘忧国”。热爱祖国、保卫祖国历来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要把这种宝贵的民族遗产继承下来，世代相传，发扬光大。

2. 适应新情况改革国防教育

长期以来，我们党和国家在国防教育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受“左”的思想影响，把战争形势看得过于严峻，在国防教育中贯彻了“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指导思想，过分地强调了形势战备教育，常常以“敌情刺激”代替国防教育。这就导致了国防教育中出现了简单化、公式化、模式化。现在，党和国家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也由过去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转变到和平时期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因此，适应上述情况的变化，改革国防教育已刻不容缓。

国防教育是一项经常性的社会教育，必须把它置于社会

教育的大系统之中。近年来，不少地区把国防教育纳入党、政议事日程，纳入学校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内容，纳入工人、农民的政治教育等。解放军是国防建设的主力军，应该率先搞好国防教育。地方人民武装部门，应大力协助各级党委、政府做好国防教育工作，并应作为自己的基本职责，加强规划，抓好落实。广大的教育工作者、作家、艺术家、工程师等，也都有责任关心国防建设，支持搞好国防教育，并将其纳入到自己的工作计划之中，为提高全体人民的国防观念，为巩固和加强国防做出新的贡献。

人民群众的国防教育，要注意突出青少年这个重点。青少年是祖国和民族的希望，未来国防建设的重担必将落在他们的肩上。搞好对青少年的国防教育，就是在修筑我们未来的“长城”。这是一项事关未来国家安全的具有深远意义的工作，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在我们搞“爱我中华，修我长城”这些具体活动的时候，要确实使广大人民群众，都能知道“长城”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关心、支持建设新时代的“长城”。同时，要注意把国防教育融合到公民的社会生活中去，使广大群众都感到他们的生活与国防安全息息相关。

建立健全国防法规，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也是促进人们增强国防观念的重要方面。当前，在国家实行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一方面，我们过去制定的法规，有些已不适应新的情况，需要修订和完善；另一方面，一些急需的法规，如全民国防教育法、国防动员法、国防设施保护法等，尚无法律成文，需要抓紧制定。我们要适应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从国防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尽快建立、健全国防法规，逐步形成比较完善的国际法规体系。使国防建设

确实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树立多种战争精神准备，思想上处于主动地位

当今的战略形势告诉我们，仅仅有某一种战争精神准备是不够的，必须树立多种、多样战争的精神准备，才能使我们的战略思想适应当代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首先，应该作好大规模反侵略战争的精神准备。从我国政治、军事、经济、地理条件和所处的国际地位看，从国家的安全和长远利益看，这种精神准备是最基本的。

其次，要有在不同区域、不同方向，进行不同规模，不同条件下的局部反侵略战争的精神准备，而且这种战争可能提前到来，也可能要进行多次，这是当前形势下战争准备的重点。

再次，还应有核战争的精神准备。目前世界上核武库日益膨胀，数量已达到饱和状态，技术上还在不断发展，尽管谁也不会轻易发动核大战，但也并非没有使用的危险。一些核国家，特别是核武器最多的超级大国，都在奉行既准备打常规战争，也准备打核战争的战略。一般情况下，他们不大可能轻率地冒险使用核武器，但战争是一种特殊的暴力手段，一旦一方面临胜败存亡的关键时刻，常规战争失去控制而升级为核战争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上还会出现一些新型武器，战争将具有新的特点。那时的战争，即使是常规战争，也和以往和目前的常规战争有很大差别，国家、军队和人民都会面临新的课题，如果对这样的战争缺乏足够的精神准备，就要造成很大的被动。所以我们对战争样式和规模以及它的激烈

程度，要有多种估计，做多手准备。

三、要有战争突然爆发的思想准备

邓小平同志指出：“战争可能延缓爆发，可是我们不能只看到这一方面。”“因为霸权主义者有疯狂性，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制造一个什么小事情，就可能挑起战争。大战固然可能推迟，但一些偶然的、局部的情况是难以完全预料的。我们应该想到，如果现在敌人打起来怎么办？”《邓小平文选》第74页。）。邓小平在多年前提出这个论点，现在仍然具有普遍意义，这一论点的基本精神，就是告诫我们，不能把战争推迟的判断绝对化，在战争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有战争突然爆发的思想准备。

国家和军队能否应付突然事变，这是检验有没有战争突然爆发思想准备的主要标志。为此，在和平时期，国家要始终保持一部分军队的高度战备水平，国家的高级军事指挥系统必须保持常备不懈。这就是以局部的戒备状态，保障全局的和平状态，保证和平时期的国家安全，使人们能够放心大胆的进行建设。

保持部分军队的高度战备水平，是各主要国家普遍采取的战略措施，尤其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他们的战略指挥机关，导弹核武器部队、特种部队，及以一部分空军、海军和少数陆军，多年来一直保持临战状态，真正是说动就动，说打就打。他们之所以能够作到这一点，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有战争突然爆发的思想准备。

我国在和平时期，保持一部分军队高度戒备，主要应包括下列内容：

保持国家和军队战略情报侦察系统和预警系统的高度戒

备状态，密切注视各主要国家的战略动向，正确分析判断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及时发现各种危机征候。

保持国家高级军事指挥机关的高度战备状态，能够随时处理各种紧急情况和突发事件。

保持战备值班部队应有的战备状态，特别是战略导弹部队、空军、海军和位于海边防地区的陆军，能够做到一声令下，立即出动。

国家和军队要制定完善的，可以应付多种情况的应急行动计划和紧急局部动员计划，一旦需要能够立即按预定计划行动。

第四节 积极发展经济，把战争准备 建立在可靠的物质基础上

积极发展经济，从来是自卫战争得以胜利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暴力的本源是经济力量。没有经济条件，暴力就不成其为暴力。国防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与经济建设相适应。只有经济建设发展的快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展，我们要加强国防建设，首先要加强经济建设。

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国家的防御能力，军队的战斗力，比以往更加依赖和取决于经济、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现代的武器装备非常昂贵，打起仗来消耗之大更是惊人。第四次中东战争只打了18天，埃以双方就消耗了50亿美元。英国和阿根廷为马尔维纳斯群岛打了一场小仗，实战不到一个月，双方共耗费64—85亿美元。两伊战争到第六个年头已经

花费600亿美元。小仗如此，大仗的消耗更将达到天文数字。根据1986年的资料，我国的军费开支约占美国的十六分之一，占苏联的七分之一。我国目前军费比日本少的多，比印度还少。国防现代化先要有武器装备的现代化，而武器装备现代化的程度又取决于整个国民经济和国防科技，国防工业的发展程度。

现代武器装备是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晶。现代战争，在一定意义上，也是现代科学技术的斗争。核技术、航天技术、微电子技术、激光技术、新材料、生物工程等新技术群，已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使现代武器装备产生了质的飞跃。一个国家没有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没有必要的现代工业基础就不可能产生现代武器装备。而这又依赖于国民经济水平的提高，由此可见，经济力量不足，国防费用是很难大幅度增加的。我们的武器装备还比较落后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力量不足和科学技术落后。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没有强大的现代化的经济，就不可能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要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就必须先有强大的现代化经济。

国防建设服从并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绝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国防建设。在重点发展经济建设的前提下，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国力，保证国防不被削弱，而且逐年有所加强。军队是一个武装集团，它是为战争和战争准备而存在的。平时时期军队的根本任务仍然是保卫国家安全，准备对付战争的危险，加紧教育训练，提高部队的战斗力。

国防建设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有促进作用。在我国，第一流的科技人材和设备大量集中在国防系统，只要把军转民

的渠道和环节健全起来，进行民品的研制和生产，并进行技术转让，这支力量和设备是能够对科技的发展，经济的腾飞起有力的推动作用的。许多国防工业分布在我国经济落后的边远地区，可以帮助这些地区的开发和脱贫致富。有些国防工业产品可以为国家创外汇。有些国防投资可作为国家宏观调节控制国民经济生活的一种手段。军队有大批院校，加之部队开展的培养军地两用人才的活动，可以为地方输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力军。部队发展种植业、养殖业、采掘业、运输业、服务业，可为社会服务，创造物质财富。部队可以派出劳动大军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和抢险救灾，特别是参加筑公路、修铁路、挖水库、建大桥，开油田等国家重点工程项目的建设。部队还可腾出或开放某些机场、码头、飞机、舰船、车辆、房屋、医院，供地方建设使用等等。我军的这些潜力和行动说明我们有可能，有条件把国防建设的单纯消耗，转变为利用一切可能在经济上产生一定的增殖作用。这也是我军对马克思军事理论的发展。只要我们进一步理顺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积极参加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开源节流，就会使国防建设促进经济建设和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下，不断加强国防力量方面做出新的贡献。

把经济建设作为战争准备的首要问题，是战争实践的客观要求。现代战争的大量数据说明战争对经济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第一次世界大战耗资3870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超过4万亿美元。可以想像，未来的战争，没有相应的经济基础是决然不行的。我国经过四十多年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已经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拥有

较大的工农业生产能力，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支持战争的物质技术力量。但是我们的经济实力和科学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为此我们必须发奋图强，千方百计地搞好经济建设，实现到本世纪末使我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的宏伟目标。战争的客观现实要求我们必须扎扎实实地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是丝毫含糊不得的最根本的战争准备。

一、工业准备

毛泽东指出：“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毛泽东选集》第981页）。一个国家拥有丰富的战略资源，发达的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和新兴工业，才能形成雄厚的军事经济实力和支撑长期战争的能力。因此必须加强工业建设，做好工业准备。

发展能源工业。能源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水力、核能等。当今石油、煤炭、水力及其生产的电力，是一切现代工业、农业、交通运输的主要动力、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其中石油是现代战争的“血液”。飞机、坦克、舰艇、各种车辆和自行火炮都离不开石油。在战争史上，由于油料供应不足而失利的战例不胜枚举。如1942年德军在北非的一次作战中，由于得不到油料供应，500辆坦克被缴获，10 000余人被歼灭。1968年8月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支装甲部队因缺油料而被迫停止前进。现代战争中油料的消耗已跃居物资消耗的首位，美国军事能源总需要量的72%来自石油。据估算，苏军进行一次方面军进攻战役，油料消耗达30万吨，约占各种物资消耗量的50%。1982年英阿马岛战争中，英军平均每人每日耗油达200—230公斤。在

某种意义上说没有石油就没有现代化国防和现代化战争。我国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已探明的煤炭储量达6000亿吨（精煤储量1700亿吨），水力资源的理论蕴藏量为6亿多千瓦，可供开发的水力资源装机容量为3亿千瓦。我们要有计划的开发利用。

发展冶金工业。冶金工业的生产能力，是衡量国家军事经济实力的标志之一。有了先进的冶金工业，就可以提供大量的钢铁和有色金属，满足战争的需要。邓小平同志说：

“打仗就是要钢铁，就是要有色金属”。（邓小平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75年7月14日）钢铁是制造各种武器装备和机器设备的主要材料。现在我国的钢铁和有色金属的生产已有了很大发展，可以基本上满足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我们要乘胜前进，积极发展钢铁工业和有色金属工业。

发展机械工业。机械工业是向一切生产部门及国防工业部门提供现代化机械装备的部门，人们称其为“工业的心脏”机械工业的生产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技术水平，标志着自力更生发展国民经济的能力。目前我国已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品种多样，具有相当规模的机械工业体系，为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装备，如原子能反应堆，加速器及核原料制造设备，航天工业和舰艇的动力装备等等。但是我们的许多设备和产品还比较落后，必须迅速发展。

发展国防工业。经过30多年的艰苦奋斗，我国的国防科技与国防工业，随着国民经济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已逐步形成了门类比较齐全、布局比较合理、具有相当

规模和水平的由兵器、航空、造船、电子、导弹、宇航及核工业等部门构成的生产体系和科研体系，培养和造就了一支科技队伍。我们自已设计制造了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和运载火箭，生产了大量的飞机、坦克、火炮、舰艇等常规武器装备，也生产出了各型导弹和新型电子、通信、防化等设备，增强了军队的火力、突击力、机动力、防护力和快速反应能力，保证军队的作战和训练需要。

在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发展中，应该注意：

（1）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应以我军的作战理论为指导。这是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发展建设的大前提，没有这样一个前提，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就带来一定的盲目性。武器装备决定作战方法，这是根本的，也就是有什么武器打什么仗。在和平时期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又必须十分注意作战理论的反作用。

（2）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建设应把科研放在首位。国防科研是国防工业的前提，军队武器装备的根本出路在于提高国防科研水平。从物质力量的意义上说，现代战争是作战双方在科学技术上的较量。同时和平时期，军队的武器装备需要量不大，且易陈旧过时，因此在总体安排上应以科研为主，生产为辅，把重点放在提高水平，打好基础。

（3）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要有快速应变能力，战时要能迅速扩大生产。现代战争的特点要求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转入战时生产体制的准备时间大大缩短。为此，首先必须制定科学的工业动员计划。其次，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必须和民用工业战时转产动员计划相衔接。再次，要正确估计

各种军用品在各种形式战争的各个阶段的不同消耗率，以便根据需要来有计划的安排民用工业转产、保证战争需要。

(4) 把国防科技、国防工业的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融为一体。现代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的发展，依赖于国家经济的发展，而先进的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又可以极大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二者是互相促进的，应当紧密结合起来。

我们还要重视发展电子、激光、高分子合成等新兴工业，以及化学工业，轻纺工业和食品工业等。

为搞好工业准备，首先要制定正确的规划，协调发展国家工业和国防工业。要根据国力的可能，国家安全和未来战争的需要，在国家工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地加强国防现代化建设。要本着缩短战线，突出重点，狠抓科研，加速更新，加强专业化生产与协作生产，实现武器装备的通用化、系列化、标准化的原则，做好战时生产准备。第二，要合理布局工业基地和厂址。重要的国防工业和军事尖端技术部门要合理疏散地配置在国家战略纵深地。重要工厂，关键车间和尖端实验设施，要采取防护措施，提高生存能力，保障安全生产。第三，为保障战时生产的继续和扩大，要科学调配劳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交战国军队数量与国民经济领域中劳动力数量比例是 1:3 到 1:5，即每一个军人，在国民经济生产部门中就要有 3 至 5 个工人进行生产。国家在平时就要根据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情况，军队对作战物资的需要，参照以往的战争经验，拟制战时军队与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人员（劳动力）使用与分配计划，既要为军队提供充足的兵员，又要为国民经济各部门分配必须的劳动力。第四，国民经济与国防工业的现代化，要

在本国经济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基础上，自力更生地发展。也要努力学习外国的好东西，有选择地引进先进技术。

二、农业准备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全面发展农村经济，不仅是保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也是保障全国军民对粮食及农副产品日益增长需要的关键。农业准备是经济准备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农业正在由自给半自给性生产向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即专业化、社会化）转化，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全面的发展，已成为世界最大的产粮国，棉花、油料等生产也在世界前列。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占全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基本上解决了11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为了保障工业的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满足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必须认真贯彻党中央“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和发展农业的各项政策，大力加强农业基本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实行科学种田；建设和发展商品粮基地和经济作物生产基地；全面发展林、牧、副、渔各业；办好生产建设兵团与农垦事业。建立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的储备，并采取藏粮于民的措施，为战时供应，特别是就地补给做好准备。

林业与军事关系密切。森林不仅能为经济建设与人民生活提供所需木材、能源和多种林副产品，维持生态平衡，减少水、旱、风、沙等自然灾害，保障工农业生产，而且在军事上是一种良好的天然遮障，既可隐蔽目标，又能阻拦敌人坦克摩托化部队的行动。因此应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重要

的战略方向和主要战场，有计划有步骤地营造成片、成带或成网的国防森林，使之形成“绿色长城”。

三、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的准备

1. 交通运输准备

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大动脉，也是保障军队机动、作战、物资与人员前送后运的主要手段。经过四十多年的建设，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由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组成的交通运输体系；我国目前铁路通车里程已达5万多公里，公路通车里程达90多万公里，内河通航里程10万余公里，民航的国内航线170多条，航空站80个左右，管道运输也在积极发展中；交通运输工具有了显著的增长，运输网的布局有了较大的改善，在国家战略纵深及边沿地区新修了一些铁路、公路，并有了一支数量很大的交通运输队伍。这就为战时交通运输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是交通运输仍然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的薄弱环节。主要问题是：铁路公路的分布不平衡，西部地区稀，东西横向干线少，有的战区铁路少，有的方向还没有铁路。铁路单线多，运输能力低，战区公路密度小，质量较差，晴通雨阻便占三分之一，内河航道缺乏整治；各种运输手段分工协作不密切，运输工具不足，技术装备还比较落后等。我们要抓住这些薄弱环节，采取有效措施加强交通运输建设。

（1）要构成布局合理的铁路交通网，修筑复线、正线、枢纽环线及电气化线路，改善技术装备，加强对重要设施和目标的防护和伪装，提高铁路设施的生存能力，逐步实现行车指挥的自动化。

（2）在各战区构成前后贯通、左右相连、质量较高的

公路交通网，建设好预设战场的迂回路和桥梁，制造性能好、载重量大、通行能力高、耗油少的运输汽车，重视履带车辆和专用车辆的研制和生产。

（3）进一步提高水运能力，对价值较大的内河及沿海港湾要增修码头、港口、建造船坞和通行设施，发展内河及沿海运输船队等。

（4）在战争时期要实行统一指挥，发挥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管理以及民间运输等综合运输能力，做到运输、抢修、防护紧密结合，力争全面保障国家建设和战时的需要。

2. 邮电通信准备

邮电通信是党、政、军、民各级领导机关，国民经济各行业、各部门、以及人民群众之间进行联系的基本手段。现在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由明线、电缆、微波、卫星和海缆等多种手段组成的通信网，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巩固国防的斗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的邮电通信还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为确保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机关在任何情况和任何时间，都能顺畅地对生产和作战实施不间断的指挥，必须加快建立平战结合，军民两用的现代化通信网。

四、战略物资储备

战争的实践证明，战略物资匮乏，是导致战争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法西斯及日本军国主义的最终失败，除政治及军事原因外，就是因为它们的战略物资缺乏，不能有效地保证前线的需要。因此各国在战前都注意储备相当数量的合金钢、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石油、粮食等战略物资。为了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我国也把战

略储备当成一项重要战略措施予以高度重视。

战略物资储备分为国家储备与军队储备。国家储备要从战略全局出发，力求储备数量充足，种类齐全的战略物资。通过国家的、部门的、地区的和单位的多种方式进行储备，由国家统一掌握与调配。

战略物资储备应贯彻以下主要原则与要求：

（1）国家储备物资应以通用物资为主与专用物资相结合，以生产资料为主与生活资料相结合，以及储备与生产相结合。重点储备国家经济生产最基本的和军工生产最急需的、最稀缺或需依靠进口的重要战略资源和原材料。比如石油、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特种钢材、关键设备、尖端技术装备的元部件及专用设备、火药、炸药、以及粮食、棉花等。

（2）战略物资储备的数量与期限，通常依据战争经验，国家经济生产条件，以及对未来战争规模的预见而定。一般是国家稀缺、依赖进口、战争急需又不易筹措或战时用量大、生产周期长的物资，平时要有计划的多储存、多采购些；战时消耗量虽大而本国资源丰富，能及时生产或生产周期短、容易筹措、战时消耗量少的物资少储备些。战略物资储备的数量与期限，各国在不同时期是有变化的。如美国根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曾要求平时储备的战略物资能满足一场持续五年战争的需要。后来认为未来大战持续的时间可能要短些，而改为三年。美国石油储备量原规定为5亿桶，后来考虑到战时耗油量大、需要进口的数量多、供应线可能被切断等情况，到一九八五年就扩大到10亿桶。我国的未来反侵略战争将是一场现代条件下的持久的人民战

争，因此战略物资的储备数量要相对多一些，满足的期限要长一些。

(3) 战略物资储备的布局，既要疏散合理，又要便于及时补给。大型仓库应建有洞库，深入地下。国家直接掌握的战略物资，一般应储存在接近工业生产基地，有便利的交通条件，又比较隐蔽的战略纵深地区。国家与军队对战略物资的品种、规格、生产、储备、管理、使用等都要有严格的规定，建立科学的管理供应制度，以便及时满足战时的需要。

第五节 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 全民族的政治素质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其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从战争准备的角度来说就是要认真、扎实地做好未来反侵略战争的政治准备。

一、加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加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民族的大团结，这是自卫战争必定胜利的政治保证。

毛泽东同志指出：“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胜利的基本保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3页）当然也是革命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是四分五裂的，那么它就

不可能有力地抵抗敌人的攻击，就必败无疑。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止的一百多年间，之所以遭受几乎所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根本原因在于满清政府的腐败，致使国家内部的各民族及广大人民群众形不成团结统一的整体力量，使帝国主义国家有机可乘；新中国成立之后，虽然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仍把中国看成“一块肥肉”，却不敢采取大的行动冒然相攻，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党、政、军、民是团结统一的。

讲团结，首先是共产党的团结。只有经过共产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只有经过全阶级和全民族的团结，才能战胜敌人，夺取胜利。历史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过去中国一向被称为一盘散沙，蒋介石就从来没有统一过中国。但是自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成为团结全国的核心力量，四分五裂、各霸一方的局面就结束了。

还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就认识到：中国无产阶级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这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就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阶级和阶层，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只有坚持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才能战胜强大的敌人，夺取革命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28年间，中国各族人民从亲身经历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谋任何私利的政党，是敢于并善于领导人民百

折不挠地向敌人作斗争的政党，看到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军队，是一支完全新型的，与人民血肉相连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这个军队具有内外团结的优良传统。在内部——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军事工作、政治工作、后勤工作之间。在外部——军民之间，军政之间，我友之间都是团结一致的。从而热烈地拥护党、拥护军队，形成一致对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夺取了历次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围剿”，胜利地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国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我们党决定和实行了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紧紧地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坚持八年抗战取得了最后胜利；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政府依赖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和援助，拒绝我党和全国人民关于实现和平民主正义的要求，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党在全国各解放区的支持下，在敌占区学生、工人和各阶层人民斗争的配合下，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积极合作下，领导人民解放军经过三年多解放战争，消灭蒋军八百万，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必须十分重视各民族的团结。新中国成立以来，进一步实现并巩固了全国范围内的国家统一，根本改变了旧中国四分五裂的局面。实现并巩固了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认真发展汉族同各少数民族的团结，改善各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搞好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胜利地进行，以国际斗争及搞好战争准备抵御外来侵略，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少数

民族人口总数达六千七百多万。分布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左右，绝大部分在边疆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一般比内地要低。因此大力帮助各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是党和国家的重要战略任务之一。从1950年到1978年，国家拨给民族自治地方基本建设投资达188亿多元，同时还给少数民族拨出多项补助款。近几年来，国家还大力组织内地一些省、市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对口支援。这对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促进各民族的大团结，起了重要作用。

必须认真搞好军政、军民团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军为了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做了很大努力，特别突出的是：为了补充军队供应，减轻国家和人民负担，发扬了“南泥湾”精神，自己动手，发展农付业生产，发扬拥政爱民光荣传统，积极参加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赞扬和支持，为了改变社会风气，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有效地增进军民团结，广泛开展了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活动。五年来全军生产粮食656,000万斤；油料14,000万斤；鱼类6,000多万斤；肉蛋55,800万斤。支援地方工农业生产11,288万个劳动日；支援国家和地方大中型重点工程8,200多项，参加抢险救灾67,768次，其中出动飞机、舰船10,550架次；车辆18万台次；抢救遇险群众1,108,000多人，抢救各种物资7,296,800多吨。建成大批共建文明村、文明街、文明学校、文明商店、文明厂。

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且为人民带来了很大利益，有效地融洽了军民、军政关系，为夺取“四化”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二、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增强军民斗志

对全民族进行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这是取得自卫战争胜利的重要思想条件。

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是贯彻积极防御战略，胜利实行自卫战争的两大精神支柱。爱国主义是以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为根本标志的，“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列宁全集》第28卷第108—169页）。它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内容。剥削阶级的爱国主义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如上升时期或遭受外国入侵时）具有进步意义，但它带有阶级局限性。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是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它从本国人民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既反对外国的侵略者，热爱自己的祖国，进行英勇顽强赤胆忠诚的卫国斗争，也反对本国统治阶级对其它民族的压迫，支持别国人民的正义的革命斗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爱国主义”是民族利己主义和沙文主义，它以“爱国主义”为幌子为其推行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服务的。这种“爱国主义”同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是根本对立的。

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热爱祖国悠久文化，热爱勤劳勇敢的伟大人民，坚持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有许多忠贞不屈，具有强烈爱国主义情感的英雄人物，如屡遭打击而不忘爱国的屈原，忍辱负重的苏武，宁死不屈的文天祥，为收复祖国领土而出生入死的郑成功，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鞠躬尽瘁的孙中山等等。至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义和团对八国联军的抵抗，特别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战

争，派出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对印、对越、珍宝岛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等等，更充分体现和发扬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及其强大威力。未来反侵略战争，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在此情况下，我们中华民族为了祖国的统一和尊严，一定要发扬举国一致，万众一心，同仇敌忾，以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同敌人进行决死的斗争。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最伟大的民族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当代世界上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作为这个伟大民族的子孙应该有强烈的自豪感、光荣感，为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而努力奋斗！

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是紧密结合、相辅相成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是激发革命英雄主义的基本前提和思想基础，高度的革命英雄主义是贯彻爱国主义精神的重要途径。

革命英雄主义从广义讲，是代表先进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勇于向社会上的反动、守旧势力和自然界进行坚决、不屈的斗争的精神面貌。无产阶级的革命英雄主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一种表现，其特征是把革命利益看作高于一切，在革命斗争中，舍己为公，不怕牺牲，敢于为真理冲锋陷阵，把个人的成绩和荣誉归功于人民群众和集体，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争史，就是一部用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谱写的英雄史诗。“八一”南昌起义的英雄，反“围剿”战争中的壮士，二万五千里长征路上的勇士，抗日烽火中的英烈，解放战争中，可歌可泣的英模人物，抗美援朝战争中的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对印、对越、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中的英模功臣，都洋溢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临

危不惧、勇往直前的崇高品质。

革命英雄主义在征服自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以及在抗洪、抢险、救灾，参加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等等都表现为，哪里有困难、哪里最艰险、哪里就有解放军，哪里就有革命英雄主义的光辉事迹。

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在敌人极端残酷、极端疯狂的进攻面前，对每一个人都提出了极其严峻的考验，只有具有高度的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的人，才能经得起这种考验，因此大力宣传、教育、锻炼养成这两种精神，就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一项共同的思想政治任务。

第六节 加强军事方面准备， 提高我军战斗力

一、搞好军队现代化建设

军队是直接进行战争的基本力量，只有抓紧建设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反应快速、战斗力很强的现代化军队，才能在平时成为遏制侵略的威慑力量，防止战争的发生，战争时期有效打击敌人，赢得战争的胜利。

我军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应具有中国特色，不能离开革命化和正规化。三化建设中，现代化是中心，正规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革命化则是现代化和正规化的根本保证，三者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缺一不可的整体。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着重抓好三个方面的事情。

(1) 不断改善武器装备尽快达到先进水平。我国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军队的武器装备要与担负的作战任务相

适应，因此必须在经济和技术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努力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尤其是要在武器装备的总体结构上进行全面筹划，既考虑各类武器的组成，又要考虑它们之间的比例关系和品种系列的配套，不能片面的强调某一种武器。同时要重视高技术武器的研制。根据我国的经济和科学技术条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武器装备的发展，仍将以常规武器为主。但今后的常规武器，应当是高技术的高效常规武器。重视高技术武器的发展，不仅对军事有巨大影响，而且对政治也有重大影响。

（2）进行严格的训练，使人与武器的结合达到一个高水平。和平时期，军队素质和战斗力的提高，主要是靠严格的教育训练。从未来反侵略战争的需要出发，既要训练打常规战争，也要训练打核战争；既要训练打全面战争，也要训练打局部战争和应付突发事件，要着重研究解决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战法；认真吸取和借鉴近期局部战争经验；重视各种专业技术训练，重视各种科学技术的学习；重视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和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以及在复杂电磁环境下的训练；重视诸兵种合成战役、战术训练，以不断提高我军在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3）注重人才培养。军队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能够指挥现代化作战的各类优秀人才。尤其是我军的现代化建设正处在世界技术革命的浪潮之中，新的技术不断涌现，各种武器装备发展很快，如果我们培养人才方面跟不上，就要更加被动。因此只有努力培养和造就足够的军事、政治、后勤及其它专业技术人才，才能卓有成效地提高军队的军政素质，加快现代化的步伐。

(4) 重视研究和发展军事科学理论。现代军事科学理论,是军队现代化的先导,必须把军事科学理论的研究放在重要地位。我们的军事科学理论,是研究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规律,研究战争准备与战争实施的知识体系,它包括军事思想、军事学术、武装力量建设、军事历史、军事地理等重要学科门类,是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叶剑英指出,“如果只掌握现代化军事手段,而没有正确的军事理论作指导,也不能有效的对付现代化的敌人,至少要付出更多。更大的代价。”(《军事学术》1978年第4期第16页。)所以我們必須在堅持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加強軍事科學理論研究,不斷提高軍事科學理論水平,發揮科學理論在軍隊現代化建設中的先導作用,解決軍隊建設和未來作戰所面臨的重大問題。

二、武装力量动员准备

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维持一支庞大的军队所需要的费用越来越高。做好武装力量的动员准备,可以达到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的目的,所以近年来一些国家一再压缩常备军的数量,把节省下来的军费用在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上。做好武装力量动员准备,寓兵于民、这是当今世界上各主要国家普遍采取的一项行之有效的国防政策。

1. 现代战争对武装力量动员准备的新要求

- (1) 动员速度要快,尤其是迅速完成首批动员任务;
- (2) 数量要多,为了适应战争规模急剧扩大和兵员伤亡量大的特点,要保障大量兵员的持续动员任务的完成;
- (3) 动员对象质量要求高,被征召的兵员,尤其是战争初期,要能不再经专门训练就能直接参加战斗,

(4) 动员对象中，要有相当数量的有指挥才能的军官和有专业知识的技术兵员和科技人员，有些科学技术专家将被动员到军队直接参加作战指挥和从事科研、工程技术工作。

(5) 人员和所需的武器装备之物资要配套。

2. 建立健全动员领导机构，制定完善的动员计划

武装力量动员工作，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组织工作复杂，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有权威的动员领导机构，平时负责动员的准备工作，战时协助国家和最高统帅部组织实施动员。

动员计划是国家的指令性计划，它是平时做好动员的准备工作，战时实施动员的基本依据。它包括：各战区、各军兵种、武装警察部队战时的组建和扩建部队的数量，动员扩编的原则、形式、程序和要求。预备役部队转入现役的程序、时限和要求。武装装备和其它物资的配发方法，征调民用器材的数量和方法等。

动员计划要把应付紧急动员和战争初期的动员作为重点，对战争中、后期的动员任务和措施，也需有一个概略的计划，以便合理地分配人力、物力资源，逐次完成动员任务。

3. 建立预备役制度

预备役制度包括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这是储备、培训后备兵员、部队和实施快速动员的一项极为重要制度。实行这一制度可以不断增强国家的后备力量，有利于动员部门对预备役人员进行预编、预任和有计划的培训，有利于把预备役制度与民兵制度紧密结合起来。民兵是我国兵员

的雄厚基础，是预备役的基本组成形式，又是我国武装力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行民兵制度与预备役制度相结合的同时，必须处理两者既要结合，又有区别的关系，要保持民兵组织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4. 建立预备役部队

预备役部队是人民解放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各军兵种的后备部队，是战时应急动员、迅速组建部队的一种形式。各军、兵种的预备役师（团），应按战时组建部队的需要，平时编配一定数量的现役军官和技术骨干，其余的人员用预备役军官、士兵预编起来，按正规部队编制配齐装备，平时归省军区建制、并与有关部队挂钩，明确战时指挥关系，按预定的作战任务和训练大纲，定期集训、演习、战时则按规定时限，转为现役部队。

5. 建立征召补充区

征召补充区，是军政统一的兵员动员责任区。由地方政府和军队协作，按照动员计划，分别以陆军、海军、空军、二炮和武装警察部队的军、师、团、营为单位，本着就地补充干部、兵员、装备（事先储备好）的原则，确定各部队征召的地区范围。通常一个军可以划给几个专区，一个师划给一个专区，一个团划给一个县，一个营划给几个乡的范围，逐级建立征召补充区。对特殊条件的兵员（如飞行员），应在较大的范围内跨区选优征召。海军的征召补充应主要在沿海地区划分。

6. 加强干部与技术骨干的储备和训练

军队扩编、新建的一个突出矛盾，往往就是干部和技术骨干的数量与质量不适应。从未来发展看，军队越现代化，

干部和技术骨干的需要量越大，为此必须大力加强干部和技术骨干的储备与训练，并使之制度化，规范化和多样化。同时还要照顾到各军、兵种的需要，使其比例适当，专业对口，编组合理，以利于战时的分类动员。

7. 做好征调民用装备、器材和改建专业兵的准备

武装力量的动员还包括征调一部分民用装备和器材补充军队。新组建的部队，尤其是预备役部队所需要的各种车辆、船只、飞机、马匹、工程机械、修理设备、医疗器械等。除由就近军用仓库解决部分外，主要将从地方征用。同时地方的专业组织，也可能组成专业部队，例如将征用的汽车运输机构改建为汽车部队，铁路建筑单位改建为铁道兵，工程建筑单位改建为工程兵等。这是寓军于民的一项重要措施，世界各国都很重视。马岛战争中，英国征用民间各类船只56艘，60多万吨，占其战时辅助船只吨位的80%，被征用的这些船只，除分别作为油船、运兵船、医疗船外，部分船只经过简单改装后作为战斗保障船只使用。所有被征用的民间船只，进入战区后，船上的人员都转为现役军人。

8. 做好动员的交通运输和通信保障准备

可靠、顺畅的交通运输和通信保障，是实施快速动员的重要因素。为护障扩编、新建部队的集结、机动和物资补充，应将动员运输列入军事运输计划。机场、港口设施和交通工具的准备，可以采取军队与地方相结合的办法解决。通信联络以地方的邮电和广播系统为主，利用地方、军队的各种通信器材和各种通信手段，优先保障迅速传递国家动员令和征召通知书。国家和军队还应制订切实可行的有线、无线通信和广播、电视保障计划，基层单位主要是作好有线、广播

通信和快速通信准备。保障国家一声令下、立即行动，快速集结。

三、战区划分

战区是为实行战略计划，执行战略任务而划分的作战区域，也称为战略区，它具有相对独立的作战体系。合理划分战区，可以构成合理的战略布局，形成有利的战略态势。

1. 战区的基本条件与要求

战区是战争全局的局部，同时又是一个战略性的整体。它应有动员组织全区人力、物力保证军事行动的能力，能够应付多种战争情况。因此在行政和经济上要有相对的完整性，在军事上要有相对的独立性，能够在国家总的战略指导下，充分发挥本战区的优势，独立遂行所担负的战略任务。在地理上要有良好的自然条件作依托，尤其是能够有效地掩护对战争进程有重要影响的战略、战役目标，有较为稳定的后方地域。在空间上要有相当大的容量，有一定的正面和纵深，能够容纳众多的作战部队，并且有一定的回旋余地，以利战略、战役军团的展开与机动。

2. 划分战区的主要依据

对谁作战，主要战略方向在哪里，是划分战区首先要明确的问题。而后，综合分析军事地理环境，其中主要包括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社会条件、地区容量等。分析这些条件，既要考虑各地区的自然地理特点及战略地位，又要考虑各战略方向的作战部署，力求在战略部署上构成完整的作战体系，使它既有利于各地区独立、持久作战，又能增强整个战局的稳定性。

战区划分，还应从战争史中吸取有益的经验，由于受各种

条件的制约，战区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例如由于受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历史上常常出现重复以往战争的进攻方向和进攻路线，从类似的历史规律中，来决定作战体系和战区重心。

战区通常以大的山脉、江河、重要的海峡为界。确立战区范围，应考虑和邻战区的地理条件和战略体系，使之有利于相互支援和协同作战。为了便于相邻地区的协同作战，应划出战区与战区间的重叠地带，并指定主要负责保障者。

战区的划分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一定的战略形势和一定的战争条件下形成的，因此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形势的变化和发展，战区的主次关系可能易位，并可能划出新的战区。

四、战场准备

处在战略防御地位的我国，应当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加强战场准备。

1. 战场准备的基本要求

战场准备，应根据不同的战区，不同的战场提出不同的要求，其中共性的基本要求是：

（1）能适应未来作战的需要，具有生存能力，符合全方位、大纵深、立体作战和全民防御的要求，能打、能藏、能机动、能指挥、能供应、能生活。

（2）能够保障抗击敌人来自地面、空中、海上的突然袭击，主要工程不仅要能抗住敌高效长规武器的打击，而且能抗击敌人的核、化学、生物武器的袭击。

（3）符合持久作战、独立作战的要求。特别某些战略、战役要点，可能被敌分割、合围，更需做好长期、独立

坚守的准备。

(4) 能够适应多种作战形式的需要。不仅能保障阵地战、运动战、游击战三种作战形式的需要,而且还能保障反空降、抗登陆以及海上、空中作战和战略导弹部队等多种作战形式的需要。

(5) 能保障防坦克、防空降、防空袭的需要。要经得住敌人大量坦克的突击,能够抗击和制止敌人战略、战役的突破和合围;要能够适应打击敌人使用直升机和空降兵实施的超越进攻;能够适应我粉碎敌人阻止我实施战略、战役机动和切断我运输补给线企图的需要。

(6) 符合隐蔽、伪装的要求。随着侦察、制导技术的发展,今后的战略伪装,不仅要对付敌人的各种侦察手段,还要对付敌人的精确制导武器,这就对战场伪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战场的伪装是具有战略意义的一项工程,必须纳入战场建设规划,同各项建设同步进行。在实施时要作到秘密选点,隐蔽备料、施工,有计划的构筑假的战略、战役目标,采用多种技术手段使战场准备达到现代伪装的要求,以提高各种工程设施的作战和生存能力。

2. 陆、海、空军和第二炮兵的战场准备

陆军的战场准备。就我国战场准备的总体来说,陆战场是重点和主体。处于战略防御地位的我军,要抗击敌人的陆上攻击,制止敌人长驱直入,必须在重要的战略方向上利用有利地形,建立大纵深,多地带、多防线的防御阵地体系。在便于坦克、机械化部队机动的地区,平时应结合农田水利,绿化造林等基本建设改造地形,如修筑梯田,挖沟修渠,营造防护林带等。形成由沟、壕、林网和筑城障碍物组

成的大面积的防坦克障碍地带。对于敌必攻、我必守的战略要点和重要城市，应多层设防，建立坚固防御阵地，形成要塞式的防御体系。在敌可能实施大规模空降的地区，应构筑必要的反空降支撑点和屯兵工事。在敌人可能登陆的重要地段，应构筑抗登陆工程。在战略纵深，应在预设开敌地区构筑必要的屯兵工事和指挥、战斗工事。构筑这些工事，工程量大，费时长，须全面规划，长期建设，逐步配套，形成体系。

海军战场准备。海军战场准备，应以海军的战略战役任务，主要作战形式和对武器装备发展的预测为基本依据，并充分考虑敌人海上作战特点和海区地理等情况，进行规划和建设。我国有许多优良的海湾、港口和深水河口，有6500多个近岸岛屿，为海军战场建设提供了有利的自然条件。海军基地是海军力量的一大要素，因此海军战场建设的重点应放在海军基地建设上，力求使各种基地形成体系。

现代海军的作战能力，不仅取决于海军兵力本身素质的优劣和数量的多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驻泊系统保障海军生存和作战的条件，其中包括后勤保障能力。此外还应重视构筑防御工程，要以海军基地防御设施为基础，构成以对海方向为主的，从远到近的，环形的，多层次的防御工程体系。

海军战场准备，要与发展国民经济，尤其是发展海军事业密切结合进行。平时的海洋工程，海洋开发和为发展海上交通运输而建设的港口、码头、仓库、驻泊点、输油管道、导航设施等，应当充分考虑战时海军作战的需要，并结合海上资源调查，积累海军作战所需要的水文资料，逐步摸清一

些海峡、航道和咽喉点的有关情况。

空军战场准备。随着空军的发展，空军战场准备越来越成为整个战场准备的一个重要方面。现代战争要求航空兵分散配置，集中使用，这就需要有大量的布局合理的机场。因此空军战场建设的重点是机场网的建设，世界主要国家，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都极其重视机场网的建设。要求一个航空兵团战时有几个机场。苏联仅在亚洲就有永备机场168个，辅助机场79个，其它小型机场1200多个。

为适应今后反侵略战争空军机动作战的需要，须结合国家民航事业的发展，按照前轻后重，纵深梯次配置的要求，在现有机场的基础上，既要加强一线机场建设，也要有计划、有重点地加强二线机场和战略纵深机场的建设，并可结合公路建设、适当发展公路跑道。现代战争一般都强调以突击机场作为消灭对方航空兵、夺取制空权的主要手段。因此，机场建设要特别重视防护工程的构筑。有计划的进行大型飞机洞库、单机掩蔽库、器材库等工程的建设，将一些重点工程项目转入山洞或地下，以提高生存能力。同时也要加强指挥引导网、情报网、气象网的建设。加强对空防御和对地面防卫以及后勤保障和机务保障系统的建设，使空军战场准备配套。

第二炮兵的战场准备。为提高第二炮兵的作战和生存能力，保障充分发挥其战略作用，必须加强基本阵地和预备阵地的建设，加强指挥，控制和情报系统的建设。对核弹药库、燃料库以及其它防护和配套工程设施，应提高抗力和综合防护能力，并加强伪装措施。

3. 战场指挥网建设

为了未来反侵略战争有一个稳定、可靠的作战指挥系统，就要积极搞好各级指挥工程建设。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由于平时这方面的准备差，战争爆发后，统帅部只好在平时的办公室里指挥作战，当敌机轰炸莫斯科时，不得不临时进入地下铁道。西部各军区司令员于战争爆发前不到一个月才接到构筑方面军指挥所的命令，但当时已晚，给指挥作战带来严重困难。我们应该引以为训，有计划地为统帅部、战区（包括某些省、市首脑机关）、方面军、集团军构筑永备指挥所，逐步完善电子化指挥系统的设施，形成战场指挥网。

4. 后方基地建设

后方基地，本质上与过去的根据地有许多相同之处，但在内容和建设方法上有许多新的发展。

根据地的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历次革命战争中，毛泽东都把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作为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予以高度重视。他把根据地看成是我军生存和发展的战略基地，是执行一切战略任务，实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战争目的依托。因此战场后方基地也可以说是作战军队的根据地。

现代战争中，一个地区，一个战场，若没有巩固的后方，很难持久作战。因此我们在战场准备中，仍应贯彻毛泽东的根据地思想。对后方基地建设，予以高度重视，后方基地建设，首先要选择适当位置，其主要条件是有一定的幅员和人口，有相当的工农业开发潜力，便于隐蔽，战时地面敌人不太容易接近的地区。后方基地建设一般应包括：一定的制造和修理设施，各种物资仓库、医院、训练基地、交通运输和邮电通信设施，以及能源供应系统等。建设的方法、应

在当地经济建设的基础上，贯彻平战结合、军民结合的方针，逐步发展，长期经营。

第七节 由平时转入战时状态

根据形势的发展，采取紧急措施，使全国或部分地区迅速转入战时状态，这是反侵略战争准备的最后阶段，也是最关紧要的时刻。

一、及时地对战争危险作出正确判断

对战争的危险及时作出正确判断，是一个国家最高统帅机关的一项十分重大而又困难的工作，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

和平转化为战争总有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处在渐变中的许多因素及其征候是客观存在的，总有端倪可察，有朕兆可寻，只要加强战略侦察，对情况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研究，战争的危险是能够判断的。但因为战争是一种特殊社会现象，较之其它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定性，因此要正确判断战争的危险又是十分复杂和困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法国、苏联、美国对德国和日本的战争都作了错误的判断，结果付出了重大的代价。

判断战争危险，要从世界大势着眼，综合分析对立的各主要国家和集团的军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多方面的矛盾状况，深入观察可能成为战争来源地的社会内部变化，看制约战争的基本因素是否能被打破，同时也要注意研究世界各国军事大国主要当权者的个性、特点、看有没有战争狂人式人物和与之相呼应的绥靖主义出现，只有从整体上弄清世界基本

矛盾的内在联系，把握其总的发展趋向，才能看清战争危险的本质。

到了需要判定战争是否很快就要来到时，需要加强侦察和情报工作，及时发现敌人发动战争的各种具体征候。如：制造入侵舆论，进行外交欺骗；军政头目活动异常，频繁召开秘密会议；扩大征兵范围，进行秘密补充；加强情报侦察，频繁发射卫星；高级人物到边境活动，进行边境封锁；更换军事头目，组织新的指挥机构；提高战备等级，增强战区实力；战略袭击兵器进一步展开，各战略集团秘密开进和集结；军运频繁，后勤补给加强，加强飞行保障，控制重要海域；通信联络异常，实施电子干扰，扩大军工生产，部分民用工业开始转产军用品；国内强化治安，仆从国家表现异常；加强防空和民防，疏散城市和边境居民等等。

二、适时转入战时状态

当判定战争危险严重，而且就要到来时，就要坚决排除各种干扰、果断地、不失时机地使国家转入战时状态。及时定下这个决心，并采取正确措施，就能在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从被迫转入主动，如果对战争危机察觉过迟，犹豫不决，不能定下适时转入战时状态的决心，以致来不及采取有效的对策，就会使国家蒙受重大损失。

转入战时必须适时。过早，会影响国家经济建设，政治上也不利，过迟遭受的损失太大，不易扭转被动困难局面。二者相较，宁可失之过早，不可失之过迟。前者利多，后者弊大，转入战时状态的主要措施是：

1. 实施战争动员

发布动员令。凡实施国家总动员，应由国家主席发布动

员令。各地接到动员令后，立即按国家动员法规，在各级动员机构的统一领导下，按计划迅速实施动员。

武装力量动员。首先要完成第一批次任务，保障全军按时完成作战准备。现役部队的补充、扩编、预备役部队转入现役，地方部队、民兵、游击队的扩大、组建，支前队伍的集中等，均应在规定的时限内完成。在完成第一批次任务后，随即进行第二批次的动员，以保障战争初期的作战。尔后按照动员计划和战争需要，进行持续动员。

国民经济动员。要按照国家动员令的规定和经济动员计划，保证国民经济各部门迅速转入战时轨道，按时完成转产任务，并迅速扩大生产；交通运输系统，要保障军队完成战略展开和完成其它运输任务；工业和科研系统要加速研制新式兵器，大幅度地扩大武器弹药、装具、器材、油料和其它军需物资的生产；物资部门要扩大战略物资的储备与供应，以保障军队作战的需要。

民防动员。充实各级民防组织；使警报系统处于完好状态，保障能随时顺畅发放警报；民兵高炮队伍按城市（要地）防空布署完成作战准备；健全人民防空各种专业队伍并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组织人民群众做好消除空袭后果的准备；迅速扩大民兵队伍；健全公安系统和群众性的治安组织，民防动员，应根据各地具体情况进行，逐步展开，防止影响其它动员任务的完成。

政治动员。要动员全国一切宣传力量、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手段、广泛深入地宣传国家动员令，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要抓紧对公民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揭露敌人的侵略阴谋和罪行，最大限度的调动全

国军民的积极性和抗战卫国的热情，保证武装力量动员、国民经济动员和民防动员任务的完成。

2. 调整战略部署，进一步实施战略展开

我军平时的战略部署，只能是基本的部署，不可能完全适应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实际情况，必须根据临战期间的情况变化而进行调整。适时定下新的战略决心，是调整战略部署的首要条件，因此必须在取得可靠的情报和正确判断情况的基础上，十分慎重地定下战略决心，并确定武装力量各部分新的任务和部署以及调整部署的顺序和方法。

进一步实施战略展开，是按战略决心，作战计划形成武装力量的临战态势，使它能够随时投入作战，这是国家直接作好开战准备的重要措施之一，对战争初期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具有重大意义。其要求是：精心组织，周密计划，准确迅速，力争在战争爆发前，完成或基本完成调整任务。

3. 组建和部署游击武装

当着国际形势已很紧张，战争征候日趋明显时，即应在可能进行游击战的地区，迅速组织和部署游击武装，并以此为中心，进一步作好开展游击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游击武装的编成和规模，以及武器装备等，应因地制宜，以保证能够独立完成战斗任务、坚持持久作战为原则，不强求一致。

在可能被敌占领的地区，特别是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上，应作好坚持秘密斗争组织的准备，建立各种秘密的群众组织和情报组织，以便在被敌人占领时，按时转入地下，领导群众进行对敌斗争，配合游击队积极打击敌人。

4. 进行疏散、搬迁

对受敌人严重威胁的城市和居民，科研机构和重要工厂进行疏散、搬迁，是减少伤亡损失，保存战争潜力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平时转入战时状态的一项主要内容。

由于武器的发展，对居民的杀伤越来越大。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争造成的死亡人员，居民仅占5%；第二次世界大战达到了30%；朝鲜战争则达到了80%。今后一旦爆发大的战争，特别是核战争，居民的伤亡将更大。因此必须重视城市人口的疏散问题。世界上多数国家，经过多年的准备，都有一套比较周密的疏散计划和实施办法。苏联预计在72小时内把城市的大部分人口疏散出去。美国的疏散计划，要求到80年代末能在接到警报后三至五天内从400个城市中疏散出三分之二的人口，争取在遭到核袭击后，美国能有80%的人口能生存下来。

疏散分早期疏散、临战疏散和紧急疏散。早期疏散是在有战争征候，形势逐渐紧张期间进行的，临战疏散是在国家由平时转入战时状态过程中进行的，紧急疏散是在发现敌空袭征候或遭敌空袭时进行的。一般的说对这三种疏散都要有所准备，根据情况发展，适当采用，避免拥挤、混乱。

战时人口疏散的地区是广大农村，最理想的是山区，各个城市由于地理位置、战时所处地位、面临的敌情不同，人口疏散的作法也应有区别，纵深城市主要躲避敌人的空袭，沿海城市除了躲避敌空袭，还要躲避敌地面和海上的进攻，因此疏散的时机、数量、去向等应有所不同。各城市视情况组织实施。

工厂搬迁，是在国家统筹安排下，由各级政府组织实施的。处于敌地面军队可能占领的重要工厂，条件许可的，适于搬迁的应搬迁到预计敌军地面部队达不到的地方。

工业的疏散已不再具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曾经有过的那种作用了。因为疏散后的企业在新地方也会同老地方一样遭受敌人空袭的可能。而且在临战期间交通运输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大批工厂的搬迁也会遇到很大困难，同时正在需要大幅度提高军需产品数量的时候，突然停产搬迁也是一个很大的矛盾，会使工业动员复杂化。因此应当慎重权衡利弊，如搬迁后仍然难以保存，就不如不搬。应当将那些离前线近，最必要的、最关键、最重要的生产设备，搬迁到后方山区，分散、隐蔽配置，采取防护措施，使它继续生产。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过去那种在战争即将爆发或已爆发时，大举搬迁工厂的经验已不完全适应今后的战争，但是在临战期间，从危险地区，搬迁一些经过慎重选择特别重要的工厂，或某些工厂中最重要的生产线，仍有其必要性。

5. 实行战时管制

从国家进入战时状态起，就应按照战争迫近的情况，有计划地按战时管制法令和法规，由政府 and 军队有关部门对社会某些方面实行战时管理，以保障国家顺利转入战时轨道，保障战争动员有条不紊地进行，保障全面扩大生产，保障人民的生活和社会的安定，防止一切混乱的发生。

战时管制要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组织、制度、生产、生活等各个方面采取适应战争需要的各种管理和限制措施，如交通管制、严格劳动纪律、加强战时兵役管理、加强社会治安、加强文化宣传管理等。战时管制应以国家有关战时法令和法规为依据，各战区和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可根据本地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地区性的有关规定。战时管制，根据需要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也可在局部地区实行。

第九章 战略防御与战略进攻

第一节 战略阶段

战争的全过程是由若干阶段组成的，这些阶段被称为战争或战略阶段，任何战争都是如此。所谓“战略阶段”，是依据战略形势的基本变化而划分的战争阶段。我军以往和今后的战略阶段划分，以积极防御战略理论为依据，科学地预见战争的产生、发展和结束的全过程，正确地把握战争进程中各个阶段的划分和转换，对于正确地指导战争向着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方向转化，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是非常重要的。战争阶段的划分，是在全面分析敌我双方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各依其本性而发生的变化，判明战争趋势的基础上，划分出战争发展的战略阶段。战争情况不同，战略阶段的划分也不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国内革命战争和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中，总是首先从战争的实际出发，全面分析敌我双方政治、经济、军事、地理以及国际条件的对比特点，从而判断战争的可能发展趋势，预见战争可能经过的战略阶段，做到心中有数地去驾驭战争。

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同志及时总结了抗战十个月的基本经验，有利地批判了当时存在的“亡国论”、“速胜论”以及唯武器论等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指明抗日战争是持久

的，最后胜利是中国的，战争全过程将经过战略防御（1937年7月～1938年10月）、战略相持（1938年10月～1945年6月）、战略反攻（1945年8月～12月）。并在各战略阶段实行了正确的战略指导，从而有力的武装了一切愿意抗日的人们，使他们有明确的战略方向和准绳，终于夺取了最后的胜利。

在解放战争中，我军经历了战略防御（1946年7月～1947年6月）、战略进攻（1947年7月～1950年6月）两个阶段。

抗美援朝战争经历了战略反攻（1950年10月～1951年6月）、战略防御（1951年6月～1953年7月）两个阶段。

我军在土地革命战争中，主要是采取反“围剿”的形式，每个根据地分别进行的每一次反“围剿”作战，具有战略和战役双重意义。由于当时敌人始终没有处于战略防御地位，也没有整体上的战略进攻。因而，我军在整体上无所谓战略防御、战略进攻。但在一个根据地的一次反“围剿”中，客观地存在着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两个阶段。

战略进攻，指战争一方的军队对敌方军队实施的全面进攻，或为达成战争的局部目的，在一个或数个方向（战区）上，对战略性目标实施的进攻。包括战略决战和战略追击。

战略防御，是在战争全局上对进攻之敌的防御。

战略反攻，一般是战略防御的最后阶段，是对战略进攻之敌采取的进攻行动，是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过渡形式。它在现象上表现为战略进攻，“通俗地说，谓之进攻”然也是可以的”（《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118页）。也就是说，战略进攻、战略反攻在形式上是相同的，都是一

方军队全局上的进攻行动。区别在于“反攻的原则，是在敌人进攻时应用的。进攻的原则是在敌人防御时应用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00页）。从目的上看，战略反攻是为了迫使敌人放弃战略进攻而采取的决战性的攻势行动，带有战略进攻前夜的性质。而战略进攻是为了歼灭敌人重兵集团，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战争全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起着巨大的作用。另外，战略进攻是指全面，战略反攻有时指局部。全线的战略进攻是从一个个局部的战略反攻逐步发展而来的。

战略阶段划分应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而没有固定的模式。建国以前，我们的主要敌人一是国民党反动派，一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我们必须首先实行战争全局上的防御，在防御中积极歼灭敌人和加强敌后战场的开辟与扩大，发展壮大自己。由敌攻我守逐步发展到互有攻守的战略相持阶段。当我军力量发展壮大到超过敌人时，开始战略反攻或进攻，达到彻底战胜敌人的目的。这是积极防御战略理论指导下的战略阶段划分的一般规律。即战略防御在前，最后导致战略反攻和进攻。但是战争情况千变万化，战略阶段的划分也没有一个固定模式。抗美援朝战争，入朝第一阶段即实行战略反攻，采取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因为我志愿军出国时，敌人已经占领了朝鲜北部大部分领土，夺取了平壤，越过了清川江，继续向北疯狂进犯，战局十分危急。我在战略指导上不能采取守势，必须首先实行战略反攻，争取主动，稳定战局。在反攻作战中，我志愿军先在尚未丧失的一部分地方站住脚跟，抓住敌分兵突出冒进的战机打运

动战，创造性的提出，“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的原则。经过连续进行的五次战役，歼灭敌人23万，把敌人赶回到三八线附近，基本上稳定了朝鲜战局。在进入第二阶段时，我志愿军没有采取由战略反攻导向战略进攻的步骤，而是转为战略防御。因为敌人经过五次战役的打击，前线兵力不足，战略后备力量筹措不及，对我无计可施，因而转入战略防御。

未来反侵略战争，将经历哪些阶段，谁也难以完全估计得合乎实际。但是，给战争描绘一个轮廓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否则，必然陷于被动，也将影响具体的战争准备。未来局部战争将是我们面临的主要威胁。局部战争，一般持续时间较短，规模较小。在充分进行战争准备的基础上，主要是进行自卫还击。可以说，更多的带有战略反攻性质。如未来反侵略战争是属于大规模的全面战争，从总的趋势看，可能要经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进攻等阶段。

正确适时的实行战略转变。战略转变，是指由这一战争进入另一战争，或由这一战争阶段进入另一战争阶段时，所作的战略指导上的转变。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所领导的革命战争，就正确地实行了土地革命战争前期的游击战向后期的正规战的转变，从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从抗日游击战争向大规模运动战的转变。实践证明，在战争发展过程中，不失时机地实行战略转变，使军队的战略方针、作战形式适应新的战争情况，对于推动战争的胜利发展有重要作用。在以往的历次战争中，我军通常是把主要作战形式的转变，作为战略转变的重要标志。一般说来，当敌我力量对比十分悬殊，我武器装备很差，战争经验很缺乏，军队正

规化程度低，或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等条件下，则以运动战为主；当我军有相当的发展，技术装备有相当的改善，建立了全国政权，有了统一的国防，有很大一部分家业需要保护等条件下，则应适当转变作战形式，将阵地战的地位大大提高。

第二节 战略防御

一、战略防御的地位、作用和任务

战略防御，是战略行动的基本类型，是战争全过程中的重要阶段。战略防御的目的，是阻止和打破敌人的进攻，保存军力和战争潜力，固守战略要地，大量消耗和消灭敌人，逐步转变敌我力量对比，制止和挫败敌人的战略进攻，为已方转入战略进攻创造有利条件。

防御、进攻是战争行动的基本类型，是人类出现战争就出现了的。任何战争，都不会完全没有防御。即使是实行进攻战略的军队，在一定时间或方向，也要采取全局上的防御。对于革命军队来讲，战略防御必不可少。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首先挑起战争，只能处于防御地位。在军事上，我们处于劣势，只有实行战略防御，才能充分利用本国作战的有利条件，发挥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因而，正确地组织和实施战略防御更加重要。

对于防御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向来有不同的看法。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都强调防御的重要性，认为防御“是战争的自然进程”（克劳塞维茨），“一个守势的战争，假使进行得很技巧，也并非完全没有利益的”（约米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各国普遍重视战略防御，并发挥了一定的作

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由于对防御的轻视，造成战争初期的极端被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技术兵器的发展，特别是核武器的出现，世界上吹起一股贬低以至否定战略防御的论调。苏联在拥有大量核武器的情况下，极力鼓吹战略进攻，宣称“火箭核突击已迫使战略防御从战争舞台上消失”（苏《军事战略》第615页）。美国也断言“防御只会带来灾难”（柯林斯《大战略》第187页）。近年来，当两个超级大国出现核均势以后，他们开始逐渐肯定战略防御的作用。

战争实践证明，任何新武器的出现和运用，都排斥不了战略防御。防御的战略地位也不能因进攻性武器的发展而被否定。战争经验告诉我们，辩证认识攻防的内在联系，摆正战略防御在战争中的位置，极为重要。任意夸大或贬低防御的作用，都会给战争指导带来危害。因为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是构成战争整体的两个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失去一方，它方也就不存在了。

战略防御的任务，从根本上说，就是挫败敌人的进攻，为自己转入战略进攻创造条件。不同的战争和不同的历史条件，战略防御的任务不会一样。我国未来反侵略战争，战略防御主要是以积极的作战，使入侵敌人遭受尽可能大的损失，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并在适当时机举行战略反攻，最终粉碎敌人的进攻。

二、战略防御的主要原则

1. 战略防御必须坚决实行积极防御

承认积极防御，反对消极防御，是指导我军战略防御的基本原则。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我国未来反侵略作战时指出：

“积极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1980年10月15日《在某防卫作战研究班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战略防御阶段，就总体上来讲，军队是处于**防御地位**，形式上是被动的。但积极防御的本质是攻势防御，并不是消极地等待敌人来打。它不仅有积极的目的，而且有积极的手段。那就是它不仅包含一个战略反攻阶段，而且应在防御全过程中积极地采取进攻行动，依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只有这样，才能摆脱被动的局面，争取主动。才能完成战略防御的任务、达到战略防御的目的。

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是我国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在此阶段中，日军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妄图三个月灭亡中国。我在战局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积极打击敌人。东北抗日联军，积极牵制日本关东军，对华北、华中抗战起到了战略上的配合作用。在这一阶段中，我军共作战1600余次，歼敌5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2000余支，收复了大片领土，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边、冀鲁豫、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牵制了大量日军，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友军作战，并使自己由出师时的四万人发展到十八万余人，对停止敌人的战略进攻，加速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重要作用。

防御作战的方法和手段，是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现代条件下的战略防御较过去有了许多新的特点和要求。例如，以往战争，我们的战略防御主要是在陆地上进行，打击的目标主要是敌人的地面部队，缺乏远战手段，战场范围有限。而未来反侵略战争，由于新的战略兵器的大量

出现，以及现代化的情报、指挥、控制系统的运用，使战场在向空中、外空和水下作立体延伸等等。因此，在新条件下实行的攻势防御，打击的目标、手段也须有新的内容。

2. 加强战略侦察，迅速定下战略防御决心

在现代条件下，敌人虽然强调战略伪装和欺骗，但要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总有端倪可察，越是临近，征候越明显。要调动几百万大军和倾国的人力物力进行侵略战争，不露出蛛丝马迹是不可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兰曾有一周预警期，法国有9个月预警期，苏联至少也有50天预警期。在情报、战略侦察极为先进的现代，正确判定战争形势并非办不到。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及和叙利亚十分重视战略伪装，但还是被美国的侦察卫星和以色列的战场侦察所发现。苏联入侵阿富汗时的军队集结和调动，也曾被美国的侦察卫星发现。即使是发动局部入侵，也会出现许多异常现象。只要加强战略侦察和正确分析判断战争形势，战争的征候是可以发现的。所以，我们在平时战争准备的基础上，要加强对敌情的掌握，努力获得关键性的情报，以求正确判明敌人进攻的时间、方向、方式和手段。尤其应密切监视敌战略袭击兵器的准备和使用情况，还应加强对外层空间的监视。

在判明敌人发起进攻的时间和主要进攻方向后，应迅速定下决心，并迅速采取和加强抵抗敌人进攻的措施。包括第一线部队的适时展开，纵深部队的调动和增援的方向，对主要目标的防护和重点城市有计划的人口疏散，防空和战略反击等各种力量的及时展开等等。临时调整战略部署，应力求隐蔽企图，加强指挥，严密组织，使调整部署的活动有秩序的顺利进行。

3. 重点设防，重点守备，建立大纵深、立体的防御体系

重点设防，重点守备，建立大纵深、立体的防御体系，是现代防御作战的重要原则，是贯彻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战争经验的总结。只有这样，才能集中兵力，加强主要方向和战略战役要地的防守，掌握强大的机动力量，应付复杂的局面，才能大量杀伤、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挫败敌人的进攻，确保防御的稳定。如果没有重点，到处设防，势必分散兵力，处处薄弱，被敌人各个击破。

正确选择主要方向和要点。主要战略方向和防御要点，是根据我们需要保卫的目标的战略战役价值，敌人的战略战术思想和作战行动特点，地形，交通对双方的影响等条件选定的。通常应选在便于保卫我重要目标的有利地形和敌人可能的主要战略进攻方向上。战略要地和沿海销钥地区，是敌人进攻的必争之地。坚守这些具有战略价值的地区，包括在大中城市打斯大林格勒式保卫战，可以割裂敌人阵势，大量消耗和牵制敌人的兵力，对于制止敌人长驱直入，稳定战局，具有重大意义。

设立有重点、大纵深、立体的防御体系。针对现代战争特点，我们应在重要战略方向战区内，从前沿到纵深，对防御阵地、人防工程、作战力量、指挥机构、各种保障系统等，统筹布局，形成有机整体，构成总体防御。兵力部署要贯彻有重点、多梯队、纵深配置的原则，既有足够的守备兵力，又有强大的机动力量。战区内具有战略战役价值的大中城市，是敌我必争的重要目标，应作为战区防御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总的防御体系，并逐步形成要塞。另外，还要在

敌人可能登陆的方向上，把海、陆、空、防组成一体，岛、岸、城防紧密结合，构成重点、纵深、立体的防御体系。

4. 在战略的内线防御中坚决实行战役战斗的外线进攻

所谓内线作战，是指军队处在防御或被包围态势下的作战。外线作战，是指军队处在进攻或对敌实施包围态势下的作战。战略上处于内线时，战役、战斗应力求以外线作战打击和歼灭敌人。

在战略防御中，为转换敌优我劣的形势，处于战略内线地位的军队要敢于进行外线作战，从总体上的敌人包围、半包围中，造成战役战斗上对敌人的包围态势，从战役战斗外线作战来打击敌人的内线。这样，既可以限制敌在战略外线上的扩张、消耗、消灭敌人的力量，造成敌人进攻力量的分散和不足，又可使我积小胜为大胜，逐步由战略上的被动过渡到战略上的主动。这是指导战略防御作战的基本方法。

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以外线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争取战略防御全局上的主动，既十分重要，又是有条件的。经过战争初期的作战，必然会出现敌我犬牙交错的态势。敌人的侵略范围越大，其兵力就越分散，困难也就越多，也就越有利于我扩大外线，举行战役战斗上的进攻。当然，对于内线外线，未来反侵略战争同以往战争亦有很大区别。由于战争的立体性，不会有整齐的战线。当敌人的战略外线不能再扩大和加强时，他的空中海上力量仍可对我纵深和后方实施攻击，形成敌我双方外线、内线同时交错存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反复拉锯，互有攻守的情况更加频繁。我们既要进行必要的战役范围的内线防御战，更要大胆的、积极的坚决开展外线作战。以内线、外线夹击敌人，促进战争形势的转变。

陆上作战，是我优势相对较多和易于发挥的战场。因此，陆上战场除继续坚守一些城市和地方，实行阵地防御外，主要力量应用于战役战斗的外线进攻，大量杀伤、消耗敌人，力争早于海空战场实现敌我强弱、主动被动形势的转变。海战场是相对独立的战场，也是战略防御全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战略相持阶段，敌人很可能对我沿海重要港口、海湾、基地、海上通道实施封锁围困，以配合陆上进攻之敌。如不打破这种封锁，我海军既无行动自由。而要打破封锁，就必须靠海战场的外线作战。在整个战略防御过程中，始终应加强反空袭作战，同时应加强空中的外线作战。必要时举行空中进攻战役，广泛开展空中游击活动。为了打击和削弱敌人进攻作战能力，还应积极袭击敌人的后方，对敌人多种基地、重要目标进行突击。

5. 适时组织战略反攻

战略反攻，是同进攻之敌进行决战的行动，是战略防御阶段最精彩最活跃的阶段，也是战略防御阶段彻底粉碎敌人战略进攻的关键行动。这种反攻充分体现了积极防御战略的实质，无论从形式和内容上都是主动的。

反攻的基本任务是，消灭进攻之敌，收复失地，并为战略进攻创造条件。

未来反侵略战争，战略反攻仍将是战略防御的重要阶段，是在有利时机，彻底粉碎侵略者继续进攻的有效方式。从以往战争看，由战略防御导致战略反攻，一种情况是在敌人进攻以后不久，防御者即在全线发起战略反攻。一种情况是由局部反攻的积累发展成为全局的反攻，表现为一种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两种情况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都可能存在。

但二者相较，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要大些。

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是一种战略性转变。这种转变的时机，首先是敌我力量对比的优劣形势发生明显变化时。当敌人来势凶猛的进攻，在我军民合力打击下，虽仍处于进攻地位，但损失严重，士气明显消沉，力量对比必然明显下降。这里，士气、民心以及国际条件是关键因素。历史上也曾有许多力量处于劣势而反攻胜利的战争，是良好的人民条件和高昂的士气起了重要作用。

其次是态势有利。所谓态势有利，主要是指进攻之敌已被分割，兵力分散；或孤立突出，出现空隙；或已失去有利的阵地以组织完全可靠的防御。在防御者来说，局势已基本稳定，并已造成许多战役战斗上的外线，主力已经集中或很快集中，战场环境有利。

再就是军事技术条件、国际条件、季节气候等条件。由于敌人武器的高度现代化，我军的军事技术水平将成为一个关键性的条件，打败敌人的进攻、收复失地、主要靠自己的力量，同时也需要一定的国际援助和同情。因此，要善于把国内外条件结合起来，促成反攻的胜利；季节和气候对军队行动影响很大，军队行动无时无地不受着天文地理条件的限制和影响，选择对己有利而对敌不利的气候举行反攻，是很重要的。

在反攻的具体实施中，要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正确选择反攻方向，并建立能实施立体和纵深攻击的反攻部署，切实做好战略反攻准备。一般地说，战略反攻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战略反攻阶段的完成并非战争结束，而是要不失时机的继续扩大结果，不断建成新的有利战略态势，根据

条件因势利导，积极发展胜利，把战略反攻推向进攻。

第三节 战略进攻

一、战略进攻的地位、作用和转入的条件

战略进攻是战争行动的基本类型之一，是消灭敌人，夺取或收复失地，最后战胜敌人的重要手段。战略进攻对实现战争目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实施战略进攻的军队在选择作战方向和发起作战的时间上掌握着主动，它能按照自己的企图事先部署兵力，进行准备，通过一系列的战役战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双方。

就总的来讲，战略进攻可能在战争开始实施。这种情况一般是推行进攻战略的国家和军队采取的，特别是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另一种情况是在战争实施过程中进行的，这种情况多是被侵略的国家或进行国内革命战争的军队，经过战略防御作战，削弱了敌人，发展了自己，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积极防御战略，不首先挑起战争，不侵犯别国主权。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我军的战略反攻将发生在战略防御之后，即从战略防御导至战略进攻。这种进攻与战争开始时就进行的战略进攻性质不同。在具体行动上具有共同之点，也有许多不同之点。我们所要研究的就是这样一种战略进攻。

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是一种决定性的转变。实行这个转变的条件是，要有较强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有利的政治形势和自然条件，正确的作战指导。没有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作基础，不可贸然转入战略进攻。没有正确指导，

不能积极创造条件，即使出现有利条件也不能加以利用，战略进攻是不会成功的。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战争中的主动和被动地位，都与双方的力量密切相关。战略防御和军事力量的优劣分不开，战略进攻也一样和力量的优劣分不开。由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转变，首先要发展军事力量。军事力量是战争力量的集中表现。为此，在转入战略进攻以后，必须在自己力量已有很大消耗的情况下，大力组织、发展自己新的力量，求得在军力上处于优势。优势越大，再加上指导上的正确，战略进攻胜利的把握就越大。反之，就不会有好的结果，或至少要走一些曲折的路。解放战争，我军经过一年的内线作战，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基本上挫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使全国的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同敌人相比，我军在第一年作战中不断发展壮大，总兵力由127万增加到195万多人。在机动兵力的对比上，我军已优势于敌；由于我军坚决贯彻了“以战养战”的方针，我军的装备得到改善，特别是炮兵得到了加强。各野战军先后建立了直属的炮兵纵队或特种兵纵队，或炮兵旅、炮兵团。各纵队和师、团也普遍建立了队属炮兵；我军广大指战员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普遍学会了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去解决战役、战斗和战术上的许多实际问题。加上技术装备的改善和加强，因而军队素质特别是攻坚作战的能力有了很大提高。士气旺盛，对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充满了信心；解放区的大部分地区经过土地改革，广大农民分得了土地，提高了发展生产、支援战争的积极性。一年中，为保家保田而踊跃参军的农民达60万人，支援前线的农民共达6000万人以上；我党所领导的民族统一战

线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壮大，蒋管区的人民群众越来越多地把翻身解放的希望寄托于我党我军身上。根据以上情况，我中央军委决定，各战场于1947年7月至9月逐步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我军经过半年作战至1947年12月，共消灭国民党正规军12个整编师（军）部、54个旅（内28个整旅）、非正规军100个团，共75万余人。外线的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完成了在中原的战略展开，开辟了广大的中原解放区。内线的陕北、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及东北等战场我军，在反攻与进攻作战中，收复了大片失地，扩大了解放区，迫使敌人进一步收缩，取得重大胜利。

应该承认，战争情况不同，转入或发起战略进攻所需要达到的优势程度不同。敌人各方面有利条件多，己方转入进攻的军力优势就应大一些。敌人战斗力较弱，或我有利条件多，军事条件略占优势或大体平衡也可以。有时，防御者的优势明显不如敌人，但如政治条件、战略形势有利，战略指挥高明，军队战斗力强，也是可以转入战略进攻的。也就是说，转入战略进攻不仅要衡量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而且要看人心的相背，善于利用有利的政治形势。所谓有利的政治形势，一般来说在国内最大限度地动员起人民群众，使之积极参加和支持战争；在外部敌国广大人民觉醒，起来反对侵略战争。胜利的军事斗争可以促成有利政治形势的出现。有利的政治形势又将有助于军事斗争的成功。

战略防御向战略进攻的转变要适时。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必须把握好时机，最充分利用战略反攻创造的形势，力求不出现大的停顿，迅速、隐蔽地调整部署，以不给敌人喘息的时间。当然，也不能操之过急，当战略反攻创造

的条件不利，战略反攻之后也不宜接着转入战略进攻，而需要充分的准备和继续进行战略防御，以求巩固战略反攻的成果，促进战略进攻条件的成熟。把握时机实行战略转变，是推进战略发展，夺取最后胜利的关键。既要积极又要稳妥，既不可轻视敌人，又不可过高估计敌人。既要看到物质条件，也要看到精神条件，既要争取大的成果，又要力求减少代价。权衡利害，选择最有利的时机转入战略进攻。

二、战略进攻的主要原则

1. 战略进攻是积极防御战略的组成部分

积极防御战略是指导防御性战争全过程的战略，它不仅指导战略防御，也同样指导战略进攻。不论任何战争，从进攻和防御两种基本类型来说，可分为防御性战争和进攻性战争。实行进攻性战争用进攻战略作指导，而实行防御战争则用防御战略作指导。防御战略又分为积极防御战略和消极防御战略。消极防御战略没有把战略防御导向战略反攻和进攻的准备和打算，而积极防御战略则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战略。很明显，一般来说，战略反攻和进攻是积极防御战略的必然结果，是积极防御战略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积极防御战略是我们的一个总战略，不是哪一个阶段的战略。认为积极防御战略只是指导战略防御阶段的看法，事实上是把“防御性战争”同“防御性军事行动”混为一谈了，把指导“防御性战争”同指导“防御性军事行动”混为一谈了。防御性战争既包含“防御性军事行动”，也包含“进攻性的军事行动”。所以，在防御性战争中，不管有多少战略阶段，都是这一防御性战争全过程中的组成部分。作为指导防御性战争全局的积极防御战略，理所当然也是指导各个战略阶段在内的战争

全过程的。如果只用它来指导战略防御阶段而不指导战略进攻阶段的行动，就不可能达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夺取战争最后胜利之目的。这样，同攻势防御、决战防御的精神是违背的。

我国革命战争实践证明，指导历次战争取得胜利的战略都无例外的是积极防御战略，在一次战争中从开始到结束都是在积极防御战略的指导下进行的，而不仅仅是战略防御阶段采用积极防御战略作指导，到了战略进攻阶段又有一个什么新的战略作指导。当然，积极防御战略在不同的战略阶段中，所实行的具体战略方针或指导原则是不尽相同的。

2. 正确选定主要进攻方向和打击目标

战略进攻方向的选择，是一项卓越的指挥艺术，它直接影响战略进攻的进程和发展。若选择得当，就可以出敌不意，打乱敌人战略计划，推动战争形势的发展，加速胜利的到来。选择战略进攻的主要方向，要从全局出发，善于趋利避害。一般是能给敌人以决定性打击，与敌要害密切相关联的，对其全局有震撼和瓦解作用；便于我军集中兵力形成必要优势，又能出敌不意；既有把握取得当前作战的成功，又有利于尔后的发展，促进全局的胜利。政治、经济因素也常成为选择主要方向的决定因素。战略进攻方向可以选一个或数个，但在同一时间内，主要战略进攻方向只能有一个。

战略进攻方向的选择，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同样的战略目标，在不同的战争中地位作用也不尽相同。比如国家的首都，敌军的主要集团，敌人主要经济区，在历史上都曾作为选择战略进攻的主要着眼点。一般是战争开始时举行的战略进攻，多指向对方的首都。而经过战略防御再转入战略进

攻，常常是首先选择敌人的主要战略集团，尔后再指向对方的政治、经济中心。我国解放战争就是这样，先消灭国民党军主力，尔后指向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中心——南京。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卫国战争，基本上也是如此。

3. 适时进行有利的战略决战

战略决战，是决定战争双方命运的严重斗争，是关系到战争前途和国家命运的大事，“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10页），必须慎重对待。战略决战，有时战略进攻一开始就进行，有时则需要经过一定的历程才展开决战。战略决战的时机，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在一般情况下，力量对比我占据了一定优势，战略态势与我有利，敌人面对重大战略决策问题举棋不定，国际形势或敌内部发生了对其严重不利的形势变化等等。

战略决战是由一系列战役组成的。大规模战争更非一次决战就能取胜。因此，要解决好下列问题。

周密制定战略决战计划，进行充分准备。在战略决战前，要周密地分析敌我形势，计算敌我兵力对比，判明敌人的战略企图和可能的行动；确定各战略性战役的作战方针，组织指挥，力量、任务、协同和保障等；照顾好各个战役和战役各阶段之间的关系；做好作战和保障、前线和后方各方面的准备等等。

及时把握战略决战的时机，正确选定第一个歼击目标。我军解放战争第三年，敌我力量对比，已由战争初期的3.4:1下降到1.3:1。敌在战略上陷入被动，主要集团均被我

分割，进退失措、举棋不定。我军经过两年作战，积累了丰富的战争经验，具备了攻克敌人大中城市和歼灭敌重点集团的作战能力。所以，具备了在长江以北歼灭敌人主力集团的条件。关于第一个歼击目标，只所以选在东北，是因为东北战场我军总兵力超过敌军，敌军孤立突击，长、沈、锦三处完全被我分割，我军物质力量雄厚，可以得到华北华东我军的有力配合。且此役取胜，对而后的决战行动将产生更为有利的影响。实践证明，战略决战的第一个打击目标选择在东北是非常正确的。

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战略决战，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一个敌人，而不能同时打两个敌人。也不可将很多兵力用于钳制方面。这既是我军作战的主要方法，又是战略决战的原则。解放战争时期的辽沈战役，在长春、沈阳、锦州三处敌军已被我割裂的有利态势下，首先集中2.5倍于敌的兵力攻克锦州，封闭了敌人南撤的通道，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尔后逐一解决长春敌人和沈阳出援之敌，最后攻占沈阳，解放全东北。三大战役都成功地贯彻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因而顺利地达成了决战的目的。

4. 抓住有利战机，发起战略追击

战略追击是对战略退却之敌的追击，是战略进攻的继续。目的是彻底消灭敌人，夺取战争的胜利，“追击能使战败的军队全军覆没”（《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集》第三卷，第198页）为发展战略进攻的胜利，应及时发起战略追击，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敌军有生力量。

举行战略追击的方式，一般采用大包围、大迂回，以求

全歼敌人，为战争的圆满结束创造条件，免留后患。追击的方法要灵活，要把跟踪追击与平行追击，主力追击与民兵、游击队袭击密切结合起来。要实施宽大范围的战略机动，采取远距离迂回的方法，插至敌后，切断敌人的逃路，务求抓住敌人主力而歼灭之。

战略追击的时机，一般说来，应在战略决战歼敌主力之后，敌人战略防御已基本瓦解，我军具有足够的能力，国际形势有利，敌国人民渴望和平等。过早实施战略追击，会遭敌顽抗，增大伤亡。过迟则贻误战机，使敌人跑掉。

现代战争中战略追击必须是立体的。现代条件下，要想追上敌人，抓住并歼灭它，需要强大的陆海空立体追击能力，仅有地面快速机动部队是不行的。同时，在追击时，要根据敌人的撤退方向和企图，以及在退却过程中可能的抵抗地区和抵抗方式，周密计划，严密组织。追击中仍会遇到敌人的抵抗甚至是疯狂的反击，战略指导要善于分析形势，不为局部情况所迷惑，不因胜利即将到来而麻痹大意。要坚决克服各种困难，不怕流血牺牲，发挥连续作战的作风，昼夜不停地实施勇猛顽强地追击，使敌人来不及调整和变更部署、重新利用有利时机和地形进行反扑。

如何顺利地实现战争目的，争取最好的战争结局，这是战争指导者在战争开始就需要认真考虑并在战争过程中努力追求的愿望。在战争的最后阶段，就此问题更需深思熟虑，正确判断。随时注意分析和识破敌人的企图，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并采取军事手段和政治手段相结合的方法，有打有谈，打谈结合，以争取有利的战争结局，在有利的条件下结束战争。

第十章 战略指挥

战争是一种复杂的社会运动形态，是敌对双方战争潜力的综合较量，也是指挥艺术的竞赛。指挥的正确或错误，对战争的成败关系极大。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外部援助等等条件，只是为战争的胜负提供了可能性，但要使可能性变为现实，还必须加上主观努力和指导活动，高超的指挥艺术，可以变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指导战争走向胜利，笨拙与错误的指挥，必然将战争引向失败。毛泽东同志指出：“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

战略指挥是指挥活动的最高层次，其基本任务是统筹战争全局，制定战争行动的方针、原则，运用国家和军队的力量以及有效的战争形式，战胜敌人或使敌人屈服，实现战争的政治和军事目的。正确的战略指挥，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使自己的思想、决策、措施符合变化着的客观情况。要照顾好战争的各个方面，抓住对战争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关节，推动战争全局的发展。要做到坚定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既有实现战略目的的坚强意志，又有高度的创造精神，善于审时度势，灵活地使用兵力，恰当地运用和变换作战形式与作战方法。要坚持高度的集中统一指挥，既能使各种力量，各种斗

争，各种作战形式协调一致地行动，又善于发扬军事民主，集中各方面的智慧，鼓励下级指挥员积极机断行事，正确解决战略上的集权和战役战斗的分权问题。要力争主动，力避被动，特别是在战略上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时，善于造成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进而夺取全局的优势和主动。

第一节 战略指挥员的素质和品格

古今中外的战争史证明，战略指挥者的素质和品格的优劣，对于战争的胜负关系极大。那么，作为一个战略指挥者，需要具备哪些基本素质和品格呢？

一、文武兼优

翻阅中外战争史，便会发现，哪些功勋显赫，有所作为的战略指挥者，他们大多数是既能文，又能武的通才。

对战略指挥者来说，文武兼优，是首先要具备的良好素质。古人云：“文武兼用，长久之术也”，今人也强调指挥员要“智勇双全”。从我国古今历史上可以看到，战略指挥者具有文武兼优的素质和品格，对夺取战争的胜利和治国安邦，有着重大的作用。我国古代汉高祖刘邦，之所以能够战胜武艺高强，兵多将广的楚霸王项羽而得天下，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因为有能文善武的张良和韩信辅助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三国时的刘备，起初手下虽有几员猛将，但由于缺乏足智多谋的人才，竟无立足之地。后来，他到隆中，“三顾茅庐”，请来了博学多才，多谋善断的诸葛亮当军师，才造成了鼎足三分的局面，我军之所以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以劣势装备打败了国内外一切强大的敌人，夺取了革命战争的伟大胜利，正是由于有文武兼优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正确领导和英明指挥。他们不仅精通政治、深明韬略，熟悉地理，懂得经济，有的还擅长外交和科学研究，有的文学造诣极深，有的理论修养很高。正因为如此，他们指挥战争得心应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由此，要求战略指挥者下功夫学习军事理论，钻研军事历史，博览和采集古今中外兵家学说之长，这是驾驭战争的必由之路。非凡的战略创见，卓越的指挥才能，并非天生的，它是来源于战争实践和平时的军事理论的“能源”之中。

战略指挥者还需要有一定的文化基础知识，即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等知识。美国《大战略》一书的作者柯林斯，在书中写道：“科学家是沿着相当狭窄的途径探索知识领域的”而“战略理论家则不然，他们需要有尽可能广泛的基础知识”。法国著名统帅拿破仑也曾说过：一个统帅，“需要具有博学多才的本领，应利用一切经验和知识”。的确，作为一个战略指挥者，有了广泛而渊博的基础知识，再加上高深的军事理论修养和实际的指挥才能，就能对战略问题有透彻的理解和精辟的分析，制定战略计划，总结战争经验，也才能以精炼的文字，准确的语言，鲜明的观点，生动的事例，加以表述。可见，战略指挥者的智力是多么重要，可以说，提高了智力，战略决策能力和速度，都会增强与加快。

未来战争，战略指挥更为复杂艰巨，战略指挥者应不断认识新的情况，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以微电子技术、核技

术、航天技术、激光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和新能源等技术群体，正推动着经济、国防等工业的前进，并有一部分新技术运用到局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作为战略指挥者更应掌握这方面的科学知识，使自己能更好地去指挥现代战争。

二、勇于创新

勇于创新，是战略指挥者必须具有的素质和品格，也是战略指挥者的基本特征之一。勇于创新的战略指挥者，他所导演的战争活剧，永远会威武雄壮，生机勃勃。反之，墨守成规，因循守旧的战略指挥者。“不管什么新变化，我有我的老战法”，以这种思维去对待战争，必败无疑。

现代战争，交战双方使用了大量的新型武器装备，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并广泛应用于军事，将使战争样式，作战方法大为改观，在这种情况下，战略指挥者如果拘泥于陈旧的方法，那么，必将遭到未来战争的无情惩罚。

唯有创新，才能胜敌。恩格斯曾指出：“现在未必能找出另一个象军事这样革命的领域”，“当技术革命的浪潮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让这些保守的偏见在军队中占统治地位，是没有好处的。我们需要更新、更勇敢的头脑。”战争史证明，每个在战争中因采用了新的办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的将领，不是新的战争手段的发明者，便是以正确的方法运用他以前所发明的新手段的第一人。作为战略指挥者，一方面自己对新事物、新武器、新战法，要有强烈的敏感性，潜心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另一方面要支持创新者，不断探索新技术、新战法，以适应未来战争的新要求。

三、深谋远虑

自古以来，不考虑长远战略利益的，就不能策划好当前的战略问题，不考虑战争全局利益的，就不能策划好战争的局部问题。因此，战略指挥者还应有深谋远虑的战略头脑。

深谋远虑，就是要求战略指挥者有通观全局，深思熟虑的能力。譬如，在制定战略计划时，应考虑到战争全过程可能的发展变化，多设想几个方案，特别是不利和失败的可能，预先拟定应变的措施。在未来战争样式和战法多样化的情况下，应考虑战略转变的条件和时机，攻与防的转换与方法，前方后方的全面兼顾问题，战争中各种斗争形式的结合问题，等等。对这些战略问题，既要有周密的计划，又要有长远的打算，这样，才能在战略指导问题上应付自如。

深谋远虑的关键在于尊重客观实际，勤于调查研究，善于科学分析。因此，无论平时与战时，作为战略指挥者都要紧紧掌握和了解与战争有关的情况和资料，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从大量的情况和资料中，透过伪装十分巧妙，令人难以捉摸的一些假象，深刻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作出准确的战略判断，以指导战争的顺利进行。

深谋远虑，应随着情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进行。战争，是一种经常处于发展变化的客观过程，因此，战略指挥者观察战争现象，不仅要从它同其他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方面去观察，去分析，而且要从它的运动，它的发展变化以及它本身包含的各种因素的产生和衰亡方面去认真、仔细观察，从发展变化的趋势中，发现或预见敌人之隙，把握战争的进程。这样，才能在战略指导上，立于主动的地位。

四、坚定果断

在快速多变、激烈争夺的现代战争中，战略指挥者必须沉着冷静，坚定果断，这是克敌制胜的法宝之一，也是战略指挥者老练的主要特征。

在战争史上，由于战略指挥者坚定果断的素质和品格优劣的不同，而给战争带来结局不同的战例是屡见不鲜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波兰、法国之所以迅速战亡，原因种种，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战略指挥者被德国的“闪电战”所吓倒。如波兰的战略指挥者，从德军入侵的最初几天，即在精神上、组织上开始解体了，该国总统于9月1日就离开了首都。波军总司令在战争的第二天，就认为战争已经失败了。而法国的战略指挥者在战争危急的形势下，“各自开始分道扬镳”。上述两例足以证明，战略指挥者的惊慌失措的举动，给国家带来了多么沉重的灾难。与此相反，在苏德战争中，当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情况非常危急之中，苏军最高统帅斯大林，还镇静自若地举行了莫斯科红场阅兵，始终坚持留在莫斯科进行指挥，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英勇坚定的高贵品格。毛泽东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在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严重白色恐怖下，举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革命举动，坚持井冈山的艰苦斗争，走过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峥嵘里程等等，都是这种伟大战略家气魄的重要表现。

在现代战争中，由于战争手段高度发展，作战方法不断革新，战争具有突发、激烈、残酷多变的特点。在战争形势处于复杂、严重、残酷的环境下，能镇静自若，沉着应变；

尤其是在敌人突然袭击时，更应有冷静的头脑、坚强的意志，决不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和暂时困难所动摇，要以坚毅的决心，有力的决策，精心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瞅准战机，狠狠打击。果断，就是在上述困难、危急情况下，能审时度势，迅速决断，坚决行动。如果事到临头，前怕狼，后怕虎，当断不断，该办不办，必然丧失战机，被动挨打。对此，在我国古代兵书上早就有过总结：“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害，生于狐疑”，在瞬息万变，分秒必争，要求高效率高质量决策指挥的导弹核武器时代，慢慢腾腾，是要贻误战机的。因此，战略指挥者必须注意坚定果断的素质和品格的陶冶。

五、善用将才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古人亦云：“为政之本在于任贤”。战略指挥者，除了要对战争的重大战略问题，作出科学决策外，还要重视选拔使用人才，特别是有才干的将才，这样，才能从组织上保证战略决策的圆满实现。战史证明，善用人才，尤其是善用将才，可以推动和加速战争进程，夺取战争的胜利。反之选用人才、将才不当，必将使战争受挫，甚至导致战争失败。

（1）要敢于选用较年轻的将才。在通常情况下，年轻有为的将才，有朝气、有活力，易于接受新事物，吸取新经验，敢闯敢为。而年老体弱的将领，尽管他有丰富的战争经验，有高超的指挥艺术，能够深思熟虑，慎重处理战事，但毕竟因为年高体弱，对繁重的战争事业，缺乏连续作战的耐久力，因而，力不从心，以苏德战争为例，战争初期，苏军

中几个在武装起义，国内战争中，建立了赫赫战功的老师，由于年大体弱，加之，对德军“闪击战”缺乏敏感性，因而，在战争初期指挥军队作战，局面总是打不开。面对这一情况，斯大林迅速启用了将领中一批年轻的“后起之秀”代替了他们，才逐步扭转了战争局面。在我国历次革命战争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善于从战争实践中，选拔作战勇敢，指挥有方的年轻将领，委以重任，对于夺取历次革命战争的胜利，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2）根据战争的要求量才使用。我国古代兵书《经武要略》上指出：“兵家人用，贵随其长短用之”。汉高祖刘邦在总结自己之所以能战胜项羽的原因时也说过：“论带兵打仗，我不如韩信；论管理钱粮，我不如肖何；论运筹划策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但是，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战略指挥者，在战争事业上，要知人善任，要具备超群的用人才干。伟大的战争事业，有攻防类型之分；在武装力量组成中，有陆、海、空军和战略导弹部队之分；在领率机关中，有司、政、后部门之分；在各类战役中，有各种战役之分。因此，战略指挥者在选用将才时，除了注重每个将领的军政素质基本条件外，还应注重每个将领在组织指挥方面的才干和特点，以用其之长，避其之短。

（3）要选用头脑冷静，作风果断的将才。这是因为，将才若是勇气过人，而智能不足，则易于急躁冲动，鲁莽从事；若是才智虽优，而勇气不够，那么，他就不敢毅然果断地定下决心，行动迟缓。因此，善于选用“智勇双全”的将才，则是战略指挥者用人得当的标志。

战略指挥者应具有的素质和品格，当然不止这五条，如坚定正确的无产阶级立场，虚心好学，有自信心，善于钻研，富有想象，尊重客观，善于表达等等。但这五条是起码的，也是主要的，这些优良的素质和品格，不是天生的，而是在长期的实践和学习中，逐步陶冶成功的。因此，每一个立志献身伟大国防事业的战略指挥者，应有决心，有毅力，把自己锻炼成为智勇双全，才干超群，能驾驭未来战争的战略指挥家。

第二节 战略指挥的基本要求

一、正确判断战争形势

正确判断战争形势，是正确实施战略指挥的前提。毛泽东同志指出：“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只有对战争的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然后才会提出相应的战略对策。要正确判断战争形势，必须把握以下几点：

1. 熟悉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

刘伯承元帅在每战之前，都非常强调要弄清任务，弄清敌情，弄清我情，弄清地形，弄清时间。他把上述这五个“弄清”称之为“五行术”，作为定下战略决策的依据。大凡能把战争的大船驶向胜利彼岸的人，都是既熟悉彼军，又熟悉己军，也熟悉一切与战争相关的知识、经济、地理、气象等条件的指挥员。而那些明于知己，暗于知彼，或明于知彼，暗于知己的指挥员，是没有不吃败仗的。这就要求进行系统的周密侦察和调查，对敌我双方及其他方面的基本情

况有彻底、切实的了解。如我国古代“围魏救赵”之战，孙臆之巧妙地运用攻其所必救，正是他对魏、赵情况有真正的了解，洞悉虚实。我国革命战争中历次重大作战的胜利，都与熟知敌情我情和作战环境有密切关系。抗日战争时，我们曾用公开揭露的办法使国民党顽固派集结四、五十万大军准备进犯陕甘宁边区的阴谋败露，不需要战斗就打破了蒋介石、胡宗南的进攻企图。正是因为对彼方情况了如指掌。近些年来发生的以色列摧毁贝卡谷地叙利亚防空导弹基地，美军空袭利比亚，其所以成功，也都是因为对彼方情况有十分准确的了解。我们承认战争现象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要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是不容易的。但是，只要熟悉了自己方面的情况，又熟悉敌人方面的情况，了解同战争有关的军事、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地理、气象等等条件，战争指挥才算有了基础，才能对战争形势作出合乎客观实际的判断，才有胜利的把握。

2. 要贯彻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

正确判断战争形势，应贯彻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对待形势要看有利条件，也要看不利条件，环境险恶时要看到光明，发展顺利时要看到困难。把革命胆略与科学精神，把必胜信心与慎重行事结合起来。如果不能从总体上藐视敌人，在具体问题上重视敌人，或是过高估量敌人，看重困难，或是虽有严重的情况而看不出，看不到，盲目轻视敌人，必然不会得到正确的结论。1946年蒋介石大举向解放区进攻时，许多人只看到国民党力量的优势，只看到它有美国的支持，以及我们的困难方面，因而忧虑战争是

不是能够打赢？然而党中央和毛泽东正确地估计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不仅看当时的力量对比，看暂时和表面的现象，而且看事物的本质，看力量对比的发展，看斗争的全局，既看到困难方面，也看到顺利方面，因而引出了正确的结论，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坚定和明确地指出，我们不但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他，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在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的时候，对形势判断也有类似的情况。有些人过高估计敌人，不相信反侵略方面的力量，对斗争缺乏应有的信心和勇气；相反，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坚决排除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全面、客观地分析了有利和不利的条件，在正确判断战争形势的基础上，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历史证明，革命的正义的战争，总会战胜反革命的非正义的战争，正义战争的战争指导者在判断形势和定下决心时，首先要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思想；同时，历史经验也表明，在战争的一定过程里，革命的、反侵略的一方，力量常常较弱，困难较多，战争指导者又必须认真对待，不可忽视。敢于斗争绝不是鲁莽从事。困难时不悲观失望，胜利时不骄傲自满，和平时期不轻敌麻痹，战争到来时也不惊慌失措，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才能对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

3. 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对客观情况进行全面的和本质的分析

叶剑英元帅说：“要把唯物辩证法正确运用在军事领域中，作为判断情况，定下决心，指导战争的法宝”。由于战场作战是你死我活的激烈搏斗，敌对双方都想获得成功、胜利，在所获得的众多情报中，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矛盾交

织，扑朔迷离的现象大量存在。为了揭开漂浮在战场作战中的迷雾，理顺错综复杂的关系，并不为敌人佯动、伪装、舆论、反间等所欺骗，必须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构成正确的判断。在战争活动中，由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原因，要把一切情况都看得清清楚楚是很困难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完全相符合的事也是极少的，但是，从复杂纷繁的现象中找出那些反映敌我相互对立的基本方面，抓住战争全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基本因素，达到对战争情况的基本认识，是可以做到也是必须做到的。1942年10月，当斯大林格勒之战正在激烈进行，德军仍有很大力量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希特勒是处在最后失败的门口了”，断言“以后的希特勒，将只有死路一条好走”。历史的进程完全证实了毛泽东同志这个判断的正确，其所以如此，正是透过现象抓住了本质，认识了苏德战争内在的联系。判断战争形势，要反对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不能把认识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之上，也不能机械的照搬以往的经验。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教条主义，抗日战争时期的亡国论和速胜论，其共同的特点都是不能客观地全面地观察和分析形势，或是过高的估计自己，过低地估计敌人，导致盲动主义的行动。苏德战争苏军开始的被动，原因之一也是形势判断出现失误，当时虽然获得了许多关于希特勒将要进攻苏联的重要情报，但认为德国与英、法的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德军不可能在东线开辟新战场，苏联有强大的战争潜力，又有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不敢轻易发动对苏战争，加之主观上希望推迟

战争，因而不能作出正确的决策，以致遭受了德军的突然袭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许多局部战争，也有不少因对战略形势判断错误而导致决策错误的事例，如美国侵略朝鲜，没有料到中国会派出志愿军抗美援朝，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判断埃及无力和不敢发动恢复失地的进攻，苏军侵略阿富汗，越南入侵柬埔寨低估阿柬人民的反侵略力量，等等，这些对形势和对彼方力量的错误判断，同其在战争中的失败或失利都是有直接关系的。

4. 判断战争形势应不断地进行

战争情况是发展变化的，人们对战争实际的正确认识，也须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循环往复的过程，因此，在战争的全过程中，应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和认识的不断提高，不断考察战争的情况，适时作出新的判断和修正原来的判断，使主观指导更加接近客观实际。我国历次革命战争的胜利，以及其他许多成功之战，不仅因为军事计划建立之前正确地分析了形势，而且更多的是得助于在战争实行过程中，不断地掌握情况和对战争形势及时作出正确的判断。比如，中央工农红军长征开始后，曾计划去湘西与第二、六军团会合。由于蒋介石急调主力，企图围歼我中央红军于北去湘西的路上，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正确地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应放弃原计划，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境内挺进。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又分析了在川黔边境创建根据地的利弊条件，鉴于当时面临着异常严重的军事形势，又决定北渡长江，在川西北创建苏区，可是，中央红军进入川南后，敌情发生了新的变化，敌以大量兵力封锁长江，我军渡江北上已不可能，于是，党中央果断决定停止向北发

展。中央红军到达川西后，党中央进一步分析了形势，考虑到革命的发展，提出我一、四方面军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这些重大行动的采取，就是基于对战争形势及时和不断地作出正确的判断，统观全局，知变善变，使我军不断摆脱危局，赢得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

正确认识战争形势，目的在于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因此，应抓住关系战争的发生和发展最直接最重要的一些问题，进行科学的推理判断。如总的战略形势，现实的潜在的主要作战对象，可能爆发战争的时间，能否避免或推迟战争，敌人发动侵略战争的企图，进攻的主要方向、可能投入的兵力、基本行动方法和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敌我力量对比，双方的民心士气，战时经济发展和支持战争的能力，各自的同盟者及可能得到的援助，战争的大致进程及可能的结局，等等，如能对这些问题作出符合规律的判断，就能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

二、作出战略决策

战略决策也就是战争最高指导者的决心，是战争活动中主观指导最重要的表现。其实质就是分析战争的矛盾和寻找解决矛盾的办法，利用敌人的弱点，发挥自己的优势，从而战胜敌人。战略决策正确与否，可以加速或延缓战争的进程，把前进的方向引入坦途或是困难之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欲有效地阻止敌人挑起战争，或在战争中以小的代价寻求大的胜利，首先就要有正确的符合实际的战略决策。

1. 要解决好对指导战争具有决定性的重大问题

战略决策是指导战争的纲领，应对战争的基本问题，如打或不打，在什么空间和时间打，打的目的，采取的方针原

则，使用的力量 and 基本的打法等等，精心筹划，作出明确的规定。战争的政治和军事目的，既是战略决策的依据，也是其头一项重要内容。战略指导者不能离开敌对双方各种互相对立的基本因素去指导战争，也不能离开战争目的去指导战争。只有针对敌人的战争目的，从敌我实际情况出发，正确规定己方的战争目的，才能正确运用斗争的力量和手段。战略决策还要规定基本的打击方向。列宁说过：“在决定时机和决定地点拥有压倒优势——这是取得军事胜利的‘规律’，同时也是取得政治胜利的规律”。基本方向是敌我斗争的焦点，是力量运用的重心，决定着战争和战局的发展。能不能遏止敌人对我发动侵略战争，在同时有两个或数个敌人威胁，或处于两线或多线作战的环境中，能不能有力地对付主要的敌人，在防御性的战争中能不能打破敌人的进攻，在进攻性的战争或战略进攻中，能不能较顺利地打败敌人，都密切联系着基本打击方向的确定，战略指挥必须十分注意解决好这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战略指挥的任务还要确定战争力量的运用和作战的基本方法，如基本的战争形式，政治斗争，经济斗争与军事斗争的结合、人民群众的动员和组织，如何在决定性时间和地点造成兵力的优势，如何对抗核袭击，如何争取和对待同盟军等等，这些也都应在筹划战略决策时认真考虑和作出规定的。

2. 从实际出发，制定基本的和阶段性的战略决策

战略上的决策，有指导整个战争的基本决策，还有指导某一战略阶段的决策，或就某一斗争方面或某一重大作战行动所作的决策。战争是流动的，战略决策的活动也是不断的，这些不同的决策，解决不同范围的问题，既有总体的，

又有阶段性和各个斗争领域的，再加上具体的组织和指挥活动，构成了对战争的全面系统的指导。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对我国革命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指导，都是这样实践的。如抗日战争胜利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我国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和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人民内战的情况，除确定以自卫战争打败敌人的进攻，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新中国的总决策以外，并针对日本刚刚宣布投降，蒋介石打全面内战的准备还没搞好，蒋日伪相勾结这样的战略形势，制定了这一历史阶段的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准备应付全面内战的战略决策，提出“目前阶段，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按具体情况发动进攻，逐一消灭之，猛力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大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资源，并放手武装基本群众”。“将来阶段，国民党可能向我大举进攻，我党应调动兵力，对付内战”。对某些重要方向和地区的军事斗争，还就其目的、方针和基本行动方法作了具体的规定。抗美援朝战争时，除适时作了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战争的基本决策外，还在不同的战略阶段，先后确定在运动中歼敌和在阵地战阶段实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阶段性的决策，并在转入相持阶段后，针对当时的斗争形势，作出了同意举行朝鲜停战谈判，“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决策。这些基本的和阶段性的战略决策，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既指明了总的斗争方向，又规定了不同条件下斗争的目标和方法，显示了战略指导的活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 正确的战略决策，是主观符合客观的产物

战略指挥只有充分了解敌我友各方面的情况及其相互联系，深刻认识战争特点，把宝贵的实践经验同新的情况很好地结合，才能使作出的决策符合实际。不同的战争，有不同的特点，各时期的战略决策，自应有不同的内容和着眼，但有一些基本的规律则是制定战略决策所必须遵循的。

(1) 多算胜少算。战略的领域宽广，问题复杂，必须对各种矛盾，各种因素深入分析，权衡利害，多方比较，才能作出恰当的决断。孙子说：“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多谋才能善断。斗争形势愈是复杂困难，判断和决策的难度愈大。愈是关系重大的问题，如是否要诉诸武力解决争端。由和平向战争和由战争向和平的转变，采取什么样的战争形式，在战争过程中战略阶段的转换，是否使用核武器，要不要实行结盟和同敌手进行政治谈判，如何防止战争扩大和升级，怎样结束战争，等等，谋虑愈要深远，决策愈要慎重。任何时候，作任何决策，都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一厢情愿。战略上的多算，还表现在对战争的发生和发展要有科学的预见。克劳塞维茨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迈出第一步以前先考虑好最后一步。”这就是说，不仅要算现在，还要算过去，更要算未来，对尚未发生和出现的情况作出符合规律的预测，战略指导才能走在前面，作出的决策才有更大的可行性和稳定性。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毛泽东同志分析敌我双方主客观条件的本质联系及其必然趋势，科学地揭示了战争的发展方向，指出了革命的正确道路和应采取的方针原则，在抗日战争开始后，他从分析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基本因素出发，科学

地预测到持久的抗日战争将要经历一个阶段，相应地提出了应该采取的战略战术，都说明了科学地预见战争进程，对正确作出战略决策，指导军事行动的胜利，是多么的重要和必要。

（2）关照全局。毛泽东同志指出：“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战争是多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的整体，敌我之间，军事活动和其他活动之间，这一部分和另一部分，这一作战空间和另一作战空间，这一作战阶段和另一作战阶段之间等等，都有着十分紧密的内在联系，战略决策之是否得当，首先取决于对全局关照得好或不好。因此，战略指挥者应全局在胸，高瞻远瞩，洞察敌我战略态势，全面考察战争形势，把各种因素、各条战线，各个战场联系起来，把当前的利益和尔后的利益，局部的利益和全局的利益联系起来，抓住本质，抓住关键，两利相衡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如果只看当前的事变，束缚于眼前的利害，掌握不住斗争的重心，是绝然作不出能推动全局发展的决策来的。

未来战争，给照顾战争全局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一方面要吸取战争史上照顾全局的经验，同时还要大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3）及时果断。战争是充满危险的领域，再加上战争情况具有的流动性和不确实性，这就要求战略指导者不仅多谋，而能善断，既智且勇，有魄力，有气势，敢于决断，敢于打破眼前的局面，创造新的形势。我国古代兵家吴子说过：“用兵之害，犹豫最大”，由于战争的特殊性质，使人们难以经常看清楚前进路上的一切。战略指挥者当然应对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情况认真地分析估量，使作出的决策有

较大的可靠性，但如缺乏勇气，疑虑重重，优柔寡断，就会坐失良机，优势反会变劣势，有利反会变成不利。战争实践证明，软弱乏力，迟疑观望，常常联系着失败，相反，胜利的取得则离不开指挥上的及时果断。现代战争，时间因素更为重要，敌人的袭击来得快，战场情况变化多端，这就要求战略指挥者根据当时的情况，迅速作出判断和决策，稍有迟延就会造成严重后果。战争行动是颇需要有点冒险精神的，要敢于在必要时冒风险。但这种冒险是建立在客观物质基础上的。恩格斯说过，“有谁打胜仗而不曾冒一点危险呢？”如果当断不断，左右徘徊，谨小慎微，只能被动挨打，一事无成。

（4）正确的战略决策，还必须符合客观情况。这是战略指导做到实事求是的一个重要标志，使目标同力量、手段相一致。确定战略目标，应以己方拥有的军事、政治、经济力量及其与敌人的对比为依据，决不能唯意志行事。毛泽东同志指出：“指导战争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任何指导全局的人，在制定战略决策时，如果违背这一规律，都是要吃苦头的。拿破仑是一个有很高军事才能的统帅，但在其军事生涯的后期，由于确定战略目标不顾客观条件，以致全军覆没。希特勒和东条英机等战争狂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确定其战略目标时，对本国人力、物力、资源等方面的弱点没有足够的估计，对苏、美、中等国的战争潜力也没有足够的估计，也是导致其彻底失败的重大原因之一。我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机会主义领导，企求革命在全国的迅速胜利，抗日战争初期出现的“速胜论”，也都是由于忽视了敌

强我弱这一基本事实，使其提出的战略目标成为不可实现的东西。历史经验表明，没有对敌我力量对比的正确估量，不可能恰当地规定战略目标，作出的决策也不可能正确。

未来战争比以往战争更为复杂，制约和影响战争发生发展的因素很多。在确定战略决策时，必须全面考虑军事、政治、经济、地理、国际条件等各方面的情况，要看到社会因素，又要注意科学技术因素，对敌我力量既要注意定性分析，又要注意定量分析，既要考虑常规能力，也要考虑核能力；既要看到陆战力量，又要估量海上、空中以至外空的斗争手段，不但要看到敌对国家和军队的情况，还要看到其他国家的态度和整个世界的战略形势，使确定的目标和自己拥有的力量手段相符，以达到战略目的。

三、制定战略计划

科学而周密的作战计划，是夺取作战胜利的重要条件。正确的战略决策，也必须有周密的计划来贯彻。因此，凡属战争全局性的重大问题，都要计划好、准备好。战略指挥上的任何疏漏和失误，都必将为之付出相当的代价。所以，战略指挥决不能走一步看一步，顾此失彼。战略指导者必须领先进行富有远见而周到的全面计划，才能更好地发挥战略指挥的主动性和灵活性，避免和减少战争中的盲目性，防止重大失误，为此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1. 制定战略计划要根据战争的目的、战略方针和实际的力量

战争目的决定着战争的规模，敌我友关系的组合及变化，主要战略方向，斗争形式及打击重点，武装力量的战略任务，战场的范围，战争动员的程度，乃至人民群众对战争

的态度。这是决定战略目标的依据，也是制定战略计划的出发点。指导战争全过程的战略方针，决定着基本的作战手段、战略步骤、武装力量的运用，以及为实现战争全局目的而采取的经济、外交的等一系列根本性措施。任何战略计划的实行，都必须以一定的力量作基础，从实际出发制定战略计划，并力求符合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在历次革命战争中，我军之所以能不断达到预期的战略目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的计划能体现战争的目的、战略方针，能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相反，那些貌似强大的敌人之所以不免于失败，固然主要地决定于其战争的反人民性，然而其战略计划的主观性和机械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德国侵略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就是一个不符合战争实际的典型例子。计划规定：从1941年6月22日对苏突然袭击开始，在“秋季落叶”之前占领莫斯科，入冬前达到战争最终目的。很显然，这一计划是“闪击”理论的产物，有极大的狂妄性和冒险性。它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对方的力量，根本不符合交战双方的实际情况。结果，与其主观愿望相反，不是闪击成功，而是彻底失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队也犯了同类性质的错误。它计划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我军。结果，战争进行了三年多，以我军的胜利和国民党军队的失败而告终。

2. 制定战略计划要有高度的科学性

在现代条件下，制定战略计划，还要强调科学的论证。对战争爆发的条件、时机、规模、方法、前景等一些基本问题，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进行分析，分析得越深入、论证愈充分，所制定的战略计划就愈可靠，实现的可能性就愈大。

战略计划有指导战争全过程的总计划和战争各个阶段的计划，乃至一个战区或一个战局的计划。计划的目的是要求不同，所要解决的重点问题和包括的内容及其详简程度也不尽相同。无论何种计划，都要解决好最紧要的问题，正确估计战争前景和可能的进程，明确有关作战方面的重要事项。如作战对象，战略目标，主要战略方向，具体作战原则，各军种和战略导弹部队的作战任务，战略集团的编成，战争初期作战行动的预案，战场准备的要求，重大战役的规模和发起时机，战略防空的部署，战略预备队的组成和使用，战略后方和军队后勤的保障任务，战争动员的规模、步骤，各有关方面的协同配合及应采取的保障措施等，这些都是作战的重大问题，战略指导者一定要十分注意。

3. 制定战略计划，要从最复杂最困难的情况着想，作多手准备

战争情况是复杂和变化多端的，要使主观指导与客观实际相一致，就必须把握战争规律，按照战争的客观规律，预见战争的发展变化。因此，在制定战略计划时，要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着想，设想多种情况、若干方案，既要考虑到战略防御阶段特别是战争初期各种可能情况及其方案，也要预见到其它阶段的可能情况，制定相应的方案；既要考虑到发展顺利的方案，也要考虑到发展不顺利的方案。否则，一旦情况出乎所料，遇到意外困难，就会陷入被动，招致挫折或失利。苏联在卫国战争初期所以被动挨打，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战略计划建立在一厢情愿的基础上，另有一种方案，没有考虑到此案不成或无法实行又怎么办，因而当出现与计划不符合的情况时。从最高统帅部、方面军指挥到前线

部队，便一时无所遵循，导致了大混乱和严重损失。

我军作战，历来有个好的传统，就是特别强调多从困难方面着想。毛泽东同志说过，无论什么问题，从困难着想就不怕，不妨把它想多一点、想尽。他还指出，不应把敌人在指挥上犯错误作为我之作战计划的基础，相反，我之计划宁可放在敌人少犯错误的假定上，这才是可靠的，而且还要想到，我乘敌隙，敌也可以乘我之隙。在历次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制定战略计划时，正是按照这样的要求做的。在解放战争中，我军不但有战胜国民党军队进攻的多种计划，而且有对付美国一旦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城市并和我们作战的计划。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一月，毛泽东同志还指示我军“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起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同志在《给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中指出，“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我们在战略计划上做了两手准备，准备美国大打，准备打成僵局，准备在朝鲜打，也准备美蒋联合从我国东南沿海登陆进攻。正因为有充分的计划和准备，我们在严重的斗争形势面前，仍然能够克敌制胜。未来战争更为复杂，对于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情况，更应有足够的估计，多作几手准备，这才能保持主动地位，争取战争的胜利。

4. 战略计划要适时地进行修订

毛泽东同志指出：“战术、战役和战略计划之各依其范围和情况而确定而改变，是战争指挥的重要关节。”由于战争的流动性，使战争计划只能有相对的稳定性。在实行过程

中，只要计划符合或基本符合实际情况，就应坚决执行，努力完成既定任务。如果计划不符合或某些部分不符合战争实际时，则应适时地加以修订，使之符合实际情况，当情况起了根本变化时，应根据新的情况，制定新的计划。实践证明，坚决执行正确的计划，及时修订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实际情况的计划，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抗美援朝战争，原计划入朝后，先平壤，元山之线以北地区防御一段时间，待军队改换武器装备后，再转入反攻。入朝后，根据敌人进展甚快，且未发现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情况，我即抓住敌人兵力分散、情况不明、轻敌麻痹、疯狂冒进的弱点，改变原计划，首先发起了进攻战役。五次战役后，又根据当时的情况，由进攻转为防御。这些正确实践，为我们树立了依据情况变化及时改变计划的典范。如果不愿改变，或不知改变，就会受到战争的惩罚。

四、实现战略计划

正确的战略决策和战略计划，为争取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但要把它变为战争胜利的现实，还必须发挥战略指挥者的主观能动性，经过大量的复杂的组织指挥活动。战略指挥者及其指挥机关，应以顽强的毅力，坚定而又灵活地解决好全局和局部，准备和实施，进攻和防御，前方和后方，陆地（海上）和空中，消耗和补充等一系列关键性问题，正确组织和运用力量，使战略计划顺利实现。

1. 调集兵力

无论实现什么样的战略计划，都要有相应的兵力作保障。作战力量的优势和劣势是主动和被动的客观基础。为了夺取优势和主动，必须贯彻集中优势兵力的原则，这是指导

战争行动的普遍规律。进攻时在决定的时机和方向投入强大兵力以歼灭敌人，防御时构成稳固而有活力的积极防御配系，有效地对抗敌人进攻，就必须聚集自己的兵力。特别是总体上兵力属于劣势时，更要善于调集力量造成局部优势，以争取主动。

任何战争形态，都离不开兵力的集中或分散。军队的集中和分散活动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因而调整部署、调动兵力，也就成了最经常、最重要的指挥活动之一。苏德战争中，以斯大林为首的苏军最高统帅部曾以相当大的精力组织作战力量的动员、补充、调动，在战争的头十天，运送兵员的列车就有五千多列，在顿个战争中光通过铁路输送部队就有近二十万列车之多。我国解放战争开始以前，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军委预见到蒋介石发动的内战势不可免，极为关切并具体组织了我军作战力量的调整集中，以形成有利的战略部署，先后从山东、晋察冀、晋冀鲁豫及陕甘宁、晋绥等区向东北调集了大量的兵力，关内各战略区的兵力也作了调整和集中。正因为如此，当蒋介石军队大举进攻时，我军能够进行有力迎击，较迅速地转变了战局。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以前，鉴于侵朝美军扩大侵略的形势，为了保卫我东北地区安全和在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反侵略战争，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久，中央军委就决定抽调4个军，2个炮兵师及其他勤务部队共25万余人，在东北的铁岭至丹东线完成集结，同时还准备以两个兵团作为后续梯队分别集结于津浦、陇海两线、因为预先调集了兵力，所以在朝鲜战场形势危急，党中央作出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定后，部队得以迅速进入朝鲜境内，阻止了美国侵略军的疯狂进攻。

2. 组建和保持强大的战略预备队，适时地用于决定性的方向和时机，推动战局发展

战略预备队是统帅部和战略区掌握的机动力量，是用以夺取和保证战争主动权的重要手段，是贯彻灵活性的重要条件。斯大林说：“不应该打没有预备队的仗，必须实行常备预备队制度”。控制并适时使用战略预备队，无论居于防御或是进攻地位都是极为重要的。战略指挥者应十分重视战略预备队的组建，经常控制强有力的战略预备队于自己手中，真正用到重要方向和决定性的作战中去。苏联卫国战争期间，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经常掌握着4—8个合成集团军，1—2个坦克集团军和1个空军集团军的强大战略预备队。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白俄罗斯战役等大规模战略性战役中，战略预备队对达成战役的预期目的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未来战争，战略预备队的地位和作用将进一步提高，只有经常保持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并加以正确使用，才能应付复杂的局面，大量歼灭敌人，逐步夺取战争主动权。为此，统帅部和战略区都应掌握强大的机动力量，疏散隐蔽地配置在主要方向的侧后便于机动的若干地域，随时准备实施机动，集中用于主要方向，重要时机，完成对战略战役全局有重要作用的任务。诸如：发展主要方向上的胜利，或恢复某一作战集团的战斗力，或进入新战区开辟新的战场等。战略预备队一经使用，必须抓紧重新组建。

3. 准备战场

防御或进攻作战，都需要有利的战场条件。战略指挥要善于正确选择战场，按照战略计划准备战场，适时向预定战

场集中兵力兵器和物资器材，进行大范围的地形改造和交通建设，修筑机场、港口和技术兵器的发射阵地，建设作战基地，以及动员组织当地的群众力量，使自己在有利的战场环境中同敌人作战。

现代战争的范围大大超出了传统的战场，从战略上准备战场，要特别重视新的作战领域。除陆上、海上和空中作战运用新的科学技术手段外，还要特别注意地下、水下及外空间敌人斗争。准备战场应从大的方面着眼，突出重点，战略指挥要把主要精力置于主要战场，务求在最关紧要的战场创造更多的条件。战略指挥不仅要按战略计划准备战场，而且更要依据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创造战场，在战争过程中开辟有利的作战方向和作战线，调动敌人就范，争取全局的主动，推动战局的发展，以达我之战争目的。

4. 组织战略机动

刘伯承同志曾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以装备与兵数劣势的军队对美帝国主义所装备的蒋介石现代化军队作战，由于我军富有特殊的机动力，善于在耗散敌人之中，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捕捉敌人弱点而不断围歼之，所以能够源源不断地俘获敌人的武器兵员以补充自己和强化自己。”这就说明了机动是趋利避害的行动，是灵活机动的表现形式。组织军队机动以建立新的战略部署，形成有利的战略态势，是战略指挥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马克思指出：“依靠出色的成功的机动，甚至使暂时的失败也成为有助于取得最后胜利的行动。”从平时转入战时状态，实施战略展开，在战争过程中进行攻防作战，都离不开军队的机动；一旦成功的战略机动，又都会造成全局的主动。现代战争，战局演变迅速，战

略机动更是获得战争活动的一种重要手段。

为保证战略计划的实现，要正确把握战略机动的时机，机动过早或过迟，不仅徒劳无益，甚至会损害战略计划的实行。现代战争特别是突发性军事冲突，情况发生快，变化快，稍一延误就可能丧失战机，酿成难以挽回的损失。因此，战略指挥要有很强的预见性，切实掌握敌人的动向，了解其行动特点，并同己方情况和地理条件等联系起来，选择战略机动的最佳时机。

适时和成功的战略机动，要有周到的计划和准备，要充分估计地形、道路（航线、航道）、天候、季节等对军队机动的影响，并根据军队装备和机动工具条件，选择最符合战略意图和最有效的机动样式，要大力筹集机动所需要的工具和器材，搞好交通保障。为了隐蔽机动企图，应加强同敌人侦察的斗争，切实搞好战略机动的伪装。

战略机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仅仅是军队由此到彼的移动，常常包含着一系列的作战行动。现代战争中进行大规模机动，随时有遭受敌人突然袭击的可能。为防敌空中袭击，应在已建立的战略防空体系的基础上，重点加强战略机动集团主要的集结（待机）和展开地区、海上、空中机动所使用的港口、机场、铁路、公路的重要区段和枢纽等的对空掩护。为了保障战略机动军队翼侧的安全，并及时予以支援，还应组织和协调相关战场配合行动。

5. 指导和协调战役行动

战役，是战役军团和战区内的地方部队，民兵，在统一指挥下，为达到一定的战略、战役目的，按照总的作战企图和统一计划，在一定的作战方向和一定的时间内，所进行的

一系列协调一致的战斗的总和。战役是达成战略任务的基本手段。战略计划须通过同时或先后进行的一系列 的 陆 上、海 上、空中战役才能实现。因此，战略指挥上不仅要精心计划和组织战略阶段全局的军事行动，还应当对战役作战加强指导，协调各战场，各战役之间的行动。

（1）指导和协调战役行动，须正确解决全局与局部的关系，着眼全局，战役行动才具有战略价值，同时又要细心考察战场的情况，使战略指导符合战役实际。在战争的各个阶段，战略指挥要按照全局的计划并充分考虑各个局部的情况，局部是全局的一部分，对全局有一定的影响，对各战区（战略集团）各军（兵）种规定作战任务，提出目标要求。特别是向新的战略阶段转变时，应区别不同情况，及时明确地给他们规定行动方针、作战重点（主要方向）和基本行动方法。在战争准备和实施的全过程中，应随时向各地区、各军（兵）种和有关方面提出战争的全面情况，使其了解全局，把战略全局的利益放在首位，只有了解全局，才能深刻理解战役在战略全局中的地位，才能自觉地服从战略全局，从而更好地处理局部，使战役行动更符合战略意图。战役指挥员在计划战役和决定战役行动时，应根据战略意图，在统一的战略计划下，坚决完成战略所赋予的任务。战役方针决定着战役行动的方向和目标，对战略意图的能否贯彻关系很大，战略指挥员应通过赋予或审定战役方针实施对战役的具体指导。战役方针可先由战略指挥员提出基本看法，征求战役指挥员的意见后加以确定，或是先由战役指挥员提出，而后由战略指挥员审定，有时甚至需要深入现地进行了解分析，再加以确定。对于两个以上战区或战略集团共同遂行的

对全局关系重大的作战，战略指挥员应直接负责组织指挥，或是派出代表或是成立专门领导机构进行组织指挥。

(2) 战争的胜利需要各种武装力量共同努力，需要军事行动同其他斗争相结合。在战争的各个阶段，战略指挥要
按照全局的利益，组织、协调陆军海军空军、战略导弹部队、武
装警察部队，民兵和其他力量的行动，使其互相密切配合，
形成强大的凝聚力。各个战场，每一个战役，都不是孤立的，
他们只有确实成为密切联系全局和局部，才能创造出战略的
效果。然而，战争的过程是复杂的，在统一计划下的各战场
各战役行动，并不一定都能按预想发展，各局部之间的
主从、先后、进攻与防御等等关系也常会变动的，因此，在战
略指挥上应善于适时调整他们的行动，从横向和纵向上加强
战场之间，战役之间的联系，努力追求全局利益的实现。在
我国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军委把握全局，指导局
部，非常出色地组织和协调了各大区的军事行动。如刘邓大
军挺进大别山开始前后，要求西北野战军攻打榆林，华东野
战军外线兵团向鲁西南，陈赓兵团向豫西出击；辽沈战役
时，为牵制平津之敌不使其出援，要求华东我军避免打很大
规模的歼灭战，每次歼敌不超过一两个整编师，同时要求我
华北野战军攻击平绥、平古线，以便抑留敌人于东北加以聚
歼。1948年11月上旬辽沈战役结束后，华北国民党军已成
惊弓之鸟。在平津战役即将发起时，为了不使平津之敌过分
孤立而自动放弃北京、天津、张家口，唐山等地，向南或西
南撤退，中央军委电示太原前线：“即停止进攻，进行政治
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太原前线解放军为
执行战略决战的统一计划，自11月中旬对太原改为长期包

困，逐步削弱敌人和开展政治攻势相结合，待机歼敌的方针，直至1949年4月20日，才对太原被围之敌全线发起总攻，24日战役即胜利结束。当淮海战役我军相继歼灭敌第七、第十二兵团后，杜聿明集团已陷入我军重重包围之中，面临绝境。此时，平津战役已胜利展开。为了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我淮海前线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停止了进攻，留下杜聿明集团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等等，这些协调行动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未来战争，陆上、海上、空中、外空、前方、后方、协调行动很复杂，任何一个方面如果出现不符合统一行动的情况，都将对全局造成损害，因此，在战略指挥上组织和指导各方面的协调行动也就更为重要。

6. 组织和指导战略后方工作

自古以来，有才能的军事家无不把后方保障视为兴兵打仗之本。后方保障，历来是军事行动绝不可缺少的重要方面。叶剑英元帅指出：“不论从现代战争的特点看，还是从客观实际看，后勤工作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重要。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决定战争的胜败。”如果只有作战行动的计划和组织，而没有正确的后方部署和良好的后方工作，战略计划是不完全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战略后方既是军队作战的依托，也是战争总体的一个战场。战略指挥员考虑作战就要考虑后方，部署作战就要部署后方。组织和指导战略后方工作，是战略指挥的重要责任。

（1）现代战争更需要充实的物质基础

现代战争，物资消耗快，需要量大。人员伤亡多，装备损坏

率高，因而对后方保障依赖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后方工作的好坏，关系到军队作战能力的强弱，影响到战争的进程和结局，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对于现代的军队，组织良好的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战略指挥在计划作战，确定作战目标、规模、方式、持续时间等问题时，应充分考虑后方保障能力的实际情况，同时，又要围绕战略意图向后方提出任务要求，指导战略后方及时地和大量地提供作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保障战略计划的实现。

（2）在战争过程中，战略指挥员要不断关心和掌握战略后方的情况，帮助其解决一些重大问题

战略指挥员要及时了解后方情况，听取后方保障的报告和建议，要关心和指导军工生产，加速把后方的经济潜力转化为现实的战斗力。要关心战略后方的稳定、安全，为其提供必要的掩护，指导战略后方反空袭，反空降作战。作战物质的准备程度，直接影响到作战计划的实施。如著名的斯大林格勒反攻作战，苏军最高统帅就通过现地检查发现了弹药、油料没有按时送到，而把反攻开始时间推迟了几天。其后的白俄罗斯战役，也因为物资器材未按规定期限送到前线而改变了战役开始时间。这类情况在战争史上是颇不少见的。借鉴这些经验，在举行重大作战时，一方面应督促后方保障系统迅速向主要方向、主要战场调集物资，一方面则应深入检查准备情况，按照实际情况对作战行动作出恰当的决定。

战争史告诉我们，最好的计划如果执行不力，也会毫无价值。就战争的谋略运用来说，从来不是千篇一律，一成不变的。相反，其变化多端，可以说是“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

河”。这不仅仅是因为战争有**时间、地点、天候**等方面的差异，而且还因为**敌我双方都在不断地变化着，我变敌也变，敌变我也变**。这就构成了战场上千变万化的复杂局面。计划一经确定，只要基本符合实际，全局情况没有大的变化，就要全力以赴地采取各种措施达成既定的作战目标。战略指挥员及其指挥机关，各军兵种和各个方面对战略计划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以保证战略计划的实现。

第十一章 战争中的政治工作

保卫祖国，准备打仗，是我军的根本任务。未来反侵略战争，是在现代条件下进行的。现代战争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如何把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运用到现代战争中去，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这是摆在我军面前的一个重大的新课题。研究未来战争中我军政治工作，必须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以我军战时政治工作经验为基础，着眼于现代条件下作战的新特点、新情况、新问题。历史经验证明，我军的军事战略中，每一个重大问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在总体上要符合政治战略的要求，而且在战争过程中，还要有强有力的政治工作给以保证。因此，研究和探讨战略问题，必须同时研究与之有关的政治工作，这是我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积累的一条重要经验。

第一节 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政治工作仍然是我军的生命线

强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战斗力的源泉，这是我军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实践所证明了的真理。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政治工作仍然是我军的生命线，这是无产阶级军队的本质和客观规律所决定的，是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能改变的。

一、历次革命战争，都证明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战斗力的源泉，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的重大因素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我军所以能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威武不屈，勇往直前，能以劣势装备打败国内外强大的敌人，主要是靠党的领导，靠强有力的政治工作，靠强大的政治优势。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党在军队中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保证红军的顽强战斗力，要取得四次反围剿和长征的胜利，那是难以想象的。正是由于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巨大作用，才使我军经受住严酷战争考验，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推翻蒋家王朝，取得全国胜利，政治工作又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抗美援朝战争，发扬了我军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志愿军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朝鲜军民一道，打败了凶恶的美国侵略军。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是继抗美援朝战争之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这次作战不论作战对象，还是我方情况，不论作战条件，还是国际环境，都与过去有很多不同的特点。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这个老传统，在这次自卫还击作战中又充分显示出它的威力。部队在很短的时间内顺利地由长期的和平环境转入战时，由对付过去经常较量的敌人转为首次对付苏联支持的越南侵略军，靠的是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广泛深入的政治思想动员；部队在战斗中争当尖刀，勇挑重担，披荆斩棘，痛歼顽敌，靠的是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参战部队充分发扬了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这种精神来源于革命的政治工作，来源于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

实践告诉我们，在现代条件下作战，始终保持坚定正确

的政治方向，保证党的绝对领导，保持无产阶级军队性质的重要问题。没有政治工作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就没有了生命；没有坚强的政治工作保证党的路线、方针的坚决执行，军队就会迷失方向；没有政治工作唤起广大干部、战士的无产阶级觉悟，干部战士就不能奋不顾身的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没有政治工作保证我军内部和外部的团结，保证在自觉基础上的严格的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军队就没有战斗力。因此，在未来反侵略战争新的条件下，政治工作仍然是我军重要法宝，它不但不能削弱，而是要加强。

二、未来反侵略战争，给政治工作带来了更艰巨的任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未来反侵略战争，由于大量的现代技术装备用于战场，战争的突然性、破坏性增大，人力物力的消耗增大，战场空间广阔，作战情况复杂多变，比过去的战争更要紧张、更激烈、更残酷。这就要求指挥员必须具有更高的政治觉悟和献身精神，更要发扬英勇顽强、威武不屈、前赴后继的战斗作风，更能吃大苦耐大劳，有藐视一切困难的革命气概，更加严格的组织纪律观念，更坚强的团结和高度统一集中。要做到这一切，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是不行的，战争越残酷，越激烈，越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空前激烈残酷的战争，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战斗情况，必须大大影响人的思想，产生剧烈的变化。摆在人们面前的，是生与死的严峻考验。人的无畏或恐惧，勇敢或怯懦，在战斗发展变化的关键时刻，对战斗的胜负，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未来战争既是经济力和军力的较量，也是政治组

织力和精神意志的竞赛。现代战争不但没有减弱对部队战斗意志的要求，相反更需要坚定勇敢、刚毅不屈，勇往直前的战斗精神。要使广大指战员具有这种战斗精神，主要靠平时的教育训练，也要靠战时顽强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好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和细致的思想工作，提高政治觉悟，有了正确思想指导，懂得为什么打仗，广大干部、战士才能经得住精神上、肉体上的严峻考验；才能情绪高，劲头足，决心大，信心强，骨头硬，无畏压倒恐惧，勇敢战胜怯懦；才能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战胜艰难险阻，忍受最大的牺牲和困苦，保证每次作战任务的完成。对于革命军队来说，任何强大的敌人是不足畏惧的，可怕的是思想上政治上的衰退和畏怯，战斗意志的削弱和丧失。所以，进行政治教育，做好人的思想工作，实在太重要了，没有这一点就没有战争的胜利。

三、武器装备越先进，越复杂，越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未来战争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并运用于军事领域，敌我双方的武器装备和作战方式都将发生很大变化。现代化武器装备精度越高，技术越复杂，速度越快，机动性越强，对人的要求越高。不但要有高度的政治觉悟和不怕牺牲的精神，而且要有更精更强的战术技术水平和高超的军事本领、指挥艺术，更紧密的团结协作。把具有高度无产阶级政治觉悟的人同现代武器装备结合起来，保证部队战术技术和干部指挥本领的不断提高，这是政治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政治工作贯穿到教育训练中去，深入到战场中去，就是要把人的因素和武器的因素紧密结合起来，使勇敢智慧与精通技术更好地结合起来，使个人的行动与整体要求更好地统一起来，这样才能如虎添翼，所向披靡。那种认为现代条件下的战

争，主要打的是现代技术，政治工作不重要了的说法，是非常错误的，极为有害的。现代战争中，不管武器装备怎样发展变化，人总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没有军队中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不提高人的政治觉悟，不搞好人与武器的结合，要赢得未来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第二节 战时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

战时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教育部队，不断提高指战员的士气和胜利信心；加强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严格军事、政治纪律，维护部队高度的集中统一；不断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增强军队内部和军政、军民之间的政治团结，保证举国上下，同心协力，共同奋战；配合军事打击，积极瓦解敌军；结合临战训练、作战、整训等项任务，培养部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连续战斗的作风；坚决贯彻执行战略方针和作战决策，保证完成党中央、中央军委赋予的各项任务。

一、广泛深入地进行政治动员，激励部队高昂的斗志和坚定的必胜信念

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是统一全军思想，充分调动战斗积极性，夺取战争胜利的首要条件，是战时政治工作的头等任务。政治动员的基本要求是鲜明、生动、有力、针对性强。要根据敌我双方的基本情况和作战任务，提出鲜明有力的号令、号召，明确奋斗目标；各战区、各军兵种要在上级总的要求下，根据自己所处的情况和担负的任务，提出具体的动员计划和要求；战争过程中，要根据新的情况和问题，

及时发出补充指示；对发生重大意外情况、军队和群众思想情绪比较复杂的战区和单位，上级机关和主要领导干部要及时奔赴现场指导工作，迅速稳定思想，鼓励斗志，要自始至终地及时准确的掌握部队的政治思想情况，分析和预见可能出现的思想倾向，予有准备的开展工作；对重大的政治、思想问题，要提出明确的政策和切合战场实际的措施。要使部队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顽强的战斗意志。政治动员的主要内容是：

（1）进行战争性质和前途的教育。使部队认清战争是战前敌我双方所实行的政策的继续。战争中各自追求的政治目的决定着战争的性质，战争的性质决定着战争的前途。敌人入侵我国，是它实行侵略政策的继续，是侵略性的非正义战争，必然遭到本国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反对。尽管有的凭借军事优势可能得逞于一时，但最终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我们抗击敌人侵略，是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侵略扩张，维护世界和平政策的继续，是保卫伟大祖国的正义战争，必然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国际上广泛支持。广大指战员认清了这一点，就会坚定必胜信念。

（2）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在以共产主义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上，把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教育，同无产阶级的人生观、战争观教育统一起来，培养广大指战员具有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高度的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坚贞的民族气节。同时，还要深入揭露敌人反华、侵略的罪恶历史，控诉敌人的滔天罪行，反复深入地进行仇视、鄙视、蔑视敌人的教育，激发广大指战员英勇杀敌的高昂斗志。

(3) 进行形势与任务教育。使各战区所有部队都明确自己担负的任务在战略全局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增强完成任务的光荣感和责任感；引导部队和人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问题，观察形势。不为敌人一时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全面客观地分析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实事求是地估量完成任务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正确理解与贯彻战略方针，做好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持久作战和独立作战的思想准备。

(4) 进行团结协同教育。全国党政军民的团结，军队内部诸军兵种之间的团结，这是我们的力量所在。要大力发扬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的光荣传统。军队要关怀和保护人民，人民要热爱和支持军队。在军队内部各军兵种间、各战略区之间、友邻之间、官兵之间要紧密团结，主动支援，密切协同。广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顾大局、识大体，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为了全局的胜利，要不惜做出最大的牺牲。

(5) 进行后勤保障在现代战争中重大意义的教育。全国军民和后勤人员都要深刻认识，没有良好的后勤组织指挥和充分的物质供应，就没有战争的胜利。要牢固树立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思想，千方百计，排除万难，完成各项后勤保障任务。同时教育部队和民兵、民工，要珍惜一枪一弹，认真做好保护和节约各种物资的工作。

二、做好组织工作，保证部队坚强持续的战斗力

强有力的组织工作，是保持部队战斗力，充分发挥人力、物力资源效能，支持长期作战，夺取战争最后胜利的重要保证。战时组织工作和干部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1) 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部队中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的我军战斗力的核心。要指导部队经常了解和掌握部队各级党组织的状况，及时健全各级党组织；善于利用战役、战斗间隙和休整时间，结合作战总结，对党委班子进行教育整顿，不断提高他们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和战略方针的自觉性；增强党性原则，维护党的纪律，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和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认真做好战时党员教育和发展工作，处理好党员数量和质量的关系；结合战时实际，把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精神文明建设经常化、具体化，不断提高党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活动能力，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2) 做好兵员和预备役干部的动员组织工作。根据现代战争的特点和要求，不断完善预备役制度和快速动员体制，以保证战争对人力资源的巨大需要；一旦发现战争征候，就应按照党和国家的指示，立即进行全民总动员，着重抓好适合青年和预备役人员的组织动员工作，迅速确定征召预备役人员的时机和措施，保证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扩编计划，组建起强大的预备军团；指导军队各院校、部队各级教导团，加强对新编、扩编和升级部队干部和技术骨干的教育训练，使新建部队能有效地进行战斗任务。

(3) 做好边打、边补、边训的组织工作，保证部队建制满员、指挥不断。统帅部、各战区和各战役集团军，要切实了解部队在战斗过程中的组织状况，做到随缺随补；指令各个部队迅速建立健全补训机构，加强对新兵和骨干的训练，保证新补兵员的质量；对于干部的缺额，除由军队院校培训输送外，各部队要注意从实战中识别、选拔干部；指导部

队大力开展军事民主，不断总结作战经验，提高指挥水平；根据现代战争的特点，改善干部的调配方法，简化干部的审批手续，以适应战争环境的要求。

（4）加强立功运动中的组织工作。要根据未来战争的特点，颁布战时立功条件，指导各军兵种部队紧密结合自己的战术、技术要求，做出相应的补充规定；不断提高部队对立功运动意义的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大力开展杀敌立功竞赛，号召人人立功，集体立功；注意立功运动的均衡发展，把前方和后方、机关和部队、干部和战士、特种兵和步兵，以及民兵、民工等都组织到立功运动中来；适时召开全国、全军性的英模大会，大力宣传英雄事迹，总结立功运动经验，掀起学习英模、争当英雄的热潮。

（5）加强部队的组织纪律建设，做到赏罚严明，令行禁止。要教育部队认清纪律是执行党的路线的保证，是我军军政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严格军事、政治纪律、干部要做模范；对严格执行政策纪律，完成任务出色的，要及时给予表扬或奖励，对违犯政策纪律，造成不良后果的，必须及时严肃处理。

（6）做好烈士、伤员和随军家属的工作。由于现代化武器的杀伤力和破坏力空前增大，烈士、伤员的数量会有很大的增加，认真做好他们的工作，对巩固部队的战斗力有重大的影响。要教育部队认真做好烈士的善后工作；对伤员要精心治疗，并鼓励伤愈人员迅速重返前线；由于长期和平环境，部队随军家属数量庞大，要指导部队设立专门机构，帮助他们疏散转移，并根据当时的物质条件，安排好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教育他们鼓励自己的亲人英勇杀敌，这对解除干

部的后顾之忧，巩固部队的战斗力具有重大意义。

三、加强战时保卫工作，同隐蔽的敌人作坚决斗争

同隐蔽的敌人作坚决斗争，是夺取战争胜利的重要条件。要在部队和群众中，广泛深入地进行防奸反特教育，提高军民的政治警惕，严格执行保密制度，严守军事机密，隐蔽我军作战企图；认真调查和掌握敌特活动的情况和特点，及时向部队通报有关敌情，采取有力措施，大力开展对敌政治斗争；军队、政府和各群众团体要密切配合，积极开展对敌情、我情的调查，严密监视可疑人员，加强对反坏分子的控制。及时揭露敌人的心战阴谋；对诋毁军队、给我军行动设置困难，制造谣言动摇军心者，要根据情节和后果给予严厉制裁；指导部队有重点的进行政治审查，把平时一贯表现和战场上的行为结合起来，既要提高政治警惕，又不能无根据的怀疑；对政治上可疑人员，要根据事实、情节和性质，分别予以重点教育、组织看管直至调离部队；对投敌、变节分子必须紧急处置；认真抓好部队的管理教育，不断密切官兵关系，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预防各种政治事故，防止非战斗减员。

四、做好民兵、民工和战区群众的政治思想工作，发挥军民的整体威力

人民战争是我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法宝。要教育部队树立坚强的群众观念和政策纪律观念，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模范地遵守政府的各种法律法规，尊重人民群众的风俗习惯，发扬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密切军政军民关系，指挥部队切实了解战区群众和民兵、民工的政治思想情况，明确政治动员的内容要求；指导群众搞好防空

袭、防核、防化学、防生物武器袭击，疏散转移，以及抢救受伤、遇难群众等工作；正确处理支前和生产、军需和民用的关系，合理安排支前和生产的人力、物力，既满足军队和前线的需要，又照顾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从战争的长期性出发，保护和发扬人民群众的支前积极性。民兵、民工是军队的强大后备力量和有力助手，除直接担负游击作战和各种繁重的战勤任务外，有的还要随部队远距离、长时间地进行各种战斗和战勤任务。在民兵、民工中，必须建立党、团、组织，设政委、指导员，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及时传播胜利消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开展立功运动，介绍军事常识，互相交流经验，严格组织纪律，提高其完成任务的能力。

五、配合军事打击，积极瓦解敌军

毛泽东指出：“我们的胜利不但要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还要依靠对敌军的瓦解”。要提高全国军民对瓦解敌军工作重大意义的认识。加强敌军工作部门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提高其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指导部队抓紧对敌军的调查研究，掌握敌人的内部矛盾，提出瓦解敌军的方针、政策，及时向部队提供敌情资料，交流敌军工作经验；指导部队利用各种有利战机，配合军事打击，采取多种手段，加强对敌宣传，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教育参战部队认真打扫战场、搜集敌军资料、文件，积极捕获战俘，迅速上报审俘结果，严格执行宽待俘虏的政策，不打骂俘虏，不侮辱俘虏人格，不没收俘虏私人财物，尊重他们的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严禁枪杀俘虏；设立俘虏管理机构，加强对战俘的管理教育，并利用俘虏进行反战宣传，揭露敌人的阴谋和造谣诬蔑。

第三节 对战时政治工作的要求

未来反侵略战争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现代人民战争。为此，对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治工作的任务是艰巨的。为了胜利地完成各项任务，政治工作必须具有原则性、预见性、政策性、时效性、群众性以及创造性。

一、坚定的原则性

未来反侵略战争的特点，要求政治工作必须具有原则性，才能保证军民在战争的任何艰难复杂情况下，坚定不移，毫不动摇地去克服万难，夺取战争的胜利。

军队必须坚持政治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原则。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军的政治工作在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人民战争理论的指导下，形成了一套基本方针和原则。这主要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中心环节；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发扬政治、经济、军事民主；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等。这些基本方针和原则，体现了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反映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本质要求。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坚持和发展这些原则，仍然是提高军队战斗力，进行人民战争，夺取未来反侵略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

我们党一贯提倡既要有坚定的原则性，又要有工作的灵活性。在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因时，因地制宜，灵活地开展工作。毛泽东说过，“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

之妙’。”（《毛泽东选集》第462页）这里讲的虽然是军事指挥艺术，但同样适用于政治工作的领导艺术。原则的坚定性和工作的灵活性，是对立的统一。两者的关系是原则性决定灵活性，灵活性为原则性服务。战争中，情况瞬息万变，灵活性具有更大的重要性。政治工作应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充分发扬灵活性。

二、科学的预见性

政治工作的科学预见性，首先是要预测未来反侵略战争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扎扎实实地做好战争爆发前的准备工作。要加强全国军民的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使人人懂得“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道理，牢固树立起时刻听从国家的召唤，奔赴战场报效祖国的思想。深入持久地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提高革命军人的荣誉感，在全民族造成当兵光荣、卫国光荣的尊重、爱护、支持人民军队的社会风尚；要适应世界先进军事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形势，预见今后若干年军队建设和未来战争的要求，加强干部队伍建设，造就大批具有现代军事科学知识、掌握现代战争指挥艺术的人才。

战时政治工作的预见性，更重要的是表现在，在战争过程中，根据各种不同环境，深入分析可能出现的可能思想和组织方面的各种问题，据以作出开展政治工作的计划、方案。主动地有针对性地把工作做在前面。

科学预见的关键，在于把握事物的客观规律性。战争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战争虽然较之别的事物可知性更少些，但仍然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对战争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做出大致的预测，提出些基本要求则是可

能的。这就要求政治工作应加强战争中思想变化规律性的研究，提高战时思想变化发展的科学预见能力。

三、高度的政策性

未来反侵略战争既主要是军事斗争，也是敌我双方之间各种非军事力量的较量。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党和国家将制定出动员全国军民战胜侵略者的各种政策。战争期间，政治工作一方面要教育全体军民坚决贯彻执行这些政策，另一方面要在自己的工作中，模范地带头执行政策。还要根据总的政策制定出有关政治工作方面的一系列具体政策。这些具体政策应有利于赢得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分化、孤立和打击敌人，保证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在政治工作的组织实施中，应特别强调掌握政策。要对广大政工人员深入地进行政策教育，不断地提高他们的政策水平；还要加强对执行政策的检查和监督。

四、极强的时效性

未来战争战场情况变化急剧，作战任务转换迅速，为适应这种情况，政治工作必须具有高度的时效性。各级政治机关和政治工作干部，必须精干、灵活、反应敏捷，快节奏、高效能地进行工作。要努力做到：第一、反映情况要快。战争中的政治思想领导与战争中对各种政治思想情况及时、准确、全面地反映信息有关。只有通过各种渠道和方法及时地把广大群众的思想反映和心理状态迅速搜集上来，如实地上报各级领导机关，才能沟通上下之间的思想，密切领导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及时取得上级机关的指导。第二，工作节奏要快。要充分利用现代化通信工具及时反映情况，下达指示，

尽量简化工作程序，节省工作时间；善于抓住各种机会，利用各种间隙，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工作。第三，解决问题要快。对发现的问题要及时予以解决。为此，政治工作机关要深入前线，加强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帮助部队解决实际困难。对于下级请示问题的答复，要力求做到及时、明确、切实可行。第四、总结交流经验要快。要善于一面工作，一面总结交流经验。不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失败的教训，都要及时通报部队。

五、广泛的群众性

未来的反侵略战争是在广大空间进行的现代人民战争，要保证全体军民万众一心，群策群力地打击敌人，政治工作必须具有广泛的群众性。要把所有军事干部、技术干部、后勤干部和广大党员、团员都发动和组织起来，保证在各种情况下，在各个环节，各个战斗岗位上，都有人做政治工作。同时，要广开渠道，动员全社会以健康的社会意识去激励民心士气，尽力减少各种消极因素对军民的影响。这样，才能使前线与后方、军队与人民，相互鼓励，相互促进，把前方作战和后方生产一齐推向前进。

政治工作的群众性，还表现在领导方法上要认真贯彻群众路线。发扬军事民主，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方法，集中群众的智慧，克服在战争中所遇到的各种困难和问题。

六、积极的创造性

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敌我斗争异常尖锐复杂，各地区各战场情况千差万别，无论是战争的全局，还是每一个局部、每时每刻都有新的问题发生，这就要求战争中的政治工

作必须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有积极的创造性。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一方面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政治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在认真调查研究现代战争特点和敌我双方政治情况的基础上，创造性的开展工作。要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继承和发展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我军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形成的许多战时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应该认真地学习它、继承它、发扬它。同时，要在斗争实践中，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不断地有新的发现和突破，不断地开辟政治工作的新途径，使政治工作始终充满着发展和前进的活力。

[General Information]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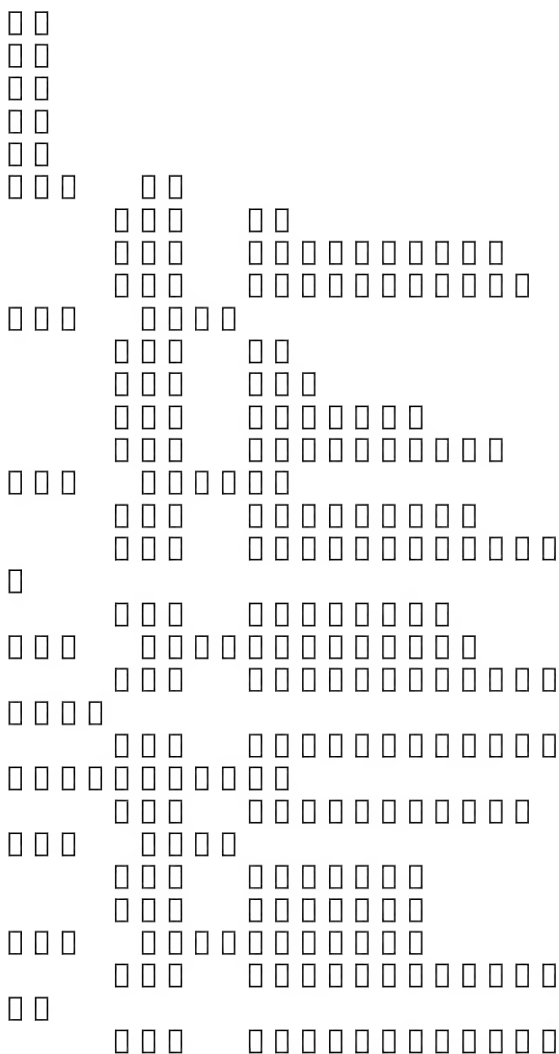
□□=□□□□□

□□=409

SS□=11096889

□□□□=1990□06□□1□

□□□=□□□□□□□□



[illegible]

□ □ □

□ □ □ □ □ □ □ □ □